苏联国内
资本主义复辟纪事

1953—1973

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

（1953—1973年）

柯　　雄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

(1953—1973年)

柯　　雄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0印张　411,000字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2·176　定价1.55元
(内部发行)

编者说明

我们试编这本《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以下略称《纪事》)，是想通过大事记的形式理出一个脉络，来说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修正主义者篡夺党政大权后是怎样变质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以供有关同志对苏修进行研究、揭露和批判时作参考。

《纪事》围绕苏修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这个中心问题，主要收集了1953年3月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到1973年年底苏修叛徒集团的党、最高苏维埃、政府通过的有关重要决议和措施，这个叛徒集团的主要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有关言论以及苏联报刊上的有关观点，这些材料着重反映了苏修叛徒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同时，一并编入了可以说明以上问题和反映这一时期苏联国内重要事件的其他一些材料和情况。

《纪事》中的材料，按年、月、日顺序编排，每年之前冠以当年事件的提要。提要中还简单地附入了当

年有关的重大国际事件，以说明当时的国际背景。为便于读者阅读，文内另加了若干编者按。

《纪事》中的材料，主要选自苏联报刊、书籍。如要引用《纪事》中的材料，务请核对原文。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材料来源有限，《纪事》是很不完善的，每年的提要也可能有不准确、不妥当的地方，希望得到指正。

1975年7月

目　　录

1953年……1
1954年……13
1955年……20
1956年……35
1957年……54
1958年……87
1959年……106
1960年……125
1961年……143
1962年……168
1963年……208
1964年……233
1965年……260
1966年……301
1967年……337
1968年……391
1969年……423
1970年……460
1971年……504
1972年……542
1973年……587

1953年

3月5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逝世。赫鲁晓夫这个早就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迫不及待地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立即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开始篡夺党政领导大权。他利用“贝利亚事件”和“医生间谍案件”，处决了内务部的一大批高级干部，逐步控制了这个重要的专政机关。他迫使马林科夫辞去了苏共中央书记一职，自己窃据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在苏共中央9月全会上，赫鲁晓夫从农业方面开始大大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肆宣扬“物质利益原则”，鼓吹发展私人经济。他在报告中还不指名地攻击了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政策。

3 月

3月5日 晚上九点五十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共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逝世。

3月6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发表决议：

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任命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决定把部长会议中的两个机构，即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改为一个

机构——部长会议主席团，主席团由以上五人组成。

建议由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解除什维尔尼克的这一职务。

决定把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合并成内务部；任命贝利亚为内务部部长，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部长，布尔加宁为军事部部长。

确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主席团候补委员为：尼·什维尔尼克、麦·波诺马连科、拉·麦尔尼科夫、麦·巴吉罗夫；由以上十四人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

选举斯·伊格纳捷夫、彼·波斯别洛夫、纳·夏塔林为苏共中央书记。

"认为有必要"使赫鲁晓夫"集中精力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解除他的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解除列·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任命他为海军部政治部主任。

3月1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批准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二）选举下列人员组成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夏塔林、伊格纳捷夫。

3月15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第四次会议，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3月6日联席会议《关于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名单»的决议。

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会上提出了关于部长会议组成名单的建议。其中，建议把军事部和海军部合并成国防部，由布尔加宁任部长。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建议。

3月27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大赦令，认为“凡曾犯有并不构成对国家的巨大危险的罪行、而又能以其在工作中的诚实态度证明可以重过诚实的劳动生活并成为社会上有用成员的犯人，已毋需将其继续拘留在拘留处所”，因此，予以释放。但“大赦不适用于因犯有反革命罪、盗窃巨额社会主义财产罪、抢劫罪及谋杀罪而被判处剥夺自由五年以上的犯人”。

3月31日 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决定，规定自1953年4月1日起，再次降低食品和制成品的国家零售价格，减价幅度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五十。这是战后第六次降低物价。

4 月

4月4日 内务部发表通告，宣布今年1月间公布的对国家保安机关破获的医生间谍恐怖集团的控告“是不真实的”，因此恢复这个案件中的一切人的名誉，并予以释放。《真理报》4月6日就此发表社论，说“这件事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前国家保安部的领导人是不合标准的”。前国家保安部部长斯·伊格纳捷夫“表现了政治盲目性”，他“做了当时负责侦讯、现已被捕的前副部长……柳明之类罪恶冒险家的尾巴”。“柳明之流企图假手于他们所捏造的案情在苏联煽起民族仇

恨”。“前国家保安部机关穷凶极恶地违犯苏维埃法律”。

4月8日 苏共中央决定解除斯·德·伊格纳捷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4月11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苏联各部部长权限》的决议。

4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六期就“医生案件”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冲突，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相互敌对的阶级和社会集团”。“苏联早就消灭了敌视社会主义的剥削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妄图进行反对苏维埃国家的破坏活动，他们不可能在我们国内找到任何有力的社会支柱”。

7　月

7月10日 塔斯社报道，几天前，苏共中央举行了全会，在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维埃国家、背信弃义地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和反国家活动的报告之后，决定把贝利亚从苏共中央清除出去，并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开除出苏共。

7月11日 莫斯科各报刊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解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并把他的案件提交最高法院审理的公告。

7月11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谢·涅·克鲁格洛夫为内务部部长。

7月26日 苏共中央发表《庆祝苏共五十周年（1903—1953年）宣传提纲》。

8 月

8月8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五次会议，马林科夫在会上作报告。

他在报告中谈到过去几十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说今后“将继续用各种方法发展重工业”，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石”。他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在重工业发展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已有了一切条件来迅速提高日用品的生产量”，“用各种方法加速轻工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这样做”，必须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我们的任务是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作急剧的转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

马林科夫说，同时，必须使“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以便在“今后两、三年内”生产“充足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党中央认为，为此必须采取“若干广泛的措施”，“首先是在发展农业落后部门中增加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认真地纠正和改变我们对集体农民私人副业的不正确的态度”。因此，“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大大降低集体农民私人副业义务交售的标准，并决定，修改集体农民农业税征收制度，每一个集体农民家庭的现金税平均减少约二分之一，并把过去几年中没有付清的农业税尾

数完全取消”。

8月11日 最高苏维埃通过新农业税，规定从1953年7月1日起，不管集体农庄农户在私人经营方面获得多少收入，一律按照百分之一公顷土地的固定税率向他们征税。降低没有奶牛的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税额（1953年减征税额百分之五十，1954年减征百分之三十），同时取消他们过去对国家的农业税积欠，以鼓励他们发展私人副业和购买奶牛。

（按：1954年出版的卡赞切夫著《苏联新农业税法》一书中说，实行新税法后，农民缴纳的税额1953年比1952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三，1954年比1952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新的税收制度正在促进着集体农庄庄员更加集约地进行自己的副业经营，更加充分地利用宅旁园地的全部面积”。“对自己的宅旁园地利用得好的农户，就会由于新农业税法的施行而获得更大的利益”。同时，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1953年私有牲畜中，乳牛增加了百分之四，羊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猪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七。）

8月12日 苏联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

9 月

9月3—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谈到"农业许多重要部门落后"的原因是：(一)过去"忙于国家工业化"，把"主要力量和资金"用于重工业，"当时没有可能保证"重工业、农业、轻工业"同时迅速发展"，没有为此"创造必要的前提"。(二)"违反了作为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的物质利益原则"。(三)"违反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关于允许"每个集体农户都有权拥有小规模的经济作为个人财产"这个"最主要的原则"。(四)技术设备"利用得不能令人满意"。(五)农庄、农场和拖拉机站缺乏"有经验"或"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六)政治工作和经济任务"脱了节"，政治工作"必须同经济任务结合起来"。

赫鲁晓夫说，现在"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继续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求得农业所有部门的迅速高涨，并在今后两、三年内大大增加"食品供应，同时"把全体集体农民的物质福利提到更高的水平"。他还说，为了发展农业，必须"提高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必须完全终止在私有牲畜方面侵犯集体农民利益的不正确作法"。不许职员和工人发展私有牲畜是"一种偏见"。因此，必须提高农畜产品的国家征购和收购价格，降低集体农民、工人、职员畜产品义务交售定额和农庄马铃薯、蔬菜交售定额。这样，"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将有更多的剩余产品以较高的收购价格和集体农庄市场价格出售"。为此，必须修改现行收购制度，改行"合同制度"。

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其中规定：(一)应严格遵守"按公顷计算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原

则”，认为按头数交售就会使先进农庄吃亏。（二）提高畜产品、蔬菜、马铃薯的国家征购和收购价格，降低私有牲畜向国家义务交售的标准。（三）“彻底纠正那种损害集体农民在私有牲畜方面的利益的有害办法”。为了使农庄庄员易于获得牲畜，根据卷案记录，凡在1953年6月15日还没有牲畜的集体农民，在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一年内都不必交售肉类。取消集体农民、工人、职员在1953年1月1日以前的历年中所积欠的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私有畜产品。（四）降低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蔬菜和马铃薯的标准。（五）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程度，等等。

9月15日 苏联成立几个新的部：食品工业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国营农场部等，以保证增加消费品生产并改进贸易工作。

任命佐托夫为食品工业部部长，柯西金为日用工业部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兼任商业部部长，伊·卡巴诺夫为对外贸易部部长。

任命阿·科兹洛夫为国营农场部部长，解除他的农业和农业储存部部长的职务。任命伊·别涅吉克托夫为农业和农业储存部部长。

9月21日 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畜牧业和降低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所饲养的牲畜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定额》的决议。

决议说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不好”，并规定了最近一、两年的发展指标和措施。主要措施有：

（一）关于鼓励私人发展畜牧业：1．责成各级领导人协助

农庄庄员购买牲畜、家禽，并通过按劳动日分配饲料和提供牧场的办法，保证农庄庄员私有牲畜得到饲料；责成地方有关部门在国家的空地上、国家林区土地上、征用铁路和公路的地带以及工人住宅区的土地上，为工人和职员的私有牲畜拨出牧场和刈草场。2．降低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私人副业现行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畜产品定额。3.凡在1953年6月15日前没有奶牛的农庄庄员，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全年免除向国家义务交售肉类，自1953年下半年起免除农庄庄员、工人、职员、个体农民和其他公民经营副业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羊皮，免除城市居民和工人村居民应义务交售的牛奶，自1953年起免除农庄庄员和其他公民经营副业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乳酪；取消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经营副业在1953年1月1日以前历年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畜产品的积欠部分。4.全部免除一些人向国家交售肉、蜜、毛类和猪皮的义务，其中包括：农村中小学教师所经营的副业，“具有专业知识”并在农村中的企业、机关和团体里工作的各种农业专门人材和医务人员所经营的副业，农业机器拖拉机站、专业技术服务站、国营农场及其他国营农业企业的站长、场长、副站长、副场长、工程技术人员所经营的副业（按：上述人员必须为该户户主或该户唯一的劳动力，私有牲畜数目又未超过一定限额者，始能享受此优待），各机关、企业和团体派往集体农庄工作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中被选为农庄主席者所经营的副业，等等。

（二）关于畜产品收购：1．必须从1954年起严格实行集体农庄按公顷计算的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固定定额。2．提高国家的畜产品收购价格。3．取消集体农庄在1953年1月1

日以前历年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全部畜产品的积欠部分。

(三)还规定了一些措施,以提高农庄庄员“在发展公共畜牧业方面的物质利益”。

9月29日 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1953—1955年增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马铃薯和蔬菜生产量及收购量的措施》的决定,其中规定从1953年起提高这两种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

10 月

10月1日 莫斯科各报刊登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措施》的决定,规定除了现有的工作报酬和奖金制度以外,拖拉机队的工作人员将自本年10月1日起获得现金报酬。

10月23日 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发表《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贸易的措施》的决定,其中规定:(一)在两、三年内,保证在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农业区不间断地销售居民所有必需的商品。(二)以百分之二十五的超额利润作为企业和经济组织的临时补助费,对上缴预算的超额利润可以重新制定计划。

10月28日 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并改进其质量》的决议,认为必须在今后两、三年内大大加速轻工业的发展,以便生产足够的日用品,并且大量增加这些物品对居民的供应量。

10月30日 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扩大食品

生产并改进其质量»的决议，规定在最近两、三年内要迅速提高肉类和肉制品、鱼类和鱼制品、油类、糖、糖果、罐头和其他食品的产量和供应量。

12　月

12 月 17 日　塔斯社报道，鉴于最高检察署已确定弗·尼·麦尔库洛夫在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机关任职期间所犯的反国家罪恶活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部长会议 7 月 17 日的建议，已撤销麦尔库洛夫的国家监察部部长的职务，并将他的案件提交最高法院审理，同时任命瓦·热沃隆科夫为国家监察部部长。

12 月 24 日　塔斯社报道，12 月 18—23 日，最高法院秘密审理了贝利亚等人的刑事案件。

法院确定："贝利亚的罪状是"：(一)"背叛祖国"，"组织了一帮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叛国阴谋分子"，企图"利用内务部的机构来反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把内务部放在党和政府之上，以便夺取权力，瓦解工农苏维埃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二)"还在国内战争时期"，贝利亚就开始同"外国情报机关建立了秘密的联系"。斯大林逝世后，他"指靠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反对苏维埃国家活动的普遍加紧，开始加紧他的活动，以实现其反苏叛国的阴谋"。(三)道德极其堕落。(四)"对忠实于共产党和苏联各族人民的政治活动家进行恐怖迫害，并在 1919 年积极破坏巴库工人革命运动"。

根据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贝利亚、麦尔库洛夫、

弗·德卡诺佐夫、布·柯布洛夫、斯·戈格利泽、帕·麦希克和拉·弗洛齐米尔斯基已于12月23日被处以极刑——枪决。

1954年

这一年，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大规模开荒的决议，认为这是“最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赫鲁晓夫集团还提出了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以及从财政上鼓励资本主义倾向的主张和措施。

在政治方面，赫鲁晓夫开始排挤斯大林时期的干部，主张把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拔到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去，而“坚决撤换”所谓“缺乏知识修养”、“不称职”的人。

11月，苏联东欧八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就10月份西方国家签订关于德国问题的巴黎协定讨论“欧洲和平和安全问题”，并发表了联合宣言。

1—2月

1月28日 赫鲁晓夫在全苏农业拖拉机站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关键在于干部，而且仅仅在于干部。这是提高农业、改进拖拉机站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工作中的这个重要方面是落后的。”“我们还有很多缺乏知识修养的人担任拖拉机站的领导职务。在拖拉机站的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只受过初等教育。”“今后的方针是：拖拉机

站站长一般都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不少拖拉机站站长不称职。我们认为，这样的人应当坚决撤换。”“我知道，某些所谓老人，即拖拉机站的老工作人员要说：‘怎么回事，以前我们也被人重视，现在变了，非要工程师不可。那我们去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事业是我们创办的。’不错，同志们，拖拉机站是我们同许多人一起创办的。但是，你们回忆一下，当我们共同创办这个事业的时候，拖拉机站的情况也和今天不同。”“有些同志对于拖拉机站的意义及其在中央9月全会决议后所负的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

2月15日 赫鲁晓夫在俄罗斯联邦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干部问题具有特殊意义。事业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谁在主持农庄和农场”。“我们需要熟悉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的干练的、内行的干部。”“我们应该努力把有才能的生产组织者，首先是把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提拔到农庄、拖拉机站和农场的领导岗位上去。但也不能不注意积有丰富经验的实际工作者。应该让他们到训练班去学习。”他说，在9月全会以来的短时间内，“已派出二万一千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到农业中去长期工作”。“还给农庄和农场送去了十万多名农艺师。”

2月19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将克里米亚州由俄罗斯联邦划归乌克兰共和国。

2月23日—3月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及熟荒地》的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从“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时期

起，经济建设问题就一直是它的对内政策的中心”。“目前，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来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

关于农业，他说，“一般说来，我们的国家已能满足本身对谷物的需要”。但谷物生产水平“尚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一切需要”。除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外，“增加谷物生产主要的、最容易做到的和最迅速的办法”，就是大规模开荒，以扩大谷物播种面积。

赫鲁晓夫批评各地“墨守陈规地采用草田轮作制”，要求“改正”这方面的“错误”，建议扩大玉米播种面积。他批评农业各部门“计划工作过分集中”，说“过分集中就会阻碍现有潜力的发挥，抑制集体农庄庄员们的主动性，并会减低他们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中的兴趣”。他说，“我们应当建立这样的计划制度，即一方面能够保证国家有计划地领导农业的发展，同时也能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其中规定：要在 1954—1955 年开垦一千三百万公顷荒地，在这两年要使谷物总收获量“大大增加”，使国家谷物征购量和收购量比 1953 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四十。决议指责现行农业计划制度“过分集中”，“限制了”农庄、农场的“生产主动性”，因此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部、国营农场部与各加盟共和国商议并于两个月内提出改变农业计划制度的建议，提交部长会议审定。同时规定严格执行按公顷义务交售谷物的原则。

3—4 月

3 月 13 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成立部长会议国家

安全委员会。

3 月 31 日 塔斯社报道，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发表《关于再次减低食品和制成品国家零售价格》的决定。这是战后第七次降价。

4 月 20—27 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讲话。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说，“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不放松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急速提高农业，大力增产消费品，要在最近两、三年内供给居民以足够的工业品和食品，大大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按：马林科夫在讲话中未提重、轻、农关系问题）。

5—6 月

5 月 6 日 塔斯社发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通告。通告说，“1950 年 1 月 10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布的《关于对祖国叛徒、间谍、破坏者施用死刑》的法令，适用于在加重情况下故意杀人者”。

5 月 爱伦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攻击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将斯大林时代称为“冰冻时期”，把斯大林逝世说成是苏联社会的“春暖解冻”。

6 月 23—24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除原订的开垦一千三百万公顷荒地外，“应当再开垦一千五百万公顷”。批评一些说“能不能等一等”的人，说“对此不必有任何怀疑”。说一、两年内，要减少中央对非黑土

地带各州的技术设备的供应，而把大部分设备送到新垦区，“是绝对合理的”，因为“最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就是利用荒地，往那里投资“最有利”。说今后“粮食的主要来源将是西伯利亚、哈萨克、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把现在主要是产粮的许多地区改种其他收入更大的作物“是适宜的”。

6月24日，全会通过相应的决议。其中规定：(一)从1954年收获期开始，免除有宅旁园地的集体农庄庄员、工人、职员、渔业和工艺劳动组合成员个人经营部分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的任务。同时，取消他们所积欠的义务交售的全部谷物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全部实物报酬。(二)从1954年收获期开始，降低集体农庄原定义务交售的谷物和油料作物的定额，以便使农庄能以较高的国家收购价格向国家出售这两种农产品。

6月27日 苏联宣布建成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

8　月

8月13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以增加谷物生产》的决议。

8月21日 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苏联国家银行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决议规定：

(一)责成国家银行对企业和组织的生产、贸易和积累计划的完成情况，降低成本任务的完成情况，对它们自己的和借贷的流动资金的专用情况，以及对支付纪律的情况加强监督；

在经常监督的基础上揭露企业和组织的经营和财务活动中的缺点，要求工作薄弱的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健全经营和财务工作，向部长提出那些玩忽职守的领导人的问题，要求他们制订出具体措施使这些工作薄弱的企业和组织真正健全起来。

(二)必须修改对企业和组织的贷款制度，取消现行的对好的和不好的企业以同样条件给予贷款这种不正确的贷款办法。

(三)让国家银行有权对那些没有完成降低成本任务、没有完成积累计划、造成超计划亏损和没有保持自己的流动资金的企业全部或部分地实行一种特殊的结算贷款制度。

(四)为了对那些完成规定的积累任务或没有超计划亏损和保持自己的流动资金的工作良好的企业和组织给予临时的财务帮助，国家银行机关可以在贷款方面给它们以优惠。

(五)授权国家银行可以提供基建投资计划未规定的机械化和采用新技术所需要的贷款，及时划拨预算交款，规定由企业的结算户和往来户划拨款项的手续。

11—12 月

11 月 11 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在居民中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说，“苏共中央搜集的事实证明：最近有些地方在对居民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时犯了粗暴的错误”。决议责成各级地方党组织坚决消除这些错误，并在今后“绝对不容许再次发生任何侮辱教徒和教

会执事的感情以及用行政手段干涉教会活动的事情”。

12月25日 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继续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的措施》的决议。

1955年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政大权的野心又前进了一步。他在苏共中央1月全会上利用所谓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比例问题，对马林科夫进行影射攻击，随之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把部长会议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赫鲁晓夫在经济方面也进一步推销他的修正主义货色。他提出了“对社会的一切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的论点。在他的策划下，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实行“以商品产品的产量为出发点”的“新计划制度”，以简单的商品订货合同代替国家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集中统一的计划领导。同时通过一系列决定、命令和措施，扩大苏联各部部长、地方领导人和企业经理、厂长直至工段长和工长的权力，允许企业各级领导有权随意处分、开除工人及决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允许企业自由出售所谓“多余的”生产资料。

这一年，苏联在欧洲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最高苏维埃于1月发布关于结束苏联同德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命令。5月，苏联同东欧国家签订华沙条约；同月，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同铁托一起发表了苏南联合宣言。6月，批准苏联承认奥地利中立并撤退驻奥地利苏军的条约。9月，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赫鲁晓夫要阿登纳帮助“对付赤色中

国”。11月，苏联和西德建立外交关系，同月，赫鲁晓夫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

1　月

1月5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批评党的工作人员中“缺乏创造精神、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社论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以党组织固有的方法解决经济任务”。说“这就要求他们善于把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

1月25—3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关于增加畜产品生产的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首先强调了大力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并就这个问题不指名地对马林科夫和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批评”。他说，“象过去一样，党认为发展重工业是首要的任务”。在“列宁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斯大林”的领导下，党“曾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发展重工业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现在和将来“也仍然要坚决执行这条路线！”

他说，近来一些人“在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起来了”，“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把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释，他们企图引用这个规律来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个阶段，发展重工业好象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则可以而且必须比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这是与列宁主义敌对的观点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

林那一伙人就曾经宣传过这种观点”。

他说，“我们必须进行斗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可以满足于现有的重工业发展水平、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人们”。他还说，在帝国主义正疯狂备战的“当前条件下，散布上述那种反列宁主义的见解是特别不能容许的”。

赫鲁晓夫接着谈到了发展谷物和畜牧业生产、改进农产品收购工作等问题。他提出必须使谷物总产量达到一百亿普特（按：合一亿六千三百八十万吨），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及国家“必要的粮食储备”。他还提出了到1960年的各种畜产品的增长指标，说在计划畜产品产量时，应依据按一百公顷土地计算的原则。说从今年开始，“必须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编制关于播种面积和发展畜牧业的计划”，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由上级发给每一地区一个种植谷物的计划和一个按照牲畜品种发展畜牧业的计划”这种方法，而改行“意味着农庄和农场将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商品为出发点”的“制定计划的新方法”。关于农畜产品的收购，说在“统一的供应工作”中，即农畜产品的分配中存在着“类似平均主义的东西”。说应实行“以生产原则为基础”的全国农畜产品“供应制度”，即要按照各地利用生产潜力和给国家供应产品的情况来分配农产品，说这样的分配制度“是完全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的”。

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其中规定：到1960—1961年使谷物总产量达到一百亿普特，以便用四十亿普特（按：合六千五百五十二万吨）谷物发展畜牧业；同1954年比较，到1960年肉、奶、油脂产量应增加一倍，蛋类增加一点二倍，羊毛增加百分之八十。征购量应增加：肉——最

少百分之六十，猪——一点八倍，奶——百分之八十，蛋——二倍以上，羊毛——一倍。

决议认为，现行的由国家向全国商业系统统一分配农畜产品的制度，未考虑各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不同的生产水平，往往使生产先进地区吃亏，是"平均主义的"，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因此须要改变。决议责成国家计委、农业部和商业部于 1955 年 7 月 1 日以前，提出改变农畜产品供应制度的建议。

2 月

2月3—9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2月8日，马林科夫在会上提出解除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申请"。申请书说，为了"加强部长会议的领导"，"由另一位对领导国家工作富有经验的同志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是适当的"。"由于我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我没有在部里或任何经济机关中直接管理过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这就对我执行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复杂和责任重大的职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特别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和对农业中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所要负的责任。因为在这以前的好几年中，我一直负责监督和领导中央农业机关的工作以及地方党和苏维埃组织在农业方面的工作"。"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和领导下，已经制订出了关于克服农业中的落后状况并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农业的总纲领。这个纲领是以这样一个唯一正确的原则为依据的，即继续尽力发展重工业，并且只有实现这一点

才能为一切必需的消费品生产的真正高涨创造必要的条件”。会议接受了马林科夫的“申请”，并于2月9日通过任命他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的决议。

接着，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任命布尔加宁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赫鲁晓夫说，以布尔加宁为首的部长会议“一定能够胜利地解决进一步加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使轻工业、农业“获得新的高涨”的问题。

会议一致通过了任命布尔加宁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决议，并解除他的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提升国防部副部长朱可夫为国防部部长。

布尔加宁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高涨的基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重工业”。“党在和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走狗进行的尖锐斗争中捍卫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政府在经济方面今后仍要坚决实行共产党规定的尽力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在进一步发展重工业和提高农业的基础上，我们将扩大消费品和居民文化用品的生产”。

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报告，说“早在战前时期，社会主义就已在我国获得胜利”，战后苏联“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2月18日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党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集体农庄干部和他们的工资问题。他说，“我们至今有百分之三十的集体农庄是由能力不强的主席领导的”，应撤换他们。他说，“一些集体农庄主席”不听话，“你说东，他们偏说

西"。因此，"可不可以任用三万名""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人"到农庄去工作。这些人的工资"每人每月二千卢布"(按：合新币二百卢布)，先由国家开支，然后逐步由农庄全部承担起来。说"应当调整集体农庄主席的工资"，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物质待遇取决于集体农庄的生产"。赫鲁晓夫说，经济领导干部"应当具有工农业方面的高深而专门的知识"，要"善于解决增进人民福利的实际任务"。他说，"对社会的一切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共产主义就是物质资料与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因此，"只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不会解决经济任务是不成的。"我们不需要没有学识的'草包'"。

3 月

3月9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现行的"由中央把各种作物的播种计划通知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制定牲畜的种类和头数的计划"的农业计划制度"过分集中"，"不切合国家需要"，是"不必要的"、"官僚主义的、过分夸大的、脱离生活实践的"，"束缚了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主动性"，"不能刺激集体农庄的农业用地扩大产量"。因此必须实行新的、"以商品产品的产量为出发点"的计划制度。新计划制度规定：

(一)新计划制度的出发点是商品产品的产值，把这种产值作为编制农业生产计划的依据。

(二)编制计划时自下而上，先直接由农庄（会同拖拉机

站)和农场开始制定。在制定计划时，不应以某种作物所播种的公顷数和牲畜头数为依据，而应以收获的农产品的公担数和畜产品的产量为依据。然后把计划交区执委会。

(三)由部长会议批准的国家农业生产计划，只规定对农业和畜牧业产品的义务交售总额、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总额、国家合同订购和国家收购的总额。"各农庄在拖拉机站的参加下根据向国家交售的任务和农庄、庄员对这种产品的需要自行决定各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范围和各种牲畜的头数及产品率。"

3月11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一批苏军将领以元帅军衔。计有：陆军大将伊·赫·巴格拉米扬、谢·谢·比留佐夫、安·安·格列奇科、安·伊·埃列曼科、基·谢·莫斯卡连科、瓦·伊·崔可夫。

授予空军元帅帕·费·日加列夫以空军主帅军衔，空军上将谢·伊·鲁金科和弗·亚·苏杰茨以空军元帅军衔。

授予炮兵上将谢·谢瓦连佐夫和瓦·伊·卡扎科夫以炮兵元帅军衔。

3月18日 赫鲁晓夫在东南地区各州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过去通过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已经过时了"，"应当加以修改"，"我们打算召开一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新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

3月30日 赫鲁晓夫在中央黑土地带各州农业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各地集体农庄主席说："你们现在已经有权自行编制自己的生产计划了。要充分运用这种权利。""自行编制计划的制度，对于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是争取巩固集

体农庄经济的强有力的手段。他能够从单位面积上获得最高产量出发进行安排。”

5　月

5月4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苏联各部部长权限的某些补充规定》。主要内容是：

(一)“各部部长在向所属企业和组织下达年度计划后，可留下下列东西归自己支配：1．不超过基建投资总额百分之五的基建投资额；2．不超过拨给本部百分之五的材料、设备”。

(二)“各部有权在全部商品成本百分之零点五的范围内调高所属企业单位的降低成本的任务”。

(三)“在财政部部长同意下，可建立、改组和撤销法定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设计机构、科研机构等”。

(四)“在财政部同意下，有权确定所属各企业和组织的标准定员和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

(五)“有权把所属企业和组织百分之五十的超计划利润集中掌握使用，给另一些企业和组织作暂时的财政支援”。

5月4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变加盟共和国经济计划管理和财政拨款工作》的决议。决议规定：

(一)工业和建筑业的总产值、商品产值、基建工作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任务、工作人员数、工资基金等指标，在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只给各加盟共和国规定总额，不再细分。

(二)加盟共和国所属企业、部门的工业品生产和分配的汇总计划由各共和国部长会议批准。共和国部长会议自行确

定本共和国各部门一切工程项目的项目表、设计任务、财务计算书的批准程序。

（三）在本共和国范围内的全联盟部及联盟兼共和国部所属企业的超季度计划产品的一部分（百分之二十五——五十）留归共和国部长会议支配。

5月13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取消1951年2月1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的《关于禁止出售、交换和弃置不使用的设备和材料以及对这些非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令。规定对因犯有上述行为被判刑而没有服满刑期的人免于继续服刑，对因犯有上述行为而正在受审的人免于审判。

责成部长会议制定重新分配和出售多余的、不使用的设备和材料的办法，大大扩大各部部长、各部总局局长、厂长在利用上述设备和材料方面的权力。

5月14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变重新分配和出售多余的、不使用的材料、设备和其他物资的办法》的决定，规定企业单位可以将上述物资提请销售机构出售，销售机构如不能接收，原单位可以自行出售给其他企业单位。

5月24日和28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先后下令改组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把国家计委改组为：（一）部长会议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国家委员会（国家计委）。（二）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经委）。

任命巴伊巴科夫为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为国家经委主席。

决定成立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以及部长会议国家新技术委员会。任命卡冈诺维奇为国家劳动和工资

问题委员会主席。

6 月

6月 《哲学问题》杂志第六期刊登契尔特科夫的一篇文章：《苏维埃社会的一致性和新旧间的斗争》。文章说，“自从我们社会中的敌对阶级消失以后，各个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对立也就消失了”。现在，在苏联“所表现的对立就是我们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中的新东西和旧东西的对立”。“社会主义的特征并不在于我们矛盾的各个方面或相互矛盾的各种倾向的要素不是对立面，而是在于这些对立面并不带有对抗的性质”。“我们没有阶级对立”。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抗性的关系”。

7 月

7月4—1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布尔加宁作的《关于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技术进步和改进生产组织》的报告。

布尔加宁说：“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曾企图证明，现阶段似乎已没有必要比较快地发展重工业了”。“这种论调是极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企图修改党的总路线。”“党及时地揭露了这种反列宁主义的观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已在中央委员会1月全会上受到了严厉斥责。”

全会通过了相应决议，要求进一步改进工业生产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采用新定额，使工业部门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地区。决议在“改进工业管理”部分谈到“管理机构的过分集中妨碍了对企业进行切实和具体的领导，并降低了各共和国经济机关、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工业工作所负的责任”。全会决定，“必须继续整顿工业管理机构，撤销部和企业间不必要的组织环节，使管理机构接近生产”，“取消工厂管理和生产中的不必要部分，取消小车间和工段”，“必须扩大企业经理、车间主任和领班的职权”。

全会决定于1956年2月14日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全会补充选举基里钦科和苏斯洛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阿里斯托夫、别利雅耶夫和谢皮洛夫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7月31日 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发布命令，规定“在1955年11月1日以前全部撤回驻奥地利的苏联军队，减少武装部队总人数，减少的数目为从奥地利撤回的军队的人数。为此，提前从军队中遣散相同数目的在役人员”（按：西方报道苏联驻奥地利部队有四万人）。

8　月

8月5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就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草案给各厂长、党组织书记、工会主席发出通知，要求“改变过去不正确的、狭隘的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式”，广泛吸收企

业人员和研究机构人员参加编制计划；各工业部门的计划“应直接”由各企业根据已确定的计划指标编制。

8月9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厂长权限》的决议。决议说，“为了提高”厂长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心”，“同时为了消除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的多余的集中，保证在管理企业中有更多的独立性和机动性”，部长会议决定扩大厂长在计划管理、基建投资管理、物资处理、人员编制和工资基金、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权限：(一) 在计划管理方面，“可在国家年度计划指标的基础上，批准本企业扩大了的技术生产财务计划”。(二)“在订货人同意下，可改变季度内的供货日期”，“在不影响完成原批准的产品计划的条件下”，“可自由接受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订货”。(三) 有权规定一部分产品的价格和劳务费标准等。(四)在物资处理方面，可以自行出售“多余的、企业不用的材料、设备、运输工具和其他物资”等，为了完成计划，有权将一部分基金、材料、小型设备转让给其他企业。(五)在确定人员编制、工资和财务管理方面，可在既定的编制范围内“改革车间和科室的人员编制”，“可在本企业职务工资表和工资基金总额范围内调整科室和车间工作人员的工资”等。(六)有权使用百分之十的行政管理费。(七)有权根据已确定的年度基建计划自行确定月度基建计划和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

8月12日 塔斯社发表公报说：“已决定在1955年12月15日以前把苏联武装部队人数减少六十四万人”。

9 月

9月8－14日　据《阿登纳回忆录》称，9月8日，西德总理阿登纳去苏联访问。9月10日，赫鲁晓夫对阿登纳说："您想象一下，赤色中国现在已经有六亿以上的人口，每年还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这些人都靠一把米过活。这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请您帮助我。您帮助我对付赤色中国吧！"

9月17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大赦令，决定赦免在卫国战争时期"由于胆小或觉悟不高而被诱惑同占领者勾结的那些苏联公民"。其中规定，对"由于在德国军队、警察和德国特种部队中服务而被判刑的人，不问刑期长短，一律予以释放"。

9月19日　赫鲁晓夫在苏联和东德政府代表团会谈的发言中说苏共是"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的党"(按：这是赫鲁晓夫在1953年3月以后至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以前，最后一次给斯大林以"高度评价"。在这以前，他虽多次不指名地指责过斯大林，但在不少讲话中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实继承者"，说苏共是"列宁、斯大林的党"，并提到"马—恩—列—斯的事业"和"马—恩—列—斯的不朽学说"等等)。

9月20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提高工业企业中工长和工段长的作用及调整他们的劳动报酬》的决议，规定工长、工段长：有权挑选和配备本工段的工人；并在征得车间主任的批

准后，有权解雇“多余的工人”和“经常破坏生产纪律和劳动纪律的工人”；有权向本工段工人下达“必须执行”的工作“指示”，为本工段工人规定工作任务；有权为本工段工人确定工资等级，并使用所掌握的奖励基金奖励工人；有权降低“完不成定额”的工人的工资；有权给“工作质量不高的工人和破坏生产纪律和劳动纪律的工人”以纪律处分；有权把“经常完不成生产任务”的工人调到工资低的工作岗位上去。

决议强调工长、工段长要受过高等和中等专门技术教育；并责成各部和企业领导人任命工程师和技术员担任工长和工段长（高度熟练的工人也可担任这些职务，但须通过专门的委员会考核，并取得担任这些职务的资格）。为了给予物质鼓励，决议规定提高工长、工段长的职务工资，以使企业和车间的生产工段最低一级工长的最低工资，超过他所领导的同一专业的工人的工资，最高可超过百分之十五。决议还规定了给这些人奖金的办法。

9月 爱伦堡抛出他于1948年炮制的《谈作家的工作》，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写“阴暗面”。

10—12月

10月13日 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在授予塞瓦斯托波尔市红旗勋章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伏罗希洛夫强调要“保持警惕”，“时刻记住以往的教训”，要求苏军“时刻处于充分作好军事准备的状态”；赫鲁晓夫则大谈生活、经济问题。

11月17日 《消息报》公布《集体农庄合办的建筑组织

示范条例》和《集体农庄合办的地方建筑材料厂示范条例》。

12月26日 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1956年预算报告说："1956年预算中的国防经费规定为一千零二十五亿卢布（按：合新币一百零二亿五千万卢布），1955年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是一千一百二十亿卢布（按：合新币一百一十二亿卢布）。军费的减少说明，苏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表现出关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证和平和国际安全。"

1956年

苏共于年初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他在会上提出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三和"路线；作了秘密报告，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全盘否定斯大林。大会以后，在全苏联展开了反斯大林的运动，丑化苏联共产党，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过去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从下半年开始，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逐步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推行，赫鲁晓夫集团在苏共二十大选举中排挤了苏共十九大选出的百分之四十七的中央委员。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解除了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不久又解除了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在政府中的重要职务。

在经济方面，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强化对工人阶级的压榨和剥削。

苏共二十大在国际上引起反共浪潮，西欧各国共产党内部和东欧各国形势动荡。4月，苏共等八个党发表公报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情报局活动；9月，赫鲁晓夫以私人身分再次访问南斯拉夫；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和波兰党领导改组；10月底，苏联政府发表了《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

基础的宣言》。此外，苏联还向美国提出了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同日本签订了结束战争状态并恢复邦交的联合宣言。

1—2月

1月30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表《关于增加马铃薯和蔬菜生产量及收购量》的决议，规定从1956年起提高马铃薯和蔬菜的收购价格，其中蔬菜提高百分之七十。

2月14—25日 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几年中，党"对农业和工业的情况作了批判性的估计，并采取了若干重大的措施"。"同时，党勇敢地揭露了经济活动、政府活动和党的活动中各方面所存在的缺点，打破了陈腐的观念，坚决扫除一切过时的、阻碍着我们前进的东西"。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

关于党的问题，报告中强调"评价党的负责人的工作，首先要看他负责的那个经济单位发展的成绩如何。一个领导人，如果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没有能力领导发展经济的斗争，就应该及时撤换"。"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若不同改进生产的任务联系起来，就等于白做"。

关于国内经济建设，报告中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党的总路线"，"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是发展工业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党组织要"尽力加强经济核算"，说这对一切生产部门都

"具有重大的意义"。赫鲁晓夫批评了在工资方面的"平均主义的现象"，说"整顿劳动报酬制度是我们目前一项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我们必须彻底实行对工作人员个人的物质鼓励原则"，这是"使生产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即要使党的工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领导人的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在经济单位的"基本工作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收入就多些"，否则就"该减少"。

报告中强调"必须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革命理论"，说现在经济学问题提到了理论和宣传工作的"首位"。赫鲁晓夫指责"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按：这是不指名地批评莫洛托夫，见 1955 年 2 月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后来莫洛托夫为此还在《共产党人》杂志上作了"检讨"），说"谁都知道，早在要通过新的苏联宪法（1936 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就已经胜利了、巩固了"，即"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就已经在我国基本上建成了，从此以后，它就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坚固基础上发展着。因此，断定我们只是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人民在"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他还指责"把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论点，了解为在现阶段马上实行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的人，"忽视""物质利益原则"的人，以及要求加速发展轻工业、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的"一些'聪明人'"。说"当然，党对这种想贬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的企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同时对那些脱离实际、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造成有害的混乱的空想家和

幻想家的错误也作了纠正”。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大谈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此外，他还就这个问题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大会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布尔加宁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大会就此报告通过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草拟苏共新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在二十一大以前预先公布党纲草案供讨论。（按：1952 年苏共十九大时，就曾通过修改党纲的决议，规定要以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基本原理”作为修改党纲的“指针”。而二十大决议则说要根据“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草拟新党纲。）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结果是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被清洗了百分之四十七。

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党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

主席团委员（十一人）：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里钦科、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主席团候补委员（六人）：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穆希金诺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

中央书记处书记（八人）：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阿里斯托夫、别里雅耶夫、勃列日涅夫、波斯别洛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谢皮洛夫。（按：十九大选出的三十五名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二十大未当选的有：安德烈耶夫、阿里斯托夫、伊格纳捷夫、科罗特钦科、库兹涅佐夫、库西宁、马

利歇夫、麦尔尼科夫、米哈伊洛夫、波诺马连科、契斯诺科夫、施基里亚托夫、维辛斯基(已死)、兹维列夫、伊格纳托夫、卡巴诺夫、巴托里切夫、别哥夫、普扎诺夫、捷沃相、尤金等人。)

2月18日 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言说，"在苏联武装部队的建设方面，我们的出发点是，未来的战争的方法和形式都会大大不同于过去的一切战争。将来如果人们发动战争，那它的特点就是大规模地使用空军、各种火箭武器和各种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但是，"最新式的武器，包括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在内，都不致缩小陆、海、空军的决定作用。没有强大的陆军，没有战略的、远程的和前线的空军，没有现代的海军，没有它们之间很有组织的互相配合，就不能够胜利地进行现代的战争"。"我们在海军建设中的出发点是，海面战斗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将比在过去战争中大得无可比拟"。他说，"除了裁减军队以外，我们的政府还要在1956年缩减军费将近一百亿卢布(按：合新币十亿卢布)。我们已经撤回了旅顺口和波卡拉半岛军事基地的驻军，并且把他们复员了"。

苏共二十大后，肖洛霍夫抛出了诬蔑卫国战争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3 月

3月6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

(一)由于集体农庄经济的发展，1935年制定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往往还限制了农庄在建

立最符合集体农庄工作具体条件的新制度方面的主动性”。因此，建议各地集体农庄自行补充和修改《章程》的个别条款。

（二）按月预付一部分现金报酬，同时改变过去各地实行的按同一标准付给超额完成计划附加报酬的制度，实行只给优秀工作者奖励附加报酬的制度，以加强对劳动的“物质刺激”。

3月9日 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规定从本年3月10日起，在企业、机关中的所有工人和职员星期六和节日前一天的工作日缩短为六小时。

3月26—29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1937年以“叛国罪”被处死的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已经完全恢复名誉”；当时被捕的前教育人民委员安·布勃诺夫和1938年以前一直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阿·科沙列夫，于最近获释。

1949年3月“神秘地失踪”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尼·沃兹涅先斯基已被“恢复名誉”。此外，苏联电台停止播送苏联国歌，因为歌词中第二迭句是颂扬斯大林的。

4 月

4月6日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通过决议，取消上年度中学的一切历史考试，因为过去的历史课本“因对斯大林的迷信而造成了曲解”，并要求修订历史课本。

4月2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取消职工因自

动离职和由于不正当的理由而旷工的法律责任»的法令。

4月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立了一个特别监察委员会，以便对公安机关(包括秘密警察)的活动进行最严密的监视。

4月 苏联宣布给一大批“个人迷信受害者”“恢复名誉”。

«共产党人»杂志第五期发表题为«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的社论，说斯大林在1937年“提出的阶级斗争将随着我们成就的扩大而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断”，“是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实际状况的”，“而党的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苏联形成了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这一理论才是正确地反映着实际情况”。社论说，斯大林的上述论断“没有考虑到，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转向了国际舞台”。

同期还刊登了一篇文章:«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群众、党和领导人»，攻击斯大林“在战火还在欧洲燃烧，希特勒德国显然准备对苏联发动军事进攻的时候，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实力和防御能力”。

5 月

5月4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废除在进行“清洗”初期为了调查破坏和恐怖活动而给予保安机关的特权，取消其对俄罗斯联邦刑法第五十八条第七、八、九节(按:这几节都属于犯“国事罪”者，系指为了反革命目的而破坏国家经济以及企业、机关的工作者，对国务活动家实施恐怖行为者，破坏国家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者) 以及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刑

法中类似条款下的事例采取“特别调查方法”的权利。

5月7－8日 科学院召开科学家积极分子会议。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在会上作《从苏共二十大决议看苏联科学院的任务》的报告，吹捧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总结报告，大肆攻击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说“在个人迷信的传播方面，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罪过不比文艺工作者小”。

5月14日 苏联政府发表关于裁军问题的声明，决定在到1957年5月1日为止的一年内再裁减一百二十万人，解散六十三个师和独立旅；解散一部分军事学校；停止使用三百七十五艘军舰。

5月26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从1956年7月1日起，十六——十八岁的职工的工作时间为六小时。

6 月

6月1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莫洛托夫“辞去”外交部部长职务的“请求”。谢皮洛夫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6月3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表决议，宣布把苏联许多部的企业和组织移交给加盟共和国管理，以“加强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的作用，并更有效地管理企业”。

6月初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撤销全联盟司法部，把它在领导加盟共和国审判和司法机构工作方面的职责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的司法部。

6月9日 莫斯科各报报道，卡冈诺维奇辞去了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6月28—30日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全苏哲学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哲学研究所所长费多谢耶夫在报告中攻击斯大林在哲学方面的言论。

6月30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决议说，党和政府"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年中，以异常的果断和决心来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个人迷信的流行缩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的作用，并且常常给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使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坏"。

决议说，"斯大林长时期担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同其他领导人一起，为实现列宁遗训而积极斗争。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他领导了党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阴谋的斗争。在这个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们的一切伟大胜利从此都被不正确地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决议指责斯大林：

(一)说他"在1937年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成了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

(二)说他在晚年，以"个人监督代替"了党和政府对国家

保安机关的监督，常常以“个人决定代替”通常的司法准则。这种情况，造成了“对苏维埃法制的严重的破坏”和“大规模的镇压”，使“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的苏联人遭到诬告，无辜受难”。

（三）说“由于个人迷信的后果”，斯大林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方面，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都有一些严重的错误”。例如，他“在领导农业上、在组织国家反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准备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他的粗暴专横行为造成了”战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妨碍了苏维埃国家生活的个别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妨碍了苏维埃社会的发展”。

（四）说他把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在一个时期受到的不可避免的限制在后来“变成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粗暴地践踏了列宁的领导原则”。

决议说，斯大林领导苏联期间，他“在苏联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他在这一斗争中有时采用了不适当的方法，破坏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这里”。

6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生产》。文章说：“斯大林二十六年前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群众的消费（购买力）的增长总是超过生产的增长，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原理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群众购买力的增长应当永远超过生产的说法，实质上是把我们暂时未克服的局部的比例失调”“看成是不能克服的比例失调。”“这种同马克思列宁主

义格格不入的观点培植宿命论和消极思想，并且是那些愚蠢的官僚为自己工作得不好作辩护的借口。”

7 月

7月14日 最高苏维埃公布《国家抚恤金法》，规定：

(一)工人、职员、军人、各类学员、其他公民因公残废者，职工家属和军人家属失去赡养人者，都有权享受抚恤金。

(二)抚恤金分为三种：养老金、残废金、赡养金。

(三)养老金领取条件：男职工年满六十岁，工龄在二十五年以上；女职工年满五十五岁，工龄在二十年以上。特别有害健康的工种从优。

(四)养老金的最低金额为每月三百卢布(按：合新币三十卢布)，最高为一千二百卢布(按：合新币一百二十卢布)。

加尔布佐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结束对这项法案的讨论时说，1956年国家支出抚恤金二百五十一亿卢布（按：合新币二十五亿一千万卢布），1957年将达三百八十二亿卢布(按：合新币三十八亿二千万卢布)。1957年领抚恤金者共一千八百万人，其中，年老、残废及超过退休年龄仍在职者为七百二十万人，领赡养金者为二百一十万人，退役军人及军属为八百七十万人。

7月16日 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被撤销，改为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合并到俄罗斯联邦。

7月20日 赫鲁晓夫在乌拉尔地区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应该大力增加粮食收购量。近年来，我们不得

不动用了一部分国家储备粮。现在必须补上。我们为什么不得不消耗我们的一部分储备粮呢？因为国内粮食不够。这是斯大林的错误。他断言，我们的粮食足够，其实远不是这样。斯大林哪儿也不去，不知道国内的真实情况”。

7月23日 法新社报道，苏联空军参谋长鲁金科说，根据避免使国际紧张局势恶化的愿望，苏联飞机已奉命不对“偶然越境”的外国飞机进行射击。

7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期发表一篇文章：《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指责“斯大林关于上层建筑积极保卫自己的基础的公式”“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对对抗性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的理解，使它成了一个阶级——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机构的体系”，“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的著作就试图把社会思想史、艺术史中的一切先进的和进步的东西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文章说，“但是，在任何对抗性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上层建筑不仅以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机构的形态出现，而且以人们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对社会生活中所有问题的观点的体系的形态出现，以表现在这些观点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态出现”。

文章还指责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一著作中所规定的关于‘消灭旧的上层建筑’的公式，并没有阐明上层建筑变革过程中新的更替旧的上层建筑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而且这一公式会促使否认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继承性的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和理论复活。就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自己也公正地反对了这一点”。

8 月

8月4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说“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改善人民法庭的工作，并把对它们的活动的监督集中在一个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授权边疆区、州法院对人民法庭实行监察，并监督它们的全部活动。为此，撤销共和国司法部在边疆区、州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附设机构”。

8月15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变生产定额审核办法》的决议。决议说，一次审核生产定额的办法，降低了企业领导人在劳动生产率上挖掘潜力的主动性和责任心，不能促进劳动定额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并往往破坏了正确的劳动报酬。

决议规定，为了消除在审核生产定额工作中的严重缺点，提高企业领导人在改善劳动定额工作和工资组织方面的责任心：(一)自1957年起废除作为中央下达的任务而列入国民经济计划的对生产定额的大规模一次审核办法。(二)授权企业经理(厂长)在取得工厂和地方工会委员会的同意下，根据在生产中采用保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经济和组织措施，以新的生产定额代替旧的生产定额。

8月27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禁止用国家的统购统销粮及其他粮食制品作家畜饲料》的决定，规定：(一)严禁各地城乡居民从国家粮店购买粮食、面粉、马铃薯等饲养家畜和家禽。(二)为饲养家畜的城市居民(边疆、北部地区的城市除

外)规定按家畜头数计算的货币税(或叫现金税),和向国家交售奶、肉的制度。

8月31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出版新版〈列宁传〉》的决议。决议认为,第二版《列宁传》中表现出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对"列宁的"某些重要的"纲领性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和策略、民族问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多样化)"阐述得不够"。说"书中没有充分表明作为人的列宁的特点"。决议要求《列宁传》在"彻底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事业中起重要作用;要阐述"列宁的"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思想等。

8月31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编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通俗教材》的决议。

9 月

9月4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卡冈诺维奇兼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

9月6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把"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改名为"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

9月8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提高低工资职工工资》的决定,规定从1957年1月1日起调整工资。工业、建筑业、邮电运输部门最低工资为三百——三百五十卢布(按:合新币三十——三十五卢布)。勤杂工最低工资为三百卢布(按:合新币三十卢布),位于农村者,最低工资为二百七十卢布(按:合新币二十七卢布)。

9月28日 最高苏维埃宣布赦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并非军事局势必要的情况下"投降敌人因而被监禁的前苏联武装部队人员。

9月 《苏维埃教育学》杂志第九期发表题为《克服个人迷信在教育学中的后果》的社论。社论说,"个人迷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教育这个领域"这样根深蒂固",所以,"肃清个人迷信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影响","成为极其重要、极其迫切和刻不容缓的任务"。社论批评许多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史专家"仍然从事于注解或者重复"斯大林时代通过的一些决定,而不愿看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发生质的变化","昨天还是正确的、极关重要的东西,今天已经需要加以认真的修正了"。

9月 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学术委员会会议。语言学博士谢尔宾纳在会上作《从苏共二十大决议看文艺学的任务》的报告,集中攻击"个人迷信"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后果",提出"要对文学艺术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现象进行批判性的重新估价"。认为文学和文学批评之所以落后,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真实性作随风转舵的理解",说"典型就是本质的反映"这个定义是"繁琐的公式";"在论述苏联大作家的著作中","优秀作家被描写成只是政治活动家著作中的引文和原理的图解者"。说对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历史作用的阐述,"是个人迷信的一种独特的做法。他们的作用被说成只是他们个人的影响,而其他所有文学家都是他们的模仿者"。认为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虽然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曾作出重要的贡献"。

10—11月

10月25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变对居民供应畜产品的方法》的决议，规定：(一)从1957年起，国家将畜产品分为两种，一种(即一部分)用于满足全国需要(供应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军队等)，另一种(另一部分)全部留归各加盟共和国、各地方，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二)限制商业部在这方面的经营范围。各加盟共和国应极力扩大集体农庄贸易和消费合作社贸易中畜产品的交易量。

10月25日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一项决定，规定取消"劳动改造营"，确定只实行两种囚禁方式：劳动改造所和监狱。决定还废除了以前管理监狱劳动的机构——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古拉格)，代之以由内务部领导的新机构，新机构同公安机关完全无关。

10月 苏联采取改进学位制度的措施。规定今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只接收有实践知识和在所选的科学专业方面有著作的人为研究生。在大学毕业生中，只有在数学、理论物理学等理科方面"有才能"的人才能直接升为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时，必须经过副博士资格考查。

11月19日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按：罗科索夫斯基原在波兰任国防部部长，波兹南事件后被赶回苏联)。

11月21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莫洛托夫为国家监察部部长，免去热沃隆科夫的这一职务。

12 月

12 月 13 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禁止招收年龄不足十六岁的人参加工作。在特殊情况下，经工厂或地方工会委员会的同意，可以招收十五岁的人工作。

12 月 19 日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对农业有一种爱好"，"生活迫使我相当认真地研究起农业来"，"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农业情况"好转了"。之所以"好转"，"第一个条件"是废除了"象块绊脚石一样妨碍人们前进"的"旧的计划制度"，而实行了"新计划制度"，准许集体农庄"在选择农作物和发展各农业部门方面自由制定计划"。"提高农业的第二个相当重要的条件，是实行物质刺激和调整价格"。他说，"如果使人从物质上得到好处，机器也会好好工作"。

12 月 20—24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改进苏联国民经济领导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采取措施来"根本改善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年度计划工作，并且赋予它职能去灵活地解决在完成国家计划中随时发生的问题"。决议规定进一步大大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各部、各经济组织、各企业在经济管理中的权限，并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解决同完成本共和国计划有关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包括基本建设、物资技术供应、劳动生产率、成本、产品销售、财政资金的使用等问题。

全会提出"由于谢皮洛夫已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免去他

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12月2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别尔乌辛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解除萨布罗夫的这一职务。任命柯西金和马利歇夫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他们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

12月31日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新年招待会上借斯大林来自吹自擂。他说，“斯大林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们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正是在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还说，“斯大林粉碎了我们的敌人。我个人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的。我们可以感到骄傲，因为在为了我们伟大事业的进步而对敌人进行的斗争中，我们曾经合作”。

12月 《哲学问题》杂志第十二期发表文章，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没有说明应当怎样理解上层建筑的阶级性问题”。文章说，斯大林“说上层建筑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同时又说上层建筑是整个社会的观点以及和这种观点相适应的制度，但没有说明怎样把这两种思想协调起来。这种不明确的说法使得评论斯大林这本著作的人得出了非常错误的结论，说对抗性社会的上层建筑只是一个阶级的产物，它只代表统治阶级的观点，从而完全歪曲了上层建筑的概念”。斯大林关于上层建筑的消灭的公式“引起了许多脱离实际的争论和错误的观念，好象在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会因经济基础的改变而一下子消灭得干干净净，好象在上层建筑的发展中没有任何的继承性。这个公式开始

排斥马克思关于改变上层建筑方面的更为灵活和辩证的公式”。文章批评学术界在反斯大林“个人迷信”方面“往往无原则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斯大林的全部理论学说，其中包括一些正确的部分也一概否定了”。同时，“还有些‘批评家’企图在同个人迷信作斗争的旗帜下诽谤前一时期所完成的全部理论工作。应该给类似这些的意图和各种各样的思想动摇以坚决的打击”。“这点尤其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因为，最近一些国际事件引起了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歇斯底里浪潮”。

1957年

在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赫鲁晓夫又制造“反党集团”事件，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最后地从党和国家的一切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6月全会后不久，赫鲁晓夫又把朱可夫开除出苏共中央，指责他在内外政策上实行“冒险主义”，并由他的亲信马利诺夫斯基出任国防部部长，加强了他对军队的控制。

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集团实行了“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的改组”，进一步扩大地方各级领导的权力，允许他们有权自由处理某些工业产品和批准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并鼓吹“从工资制度上刺激”企业领导人。在农业方面，取消了私人农产品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制度，提出取消机器拖拉机站。

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回击了国际上的反共逆流，并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赫鲁晓夫也装出“反对修正主义”的样子并在斯大林问题和某些理论问题上暂时有所收敛。11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会议。经过斗争，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

1 月

1 月 12 日　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决定从 5 月份起出版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刊物《苏共历史问题》杂志。其基本任务是探讨党史问题，特别是十月革命后的党史问题。

1 月 17 日　赫鲁晓夫在中国驻苏联大使为我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最近，西方常有人指责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是'斯大林分子'。对这一点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照我们的理解，'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当问题涉及革命事业、涉及在革命斗争中保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反对我们阶级敌人的时候，斯大林英勇地、毫不妥协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我们批评斯大林"，"是因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质，是因为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甚至当斯大林犯错误、破坏法制时，他依然深信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事业。斯大林的悲剧也就在这里。而在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基本的和主要的就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作斗争——，象俗语所说的那样，但愿上帝保佑，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象斯大林一样地战斗"。

他还说，"斯大林的名字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苏联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愿意象斯大林那样，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忠于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事业"。"共产主义的敌人企图抓住我们对斯大林的缺点

和错误的批评，利用这种批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企图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引向反对我们制度的基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1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一期发表社论，说“苏维埃文学家坚决反击想使文学脱离总路线的任何企图”。“苏共党章责成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作一个为实现党的决议而奋斗的积极战士”。共产党员“不容忍违反党的政策，违反党的思想体系的一切现象”。共产党员“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坚决反击所有想利用我们的困难来危害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1月 《苏维埃商业》杂志第一期发表加弗里洛夫的一篇文章，鼓吹商业机构“自由地直接向工业企业订货”。文章说，“1955年，在减少商品总量计划工作的集中性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供应给城市商业机构的主要商品的分配工作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的商业部办理”。“尽管在商品总量计划工作中的集中性大大减少了，但是商品流转计划同商品保证仍不协调”。“1957年以前，由部长会议来批准全国的零售商品流转计划”。“从1957年开始，对这个办法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变，目的在于改进商品流转和商品分配的计划工作”。“从今年起部长会议只批准全国和各加盟共和国零售商品流转计划的总数，以及几种重要食品和工业品(面粉、米、糖、皮鞋、棉织品、毛织品和麻织品)的市场总量”。“部长会议只批准全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向市场供应的非统一分配商品的总数”。“在这些条件下，又重新提出了商品收购组织和营业工作的问题”。文章说，“最好是使商业机构不仅可以自由地从批发站购买商品，而且可自由地直接从生产企业购买商品”。

2 月

2月1日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州农业先进工作者集会上发表讲话，鼓吹向美国资本家“学习”，颂扬1956年曾经访问苏联的美国农场主加斯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精通自己那一行”。说“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学习，吸取一切适合于我们的东西”，“这并不丢人”。他说，“必须坚决地面向经济”。“要学会算帐，学会合理经营，要做到有赢利”。

2月11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扩大加盟共和国权限》的法令，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组织法院和诉讼程序的立法权并把通过民法和刑法的权限划归各加盟共和国（只有这些立法的基本原则的权限仍然属于全联盟）。同时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行决定建立新的州和边疆区，而不再由全联盟批准。

2月12日 最高苏维埃发布《关于批准苏联最高法院条例并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第一〇四和一〇五条作修改和补充》的法令。法令决定：（一）批准苏联最高法院条例。（二）由于最高法院的权限有改变和加盟共和国法院权力的扩大，因此对宪法第一〇四和一〇五条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规定“苏联最高法院是最高审讯机关”。它负责监督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司法活动。

2月12日 《真理报》刊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戈尔金的一篇文章，责备斯大林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把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卡拉恰耶沃人从北高加索迁往

哈萨克和中亚并取消其民族自治。

2月12日 《消息报》报道，赫鲁晓夫集团为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曾于1月9日宣布恢复车臣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卡拉恰耶沃一契尔克斯自治州、卡巴尔达一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州。

2月13—1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必须在工业和建筑业的各个环节上改进管理组织的形式"，"以便使这种形式适应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国民经济任务和要求"。说由于在目前的经济管理形式下，(一)"一个部或一个局很难对大量企业和工地实行具体而有效的领导"，因此，"必须放弃工业领导方面的某些陈旧的组织形式，以便避免进一步分散技术管理、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采取能够充分地考虑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特点的更灵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形式"。(二)本位主义往往"有碍于许多极重要的发展国民经济问题的解决"，"破坏同一经济行政区内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间正常的生产联系"，破坏专业化和各企业间的协作。因此，必须改组经济管理，使"经济建设领导形式""能把地方上具体而有效的领导同严格遵守全国范围内集中的计划原则充分地结合起来"。

报告认为，改组后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形式，"必须把"对它们的"日常领导的重心移到地方"，因此，"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通过各专业部和主管机关进行管理的组织形式"，而"采取新的分区管理的形式"。所谓"分区管理"，就是取消原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各联盟部、共和国部，而在工业发达的州、边

疆区和共和国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它们变成“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环节”。这些国民经济委员会“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全国计划所规定的任务，直接管理所属企业和建设单位”。它将“享有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务活动所必需的各项权利”，其任务包括制定和实行长、短期生产计划，制定企业专业化和生产协作的计划，编制和实行物资技术供应计划等。而“领导企业和建设单位的主要工作”，则“集中于”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公司、托拉斯和其他经济联合组织。在实行上述“新领导形式”后，国家计委“不得干预经济行政区的行政管理”。

报告中要求各地国民经济委员会“保证提高各专业经济联合组织的赢利”，而“经济联合组织应该享有现在各部总局所拥有的经济核算权利”。要“认真地加强经济核算制，扩大各企业和经济机关领导人员的权限。除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之外，赢利和生产基金利用情况也应当规定为计划和考核企业、建设单位活动的主要指标”。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强调“必须沿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前进。说“如果把主要资金用于发展‘乙’类工业各部门”，这“只能得到一些表面成绩，只能够在短期内满足某些需要”，但是这“将会破坏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使国家经济必遭停滞”。

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5月10日，最高苏维埃根据以上报告和决议公布了相应的“法令”。主要规定：(一) 工业和建筑业按经济行政区由各地国民经济委员会进行管理。(二)撤销二十五个原联盟兼加盟共和国部以及

数目更多的共和国部，将其原辖企业全部下放。(三)将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委员会再改组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全国长、短期计划，撤销原负责短期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

全会选举弗·罗·科兹洛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谢皮洛夫为中央书记。

2月1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葛罗米柯为外交部部长，解除谢皮洛夫的这一职务。

2月16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库尔斯克州雷耳斯克区“把五个村庄合并起来”，“竟让一位文化修养不够的主席来领导”。他说，“固然，据叶弗列莫夫同志(州委书记)说，这位主席人还不错。但是，评价一个工作人员要有尺度。他人不错，然而他的文化程度很低”，“他只上过三年学”。“交给这个文化修养不够的农庄主席经营五千公顷耕地，可是他的能力和知识却只配经营一千公顷”。“每个人要区别对待，要他量力而为。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必须量材使用”。

2月20日 美联社报道，一百名莫斯科大学学生最近因“进行反共政治活动”、“怀疑现体制”被苏联当局开除，并被“送到工厂做工”。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师范学院)有一批学生，因“组织一个地下政治组织”而被捕。

在列宁格勒大学最近一次讨论奖学金问题的学生会议上，“一些心怀不满的学生”把会议变成了示威。示威中他们举着哥穆尔卡的像。

2月22—23日 科学院举行全体会议(年会)。科学院主席团总学术秘书托普切夫作关于1956年科学院工作的总结

报告。他说，“我们必须给各种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企图，给科学和哲学中各种背离不可动摇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倾向以最坚决的回击”。“任何含糊、中立、不问政治、客观主义都是特别不能容忍的”。并说“《历史问题》、《哲学问题》、《苏维埃国家和法》等杂志在阐述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方面，在评价党在艺术中的领导作用方面，犯了错误”。

在科学院举行年会之前，各学部分别举行了全体会议。

1月15—16日举行的文学和语言学部全体会议的决议说，“苏共二十大决议有助于学者们摆脱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有助于揭露斯大林的在许多方面有成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一些错误的和值得争论的论点”。

1月29日和31日举行的经济、哲学和法学学部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说，“1956年，经济、哲学、法学工作者遵循二十大决议，在解决从理论上全面而更深刻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项任务方面迈出了头几步；修改了一些阻碍科学发展的不正确的理论原理，其中有：对价值规律估计不足，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生产范围内，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基本生产资料的无形损耗”。报告认为，“批判地修改某些教条主义原理和错误观念仍然是我们社会科学家极其重要的义务”。“在克服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对资产阶级的和假社会主义的敌对理论进行积极的斗争”。

2月25日 部长会议通过两个决议：《关于把1957年为联盟共和国各部规定的基本建设、劳动力、成本的限额和任务都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议和《关于把1957年

拨给联盟共和国各部的各项物资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掌握处理»的决议。

3 月

3月2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将批准工艺方法、技术条件、标准、食品及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权限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议。决议认为，这样做既可消除过度集中，又可加强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职责。

3月8日和12日 赫鲁晓夫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农业工作者会议上两次发表讲话，都谈到了工资制度问题。

他说："必须让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根据所生产的产品取得工资，必须让工资制度刺激他们的工作，必须让你们，国营农场场长同志们，不是靠压低计划，而是靠进一步钻研业务、妥善地组织工作来得到高额薪金和奖金"。"现行的报酬制度无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制度已经过时了。""要定出一种根据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计酬的报酬制度。""也许应该定出一种中等工资或最低工资，然后再根据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定出奖励工资。实行这种制度，工作用心的人就会得到好报酬，工作不好的人就要倒霉。这种制度可以推动领导人进行集体经营。""今后应该根据每百公顷农业用地所得的产品""来计算"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站长、国营农场场长的工资。"一句话，要给工作不好的人配钥匙上锁，让他们得不到不应得的东西。同时……给予工作好的人以高额报酬和

荣誉。"

3月9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指责该杂志"犯了具有背离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原则倾向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一) 杂志的某些社论和文章，在象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样的问题上，抹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美化孟什维克在1905—1907年革命中的作用，贬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二)有的文章在批评"个人迷信"的幌子下，力图突出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的作用，客观主义地解释党的政治、思想斗争问题。(三)有的文章实质上削弱同历史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四)取消了对南斯拉夫报刊上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言论的批评。

3月12日 赫鲁晓夫在罗斯托夫市劳动者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在苏联也有人反对开垦荒地的政策。"他们曾经说：你们决定开垦生荒地，当心碰破了鼻子，说不定还会丢掉脑袋哩。怀疑派失算了，生荒地已经为我国人民服务了"。

4 月

4月3日 赫鲁晓夫在中央黑土地带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认为，对区一级工作人员，包括区党组织的领导人在内，应当规定奖金制度，即肉类和牛奶产量达到一定指标就可以获奖"。"某些同志错误地认为，似乎党的工作者不该奖励，好象这是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这是错误的"。"对苏联人，包括党的工作者在内，实行物质鼓励并不违背我

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仅如此，物质鼓励，这还是从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新社会的理论中得出来的”。

4月8日 赫鲁晓夫在高尔基市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公债问题。他说，苏联人民“每年认购大量公债”，通过认购公债向国家提供了二千六百亿卢布(按：合新币二百六十亿卢布)。“但是有借就得有还！”现在国家每年要拿出一百六十亿——一百八十亿卢布(按：合新币十六亿——十八亿卢布)来支付该年公债本息。“如果公债继续发行下去，那么到1967年，国家每年就要拿出二百五十亿卢布(按：合新币二十五亿卢布)来偿还公债”。因此，国家准备停止发行公债。但“解决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因为，“国家必须向人民偿还早先发行的二千六百亿卢布(按：合新币二百六十亿卢布)公债，并且还要拿出价值相等的商品来”，“如果不这样，物价就要上涨”，“生活费就会有上涨的巨大危险”。因此，国家准备从1958年起，除利率三厘的自由流通公债外，停止发行公债。“但同时也要停止支付早先发行的公债本息，把公债偿还期暂缓二十到二十五年”。

4月上旬 《党的生活》杂志说，“个人迷信在斯大林晚年时期所造成的损失是无可争论的。然而，党一方面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同时针对修正主义的攻击维护他并且申明不让敌人糟蹋他的名声”。这“证明了我们的革命观念的纯洁”。“虽然应用的方法和方式上(斯大林时代)有过重大的错误，但是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列宁主义为依据的”。

4月19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8

年起停止发行国家公债，利率三厘的自由流通国内有奖公债除外；但1957年还要发行一次总额达一百二十亿卢布（按：合新币十二亿卢布）的公债，而且立即停止进行过去发行的国家公债的抽签发奖工作，将这些公债的还本日期延期二十年，即自1977年开始分二十年平均付还。

4月22日 苏共中央书记福尔采娃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八十七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作报告，她说，“现在，有人以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为幌子企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中心论点，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宣扬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即行消亡，而不考虑帝国主义阵营的存在”。“不久前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再次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专政稍有一点削弱，也会被国际反动派唆使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用来反对人民政权。这是对一切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历史经验而指望不要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人的警告”。“否认或者贬低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的企图，正是陈旧的、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谴责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说法的复活”。

4月27日 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缩短黑色冶金工业企业工作日和调整这些企业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人工资》的决议，规定从1957年起地下采矿工人（清理工、掘进工）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其余地下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及露天采矿人员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同时，调整和提高他们的工资，以提高他们“从物质利益上对生产成果的关心”，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生产。

5 月

5月14日 据合众社报道，苏联副总检察长库德里雅夫采夫5月14日在接见哈佛法律学院教授贝尔曼时说，自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已经释放百分之十以上的囚犯，取消了三分之二的西伯利亚劳动营。现在拘禁的囚犯中，政治犯不到百分之二，大部分是战时勾结德国人迫害苏联公民的叛国分子。除了政治犯以外，目前劳动改造所的囚犯有百分之五十是强盗，百分之二十是无赖，其余则是其他各种各样的罪犯。他说，过去二十五年来所有被判处服刑的人的案件已经加以重新审查或正在重新审查，其中包括那些已经释放或去世的人的案件，以便能够完全恢复名誉。最高苏维埃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派代表驻在各个改造所，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可以不必请示莫斯科便在当地恢复囚犯的名誉。

5月22日 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市召开的俄罗斯联邦西北地区各州和自治共和国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取消集体农庄农户义务交售产品的问题。他说，"早在1953年就已作出关于减低集体农庄的农户的农产品交售定额的决议"(同1953年比较，集体农庄的农户义务交售的肉类已从四十——六十公斤降到三十公斤，每头奶牛牛奶交售量从平均二百二十三公升降为一百零一公升，鸡蛋、羊毛、马铃薯交售定额几乎减少了一半)。"现在，集体农庄的农户交售的农产品所占比重不大"(其中肉类、牛奶、羊毛、鸡蛋、马铃薯分别占百分之十点二、百分之七点一、百分之二点六、百分之十八点五、

百分之十五点九)。"因此,产生了一个我们正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考虑的问题:国家停止收购集体农庄庄员私人产品的时刻是否已经来到?"他说,"停止向集体农庄的农户收购产品""可以在农村造成良好的政治气氛"。"集体农庄庄员的负担减轻了,但是必须使集体农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把集体农庄农户免纳的那一部分产品承担起来"。

赫鲁晓夫说,在取消庄员私人经济的义务交售以后,他们会把"自产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的。这就"能满足我们社会、我们人民的需要"。因为"大家知道,在算术中,几个相加数的位置变更,其和不变。东西总会出现在市场上"。

5月28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因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而精简的管理人员的工作安置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

(一)应合理分配各种专业人员到有关生产企业。

(二)对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员组织起来进行短期训练,训练期间保留不超过一千卢布(按:合新币一百卢布)的工资。

(三)对一切被精简重新安置工作的人员发给一次补助金。

(四)重新安置工作的间歇时间不超过三个月者得以计算连续工龄。

6 月

6月7日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波伊佐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二十大关于恢复由

于过去流行的个人迷信而被破坏了的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的指示”“对党的一切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对审理过去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向二十大提出的申诉给予特别的注意，这些前党员认为过去就他们的问题作出的决定是不正确的”。“苏共州委会受权可以恢复被开除的人的党籍，而不管过去是那一级党机关作出开除出党的决定的”。文章说，“结果，二十大以后提出申诉的前党员有一半以上被恢复了党籍”。文章还说，过去的一些反列宁集团的成员也提出了申诉，党机构最近时期也在研究他们的申诉。

6月14—22日 苏共中央召开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在会上作《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告。报告指责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教学工作没有根除“教条主义和学究气”。另一方面，说有些教员在反对个人迷信时又违反了历史科学中的列宁主义党性原则，有些高等学校在反对个人迷信时，把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原则的一些重要著作也忘记了。

6月16日 法新社报道，《历史问题》杂志主编布鲁日阿洛夫和其他九名工作人员于今日被免职，因为他们只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而不坚决谴责“目前的修正主义倾向”。在最新一期的社论中，这家杂志指责前编辑人员屈服于“耸人听闻和资产阶级的客观性”。社论说：“把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同党和人民的政策和活动相提并论，这是重大的错误。这种解释只会使人低估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成就。”

6月22—2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揭发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责莫

洛托夫等人正当党在实现二十大决议的时候"出来反对党的路线"。说"为了改变党的政治路线",他们"力图更动苏共中央全会所选出的党的领导机构的组成成分"。

决议说：

(一)他们"实际上力图反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在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二)"他们反对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以及在立法方面的权力，并且反对加强地方苏维埃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的作用",反对"党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和精简庞大的国家机构而采取的措施","反对民主集中制"。

(三)他们"顽固地反对并且力图破坏象改组工业管理和在各经济区建立经济委员会"的措施。

(四)在农业问题方面,"他们不承认有必要增加集体农民在扩大农产品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他们反对取消集体农庄旧有的官僚主义的计划制度，反对采取一种足以发挥集体农庄在经营经济方面的主动性的新的计划制度"；反对"在今年年底废除征购在集体农民个人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毫无根据地反对党所提出的"在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量赶上美国的号召。此外，莫洛托夫"因循守旧",还"反对开垦三千五百万公顷的生荒地"。

(五)他们反对"为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为消除以前违反革命法制的行为以及为防止再发生这种事情提供条件的措施"。

(六)"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个集团,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

表现了墨守成规，并且多方阻挠执行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普遍和平的迫切的新措施。”

“长期以来，莫洛托夫同志以他外交部部长的身分，不但没有通过外交部采取什么措施来改进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而且一再出来反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实行的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措施。”

“莫洛托夫同志阻碍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缔结，阻碍同这个居于欧洲中心的国家改善关系。……他还反对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他反对党所提出的下列根本主张：关于在目前条件下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不同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加强苏联共产党和国外进步党派的接触的必要性。”

“莫洛托夫同志一再反对苏联政府为了保卫和平和各国的安全而采取的必要的新步骤。例如，他否认苏联领导人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建立个人接触的适宜性，而这种做法对取得互相谅解和改善国际关系来说是必要的。”

在上面所说的许多问题上，莫洛托夫的意见得到卡冈诺维奇的支持，有时也得到马林科夫的支持。

决议宣布：

（一）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的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

（二）取消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解除谢皮洛夫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并取消他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按：此决议于6月29日“一致通过”，莫洛托夫一人弃权。）

7　月

7月4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8年1月1日起取消农庄庄员、各种合作社社员、工人和职员私人副业的各种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7月4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站部部长的职务，卡冈诺维奇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国家监察部部长的职务。

7月5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阿·尼·柯西金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解除米·别尔乌辛和马·萨布罗夫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7月6日　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电力”工厂职工大会上发表讲话，除重复苏共中央6月全会对莫洛托夫等人的指责外，还说：“这个集团，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千方百计地阻挠实施有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措施。他们最欣赏的是‘拧紧所有螺丝钉’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违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英明政策的”。赫鲁晓夫说：“他们哪里还懂得列宁主义的实质！他们习惯于一套旧观念和旧方法，对新的条件顽固地熟视无睹，死死抓住一套过时的、不符合于我国向前发展的利益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他们在内外政策问题上都是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们以死气沉沉的书呆子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表示，要“坚决贯彻”二十大“所制定的路线”。他说，反对“反党集团”“将有助于更顺利地实现”二十大的决议，“因为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实现这些决议的势力被清除了”。

7月10日 《真理报》报道，各加盟共和国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5月10日的法令，在全苏联总共划分了一百零五个经济行政区，其中，俄罗斯联邦七十个，乌克兰十一个，哈萨克九个，乌兹别克四个，其他加盟共和国各一个。

7月上旬 《历史问题》杂志第三期发表社论，说“杂志编辑部在阐述一些重要问题时，犯了严重的方法上的错误，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陷到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编辑部人员错误地理解二十大在思想工作方面所提出的任务。二十大提出和平共处的可能，但某些杂志工作人员却把这一方针理解成可以‘缓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敌人的斗争，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可以和平共处”。

社论说，“杂志歪曲了苏共历史的一些问题。在阐述苏共历史时，在许多场合，杂志错误地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党的不同阶段的立场，没有揭露两者的政策和实际活动的根本差别，没有指出列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尖锐的原则斗争”，“反而去为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恢复名誉”，并“利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企图突出季诺维也夫的作用”。社论说，“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揭露和粉碎党的敌人，争取党的事业的胜利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曾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害，但如果把个人迷信与党和人民的实际活动混为一谈”，就“会导致贬低党

和国家的成就”。社论指责杂志“没有揭露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是去寻找机会主义者活动中的‘积极方面’”。

7月18日 《苏维埃文化报》刊登莫斯科“思想会议”的报告，报告说，参加会议的人指责马林科夫在艺术问题上发出的指示具有“有害的”影响，说“他对艺术典型所下的定义是庸俗的”（按：这里可能指的是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中发表的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讲话。马林科夫在这个报告中强调“必须通过正面的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光辉灿烂的人格”，以此帮助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他说，文艺工作者“必须时刻记住，具有典型性的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着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对形象的有意识的夸张和突出的夸张，并不排斥典型，而是更加充分地表现它和强调它”。“典型性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问题”）。

7月21日 《真理报》载文，指责《苏维埃白俄罗斯报》、《乌克兰真理报》和《苏维埃吉尔吉斯报》等地方报纸及某些中央报纸，对解释“中央6月全会决议”，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宣传不力。要求各报刊“今后每期都要解释中央6月全会的决议”。

7月24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把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经济联系的中央经济关系局改组为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任命米·格·别尔乌辛为这个委员会主席，解除他的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的职务。

7月27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国家银行权限》的决定，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国家银行分行，在取得国

民经济委员会的同意下，有权将其物资保证贷款和季节性贷款在该委员会的专业局和企业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国家银行有权对某些企业实行特别贷款制度，有权根据加盟共和国工业部、地方苏维埃工业管理部门、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请求，贷给一个企业不超过二百万卢布（按：合新币二十万卢布）的采用新技术、改进工艺规程的贷款，和不超过二百万卢布（按：合新币二十万卢布）的扩大消费品生产及改进质量的贷款，同时根据企业本身的请求，可以贷给不超过一百万和五十万卢布（按：合新币十万和五万卢布）上述方面的贷款。

7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期发表题为《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维护列宁的原则性》的编辑部文章。文章说，“对于在一部分文艺界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的不健康倾向应该负相当大责任的”是“宗派主义分子谢皮洛夫”。“他离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文学艺术问题所规定的路线，采取了违反列宁主义原则性的自由主义立场”。“他在公开言论中，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对某些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不健康倾向表现了妥协态度”。“向无政府主义分子让步”。文章还指责说，谢皮洛夫在美术家和作曲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根本没有驳斥那些胆敢在代表大会上攻击党的领导和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煽动分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反党集团”“企图贬低和损害”苏共中央在1957年5月同作家举行的会议以及党政领导人接见艺术界知识分子代表的“意义”。

8 月

8 月 24 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法案委员会制定«关于加强同危害社会的寄生分子作斗争»的法案，规定“对凡是危害社会、过着寄生生活、有劳动力却蓄意规避对社会有益的劳动的成年公民，可以根据公众的裁决，以流放形式强制他们在流放地点劳动两年至五年。关于流放的公众裁决由所在地的公民全体大会作出”。

8 月 26 日 塔斯社发表公报，宣布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核和热核(氢)武器试验(按：9 月 25 日和 10 月 26 日，塔斯社又先后发表公报，宣布试验了“陆海军各种武器的原子弹头和氢弹头”以及“威力巨大的新式氢弹”)。

同日，塔斯社还宣布进行了第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

8 月 28 日 «真理报»发表赫鲁晓夫 5 月 13 日在苏共中央召集的作家会议上，5 月 19 日在作家、美术家、作曲家招待会上，7 月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的摘要汇编，题为«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首先以很大篇幅大肆攻击“教条主义者”、“老顽固”和“保守派”。他大吹特吹苏共二十大决议“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典范”，宣扬二十大以后在工农业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开荒、改组工业管理等)，攻击反对这些措施就是“守旧的表现”。说“过时的、旧的东西应当加以粉碎。我们不能按照旧的方式生活，我们必须前

进”。他说，“关于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报告提纲发表以后，某些作家表现出不理解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新的过程，没有充分的准备来正确地估计在迫切需要改进工业管理形式的现阶段上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在这方面这些作家还表现出脱离生活”。“他们错了”。他大谈所谓对农民的“物质刺激”，说“遗憾得很，我们这里有时候还遇到一些‘老顽固’”，他们“墨守成规”、“脱离生活”，并说，“思想战线的工作人员中间也有这种人。他们是陈腐观念的俘虏，是书本上的公式、教条和定理的俘虏”。他说，“应当承认，书本上的繁琐哲学的观念是相当顽强的。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常常感到有这些东西。抱有这些观点的人害怕一切新鲜事物，他们大声叫喊和喧嚷，他们惊慌失措，失去了冷静分析情况的能力，没有能力理解必须实现社会发展过程所要求采取的措施。当中央建议在农业方面实行新的计划制度的时候，保守派就出来反对这种措施”。“有些信奉‘纯理论’的人企图把我们党的活动，把我们党所采取的措施说成是什么狭隘的实践主义。在作家中也有些人拥护这种观点”。这些理论家“的全部理论‘智慧’不外是动不动摘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的词句。这种可怜的学者自封为理论家，却不懂得这样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即人们在从事政治、科学和艺术活动之前，首先要吃饭，要喝水，要住房子，要穿衣服”。“在我们经济学家中间有一些人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实践”。“这些人不是理论家，而是学舌的鹦鹉”，他们的理论著作“是分文不值的”。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以很大篇幅谈到了斯大林问题，攻击“在斯大林晚年的时候，理论和实践脱离了联系”。“斯大林

那里也不去”。“在中央，没有谁想真正地了解一下地方的真实情况”，农业中的“物质利益原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对斯大林个人的不客观的片面的描绘”。同时，他说，二十大以后，在苏联“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开始站不稳立场，在估计同克服个人迷信后果有关的一些复杂思想问题上表现了某种动摇”。“某些同志片面地和不正确地理解党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的实质。他们企图把这个批评说成是对斯大林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的笼统的否定”，他们“怀着成见，只寻找我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史上的阴暗面和错误，而忽略了苏维埃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他说，“在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中间，还有个别的人有时候丧失立场”，“他们企图把事情看作这样：仿佛文学艺术的使命只是寻找缺点，主要是谈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和阴暗面，而对一切正面的东西则闭口不谈”。“抱有这种错误的和有害的观点和情绪的人，反对那些在作品中真实和鲜明地描绘了苏维埃社会蒸蒸日上的发展和我们同时代人的正面形象的作家和美术家。被吹毛求疵者轻蔑地安上‘粉饰太平的人’绰号的人们中间有格里巴乔夫同志这样的作家以及其他一些人”。

赫鲁晓夫说，“如果认为在我们苏联的条件下不积极参加实现共产党的政策也可以为人民服务，那就大错特错了。不接受党的观点和党的政治路线，就休想同人民一道并肩前进”。“党坚决地谴责了并且正在彻底纠正个人迷信时期在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在思想工作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党同时也坚决反对那些企图利用过去的这些缺点来反对党和国家领导

文学艺术的人”。党员作家中“某些同志不愿按照党章规定的党的纪律的要求来行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反革命为了自己的卑劣目的利用了某些作家，这个教训提醒我们，对于敌视社会主义的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如果不从政治上加以监视，采取无原则和无主见的态度，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8月29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撤销国家监察部，成立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检查。

8月29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某些问题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处理解决》的决议。决议规定：

(一)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有权把下属各类产品留归自己掌握：本共和国超过季度计划和补充任务生产的日用工业品和食品(不包括面粉、大麦、米、植物油、糖、酒精、伏特加酒)、豆饼、糠麸；百分之五十的其他工业品(不包括有色金属、煤、石油)；百分之五十的石油、沥青。

(二)有权自行支配劳动力、基建投资和统配物资储备。

(三)在部长会议为共和国规定的基建总投资额和重要工业部门投资额范围内，有权改变各国民经济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各部的基建投资计划。

(四)有权批准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企业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本共和国各部和各地方苏维埃的标准组织机构和人员的编制等。

(五)有权决定为国家、社会和其他需要拨出土地。

9—10 月

9 月 26 日　部长会议通过《苏联各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条例》。主要内容是：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各国民经济委员会由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组成，直接受它的领导；各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所属的一切企业、机构、组织；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计划管理、基本建设、物资技术供应、财政与信贷、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权限。

9 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时期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文章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方面，斯大林有很大的功绩"。"但是在斯大林的著作中还有没有科学根据的、与事实不符合的论点。这些论点是：生产资料仅保持商品的外壳；价值规律只有通过工资对生产起作用；商品流通已经开始与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相矛盾，必须逐渐过渡到产品交换。"

10 月 4 日　苏联宣布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

10 月 26 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马利诺夫斯基为国防部部长，解除朱可夫的国防部部长职务（按：据西德《明镜》周刊报道，朱可夫在 11 月 5 日就任北极军区司令）。

10 月 26 日　《红星报》发表题为《苏联军队强大的源泉在于共产党的领导》的社论，说"今年 4 月党中央给军队的指示，要求党组织全面注意战斗准备、军事纪律并教育全体人员在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揭露和消灭缺点。半年来，在苏军党组织中已有显著的改变，但是还有些部队和舰队对中央这个指示贯彻不够，对那些破坏军事纪律和党的纪律的共产党员批评不够大胆”。

10月27日 《红星报》发表社论，说“在陆海军中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对进一步巩固苏联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有着严重的意义”。苏联陆海军战士“确信党所计划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定地热爱党”，“并且热烈支持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和倡议”。

10月底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解除了朱可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就他的问题通过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决议说：“进一步改善在苏联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对解决苏军面临的任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党的政治工作的实践中还有着严重的缺点，而且有时表现出对党的政治工作估计不足。”“应当永远记住列宁的这一指示：军事机关的政策，象所有其他机关和机构的政策一样，应当在党通过它的中央委员会所颁发的总的指示的准确基础上并在党中央的直接监督下实行。”

决议还说：“苏共中央全会指出，近来，前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同志破坏了列宁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党的原则，他所执行的路线是收缩党组织、政治机构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取消党、党中央和政府对陆海军的领导和监督。”而且，在朱可夫同志“亲自参加下”，“在苏联军队中开始培植对他个人的崇拜”。“过分地夸大他个人和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作用”。

“朱可夫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他成了在政治上站不稳的人，无论在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方面以及在国防部的领导方面都倾向于冒险主义。”

10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五期刊登费多谢耶夫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进步》。文章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一些阶级赞成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中过时方面的改革，而另一些阶级则反抗进步的改革”。文章认为“一切社会集体”都同这些“改革”“有血肉联系”。

11 月

11月2日 据塔斯社报道，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最高苏维埃决定赦免被认为“没有对国家犯有重大罪行的罪犯”。

11月3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章说，“朱可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言，承认对他的指责是正确的。他说：‘我认为，在这里，在全会上，对我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次批评是对我个人和其他军事工作人员的党内的、同志式的帮助，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党在正确领导陆海军问题上、在对武装部队人员进行正确的党和政治教育问题上的要求和路线。有些同志在提出处分办法时说，在1946年斯大林在世时我曾经一度被解除中央委员的职务，并且说我没有认识到纠正当时造成解职原因的那些错误的必要性。同志们，

当时我不能承认，也没有承认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是正确的，也没有承认当时对我提出的指责是正确的。现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我承认自己的错误，现在我向中央委员会保证，决心彻底纠正我现有的缺点'"。

11月6日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他说，"一切革命的主要的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虽然十月革命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实现的，但是并没有流很多的鲜血"。而且"工人阶级在革命胜利后表现了非常宽大和人道的精神，甚至某些参加过反革命暴乱的将领"也"获得了假释"。

赫鲁晓夫谈到了斯大林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之所以反对斯大林，其原因之一是"不允许用教条主义、书呆子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保证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他说，"党一方面批评斯大林活动的不正确方面，另一方面在过去和将来都同所有"在"批评个人迷信的幌子下"毁谤斯大林的人"作斗争"。他说，"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评价"。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以及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的国家逐步消亡的问题。

他说，当剥削阶级的残余(资本家、地主、富农)还存在的时候，当他们在国内还有某种影响，并且受到外国反革命势力支持的时候，(国内)阶级斗争可能尖锐起来，矛盾就可能成为

对抗性的。然而，现在苏联已成为“精神上和政治上一致”的社会，“已经没有剥削阶级”，“剩下的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巩固”，因此，苏维埃国家早先的“镇压剥削阶级及其国内残余的敌对活动，镇压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秩序的活动”的职能“就逐渐消逝了”。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向共产主义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其面貌”，目前其“最主要的”职能是“组织社会生产和领导经济”，“控制劳动量和消费量”“对劳动人民进行教育”，执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

11月14日 赫鲁晓夫在答合众社记者夏皮罗问时说，在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已经在进行”；“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某些强制机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苏联的“强制性的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阴谋”。

11月 《苏联大百科全书》付印，其中对斯大林作了如下评价：

斯大林“是俄国和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最著名的活动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杰出的理论家”。“他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俄国革命、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同列宁主义的敌人”(按：指托洛茨基分子等）的“思想斗争中，很大的功绩应属于斯大林”。“斯大林在其理论著作中捍卫列宁主义的时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应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很大的意义”。斯大林“对国防事业和同法西斯主义斗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斯大林的名字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分不开的，如果把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扩大到他的整个的多年的党和

国家的活动就是对历史真象的最粗暴的歪曲”。

但是，《全书》同时指责斯大林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在土地问题上曾“站在‘分配派’的行列里”，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联合问题上“最初站在不正确的立场上”，在卫国战争前夜“不正确地估计了国际局势”。1937年，提出了“似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国内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的错误公式”。此外，“在战后年代，斯大林常常个人对经济问题采取错误的决定，并且拒绝中央委员们提出的、很明显已经成熟了的新措施和建议。这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农业方面造成了损失”。他在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也犯了严重错误”。

12 月

12月14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撤销航空工业、国防工业、无线电工业和造船工业等四个全联盟部，而在这四个部的基础上成立四个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委员会(按：7—9月已撤销了二十四个联盟部)。

任命德·费·乌斯季诺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

12月16—1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结果和工会工作的问题。

全会选举穆希金诺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伊格纳托夫、基里钦科和穆希金诺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全会通过了《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决议说，“由于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组”，“地方工会组织的领导中心都要转移到州、边疆区和共和国”。“中央全会认为，应扩大企业工

会的职能，给予它们参加制订企业生产财务计划、解决劳动定额和工资问题等方面的权利”。“工会应经常改进劳动报酬制度，以便使劳动报酬制度和奖励制度成为增加产品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杠杆”。

12月21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在清除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个人野心家、怀疑分子、根本不够格的人、落后分子和失掉远景的人以后”，保安机关“补充了政治上成熟的、经过良好锻炼的共产党员”。他说，在“苏维埃社会已经没有剥削阶级”的情况下，今天“已经没有内部理由使国家保安机关处于苏维埃政权初期那样紧张的状态”。

12月25日 苏共莫斯科市委员会举行会议。会议鉴于福尔采娃已调任苏共中央书记，决定解除她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会议选举弗·伊·乌斯季诺夫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2月26日 乌克兰党中央举行全会。全会鉴于基里钦科已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决定解除他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全会选举原第二书记波德戈尔内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取消机器拖拉机站的问题。他说，“在现有情况下，技术装备有时得不到合理使用。例如，集体农庄主席要这么办，而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却要那么办。可是站长说了算，机器归他掌管”。另一方面，“每位机器拖拉机站站长都想配备全套的机器，尽管有些机器可能他当时并不需要。但是，他坚持要把这些机器拨给他”，“一年年地

闲放着，锈坏了”。“这样看来，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技术装备卖给某些集体农庄呢。我认为这是对的。只要土地和技术装备掌握在一个主人手里，所有的机器就一定会利用得更为有效。这样我们就更能发挥集体农庄庄员的主动性”。“当然，有一些机器仍然要掌握在国家手里，把它们放在机器拖拉机站里出租。要是集体农庄不需要某种机器，它就不去租赁。这就是对集体农庄工作的一种卢布监督”。

12月下旬 据《纽约新闻与美国人日报》报道，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美国国际新闻社记者康西说，“没有步兵，任何战争都不能获胜。没有步兵，使用任何武器都不可能获胜。只有步兵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步兵在现代化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可能比过去还要大”。“航空母舰已经过时了”。火箭“将逐渐代替”轰炸机。

1958年

赫鲁晓夫继1953年窃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位后，又夺取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权，从而实现了他篡夺全部党政大权的罪恶目的，并进而在党政各部门大力排除异己，提拔亲信，加强资产阶级专政。苏共中央通过决议，为1948年受到严肃批判的一批作曲家翻案；最高苏维埃宣布斯大林时期制定的刑法已经“过时”，“迫切需要修改”，并通过一系列法令，如取消“劳动人民的敌人”的罪名、取消“剥夺选举权”的判刑、缩短剥夺自由的最长期限等。同时制订了新的关于国事罪和军事罪的刑事责任的法令。

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连串措施：废除原有的制定和批准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办法，把制订年度计划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和企业；提出修改集体农庄章程，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代之以国家收购制；鼓吹农产品自由买卖原则、废除宅旁园地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同时，用缩短劳动日、调整工资等“福利”措施，笼络群众，腐蚀干部。

这年6月，赫鲁晓夫致函艾森豪威尔，建议扩大苏美贸易。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情况下，7月底，赫鲁晓夫访问了北京。

1 月

1月6日 苏联政府决定，除1955—1956年已裁减武装部队一百八十四万人外，再裁减三十万人。

1月7日 美联社报道，苏军《红星报》批评外高加索军区政治教育工作薄弱。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去年10月曾被任命为该军区的司令，上周他已被解除这一职务，重新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红星报》还攻击一些将军，指责他们不贯彻党关于解除朱可夫元帅的职务和加强军队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

1月10日 法新社报道，苏军《红星报》说列宁政治军事学院政治部受到党的严厉批评，指责它：(一)发表太多的讲话。(二)思想水平低。(三)课程没有生气。(四)任用了一些学究式和教条主义的教授。(五)纪律方面有很大缺点。(六)学术工作不能令人满意。

1月15日 德新社报道，苏联陆军政治部主任谢尔托夫大将去职，由戈利科夫继任。

1月 《政治自修》杂志第一期发表题为《在党的教育网中创造性地研究经济学》的社论。社论说："斯大林是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韧不拔的革命家。他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功绩巨大。他不仅顺利地保卫革命学说免受敌人的攻击和机会主义者的歪曲，而且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共产党的经验，在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斯大林在我党历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苏共中央总结报

告中，在其许多著作中，揭示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总危机及其两个阶段的问题；揭露了法西斯主义反动的侵略本质；论述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及其特点。斯大林的总结报告和著作，发展了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表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实了解决苏联基本经济任务的必要性，等等。”“斯大林在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著作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们应当慎重地对待斯大林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那些著作中的理论原理。”

“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在斯大林的个别著作中还有若干有错误的、根据不充分的或者引起争论的原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例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有关美、英、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不可避免地缩减这一原理。……关于苏联逐渐过渡到工业和农业之间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现在已经成熟的论断也是不正确。……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阐述提供了不少积极的东西。……但是在他的某些论点中，低估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范围，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生产的作用。”

2—3月

2月8日 赫鲁晓夫在招待知识分子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希望作家、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上更为勇敢，更注意对生

活、对人进行观察!"要求他们"下更大的决心来面向现代生活"。"抓现时代的重大主题"。他说,他"很喜欢"肖洛霍夫的"优秀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说它"叙述了坚强的苏维埃人的经历"。"也喜欢"特瓦尔多夫斯基发表在《真理报》上的"长诗中的几章"。

2月20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别尔乌辛的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任命斯卡奇科夫为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

2月25—2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报告提纲,并就这个报告提纲通过了决议。决议说,对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要作修改,要提高集体农庄的物质利益,实行新的计划制度,授权集体农庄修改示范章程。决议说,要改变现行的集体农庄生产技术供应制度和逐步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直接转卖给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

3月27—31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伏罗希洛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在这次会议上,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根据苏联宪法"向最高苏维埃交出政府职权。接着,伏罗希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建议赫鲁晓夫为部长会议主席。会议决定由赫鲁晓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并由他组织政府。会议通过的政府组成名单中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弗·科兹洛夫、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柯西金、亚·费·扎夏季科、德·乌斯季诺夫、约·约·库兹明(兼国家计委主席),外

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布尔加宁，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

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报告。他说，"在苏联发展的现阶段，在经济建设方面，随着工业管理的改组，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这个最重大、最刻不容缓的国民经济任务就被提到了首要地位"。他提出逐步取消机器拖拉机站，把各种农业机器直接卖给集体农庄，以结束"一块土地上有两个主人"的现象。他说，"个别经济学家还在几年以前"就提出过这个建议，但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危险的"、"错误的"。然而，现在由于集体农庄经济上组织上的"发展和牢固"，机器拖拉机站原先具有的作用就"消失了"，因此可以取消它了。

赫鲁晓夫谈到了取消机器拖拉机站后农产品的收购问题和收购制度，说这个问题"应当细致地研究"，并通过相应的决议。他说："随着农产品生产的增长，收购的性质也将发生变化"。目前在农产品尚不充裕的时候，国家"暂时"不得不"确定每个地区的收购计划"。但将来当农产品十分充裕的时候，"国家将有可能"在"由于成本较低因而比较便宜的地区收购"农产品。

会议最后于3月31日通过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以及《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法律。主要内容是：(一)赞同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拖拉机站的措施。(二)把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把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三)委

托部长会议研究关于扩大农庄生产费用贷款的问题。

3月31日 波利扬斯基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4 月

4月1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决定从今年起，把许多重工业部门的工作日缩短为七小时和六小时，并调整这些部门的工资。在调整工资方面，要求在这些工业部门进一步提高低工资职工的工资，缩短最高和最低工资间的差距，提高工资率在工资中的比重，广泛采用有技术根据的新生产定额和经济上有效益的工资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要求采取具体措施，以便在缩短工作日和调整工资时不使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并不使工资基金超支。

4月17日 法新社报道，爱沙尼亚党中央书记里斯特梅吉被解职，并被开除出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处。

4月17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表《关于改进国民经济物资技术供应》的决议。决议说，中央有关各部撤销后，各产品销售总局改组为共和国间产品供应总局。产品物资的供销一般应由供需双方企业直接订立合同来进行，合同不能超越上级规定的限额。

4月18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定。主要内容是：(一)自1958年起把新的拖拉机等农业机械自由地卖给农庄，或者

现金交易，或者赊购，分期在二——三年还清。(二)对国营农场也采取自由出卖机器的方式，不再实行调拨。(三)规定技术修理站的职权范围，确定技术修理站实行经济核算；随着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有关拖拉机手和农机手也下放各有关农庄。(四)规定新的对集体农庄和技术修理站的拨款和贷款制度。

4月24日 部长会议决定，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有权改变以下各项计划，但须事后通知国家计委：(一)本共和国年度计划范围内的季度生产计划(但不能改变对全联盟、其他共和国、联盟部、市场的供货计划)。(二)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所规定的劳动计划和成本计划的季度计划数。

4月24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未完成提供产品的计划和任务的责任问题》的法令。其中规定：各企业、经济机构、国民经济委员会、部和主管机关的领导人和其他公职人员不完成对其他经济行政区或加盟共和国或全联盟所需要的产品供货计划，是粗暴地破坏国家纪律的行为，并对此负有纪律的、物质的或刑事的责任。对于无正当理由而未完成上述产品供货计划的企业、经济机构、国民经济委员会、部和主管机关的领导人和该事项的具体过失人员，给予严格的纪律处分，或按照各加盟共和国法律的规定给予不超过三个月工资的罚款的处分。对于无正当理由而多次未完成上述产品供货计划的人员应视为亵渎职守，追究刑事责任。

5 月

5月4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表《关于改进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作》的决议。主要内容是：

（一）从1959年起废除现行的制订和批准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办法。

（二）国民经济计划应以长期规划为根据，并分别按年度、部门、加盟共和国、经济区企业和建筑机构进行编制。

（三）各企业、各建筑机构、各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地方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各部门根据五年或七年计划的控制数字自行编制的计划是整个计划体系的基础。

（四）大大缩减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和控制数字的项目，大大缩减须经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批准的指标项目。

5月6—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加速发展化学工业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5月28日 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决定修改联共（布）中央1948年2月10日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决议说，把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塞巴林、波波夫、米亚斯科夫斯基等"天才的作曲家"说成是音乐中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代表，是"个人迷信时期突出的缺点的表现"。

决议批评斯大林对某些艺术作品和创作的主观态度说："上述（1948年的）决议中的一些不正确的估价反映了斯大林

对待某些艺术作品和创作的主观态度”。

“1951年《真理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对丹尼凯维奇的歌剧《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茹科夫斯基的歌剧《全心全意》提出了片面的和带有偏见的批评，这些批评也反映了斯大林对待某些艺术作品的主观态度。大家都知道，在决定这些问题方面，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对斯大林起了不良的影响。尽管《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歌剧的脚本和音乐有缺点，但断言苏联著名作家华西列夫斯卡娅和考涅楚克所写的脚本有‘巨大的思想毛病’和指责作曲家丹尼凯维奇没有原则性是无根据的。在以后的一些文章和发言中，又重复了这篇文章中所包含的不公平的责难。在关于《全心全意》歌剧的编辑部文章中，除了对歌剧的音乐和脚本作了正确的批评意见外，也含有明显的夸大和片面性。”

5月30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确定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运费和劳务费标准》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在价格和费率管理上的权限，并具体规定了部长会议、国家计委、联盟有关部、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企业经理在价格和费率问题上的权限，主要有：

(一)国家计委拟订并向部长会议提出改变各项批发价格的总额和电费、运费、煤气费的总标准。

(二)确定以下几项产品目录：(1)由部长会议确定采购、收购、销售价格的农、林、渔业产品和原料目录。(2)由国家计委核定批发价格的工业品目录。(3)由国家计委核定批发价格的农、林、渔业产品和原料目录。(4)由商业部决定零售价格的工业品和食品目录。

(三)将解决价格和费率问题的一些权限移交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机关。

6　月

6月17—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取消义务交售制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以及关于新的农产品收购制度、收购价格和收购条件》的报告。

赫鲁晓夫说，1953年9月全会以来，苏共所采取的一系列关于农业的详尽纲领，"是以列宁的关于使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增产农产品的原则为基础的"。现在，"改进农产品收购制度"，并研究为农庄售给国家的农产品规定"有经济根据的价格"问题，就是为了给"发展农庄生产造成新的刺激"。

他说，现行的多种形式的收购制度(包括：自1932—1933年间开始实行的粮食、肉类、牛奶及其他若干种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1940年以后实行的由国家按较高价格采购农产品的制度，对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制，以及对重要工业原料作物的预约收购制)，为农产品的不同收购形式规定了不同的价格，而这些价格"往往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指定收购农产品的现行制度，"使得农庄没有考虑本地条件的余地，而必须向国家交售这些指定种类的农产品"，结果"妨碍了农庄去发展本地区最有利的部门"。因此，必须改变，即：取消义务交售制，而实行集体农庄按国家为各个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价格

把产品卖给国家的制度。他说，实行这种制度后，随着农产品的进一步增长，国家就“可以通过计划收购方式只收购一部分商品产品”，以满足全国性需要；同时使农庄“有充分条件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产品”。这样，就可以发挥农庄“在发展公有经济方面的主动精神”。

全会根据上述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决定从 1958 年起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农产品，向机器拖拉机站交纳实物报酬的制度，以后由国家按统一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收购集体农庄的农产品。

全会选举波德戈尔内和波利扬斯基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6 月 19 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苏联法律、苏联最高苏维埃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布告和法令颁布以及生效程序》的法令，规定“苏联法律、苏联最高苏维埃法令和其他文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布告和法令都要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上发表”。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没有普遍意义或普遍规模性质的布告和法令”除外。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贝尔曼认为这件事是“重要的”，说“在 1937—1958 年间最高苏维埃制定的七千项以上的法律中，只公布了几百项。部长会议发布的三十九万个命令和章程中，只公布了几千个”。

6 月 30 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农产品及向机器拖拉机站交纳实物报酬的制度和关于农产品收购工作新情况、价格等问题》的决议。决议根据苏共中央全会决议作出以下规定：(一)从 1958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

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粮食、油料、马铃薯、蔬菜、肉、奶、蛋、羊毛、饲草的制度；同时取消向机器拖拉机站、技术修理站、专业站交纳实物报酬的制度。从7月1日起集体农庄根据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规定的收费标准向这些机构交纳现金。(二)从1958年7月1日起国家实行统一的农产品收购办法，收购量仍然根据耕地公顷数计算，但要订出更合理地分等计价的标准。(三)最好按各加盟共和国、各边疆区、州、区、各农庄或国营农场确定农产品收购的长期计划（五——七年），分列年度数字。(四)确定新的详细的按共和国分级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五)国家收购农产品的机构可以给出售农产品的农庄预付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五的价款。(六)从1958年7月1日起按新的降低了的价格向农庄出售拖拉机、农业机械等。

7—10月

7月9日 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颁布《国营工农业企业、建筑机构常设生产会议条例》，规定生产会议由工会代表、行政代表、党团代表、技术人员代表组成，选出主席团和秘书进行工作。生产会议要研究生产计划、劳动工资、技术定额、技术措施、职工福利等问题。

7月1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公布《工会基层委员会职权条例》，规定各工厂和地方基层工会有权：(一)参与制定企业生产计划、基建计划、文化设施计划。(二)代表职工与企业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三)领导生产会议。

(四)监督建议执行情况等等。

8月13日 赫鲁晓夫在斯摩稜斯克州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新的农产品收购制度和农产品价格问题。他说，苏共中央6月全会决定取消义务交售制和实物报酬制度，"规定了统一的国家收购形式，改以货币计价收购产品"，"这是集体农庄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现在，已经规定了今年的过渡性的统一价格，只要合理经营，这种价格就能保证迅速提高集体农庄的生产和全面发展集体农庄经济。现在，卢布在集体农庄的经济中可以起更大的作用。卢布将会显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每个领导人的才能，因为今后想要获得高额的收入和优厚的劳动日报酬，就必须善于经营，必须努力降低产品的成本"。

9月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于1959年1月27日召开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

全会取消了布尔加宁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资格。

9月21日 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制度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经过所谓全民讨论之后作为国家法律付诸实施。这次"改革"提出的主要口号，是要"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走向生活"，"从事有益的劳动"。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满足经济部门需要的熟练劳动力，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

9月24日 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律。法律共分四十二条，其中规定了改组中等学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

等专业教育和高等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

10月27日 作家协会决定开除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说这部小说恶毒诬蔑社会主义、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

10月31日 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自1959年起，汽车、拖拉机、电动设备以及其他农业机器的零件、部件、机组实行自由出售（由技术修理站和专业商店经营），不再加以限制，取消这些物品的统一分配制度。

10月31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一次会议上再次谈到新的农产品收购制度。他说，现在“国家一律按统一的地区价格收购产品。今后就要到价钱便宜的地方去收购了”。“许多人还用旧眼光看待国家和集体农庄的经济关系，还没能摆脱纳税和义务交售的习惯。其实情况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实行了按统一收购价格购买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办法。谁卖的多，谁赚的钱就多”。他说，改组拖拉机站的决议以及关于确定农产品统一价格的决议“有重大意义，它们标志着农业发展中的新阶段”。

11 月

11月1日 塔斯社就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10月31日给赫鲁晓夫的信受权发表声明说，“如果帕斯捷尔纳克表示愿意到国外去领取发给他的奖金，苏联国家机构方面将不进行任何阻挠。资产阶级报纸造谣说，帕斯捷尔纳克已被剥夺出国权利！这是拙劣的捏造”。

11月3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于在机器制造、石油和瓦斯工业企业缩短工作日并调整职工工资》的决议。

11月6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在工业企业中推行车间生产管理制度》的决议，责成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和各部自行决定在那些企业推行这个制度。决议认为在一千人以下工厂推行为宜，同时要相应扩大工长和工段长的权限。

11月12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布《教育改革提纲》，强调各共和国民族学校要学习俄语。

11月1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并通过了赫鲁晓夫将在苏共二十一大上作的《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提纲。全会还讨论了"加强学校和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以及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问题。

全会鉴于别利亚耶夫已当选为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决定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11月14日 苏联报纸发表《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规定七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发展各经济部门，大力加强国家的经济潜力，以"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11月2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谢列平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11月25日 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有关刑事立法和刑事诉讼原则的新法案，以及对宪法中某些条款的修改和补充。联盟院法案委员会主席波利扬斯基就《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

刑法基础》、《叛国罪的刑事责任》、《军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等新法案作了报告。他说，过去实行的刑法基本原则和许多其他的刑法是三十多年以前通过的，在许多方面都过时了，迫切需要修改苏联的刑法。

波利扬斯基在解释《刑法基础》法案时说，这一法案一方面规定缩小和减轻对国家和社会没有多大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另方面又规定加重最严重的反对国家的罪行的刑事责任。国家暂时还不得不保留死刑这样一种严厉的惩办措施。但是在和平时期只有犯了象叛国、间谍活动、破坏活动、恐怖活动、严重的谋杀、匪徒活动等罪行时才判处死刑。

波利扬斯基代表两院法案委员会建议取消某些判刑措施，如不再宣布为劳动人民的敌人这种罪名，不再取消其国籍和永远驱逐出苏联国境或判处暂时离开苏联。保持象剥夺选举权这样的判刑措施也是不适宜的。

法案委员会决定对罪犯剥夺自由的最长期限为十年，只有犯了特别严重罪行的人才剥夺自由十五年，而根据现行法律最长期限为二十五年。

波利扬斯基说，通过新法律草案将是解决苏联立法工作中的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民族院法案委员会主席拉苏洛夫在报告中谈到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审判制度的法律基础》、《军事法庭条例》、《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基础》等法案，说制定这些法案的根据是在苏联已广泛实行了扩大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并扩大它们在立法方面的权力。

11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六期刊登列昂节夫的一篇

文章。文章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是缩小对价值范畴的利用，而是扩大对它的利用，必须保证每个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他的劳动成果。

12 月

12月15—1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最近五年来农业发展的结果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生产的任务》的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把1953年以前的农业情况说得一团漆黑。他进一步肯定在物质上鼓励集体农民、派领导干部和专家去“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行新的计划制度、开垦荒地、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和实行收购农产品的新制度等措施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攻击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谢皮洛夫，说这个“反党集团”企图破坏党的“9月全会和二十大的决议的实现，修正党在国家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的列宁主义总路线”。说这些人最近几年来竭力反对实现重大的农业措施，反对垦荒政策，反对取消集体农民、工人和职员的自营经济给国家交售农产品的义务。说他们是“不懂农业的”，“他们把农民看成是抵抗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说莫洛托夫关于每一个州应保证马铃薯自给自足和增加农村中国家公债总额的建议，曾把集体农庄推上完全破产的境地。说马林科夫欺骗了党和人民，他在1952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说全国谷物总产量为八十亿普特(按：合一亿三千一百万吨)，而事实上还不到六十亿普特(按：合九千八百二十八万吨)。

赫鲁晓夫说，现在已可以用按照反映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价格自由出售和收购农产品的制度来代替征购制度了。自由出售产品的原则还将逐渐普及到经济各部门。哪里的农产品便宜，国家就在哪里收购。他还提出了修改集体农庄的劳动计算制度和报酬制度的问题。

全会就这个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同意苏共中央1953年9月全会以来关于农业问题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决议还说：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脱离人民群众、反对人民切身利益，企图阻挠实现二十大对国内外政策一切重要问题所制定的方针。这个卑鄙的集团为中央委员会所揭露和击溃，并且为党和人民所唾弃"。

12月2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一系列法律。其中有：

«关于国事罪的刑事责任法»。法律规定了对犯有叛国、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破坏活动、反苏煽动和宣传、泄露国家机密、聚众骚乱等罪行的惩处办法；

«关于军事罪的刑事责任法»。法律规定了对犯有违抗命令、反抗首长、威胁首长、开小差等罪行的惩处办法；

«关于取消剥夺选举权的判决法»。法律说，"由于继续保留剥夺选举权这样一种刑法已不合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不再采用剥夺选举权这样一种刑罚。所有被判剥夺选举权的人免于此刑"。并对宪法第一三五条作了相应修改；

«关于联盟、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法院组织立法基础法»、«关于批准军事法庭条例法»、«关于批准联盟和加盟共和国刑法诉讼基础法»、«关于批准联盟和加盟共和国刑法基

础法》(按:也有译为刑法纲要)。

12月 《党的生活》杂志报道说,最近两年,发展新党员的人数比苏共十九大到二十大的三年半时间内增加了将近一倍。

12月 《哲学问题》杂志第十二期报道说,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1958年春举行了关于矛盾问题的学术会议。哲学博士斯捷潘尼扬在报告中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这个定义已经过时,应该说是"本质差别的统一和斗争规律"。这一论点受到盖杜科夫的反对。

1959年

苏共于年初举行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七年计划，同时再次对“反党集团”组织围攻，为进一步推行二十大所确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扫清道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虚假口号，说“解决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任务，就是要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报告还鼓吹把国家的某些职能移交给社会团体，宣称“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一年还举行了两次中央全会，分别讨论工业和建筑业的机械化、自动化问题，以及农业生产问题。会上大肆鼓吹“技术挂帅”，強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是机械化、自动化。

在政治方面，进一步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宣布公检法的工作内容已发生“重大变化”，保安机关的活动范围已缩小。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幌子下，大力发展“人民志愿纠察队”、“同志审判会”、“社会监督”等“群众组织”，来替代国家专政机关的部分职能。同时在文艺界和新闻界大搞“自由化”，赫鲁晓夫甚至亲自赤膊上阵，替反动作家鸣冤叫屈。

在外交方面，赫鲁晓夫大力同美国拉关系。年初，米高扬抵美，为赫鲁晓夫访美作准备。6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

苏修片面撕毁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9月初，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事件发表声明，袒护印度。同月，赫鲁晓夫访美，同艾森豪威尔举行了戴维营会谈，还在联大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建议。他从美回国途中来我国参加我国庆十周年活动，公然在我国庆招待会上对我进行影射攻击。

1—2月

1月15日 苏联进行了战后第一次人口调查，人口总数为二亿零八百八十三万人。其中俄罗斯人有一亿一千四百一十一万人，占百分之五十四点六。上一次人口调查是1939年进行的，当时人口总数为一亿七千零四十七万人。其中俄罗斯人一亿零三十九万人，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七。1958年民族数为一百二十六个，1926年人口调查时为一百九十四个。

1月22日 苏联政府通过《关于苏联国民经济技术供应的规定》的决议。其中规定：(一)国家计委每年应拟订国家物资技术供应计划草案，包括物资平衡表、产品分配计划、共和国物资调拨供应计划、全联盟物资供应计划。(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批准各加盟共和国计委提出的物资供应计划(不经国家计委分配的物资)，决定各共和国自己生产的产品分配方法。(三)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必须坚决制止在物资技术供应工作中的各种地方主义倾向。

1月27日 苏共举行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

数字»的报告。报告宣称苏联现在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说“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加强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同时日益充分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说今后七年的根本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经济竞赛中最大限度地赢得时间”。“大约在197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侈谈“党和国家的全部思想工作的使命是发展苏联人的新品质，用集体主义和勤劳的精神，用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用新社会道德的崇高原则的精神，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胡说“人对人不是仇敌，而是朋友和兄弟”。

报告在谈到“共产主义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时提出了以下谬论：(一)只有拥有了非常丰富的产品足以充分满足一切人的需要的时候，当一切人都养成了尽自己的能力去劳动的习惯的时候，共产主义建设就算成功了。(二)要把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提到一切工作的首位，而建立物质技术基础的前提首先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全国电气化、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阶级的不平等，只是还有产品分配上所得份额的不平等。(四)国家消亡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尽力扩展民主，“吸收最广泛阶层的居民来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吸引“全体公民”参加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领导工作。国家机关所履

行的许多职能应逐渐过渡到由社会团体来履行。(五)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六)社会主义国家"要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所有国家在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中，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是它们的共同规律，而不是这些规律的特殊表现。

报告再次攻击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

报告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强调要提拔"受过锻炼、通晓业务、有主动精神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要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

报告还提出，对苏联宪法"作某些修改和补充的问题已经成熟了"。

1月30日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一大发言，说"从思想上粉碎和屏弃要党和国家离开苏共二十大确定的路线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对于顺利解决党、国家和经济建设的各种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说"首先发展重工业，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我们的不可动摇的总路线"。

同日，苏斯洛夫在苏共二十一大发言，说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是按劳分配，后者是按需分配，"而这种差别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别决定的"。他说："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没有不可克服的界线。社会主义是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的"。

他说："自从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我国的思想生

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期间大胆地提出和解决了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许多新问题，坚决抛弃了一切过时的和陈腐的东西，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书呆子气的斗争”。

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现阶段的主要职能在于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监督劳动量和消费量，维护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现在“国家机器”“强制的范围更加缩小，它只用于对付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特务，对付小偷和骗子手、盗窃社会财富的人、寄生虫、凶恶的流氓、凶手和其他危害社会的分子”。

1月30日 塔斯社发表公报宣布：到1959年1月1日止，苏联政府根据最高苏维埃决定裁减武装力量三十万人已经完成。裁减的军队基本上是国内驻军，也包括从德国撤回的四万一千多人，从匈牙利撤回的一万七千多人。

2月4日 马利诺夫斯基在苏共二十一大发言，说“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武装部队的全体官兵都深深地感激苏共中央以及赫鲁晓夫同志本人”，“感激他们揭露并粉碎了”“反党集团”，“从而使他们没有给我们国家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武装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害”。

他说：“苏共中央10月全会《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对我们解决武装部队当前任务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决议本着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精神和列宁的领导武装部队的原则，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武装部队的全面的纲领。苏共中央非常及时地发现了前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元帅有使军队脱离党的意图，并狠狠地给了这个新出现的‘拿破仑’

当头一棒”。马利诺夫斯基说：“假若有人胆敢侵犯我们或侵犯我们的朋友和盟国，我们拥有一切必要的条件给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不管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并将从此一劳永逸地把所有的人的这种念头打消”。“我们的武装部队拥有非常好的军事火箭技术装备，这种装备既能够命中战场上的目标，也能够命中地球上任何一点的目标。”“火箭武器正是最符合现代作战要求的武器，它能够有效地解决陆海空的战略、战役和战术任务。”

同日，谢列平在苏共二十一大发言，说“国家保安机关、民警、法院和检察机关的工作在内容和实践上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家保安机关的锋芒“是指向资本主义国家从外部派到我国来的间谍的”。说要“不断加强”国家保安机关。

他说：“近年来革命法制在我国已经完全恢复，而破坏法制的犯罪分子已受到惩治”。“国内的惩罚职能大大地缩小了，而且今后还要缩小。但是，国家保安机关活动范围的缩小，惩罚职能的削减，以及人员编制的缩小，绝不能理解为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问题了，敌人的活动减少了。如果那样理解，那就错了。”

他说：“最近几年来，我国内部的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我们现在没有造成大规模犯罪的社会原因。我国已经没有剥削阶级”。“苏联刑事犯罪的数量在逐年减少，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在我国完全消灭犯罪现象。”

他说：“我们应当关心那些曾犯过罪但已服满刑期的人，要及时安排他们的工作，全面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在我看来，应当考虑授权共青团、工会以及工厂和集体农庄等社会团体

和单位保释那些误入歧途而罪行较轻的人，以便使他们有机会在集体中改过自新，而不必服刑”。因为，“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准则，因而受到惩罚，这不仅给违法乱纪分子本人，而且也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带来许多悲哀和痛苦”。

2月5日 苏共二十一大通过«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并就赫鲁晓夫作的«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通过了决议。决议说，党在今后七年中的主要任务是：在经济方面，全面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使一切经济部门的生产获得这样的增长，以使在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方面和保证苏联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经济竞赛中取得胜利方面能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苏维埃民主，扩大各社会团体在解决国家问题中的职能。在思想方面，提高劳动者的共产主义觉悟。决议鼓吹“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在现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尽力发展民主。国家机关现在所履行的许多职能应该过渡到由社会团体来履行。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是捍卫和平、防御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进攻。国家保安机关的矛头首先指向帝国主义国家派来的间谍。

2月12日 赫鲁晓夫在梁赞州机床制造厂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共产主义就是要使每个人穿得好，住得好，能够学习，志愿地劳动，为社会造福，享受科学、文化和艺术的

一切成果”。

3—4月

3月9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公布《关于劳动人民参加保卫国家社会秩序》的决议。决议说，“同危害社会的行为作斗争不仅应该由行政机构进行，而主要的方式应该是广泛地吸引劳动人民和社会团体来保卫国家的社会秩序”。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接受了“劳动人民提出的关于在城市和农村建立保卫社会秩序的人民志愿纠察队的许多建议”，并批准了纠察队临时条例草案。根据草案，“纠察队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制止破坏秩序的现象”。

3月11日 路透社报道，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档案处受命公布了直到现在不合理地保密起来的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件。

3月20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部长会议副主席柯西金兼任国家计委主席。任命库兹明为部长会议国家科学经济委员会主席，免去他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

4月24日 部长会议批准公布《关于发现、发明及合理化建议的条例》和《关于对发现、发明及合理化建议给予奖励的办法》。这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一)规定对发现给予奖状，对发明给予发明家证明书或专利许可证，对合理化建议给予证明书。(二)规定发明的成果归国家享有。(三)规定专利许可证发给要求承认他为该项发明的专有人。(四)规定了

给予发现、发明及合理化建议者的各项证状的手续和奖金的数额，并规定将此项奖金的数额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五)规定奖金应根据采用该项发明或建议每年能节约多少而定。(六)规定了授予“共和国功勋发明家”、“共和国合理化建议者”称号的办法。(七)这些规定从1959年5月1日起实行。

4月27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法令，规定年满十六岁的人进行小量投机也要负刑事责任。

4月27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说：“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一三六条规定，在加重情节下的蓄意杀人，判处十五年以上的剥夺自由或死刑。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一三七条规定，蓄意杀人，判处十年以下的剥夺自由”。

5—6月

5月18—23日 作家协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在会上作了《苏联文学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根据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的精神说，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任务是“鲜明地刻画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英雄功勋”。为此，要“团结文学艺术的一切力量”，要“广泛团结一切作家力量”。报告鼓吹作家要“反映现代”，说“这个要求在今天是最重要的政治、艺术、美学的要求”。说“人是文学的主要对象”，而“创造现代人的概括的形象是特别迫切需要的”。关于创作题材，说“没有什么渺小的主题，只有对主题的渺小处理”，说“生活方式、家庭关系和爱

情关系，对谁也不是禁止写的主题”。报告还竭力鼓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艺术技巧应该成为世界第一”的口号。

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作家杜金采夫(按：著有反斯大林小说《不单是靠面包》)“从来不曾是我们的敌人，不曾是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还说苏联文学界中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过去”，“修正主义观点和修正主义情绪的代表在思想上已遭到完全的失败”。赫鲁晓夫号召要“团结各种力量”，说“在我们这个没有敌对阶级和敌对集团，整个生活都建筑在同志爱和友谊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对那些不幸‘给鬼迷了心窍’的人需要更加关心”。他说，“犯罪，这就是脱离社会上公认的行为准则，常常是由于一个人精神混乱所引起的”。

赫鲁晓夫一面说作家不能在温室里培养出来，一面又连连声称他不是建议作家应迁到矿井、工厂和集体农庄去，说“这是不理智的”。他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质量问题时说，“哪怕只写了一本书，但是，要一本好书”。说作家应努力创作能“永世长存，带给人们以喜悦”的好书。

6月22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将某些经济建设问题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处理解决》的决定，规定进一步扩大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权限，把计划、财政、劳动工资、住宅建设及其他建设方面的问题移交它们去处理解决。

6月24—3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在工业和建筑业中实行全盘机械化和生产自动化及运用新技术，以进一步扩大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等问题。

赫鲁晓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鼓吹唯生产力论。说“只有

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我们必须全力发展科学技术，广泛实行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为了在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赢得时间，这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

赫鲁晓夫说，为了“尽全力发展物质生产”，“组织生产的问题是现阶段我们整个思想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的部分”。说在工厂里“使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精通自己的业务，生产出合规格的零件，装配出很好的机器，这就是党的工作”。说谈论人的思想状况如何的报告“不妨等五十年或者八十年以后再去听”。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要求“全力扩大对决议执行情况的社会监督”。“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加强和严格遵守国法，不容许出现地方主义，擅自把投资和物资资源用于地方需要，不执行合作供应计划的现象。”说“党和国家的纪律问题，是党和国家机构全体干部活动中基础的基础。有些工作人员接到决议后还议论着：我愿意执行就执行，不愿意执行就不执行。这种人不应该有他们的位置。决议一经通过，谁也没有权利破坏它”。

赫鲁晓夫说，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应该加强监督党的决议和苏维埃国家的法律的执行情况。检察机关必须经常对遵守苏联法律的情况实行监督”。他强调“应该在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各个环节中加强监督工作”。

赫鲁晓夫还强调要组织职业教育，加强培养中等专家。

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执行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加速工业和建筑业中技

术革新的决议方面的工作»的决议。

6月26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基层党组织中成立监督委员会，以便执行党组织对企业行政活动的监督权利» 的决定。决定说，“现行的监督组织形式也不完全适合苏共二十一大所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企业工作的特点和条件，党组织可以建立委员会，来监督完满地及时供应其他经济区、对外贸易和国防工业所需要的产品，监督产品质量、实施新技术、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等问题。在商业机构中，委员会对保证商品供应、遵守商业规定、缩减流通费用等实行监督。

除决定外，苏共中央还发布了这种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条例。条例规定了委员会的任务、权利和义务以及委员会的组织办法。

7—8月

7月2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坚决调整对国民经济各部门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奖励办法»的决议。决议认为，现行的对国民经济各部门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奖励办法有严重缺点，这种办法是根据企业完成超额生产计划而给予奖励的。实践证明，这种办法不能促使上述人员充分挖掘潜力、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某些企业领导人为获取高额奖金，用不正确态度对待工作，甚至压低生产计划。因此，必须予以改进。决议分别为各部门(工业、建筑业、农业、交通邮电)规定了对上

述人员的奖励条件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

7月10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对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工业企业发放工资》的决定，规定各部的工业企业每超额完成总产值计划百分之一，国家银行即按其生产人员工资总额加发百分之零点六到百分之零点九的工资。

7月20日 最高法院就法院实际运用刑事惩处办法问题作出决议。决议说，目前国家机构的某些职能，其中包括保障社会秩序和遵守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准则的职能，应当逐渐交由社会团体履行。

决议说，根据苏共二十一大的决议和1958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刑事立法基本条例，法院应该关切所选择的处刑方式是否适合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应该考虑被审判者的个人特点，应该关切处刑方式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罪犯改过自新。法院在给特别严重的罪犯或特别危险的惯犯以严厉的处刑的同时，还应对那些对社会来说不构成特别大的危险、并且可以不同社会隔离而走上改正道路的罪犯，不采取剥夺自由的处罚方式。各级法院在社会团体和劳动群众集体要求之下，应考虑将这些人交给社会团体和劳动群众组织实行缓刑和教育改造。对于那些犯法非常小的人，法院应停止刑事审判，交给社会团体处理。

7月24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罪犯在剥夺自由的地点服刑制度的改变办法》的法令。法令规定：(一)服完不少于一半监禁期限的罪犯，在其行为表现良好的条件下，可根据法院的决定，把监禁改为在劳改营羁押。(二)破坏劳改营制度情节恶劣的罪犯，可根据法院的决定，将

在劳改营服刑改为期限不超过三年的监禁，剩下的期限仍在劳改营服刑。

8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十六期刊登拉脱维亚部长会议主席拉齐斯的一篇文章。文章说，“我们这里发现有这样一些领导人，他们企图使共和国脱离正确的发展道路而把它引向民族主义狭隘性和闭关自守的方向”。“例如，前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克拉夫同志在讨论七年计划草案时，公开反对党的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坚决拒绝在拉脱维亚共和国内扩建车辆和柴油发动机制造厂，主张扩大对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投资，而这两个部门的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共和国的需要。”“这些意见的实质并非别的，而是力图导向自给自足，导向民族主义狭隘性和闭关自守。接受了这些做法就会危害全国利益，危害拉脱维亚人民的利益，就会破坏拉脱维亚同其他共和国的经济联系，阻碍共和国生产力的发展。共和国党中央对这些现象给予了应有的打击。”

9—10月

9月3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为武装部队军事学院毕业生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进一步加速技术进步是解决创造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这个任务的基本环节。在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我们就在这匹马上下赌注”。他强调要“加强党对陆海军生活各方面的影响，竭力改善党组织的工作”。说“军官必须精通迅速发展的技术”，要“在自己的下级中间树立崇高的威信”。

9月19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从1959年第四季度到1960年第四季度这一时期内完成缩短职工工作日的工作，使全体职工都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以地下工作为主要职业的工人则过渡到六小时工作日。决议还决定调整职工的工资，把最低工资额提高到四百——四百五十卢布(按：合新币四十——四十五卢布)。

10月22日 最高苏维埃两院法案委员会公布《同志审判会试行条例》草案。草案说，同志审判会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犯罪和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用说服和社会感化的方法教育人，对任何反社会行为造成不容忍的气氛。同志审判会的职权包括审理有关破坏劳动纪律，非法使用材料、设备和交通工具(没有给国家或组织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同志审判会也审理其他一些案件，其中包括逃避社会公益劳动、寄生生活方式、没有完成教育孩子的责任、小规模的投机活动、公民之间五百卢布(按：合新币五十卢布)以下的钱财争执以及双方同意提交同志审判会的一千卢布(按：合新币一百卢布)以下的钱财争执。

草案规定，同志审判会仅限于公开地审理案件或者从几种有作用的措施中采取一种。同志审判会可以责成破坏者对受害人或集体公开道歉，给破坏者以警告、舆论谴责和社会申斥，处以一百卢布(按：合新币十卢布)以内的罚款。同志审判会有权向企业、机关和集体农庄领导建议给犯罪者调任为期不超过三个月的低工资工作，建议降职或解雇犯罪者，责成犯罪者用自己的劳动来补偿他招致的损失，责成犯罪者赔偿不超过五百卢布(按：合新币五十卢布)的损失费。

同志审判会的最后决定不必向上呈报，如果所通过的决定与案情、法律不符，工会、苏维埃地方执委会有权建议同志审判会重新审理。

10月23日 最高苏维埃两院法案委员会公布《关于提高社会公众在同破坏苏联法律和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准则的斗争中的作用》的法律草案，《关于同志审判会的示范章程》草案和《关于未成年人案件委员会的示范章程》草案。上述草案是根据苏共二十一大的决议制订的。法律草案说，"尽力扩展民主，吸收全体公民参加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领导工作以及管理国家的事务，是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中改进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的主要方向"。"国家机关的许多职能应当逐步过渡到、而且现在正在过渡到由社会团体来履行。"

草案说，必须全力发展人民志愿纠察队、同志审判会、社会监督以及其他业余组织的工作，这些组织的使命同国家机关的使命一样，在于预防和制止犯罪行为以及其他破坏法律和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准则的行为。

11—12月

11月14日 赫鲁晓夫接见新闻工作者代表，并向他们发表谈话，宣称"现在没有因犯政治罪而受法律审判的事实"。"国内现在没有阶级斗争和敌人活动的社会基础"。

12月22—2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农业问题。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讲话，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农产品的决定性条件"，为此"要更好地利用机器，要靠本领，要更好地

组织工作”。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大事指责一些农业领导人，对这些人说，“既然套上了轭索，那就别说吃不消，拉吧！如果你感到拉不了，那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们有的是出色的干部，有人替换。这并不是威胁。一个不能胜任所委托的任务的工作人员被更有能力的人，被更有经验的组织者所接替，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党所委托给我们的义务，责任是很重大的，是必须执行的。如果你执行不了，就请你让位给别人。”

讲话再次强调“物质鼓励”，说“必须调整农产品的价格”，“由每个集体农庄自己决定调整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额”，“不取消对集体农庄庄员进一步发展公有生产的物质刺激”。

全会就进一步发展农业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今后保证每年至少增产十亿——十一亿普特（按：合一千六百万——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为此必须开垦荒地和提高耕作水平来扩大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要增加现金收入中的公积金提成，用来购买机器、设备和建造保证迅速提高集体农庄经济的设施；要进一步研究成立集体农庄联合机构的问题。

12月30日 部长会议批准公布《苏联部长会议计划委员会工作条例》。条例规定国家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的发展，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最合理地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国家计委负责编制十五——二十年的长期经济计划，发展经济的五——七年控制数字，核对各加盟共和国、各部长提出的长期计划草案是否同下达的控制数字符合等。国家计委还负责批准某些工农

业产品的批发价格、运费及劳务费标准，以及某些日用品的零售价格等。

1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八期发表题为《约·维·斯大林》的编辑部文章，说“斯大林是我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卓越和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织家，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坚定的战士，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他执行了党的崇高的托付，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达三十多年，对党，对苏维埃祖国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着巨大的功绩”。“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的一生；在他的一生中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敌人的英勇斗争”。

文章又说：“在党和苏联人民获得巨大成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便逐渐开始形成和发展，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成绩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多地被归于斯大林的名下。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依据客观的社会规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胜利被说成是一个人的性格、意志和才能的结果，这完全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看法”。

“在苏联人民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后，个人迷信达到了极大的程度。由于卫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社会和国家制度加强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提高了。但是所有这些成绩也被算作斯大林个人的功劳。过分的歌颂冲昏了斯大林的头脑，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功劳，他相信自己是毫无缺点的，于是自我赞扬、自我欣赏在他的性格中越来越发展了。”

“应该指出，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和在理论上不止一次地尖锐反对个人迷信，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看法。……但是，实际上，他越来越言行不一，特别是涉及他个人的时候。”

1959 年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 年第三版增订本中说：“由于集体化的完成，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根子被拔掉了。农民分化和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过程停止了。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日益成长的社会主义同已被推翻的、但初期还是强大有力的、在小商品生产中还有基础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克服了。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

1959年 《经济科学》杂志第四期刊登布达果娃的一篇文章：《关于集体农庄庄员私人副业的消亡问题》。文章说：“庄员的私人副业建立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它不是私有经济。庄员的私人副业是从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产生的完全新的经济现象。这种私人经济是在农业劳动组合基础上存在的特种经济”。

1960年

赫鲁晓夫继续排除异己，进一步把伏罗希洛夫排挤出党中央主席团，并解除他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大批撤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把大批“专家”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

在军事方面，形成一套“唯武器论”的军事路线。认为当前国防力量“不取决于有多少士兵”，而“取决于掌握什么样的发射工具”；未来战争的打法不是把军队部署在边境上，战争将不是在交战国的边界上开始，而是在交战国的内地开始；水上舰艇也失去原来的意义。据此，提出要以火箭来代替陆海空军，成立火箭部队总司令部；提出要考虑在建军方面过渡到地区制度问题，按地区原则来编制部队。还强调加强军队领导的一长制。

在意识形态方面，赫鲁晓夫鼓吹“创作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要文艺工作者“不是根据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创作。鼓吹“用新的方式来解释”许多哲学问题和社会学问题，强调党的宣传工作“应集中于经济知识的宣传”。

5月，决定从1961年1月1日起发行新币，旧币十卢布折合新币一卢布。

这一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的原则斗争进一步发展。由于赫鲁晓夫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共产党在4月

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反修文章。6月，举行布加勒斯特会谈，赫鲁晓夫在会谈中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7月，苏联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11—12月，举行了八十一党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声明》。

1 月

1月1日 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新年宴会上的祝酒词中提到苏联在联大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计划时说："如果我们的建议被采纳，我们准备随时解散我们的军队"。"但是如果'冷战'拥护者要把我们拖进无穷无尽的争论迷宫中去，我们是不是要走上他们想把我们推上去的道路呢？我们自己不妨单方面地考虑和裁减我们的武装部队，而用火箭保卫我们的边界。"

1月3日 塔斯社报道，赫鲁晓夫在1959年12月30日答阿根廷《号角报》社长诺布勒问时说，1960年"将作为开始实现人类关于没有武器和军队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宏伟愿望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1月10日 《真理报》报道，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当前条件下党的宣传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并创造性地发展党所积累起来的理论财富，发动劳动人民为实现党的政策而斗争"。

1月12—13日 文化部召开电影艺术委员会会议，讨论影片的现代主题的创作问题。电影艺术委员会主席格拉西莫

夫在会上作报告。他说，影片应该描写“周围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问题”，描写“我们的周围生活中和我们的先进人物思想中所发生的复杂而生动的过程”，描写“生活中最现实的问题”，“描写今天”。

1月14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医疗设施和保护居民健康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说，政府将把从再次裁减武装部队而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改善居民的医疗设施。

1月14日 苏联政府决定撤销内务部，并将其职权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

1月14日 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裁军是巩固和平和保障各国人民友谊的途径》的报告。

赫鲁晓夫谈到了最近三十多年苏联武装部队人数的变化：1927年——五十八万六千人，1937年——一百四十三万三千人，1941年——四百二十万零七千人，1945年5月——一千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人，1948年——二百八十七万四千人，1955年——五百七十六万三千人。由于1955—1958年裁减了二百一十四万人，现在苏军总人数为三百六十二万三千人。赫鲁晓夫说，不管裁军谈判的进程如何，“单方面裁减武装部队是可能的”。他建议把陆海军人数裁减为二百四十二万三千人，说这样将使每年大约节省一百六十亿——一百七十亿卢布（按：合新币十六亿——十七亿卢布）。赫鲁晓夫说，这样做将无损于苏联国防力量。

赫鲁晓夫还谈到了苏军的建设方向。他说：“在现代军事技术发达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

这类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空军几乎全部在被火箭武器代替”。“在海军中潜水艇有重大的意义，而水上舰艇已不能再承担它过去所承担的角色了。我国的武装部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用火箭核武器”。“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决定性地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在现在的条件下，战争不象过去那样打法，它跟过去的战争也很不一样，以前各国总是把军队部署在尽量靠近本国边境的地方，为的是在紧要关头用士兵和大炮筑起一道活的屏障。假如有某个国家想侵入另一个国家的疆界，它就需要向这些防守边境的军队进攻。战争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起初，激烈的战事发生在交战国的边境上，军队也是往那儿集结的。”“现在如果发生战争，作战的方式就不同了，因为各国将拥有可以把武器发射到几万公里以外的办法。战争将首先在交战国的内地开始，同时，不仅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而且在头几分钟内，一切首都、一切大工业中心或行政中心、一切战略地区无一能免于遭到袭击。因此，如果发生战争，它一开始就不一样，战事的发展也不一样。”

赫鲁晓夫说，“目前，政府和党中央正在考虑和研究以后在建军方面过渡到地区制度的问题。地区制度将能保证必要的干部和受过军事训练并能掌握现代武器的居民名额。我们有可能按照地区原则编制成军队。他们的人员将能不脱离生产地掌握军事技术，一旦必要，相应的运输工具——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就可以把军队集中到我们境内所需要的地方”(按：两年以后，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共二十二大

上把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称之为苏军的“建军方向”、苏军“军事学说的基础”和军事工作的“指南”）。

1月15日 最高苏维埃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关于把苏联武装部队再裁减三分之一，即一百二十万人》的法律，并将裁减陆军和海军的装备，削减军事开支。另外还通过了《致世界各国议会和政府的呼吁书》，呼吁他们响应这一“新的和平倡议”。

1月21日 《真理报》报道，哈萨克党中央全会解除了别利亚耶夫的第一书记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1月25日 塔斯社报道，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根据再次大量裁减武装部队一百二十万人的法律，通过了《关于陆海军复员军人劳动安排和物质生活保障》的决议。决议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各级党委会、各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苏维埃，自复员军人到达居住地的时候起，在一个月内，应根据他们的专长和工作经验作好劳动安排。

1月28日 《真理报》报道，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举行全会，解除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列别杰夫的职务，他的职务由别利亚耶夫担任。

3—4月

3月4日 《消息报》公布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消除在办理公民就业手续及解决生活需要问题时的文牍官僚主义弊病》的决议。决议说，苏联法律以及机关、企业内部的劳

动规章规定，接受新工作人员时，他们应交验身份证及劳动手册，而初次参加工作者应交验身份证及房屋管理所或村苏维埃关于最近时期活动的证明。但是很多机关、企业却除了要新工作人员交验上述文件外，还要交验过去工作、工资、家庭情况、住所情况、户口等材料以及书面鉴定。在分配住房时，也常常要鉴定。在确定残废程度时，也一定要交验劳动手册的存本及生产鉴定。此外，进学校学习、退职、休假、送孩子进托儿所或幼儿园、买火车季票、领燃料以及解决其他许多生活问题时，都要交验许多不必要的证明材料。

决议认为这种做法是官僚主义的，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消除这类不正常现象。说如果身份证、劳动手册、出生证明已经提供了必要材料，就不应该再要其他书面材料。

3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五期刊登一篇文章，谈到苏共现在有八百零一万七千名正式党员，六十九万一千名预备党员。其中有一百多万名党龄不超过三年的新党员。文章说，苏共二十大以后，大大改善了调整党员成份的工作。例如，在1959年吸收入党的职员中，工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专家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二，而这些专家过去大部分都是工人和庄员。目前正注意吸收重要工业部门中的先进生产者入党。

4月6日 最高法院举行全体会议并作出决议。决议强调说，“全力保护集体农庄所有制和保卫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的财产权”，是法院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处理集体农庄的民事案件时，法院必须考虑到，集体农庄的产品和财产由集体农庄庄员自己管理，经过集体农庄庄员全体会议修正、更改和补充并在区执行委员会登记的集体农庄章程，是集体农庄

活动的主要法律。

4月7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计划工作和国民经济领导工作》的决议。决议说，国家计委专搞年度计划工作；协调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方面的活动；协调苏联国民经济计划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的关系。决议责成国家科学经济委员会负责长期规划工作。

4月7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非法装配和利用无线电发射装置的责任》的法令。法令规定：未经许可而装配和利用无线电发射装置，应处以五百卢布（按：合新币五十卢布）以内的罚款，并没收其无线电装置。

4月14日 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红星报》发表一篇文章。文章说，"应当更加积极地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一长制和提高指挥人员及首长的威信"。"在目前条件下，一长制在领导军队方面的作用无比地增长了，因为在使用最新式的战斗武器中，全体军人意志和行动统一的作用增长了，而这种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只有以对军队的灵活部署、严格的军事纪律和对军队的统一支配加以保证"。

4月21日 苏联颁发1960年列宁文学艺术奖金。获奖作品中有影片《一个人的遭遇》，有阿朱别伊、茹科夫、萨丘科夫等人写的《亲临美国——赫鲁晓夫访美记》，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4月23日 塔斯社报道，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被任命兼任国家科学经济委员会主席。他的前任库兹明因"调任他职"，被解除这一职务。

5 月

5月4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公布《关于提高卢布购买力和含金量》的决议。决议说，自1961年1月1日起将发行新币，旧币十卢布折合新币一卢布。一卢布的含金量从0.222168克提高到0.987412克。

5月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选举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波利扬斯基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选举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科兹洛夫为苏共中央书记。全会解除别利亚耶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基里钦科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解除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阿里斯托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全会鉴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伊格纳托夫已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鉴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福尔采娃已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解除她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5月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解除他的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鉴于科兹洛夫已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解除他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任命伊格纳托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任命福尔采娃为文化部部长。任命诺维科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解除米哈伊洛夫的文化部部长的职务。

5月5—7日 第五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五次会议，听取赫鲁晓夫作《关于取消工人和职员的赋税以及提高苏联人民福利的其他措施》的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在1950—1960年期间，苏联预算的资金总额从四千二百三十亿卢布(按：合新币四百二十三亿卢布)增加到七千七百三十亿卢布(按：合新币七百七十三亿卢布)，即增加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最近几年改组了企业管理和提高了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预算总额从1955年的一千四百一十亿卢布(按：合新币一百四十一亿卢布)增加到1960年的三千八百八十亿卢布(按：合新币三百八十八亿卢布)，在这一时期内，它们的预算在全国预算中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六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二”。“国家预算中五分之四是用作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在1960年预算中，国防开支占百分之十二点九，而在1955年占百分之十九点九。“由于在发展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财政和货币流通的稳固，苏联拥有一切必要的财力，使得在今年就可以着手开始分阶段取消对职工工资的征税。”

5月7日，赫鲁晓夫在会上致闭幕词，其中谈到，根据政府的决定，苏联陆军和海军正向火箭武器过渡，其实已经过渡到火箭武器了。因此成立了火箭部队的总司令部。

同日，赫鲁晓夫提出下列决议案：同意伏罗希洛夫提出的“因健康情况不佳”解除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的“请求”。此外，党中央委员会建议选举伏罗希洛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同时，建议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取消职工赋税》的法律，规定从1960年10月1日开始到1965年，分阶段停止向职工征收所

得税以及单身者、无子女者和少子女者的捐税。首先取消工资比较低的职工的赋税，然后逐步停止向所有劳动人民征税。会议还就在1960年完成全体职工过渡到七——六小时工作日这一措施通过了一项法案。

会议任命涅杰林为火箭部队总司令。

会议“因健康情况不佳”解除伏罗希洛夫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任命勃列日涅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5月11—14日 苏军举行党的基层组织书记会议。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当战争威胁还存在，全面彻底裁军还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保持高度的国防力量，保持必要的武装部队”。他说，不管军事技术的威力和有效性多么大，没有人，它就毫无用处。技术是人来运用的。由此得出结论，军事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全体官兵的政治教育、战斗准备和技术训练结合起来。

5月13日 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主席索波列夫在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和莫斯科作协理事会联合举行的讨论会上作报告，说“衡量作品的标准是艺术标准”，技巧是“才能、共产主义世界观、对生活的理解、才干和对时代的敏感的有机融合”。索波列夫提倡写“位于永恒积雪线以上的作品”，认为“这是真正的艺术，是文学”，说有些作品“暂时获得成功和流行”，但“经不住时间考验，配不上文学的概念”。认为作协的具体任务就是“提高文学技巧，尽力使书、诗歌、戏剧提高到决定文学概念的、永久的不朽光芒的绝对标准”。

5月16日 加尔布佐夫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前财政

部部长兹维列夫“因健康情况”获准辞职。

6 月

6月14日 农业部部长马茨凯维奇在农业专家会议上说，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之一，是在全国各地正确地配置农业生产和实行生产专业化。他认为，国营农场必须由托拉斯来领导。在国营农场占优势的地区，应该建立区国营农场托拉斯。马茨凯维奇认为应“扩大”专家的权力，工作中要有“更多的独立性”，基本生产单位“应直接由专家领导”。

6月15日 罗斯托夫州委会解除了基里钦科的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6月20日 塔斯社报道，特瓦尔多夫斯基（按：写攻击斯大林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作者）获得列宁勋章。最高苏维埃为此发布的指令说：“《山外青山天外天》是一部从哲学上来领悟人民、国家和个人的历史命运，领悟艺术问题和艺术家的使命的作品”。

6月25日 法新社据莫斯科电台报道，别利亚耶夫继今年5月被免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后，又被免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别利亚耶夫今年1月在被免去哈萨克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时还失去了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当时他被指责在那个地区的经济指导方面犯了“过失和错误”。他的情况同基里钦科相似。基里钦科同他一起被解除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主席团中的职务。基里钦科后来成为罗斯托夫州的第一书记，但是在6月15日

又被解除了那个职务。

6月29日 《真理报》发表马利诺夫斯基在军事学院毕业生招待会上的讲话。他说，根据党中央的倡议，一些高等学校有预见地适时地向火箭专业过渡。这是由于武装部队中风起云涌地采用战术火箭、作战战术火箭和战略火箭而引起的。我们完满地完成了这一工作。

6月29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各地用地方财力进行计划外基建开支的规定》。主要内容是：从1961年起各地可以用本地工业的利润进行住宅、文化设施的建设及其他计划外工程。各地区使用利润的限额如下：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哈萨克、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可动用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白俄罗斯可动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利润，其他加盟共和国可动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

7 月

7月1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对企业的经济鼓励以及关于加强工业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创造和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规程、关心使生产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决议。决议规定：进一步增加从超计划利润中拨归企业基金的提成额。准许各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部设立掌握新技术的基金。根据决议，从1960年的10月1日起，对工业企业、建筑、运输和邮电工作者以及地质勘探、科学研究和设计机构实施新的奖励制度，凡采用新技术完成工作者将予奖励。

7月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布《关于1957年5月10

日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法令的几点补充规定》。规定中说，各加盟共和国得成立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受共和国部长会议领导。而共和国各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则受前者和后者的双重领导。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有权中止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7月7—8日 苏共莫斯科市委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及国家和法研究所联合召开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问题”的学术会议。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在会上说，在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阶级被消灭以后，苏维埃民主就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民主变成全体人民的民主。

7月11日 塔斯社报道，“苏联许多城市已关闭了监狱”，仅莫斯科在1960年就已关闭了三个。“要在十五——二十年内完全消灭犯罪现象。”

7月13—1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苏共二十一大《关于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决议执行情况。全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工业和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决议。全会鉴于勃列日涅夫已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免去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全会根据伏罗希洛夫的“请求”，免去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7月16日 苏共领导人接见知识界代表，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先后向他们发表讲话。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所有的人过最好的生活。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希望过得更好。甚至鸟儿也要为自己的小鸟寻找美味的食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不论他处于何种地位和从事何种劳动，都是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知识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

务，因而也就是为作为这个社会成员的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一个人只要一出生就必然要在斗争中捍卫自己的生存。”“现阶段的任务是为争取人的幸福、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条件、发展人的一切能力和才能而斗争。”

“苏联文艺工作者从党的政策中看到创作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表现。”“斯大林逝世后的时期是整顿和清理的时期。”“生活在苏维埃社会里就意味着接受和同意这个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和胜利而积极斗争。”在苏联“很难区分党员和非党员”。苏联作家、作曲家、画家、电影和戏剧工作者，“不是根据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全部创作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奋斗”。

苏斯洛夫在讲话中吹捧赫鲁晓夫是“为和平而斗争的坚定、彻底和孜孜不倦的榜样”，所有的人都怀着“爱戴、尊重、衷心的感谢和颂扬的心情谈论他”。

他说，文学艺术的任务是“要为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技巧而斗争”。说文艺批评应该是“关切而热诚”，“应该理解艺术家的实际困难”，不要“全盘否定”，评论作品时不允许“抱有怀疑态度和老是挑剔”。

8—9月

8月3日 《真理报》报道，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最近举行了会议，会议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党组织的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经济知识的宣传，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特别

是对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和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的道路进行深刻研究”。“全体劳动人民都应掌握经济知识的基础”，“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事”。

8月15日 部长会议任命戈留诺夫为塔斯社总编辑。年满六十二岁的巴尔古诺夫“因健康关系”被解除上述职务。

8月24日 塔斯社宣布，一艘巡洋舰的拆毁工作已经结束，舰上的炮塔和司令台已拆下送去再熔炼。舰上的金属已送进平炉。这是赫鲁晓夫访美时曾经提到的巡洋舰中的一艘。他当时说，苏联甚至要把刚刚造好的巡洋舰拆掉，因为在火箭技术时代它们已经过时了。

9月7日 《红星报》刊登格列奇科元帅一篇论述苏军新规则的文章。文章说，要在部队中施行武装部队新的纪律规则和内勤规则。这意味着在改善陆海军全体人员的共产主义教育，加强军事纪律、组织性和秩序等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规则还反映了一长制得到了新的发展。新的纪律规则要求各级首长除加强教育工作外，还要对部下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坚决要求他们遵守军事纪律和秩序，对部下的任何过失都要加以追究。但是，这并不是说，对犯过失的人要一律立即加以纪律处分。新的规则中删除了逮捕士兵一节，只保留了禁闭，禁闭时间缩短了。规则中说，逮捕是一种极端的惩罚手段，只有在首长采取的其他一切手段无效时，才加以采用。

文章在谈到内勤规则时说，这个规则充满了对提高军人的生活道德品质的关怀。

9月14日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被接收入党。

9月24日 《消息报》报道，北高加索的一些坦克被拆掉

炮筒和机关枪,改装成牵引车,以便在建筑和木材工业中使用。

10　月

10月1日　塔斯社报道，莫斯科一所军事学校由于裁减武装部队而于今年关闭。这所军事学校的校舍根据政府的决定交给各国人民友好大学。

10月3日　《消息报》报道，黑海舰队的主力舰即将拆毁。《消息报》说，这是对赫鲁晓夫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苏联政府裁军声明的证实。

10月5日　科学院经济、哲学和法学学部举行全体会议,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在会上作报告说,在共产主义建设的经济问题中,技术经济问题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还说，许多哲学问题和社会学问题应该用新的方式来解释。他在谈到国家和法的消亡问题时说，这里所说的是作为与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国家相联系的强制手段的法的政治形式的消亡。法学家的任务是研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如何充分保障人的权利,根据怎样的原则来建立社会自治。

10月20日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宣布:“我国也有装备着火箭和原子发动机的潜水艇”。

10月25日　莫斯科军区司令、苏联元帅莫斯卡连科接替涅杰林任火箭部队总司令和国防部副部长。涅杰林在最近一次飞机失事中丧命。克雷洛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接替莫斯卡连科。

10月27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三项法

律：(一)审判制度法。(二)联邦刑事法典。(三)刑事诉讼法典。塔斯社在报道中说，刑事法典不仅规定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也规定对罪犯教育的措施。剥夺自由的最长期限规定为十年，最短期限从一年降到三个月。法典规定，如果犯罪行为对于社会不是危险的并且完全是初犯，就解除其刑事责任，而转交同志审判会处理。对惯犯规定了严厉的惩办措施，他们可能被监禁十五年。对谋杀犯判处死刑。

12　月

12月8日　《共青团真理报》载文批评某些司法机关对待重刑事犯过于宽大。说一个杀人犯被判了十年徒刑，但在劳改营只坐了两年牢，后两年改住劳改营自由区，每月可挣一千五百——一千七百卢布(按：合新币一百五十——一百七十卢布)。一共服刑四年就提前释放，并撤销了前科。文章还批评了这样一种说法："保护犯法者，现在是时髦的做法，所以我们想跟上生活的步伐"。

12月20—23日　第五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六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61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和国家预算。预算中的国防开支占百分之十一点九，为九十二亿五千五百万卢布(按：合新币九亿二千五百五十万卢布)。

12月26日　据《党务工作人员手册》1961年第三版发表的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保证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不间断性》的决议说，十五——二十年的总体计划是计划体系的基础。在制定本年度计划时，要同时制定下一年的产量、产

品品种、投资额和生产能力四个指标的控制数字，还要制定从当年算起的第五年的主要指标。

12月29日 塔斯社报道，马茨凯维奇被解除农业部部长的职务，由奥利尚斯基接任。奥利尚斯基是乌克兰人，列宁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茨凯维奇到新成立的哈萨克的一个边疆区任苏维埃主席（按：《文学报》在11月29日以《法律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为题发表小品文，指名批评马茨凯维奇没有反映农业真实情况）。

12月29日 亚美尼亚党中央举行全会，解除托夫马相的第一书记和中央局委员的职务。全会选举托罗卡为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

12月 《哲学问题》杂志第十二期刊登尼古拉耶夫的一篇文章：《论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发展》。文章说："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维埃国家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所实现的、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的职能消失了，消亡了。随着在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对我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武装进攻的危险将会消失。因此，保卫国家防止外来敌人的必要性将会消失，国防的职能也将消失"。

1960年 库西宁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一书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之间的界线是灵活的，相对的，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阶级或阶层，这一切都有助于阶级差别的消失。不仅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界线是这样，而且这两个阶级（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的界线也是这样"。

1961年

苏共于10月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及其他文件，使赫鲁晓夫集团从二十大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完整体系。大会把反斯大林运动推进到更加疯狂的程度。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用“人道主义”和“全民民主”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大会以后，借口过去的法典“已经过时”，对原来的民法和刑法法典作了修改，加强了资产阶级专政。）在经济理论方面，大会突出地强调“利润”、“价格”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它作为管理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二十二大在赫鲁晓夫带领下集中攻击“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从此，包括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在内的所有“反党集团”成员都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消失了。

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对苏联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农业危机日益暴露出来。为了摆脱困难，赫鲁晓夫提出了要以与工业同样的速度发展农业，改组农业部，建立供应农业技术设备的全苏联合机构，同时又大批撤换“领导农业不力”的地方领导人。

在这一年里，苏联宣传机器对赫鲁晓夫作了空前肉麻的吹捧。

二十二大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随后，苏联外交部发表了关于撤退驻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和要求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离苏的公报。6月，赫鲁晓夫同肯尼迪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谈。

1 月

1月6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等党组织的会议上说："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已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可能性"。

1月10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农庄的经济和财务状况的措施》的决定。其中规定：(一)1961—1965年对集体农庄出售各种畜产品的收入（销售总收入减去生产费用）的百分之八十免征所得税。(二)从1961年2月份起，分别降低卖给集体农庄的各种机器零件的售价，同时降低汽油零售价格。(三)卖给集体农庄的农业机器可以分期付款。(四)集体农庄可以延期偿还国家银行的长、短期贷款。

1月12日 据报道，部长会议最近在赫鲁晓夫主持下举行会议，讨论七年计划(1959—1965年)头两年的执行情况和进一步改进国民经济计划制度的问题。

会议认为，有必要把从超额完成过去两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所得到的新的资源和生产潜力用来加速苏联工农业的生产和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决定修改七年计划，以提高某些部门的发展指标。关于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计划制度的问题，会议认为，有必要在制定年度计划的同时，也制

定从当年算起的第五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以便有一个连续生效的为期五年的计划。

1月10—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1960年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在农畜产品生产和向国家交售农畜产品方面的社会主义保证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措施。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各共和国领导人就这个问题作的十六个报告。

讨论结束时，赫鲁晓夫作了《提高人民物质福利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任务》的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从1953年以来，农业"取得了应有的成绩"。但"农业的发展速度还没有工业那么快"，"没有做到步调一致地共同前进"，"七年计划的头两年"对农业"是不顺利的年头"，"某些产品的生产"没有完成计划。因此，这次中央全会要"尖锐地提出进一步发展农业的问题"。

赫鲁晓夫对各地领导人和农业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大加指责。他说，"看来，由于开荒而使谷物生产增加的成绩"，对"个别领导人起了腐蚀作用"。他还指责地方领导人弄虚作假，"非常轻率地提出很高的保证"，骂他们是"败家子"，威胁要把其中一些人"开除出党"，甚至"送交法院"。

赫鲁晓夫过去攻击马林科夫等人要以发展重工业的速度发展消费品生产的观点，现在却要求实行他曾经反对过的这一主张。说"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已"可以在不妨碍进一步发展工业和加强国防的情况下，拨出更多的资金发展农业"。说"鉴于农业发展的速度还不象工业那样快"，"有必要采取措施，弥补过去做得不够的地方。在七年计划的今后五年中，将

以空前无比的速度发展农业生产”。“为此，要求对满足农业需要的拨款作重大修改”。“在七年计划所规定的数目之外大大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1954 年，赫鲁晓夫鼓吹把农业装备和投资集中于新开垦地区，主张原有的一些产粮地区放弃谷物生产。而现在却反过来指责这些地区的领导人对他当年的主张“缺乏正确的理解”，并要求今后“所有的州、所有的共和国都要加紧努力”生产谷物。

为了摆脱日益明显的农业危机，赫鲁晓夫在全会上除提出大大增加农业投资外，还要求：(一) 发展水利灌溉，改良土壤。(二) 改组农业部。(三) 成立“以经济核算制度为基础的全苏联合机构”，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供应技术设备和肥料。(四)建立国家采购委员会，修改采购制度。(五)大种玉米，说现在玉米成了增产谷物的“主要潜力”。(六) 进一步“挖掘新垦地的生产潜力”。(七)加强物质刺激。说“应当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人”。“单靠精神上的因素是走不远的”。“应该让人们看到和感觉到什么是物质刺激”。说“工作做得好，劳动生产率提得高，就应该有相应的报酬和物质奖励”。对于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就要“告诉他”，“由于犯了错误会失去什么”，“提醒他对计件实物工资或货币工资的注意”。

全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说，“发展农业的问题应当永远是我们党注意的中心”。决议要求：(一) 改组农业部，使其工作集中于：全力改进科研机构工作、总结和宣传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根据各地区的特点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出关于最合理地指导农业生产问题的建议、培养高级和中级干

部。(二)建立联合机构来解决保证供应农业技术设备、备件、矿肥和其他的物质技术手段的问题，解决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安排机器的修理和利用的问题。(三)设立国家采购委员会来进行各种农产品的采购工作。

这次全会反映了赫鲁晓夫几年来农业政策的破产。

这次全会决定，将于1961年10月17日召开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全会选举根·沃罗诺夫(按：原为奥伦堡州委书记，赫鲁晓夫认为他是农业专家)和维·格里申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月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举行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科学会议。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伊利切夫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在苏共中央《关于现代条件下党的宣传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了对劳动的精神刺激在不断增长。某些头脑发热的人因为这一点便开始说什么个人物质关心的作用在缩小”。他说，“必须同各种平均主义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强调必须发展“社会消费基金”，说“每一个苏联家庭依靠社会基金的消费部分不断增长这个事实”，“产生了使每一个苏联人”“对于提高全社会福利的个人关心”，因而使“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原则”“充满了新的社会内容”。“物质刺激便成了对劳动的精神刺激的增长的源泉”。

2—4月

2月4日 部长会议公布《企业改善工作人员文化生活

条件和改进生产的基金条例》。条例规定，从企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十)的款额用于住宅建设和文化建设，用作个人奖励基金。同时，废止1955年8月9日公布的旧条例。

2月20日　塔斯社报道，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根据1月全会决议改组农业部和成立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决议规定，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具有部长会议国家委员会的权力。

2月20日　塔斯社报道，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斯基说，“苏联军队的改组和装备新型武器的工作已经完成。战略性火箭部队已经建立，它已成为苏联武装部队的主力”。

2月22日　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在《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在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以后，国民经济计划过分集中的情况消除了，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自下而上的计划原则”。文章还说，“由于顺利地完成七年计划前几年的任务，我们有可能稍微改变发展轻重工业的比例，把部分投资转到扩大消费品的生产上”。

2月25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组和改进国家采购农产品的组织工作》的决议，决定从1961年起，对粮食、肉类、牛奶和经济作物的采购都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国家采购组织同农庄、农场签订的采购合同一般为期二——五年。合同每年调整一次。合同中规定买卖双方的义务；在区或两个区之间建立农产品采购监督组织。

3月　《经济报》报道，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由消费合作社向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收购国家不购买的剩

余农产品，并在市场上按照地方市场形成的价格出售。收购价格由合作社同集体农民议定。

4月12日 苏联宣布发射了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

4月16日 塔斯社报道，塔吉克党中央举行全会，解除乌尔札巴耶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取消其党中央委员的资格，并开除出党；取消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胡多耶夫的党中央委员资格，并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欺骗党和国家，在收购棉花方面作了虚报。解除奥勃诺索夫的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职务，取消其党中央委员的资格，并开除出党，因为他在政治上没有原则和无能。

全会选举拉苏洛夫为塔吉克党中央第一书记。

从2月到4月，全苏有不少州的州委第一书记、书记和苏维埃主席，作为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破产的替罪羊被撤职，有的并被开除出党。其中有：乌利扬诺夫斯克州的雅科夫列夫、卡卢加州的波斯托瓦洛夫、亚罗斯拉夫州的巴里诺夫、阿斯特拉罕州的加念科、基洛夫州的普切利雅科夫、伊凡诺沃州的库兹米奇等十多人。他们被撤职的原因是：“在领导农业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保证对州党组织的领导”，“有反国家行动”，“没有按苏共中央1月全会的要求和赫鲁晓夫的指示来改进自己的工作”，等等。

4月26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十七个大经济区，每个大经济区设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协调和计划委员会”，以便协调当时的一百多个国民经济行政区（按：在此以前，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年）起，

全国性的国民经济计划一直是按十三个大经济区来制定的。1957年，赫鲁晓夫把全苏划分为一百零五个经济行政区)。

成立大经济区的理由是：

(一)由于经济日益发展，现在"许多重要的国民经济问题根本不局限于经济行政区的范围，它们不可能靠个别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得到解决"。"区域广大的大经济区拥有综合发展经济的一切必要条件"。

(二)大经济地理区有很大可能性来广泛发展所有工业部门的协作化。按大经济区来制定发展和分布生产的计划，"是从地理上合理分配劳动力、同各种地方主义倾向作斗争的最有效办法"。

(三)大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协调和计划委员会，将研究综合发展经济的基本问题，并向各加盟共和国计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提出建议。

3—4月间 3月间，莫斯科等地首映新影片《战火年代的故事》；4月间，首映反斯大林的《晴朗的天空》等影片，并拍摄了不少"反战"影片。这些影片散布和平主义毒素，或者攻击斯大林，为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制造舆论。这期间，还上映了吹捧赫鲁晓夫的纪录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5—6月

5月4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加强同规避社会有益劳动和过着反社会的寄生生活的分子作斗争》的法令。法令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公民，不愿遵守

宪法关于公民义务的最重要的规定，即不尽自己的能力诚实地从事劳动，而是规避对社会有益的劳动，靠经营土地、小汽车、住房获取非劳动收入或有使他们可能过寄生生活的其他反社会行为者，区(市)人民法院可决定他们须从事两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易地劳动，并没收其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强制他们在新住地参加劳动。

对于只是表面上在企业、机关工作或名义上是集体农庄庄员，而实际上从事私人企业活动，靠非劳动所得的财产生活者，可对其采取上述同样的制裁措施。

5月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加强同特别危险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法令。法令规定，要“加重惩罚”对国家“特别危险”的罪犯。所谓“特别危险”的罪犯中包括：特别危险的国事犯、有破坏劳动改造机关工作行为者、聚众骚乱者、“反抗首长或强迫首长违反职责”者，等等。这些罪犯不得提前释放，而对其中“最危险的罪犯”甚至要判处死刑。

5月6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允许对犯有以下罪行者采用死刑——枪决：盗窃特大数额的国家财产或社会财产；制造伪币和有价证券并以此为业；凡在受改造的犯人被剥夺自由的地方进行恐怖活动，或袭击行政机关，或为此目的而组织犯罪集团以及积极参加这种集团的最危险的惯犯和重罪犯。

5月16—20日　苏联当局在乌克兰利沃夫举行了对“乌克兰工农同盟”(按：该组织谴责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审讯。其领导人分别被判十——十五年徒刑。

5月29日　塔斯社报道，摩尔达维亚党中央举行全会，

解除谢尔久克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理由是“他担任党的其他领导工作”。全会选举鲍久尔为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

6月20日　苏联元帅叶廖缅科在《红星报》发表文章，评新近出版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第二卷。文章指出，“在苏联军事历史著作中，很长时间都不能正确地阐述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文章认为当时撤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对军事政治形势所作的不正确的估计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失策和错误”。文章提出，在1941年夏秋的乌克兰战役中，西南方向的总司令布琼尼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曾提出“建议”，但遭到最高统帅部的“拒绝”，结果使“西南战场军队失败”。

6月20日　《巴库工人报》发表影评，介绍影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吹捧赫鲁晓夫“是真正新型的领导者”，是吸引人们“来解决复杂的经济任务的出色的组织者”。在卫国战争期间，“他是热情的演说家和勇敢的战士”，“直接参加了歼灭法西斯的战斗”。“他是集体农庄庄员们的顾问，他是矿工们的助手，他是千千万万人的导师”。他是个“不倦的、坚毅的”人，他“教导人们原则性，教给人们管理生产”，受到人民的“爱戴和信任”。

6月21日　《真理报》发表普拉托夫中将的一篇文章，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第二卷。文章指出，战争初期苏军被迫撤退，“原因之一在于，斯大林独自一人决定最重要的国家和军事问题”。文章说，“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大林格勒和东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领导军队的

水平提高了。在这方面，斯大林格勒和东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赫鲁晓夫有很大的功绩”。文章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思想战线上极重大的事件”。

6月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培养科学干部和科学教学干部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批评科学家“很少对工农业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进行科研工作时，对问题的经济上的根据注意不够”，要求按照国民经济的要求提高科学干部和科学教学干部的水平，决定采取措施鼓励他们进行关于重要国民经济问题或理论问题的研究。

7—8月

7月3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批准同志审判会条例》的法令。条例规定，企业、机关、团体、学校、街道、农村中的“同志审判会是选举产生的社会机关”。其“主要工作是预防违法和对社会有害的行为。用说服和社会制裁的方法来教育人们，以建立一个不容许任何反社会行为的环境”。

7月8日 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全军共青团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无论武装力量的技术装备有多么大的意义，陆、海军战斗力的决定性条件仍然是人”。又说：“火箭部队和火箭兵团将成为我们武装部队各兵种的基本战斗力量”。

7月 《哲学问题》杂志第七期刊登什特拉克斯的一篇文章：《论客观规律的发展》。文章说，目前在苏联，“对抗性矛盾

消失了”，“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阶级之间的冲突的客观基础没有了”，产生“社会革命的任何基础”“失去了”，“飞跃不是通过社会一部分反对社会的另一部分的斗争来实现，而是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社会集团的共同行动来实现”。

8月30日 塔斯社报道，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鉴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集团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对苏联进行直接威胁，责成国防部下令：在对德和约缔结以前，暂缓把到1961年服役期满的士兵、水兵、军士和士官转为预备役。

8月31日 苏联宣布研究出制造二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吨级核弹的方案。

9 月

9月12日 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说坚决同特别危险的犯罪行为作斗争是司法机关最重要的任务。对于犯了这些罪行的人，以及对于特别危险的累犯，应该使用法律所规定的严厉惩罚手段。

9月13日 《真理报》刊登“苏联人民演员”格拉西莫夫的一篇文章：《电影为共产主义服务》，说最近几年电影事业中出现的“新东西(按：作者举出的影片中有反斯大林的《晴朗的天空》)不是由于偶然意志形成的，而是在第二十次到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年代中，在人民本身和我们整个国家内部所发生的深刻而重要的过程的结果”。然而，文章指责影片在“揭露”“阴暗面”和“人的关系中种种丑陋和混乱的根源”方

面“还非常畏缩”，还“不好意思指出恶的具体体现者”，而“把打击缓和到小心翼翼地、有时甚至是客气地碰一碰的程度”。

9月14日 塔斯社报道，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发布命令，规定定期征集1942年出生的公民和延期应征而期限已满的适龄公民服现役。命令还规定，目前在兵团、部队和其他岗位上服兵役而现役期限已满的士兵、军士、海军军士，暂时延期转入预备役。

9月22日 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喀尔巴阡军区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一长制是苏联武装力量建设的极重要的原则”。“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在战斗行动瞬息即逝的情况下，一长制尤为重要。”因此，必须继续加强一长制。

9月 《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第九期刊登皮斯柯金的一篇文章：《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苏维埃国家的发展》。文章说，“苏维埃社会已经是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苏维埃国家已成为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全民的政治组织、全民的国家。在这里，对所有的人都实行民主”。“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的定义已不适用于苏维埃国家”。

9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三期载文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攻击斯大林，吹捧赫鲁晓夫。文章说，这本书“广泛阐述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活动”。说赫鲁晓夫“在基辅和哈尔科夫保卫战期间”，“多次大胆地表示不同意大本营的并非经常符合具体条件的命令，并且提出了更加合理的决定”。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9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四期刊登布金科的一篇文章，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胜利的极重要的结果是随着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解决，苏维埃社会的阶级斗争停止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是很清楚的”。

10　月

10月6日　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沃尔科夫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说从1956年开始到1961年底，有四千多万人在同时提高工资的情况下过渡到新的劳动报酬条件。这大约等于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二。文章说，在向新的劳动报酬条件过渡的同时，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月四十——四十五卢布(按：从1961年1月1日起新币开始流通)。在大多数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的最低工资率处于较高水平：每月五十——六十卢布。由于主要是提高低工资职工的工资，每月四十卢布以下工资的工业工人的比重缩减了四分之三。同时每月一百——一百六十卢布工资的工人的比重几乎增加了一倍。

10月8日　《星火》杂志刊登科学院国家和法研究所所长罗马什金的一篇文章，说“关于国家的著名的一般概念，即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的概念，对我们的国家已不适用了，因为在我们国家里已没有什么阶级镇压可谈”。

10月9日　《消息报》记者在报道原子潜水艇实习航行时写道：“不久之前苏联军队中还流行着一种不正确的观点，认为在拥有强大水上舰艇的基础上，应该缩减建设潜水艇的

计划”。特别是前国防部部长朱可夫“认为舰队是古代的残余，只有节日阅兵才需要”。

说赫鲁晓夫干预了这件工作。宣传是赫鲁晓夫决定了潜水艇在全体战斗武装部队中的地位。苏联水兵称赫鲁晓夫为“原子舰队之父”，科学家根据他的指示设计了新型的潜水艇，并且为潜水艇生产了用原子发动的强大发动机。

10月17—31日 苏共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弗·科兹洛夫作了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苏共纲领》和《苏共章程》。这次代表大会，是苏修叛徒集团把他们从苏共二十大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一)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和《苏共纲领》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声称要用“二十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并说“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党的“总路线的基础”。

(二)文件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国家机器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职能也就消亡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已由“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代表全民意志的机构”，“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全民的组织”，“无产阶级民主已经日益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工人阶级的党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三)文件大肆鼓吹“物质利益原则”。说“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正确地结合起来”是“在整个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路

线”,“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就意味着毁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说“在政策中要讲现实主义”,“在分配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领域内”,“党始终不渝地实行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坚决反对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现在“没有理由放弃”这个原则,而且要“进一步发展”这个原则。说“只要劳动者对许多物品的个人所有权,作为个人消费的形式,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而不变成目的本身,它同共产主义建设是不矛盾的”。

(四)文件强调“地方和企业的权力独立性以及权限将进一步扩大”,“应当在一切生产领域中加强卢布的监督作用”,“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在这方面,运用经济核算、货币、价格、成本、利润、贸易、信贷、财政这些发展经济的关系,起着巨大的作用。”说“应当经常改进价格制度”,“应当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价格应当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反映社会必要劳动消耗,保证能补偿生产和流通费用,使每一个正常工作的企业得到一定的利润。”“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应该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润,更广泛地利用利润来奖励自己集体良好的工作,来扩大生产。”

(五)文件攻击“保守主义者”,说他们“在国民经济部门……象小鬼缠着有罪的灵魂一样,抓住旧东西不放”。说过去党和国家领导经济和文化的“某些方法”“在新条件下已不再适应生活的要求”,已成为“发展的障碍”,因此要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足够的勇气使那些已经不符合历史经验的公式和原理更加准确”,要“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来改变理论原理”。说“创造性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同思想停滞和崇拜不符合实际状况和客观环境的公式，是不可调和的”。说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采取的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完善国民经济计划”、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等措施，是“真正革命的重大措施，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极重要的贡献”。

（六）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集团借口“反对个人迷信”，空前猖狂地攻击和全面否定斯大林。说二十大反对斯大林，就是“抛弃已经成为前进障碍的那种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方法”，否则就会“让守旧的、反对一切新的创造性的事物的势力在党内占上风”。

大会专门通过决议，决定把斯大林灵柩从列宁墓中迁出。后来并予以火化。

（七）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发言还攻击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说他们的“罪状”是：1.反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的关于谴责斯大林的“建议”；2.反对“开垦荒地、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改善苏联人民的福利、恢复革命法制”；3.“抵制一切新事物”，“反对党的路线”，“反对二十大的方针”。说他们想“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排除那些出来揭露个人迷信时期罪行的同志”，“力图改变党内和国内的政策、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制订的政策”，“想使党和国家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想恢复个人迷信时期的政策和领导方法”，“想把莫洛托夫安放在领导岗位上”。赫鲁晓夫说，“同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原则性的尖锐的政治斗争，是新与旧的斗争。问题是：我们党今后是继续执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政策呢，还是重新恢复个人迷信

时期的方法”。他攻击莫洛托夫等人已经“僵化”、“脱离生活”、“精力枯竭”，说“虽然他们早已成为烧尽了的只冒烟的木头，可是他们却认为他们似乎还在继续发光”。另一方面，他说，“一批新的政治活动家”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反对一切阻碍新事物发展的东西，战胜旧事物的反抗”。

在这次大会上，就“反党集团”问题第一次点名攻击了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

科兹洛夫在报告中说，“反党集团的组织者直到现在还在企图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在这方面特别起劲的”莫洛托夫，“竟然把苏共新纲领描述为在精神上是反对革命的纲领”。

(八)大会通过的新的《党章》、《党纲》和赫鲁晓夫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都强调“按照一定比例”“经常不断更换”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并在新的《党纲》和《党章》中对此作了具体规定。赫鲁晓夫说，“向这种制度的过渡”，“符合于苏维埃社会的政治组织方面新时期的实质”，“在这个时期内，国家变成全民的国家，而党变成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代表者”。说建立了这种制度，就可以除掉那些“失掉了创造性办事的能力”和“丧失了对新事物的感觉”因而“成为一种障碍”的领导人，使他们“不挡住新生力量的道路”。据科兹洛夫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这种制度实际上在二十大后已经实行了几年。他举例说，“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党的边疆区委、州委的委员，在最近的选举中换掉了百分之四十五，而市委和区委委员换掉了百分之四十”。

(九)这次大会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影射反华。

(十)大会最后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十九大中央委员和

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二当选。“反党集团”的全部成员，都被排挤出中央委员会。

10月19日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吹捧赫鲁晓夫和《苏共纲领》。他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从拟定经济和文化建设计划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胆思想的丰富和深刻来看，从党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的规模以及所取得的结果来看”，苏共二十大以来“确实是”苏联的“伟大转折点”。说《苏共纲领》是苏共“期望的里程碑”，“是时代的伟大文献”。说赫鲁晓夫是“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说他的“特点是”“执行党的路线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摇性”、“大胆精神和坚决性”，“这些品质最好不过地表明赫鲁晓夫同志是一贯地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有权受到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爱戴和深深的尊敬”。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大反斯大林；攻击“反党集团”，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10月21日 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证明，过去几年“在赫鲁晓夫倡议下所采取的”“进一步完善生产结构的方针是多么正确和及时”。《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的报告是“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与共产主义不可分割”。柯西金说，苏联“对于任何国际问题，都是从和平共处的立场”来处理的，“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求得短促的和平喘息时间”。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彻底排除出去”。他攻击“反党集团”“维护工农业中旧的、已经过时的经济政策”，指责“他们

认为只有单纯的集中决定着经济领导的社会主义方法”。他说，今后，“必须继续改进工业中的生产组织”。

10月26日 伏罗希洛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表书面声明，承认自己在“支持反党集团成员的有害言行上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表示“整个地、完全地同意”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所作的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的“全部论点”。表示“坚决谴责”这一“集团”的“派别活动”。表示“完全同意”党在消除“个人迷信”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对自己“在那种情况下犯了错误而深感遗憾”。说自己在党内五十八年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章党纲，从来没有背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党集团。

10月26日 谢列平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攻击“反党集团”，说“现在是在法律中规定处分官僚主义表现的办法的时候了”。

谢列平说，“反党集团，首先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等，反对在国内恢复社会主义法制的坚决转变”。说他们“在非法大规模地镇压”方面“是有罪的”。说那时曾“通过了特别刑法以便污辱和杀害正直的”领导人。他说，1957年6月，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布置了自己的警卫队，“准备采取最极端的措施”。“现在，在粉碎反党集团之后，特别深刻地感到，多么美好的时候来到了，我们党和国家内的空气变得多么新鲜，呼吸起来真正感到舒畅，工作起来真是带劲。”

谢列平说，国家保安机关进行了改组，取消了一些“非其本份”的职能，清除了“追求名利的分子”，已派了一支“庞大

的"队伍到这些机关去工作。说现在除了根据法院的判决以外，不能指控任何人是罪犯并加以惩罚。"国家保安机构工作中完全新的东西是：除了加强同敌人谍报机关的走狗作斗争外，对那些有政治性错误行为、有时近于犯罪、但这是由于政治上幼稚或轻率而并无任何敌意的苏联公民，采取预防的教育的措施。"

谢列平最后攻击了维辛斯基，说法学界对维辛斯基有"个人迷信"。说维辛斯基"在确定法的概念方面是从随着共产主义的向前发展，阶级斗争将尖锐化，因而应当加强镇压措施的错误原理出发的"。

10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二十一期载文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第三卷，吹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功绩"。

美国《纽约时报》10月22日在报道中讽刺地说：苏联"正在对战时历史进行彻底的检查以便歌颂赫鲁晓夫"。"现在看来很明显，使局势对希特勒不利的是赫鲁晓夫而不是斯大林"。在上述著作中"赫鲁晓夫的名字出现了四十一次，而斯大林只提到了二十七次"。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看来，……是赫鲁晓夫……'策划了'赶走德国人的'攻势'"。

11—12月

11月13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鉴于谢列平已调任其他工作，解除了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时任命谢米恰斯内担任这一职务。

11月22日 《消息报》刊登列宁格勒市法院院长索洛维耶夫的一篇文章，说“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二大这一段时期是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准则进行了巨大工作的时期。在此期间，按照党中央倡议，实现了重要的司法改革：通过了《刑事立法原则》、《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原则》、《法院组织立法原则》、《关于同特别危险罪行和过寄生生活的分子作斗争的法律》”。“所有这些，毫无疑问，促进了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巩固”。

12月2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把投资拨款银行（建设银行）划归财政部。

12月5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说在苏联，剥削阶级——地主、富农、资本家“早已消失了”。因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本身相联系的主要东西——一个集团的人攫取另一集团的劳动成果的可能性——消失了”。

12月8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联盟院法案委员会主席波利扬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民事立法原则法草案的报告。报告说，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为全民国家了”。因此，“现行法律的许多条款已不符合现时期我国所存在的关系，它已过时了”。又说，苏联民法旨在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全面地、和谐地发展人的个性。草案对调节公民的财产关系很为注意。个人财产仍然是满足社会成员物质和文化需要的重要方法之一。草案规定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条文，巩固公民的财产权以及与之有关的个人权利。

民族院法案委员会主席拉苏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立法原则草案的报告。报告说，现行法典的许多条款

都已陈旧，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情况的要求。又说，民事诉讼在保障个人自由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起着很大作用。诉讼程序立法原则草案中规定的民事诉讼法的民主原则包括：由法院单方面根据全体公民在法律和法院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实行公正裁判；民事案件的集体审判制；裁判员的独立性以及他们绝对服从法律；用本地语言进行诉讼；公开审理民事案件以及检察员在民事诉讼中监督法律的正确执行。

12月14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部长鲍尔迪列夫的谈话。他说，近几年对于苏联立法来说是“恢复青春的年代”。去年在通过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原则》和《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原则》后，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又批准了刑法(基础法)草案。这些新文件是根据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制订的。俄罗斯联邦民法法典还是1922年新经济政策时期制订的，法律的许多条文“已经过时”。新的基础法将从1962年5月1日起生效。

12月16—23日 苏联当局在乌克兰利沃夫举行了对“乌克兰民族委员会”的审讯。被审讯者均被判了重刑。

12月25日 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在全苏思想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说，斯大林“犯了许多理论上的错误”：

哲学方面，斯大林提出了所谓对立的统一是不存在的这一错误论点；在对待哲学遗产问题上、在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学说方面制造了混乱；取消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以“辩证法特征”来一般地代替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在苏联不断胜利而尖锐化的规律。

经济理论方面，在关于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

制水平的途径问题上，在关于商品流通缩小和产品交换代替商品流通问题上，以及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总是要超过生产的问题上，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原因的解释以及把生产资料排除于商品生产范围之外都是不正确的。关于在战后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产值不可避免地降低的论点及其他论点也是错误的。

法学方面，维辛斯基是斯大林在法律问题上的传声筒。维辛斯基企图从法律上把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阵地在苏联的巩固而尖锐化的有害论点固定下来，并力图利用法律科学来为司法专横和破坏法制辩解。

党史科学方面，斯大林评价历史事件的主观主义，为吹捧个人而歪曲事实，贬低列宁在党史中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是对党和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这些都产生了最严重的后果。

伊利切夫说，没有任何根据认为斯大林的全部著作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贡献，更谈不上是伟大的贡献。当然斯大林对党和共产主义运动(其中也包括理论方面)是有功绩的。不能不考虑到他在一些著作中普及了马克思主义，阐述了列宁的观点，在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时，站在正确的理论立场上保卫了这些观点。但当斯大林企图“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他犯了许多理论上的错误，作了主观主义的判断。

伊利切夫批评“某些大学生往往是形式地学习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说，“改变情况应该从社会科学教

员着手。其中的某些人应该进修，重新培养，帮助他们摆脱不正确的教条主义观点”。

12月29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规定对属于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其他国家机关或合作社机关的农业机器使用时不爱护或者保管不善者，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或判处同样期限的改造。不止一次发生这种行为或者造成严重损失者，判处三年以下的徒刑。

1962年

这一年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国内政治经济困难大暴露的一年。

在经济方面：3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专门讨论了农业问题，赫鲁晓夫公开承认七年计划(1959—1965年)的完成“受到了严重威胁”,“全国将遇到很大困难”;并提出要“从根本上改组”农业领导机构。11月间，又举行了讨论国民经济领导问题的中央全会，决定按生产原则自上而下地改组党的组织，把党组织分为领导工业的党委和领导农业的党委两套班子。这一年苏修集团抛出了利润挂帅的“利别尔曼计划”。此外，为了弥补经济上的困难，苏修叛徒集团宣布提高肉类、各种肉产品和动物油的零售价格，把原已宣布要取消的职工工资税和要降低的工资税率无限期延期实行。

在政治方面：苏修叛徒集团展开了更疯狂的反斯大林运动，为大批人恢复名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法学、军事学、文学艺术、教育学、语言学等各方面，对“为斯大林个人迷信辩解”的人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強调要把“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作为“发展理论思想的最重要条件”。同时大量上演和出版以反斯大林“个人迷信”为题材的电影、戏剧、音乐、小说、诗歌。还提出要重新制订新宪法，使宪法贯串“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幸福”的精神。另一方面，则加強法西斯

统治，修改了一系列的法律条令，扩大死刑范围和“特别危险罪”的范围，加强许多“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这一年4—5月间，苏修在我新疆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10月，发生“加勒比危机”，赫鲁晓夫屈服于美帝压力，下令拆除苏联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随后，米高扬就此事访问了古巴、美国。

1—2月

1月18日 《真理报》刊登波斯别洛夫为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五十周年写的一篇文章，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浸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本书是斯大林在理论领域中的“专横”和斯大林“不愿重视”列宁原理的结果。说党史中有斯大林支持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话，但当时他还不是一个足够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产生了一定的动摇和不一贯性，没有懂得列宁反托洛茨基集团斗争的全部重要意义。

1月25日 《真理报》载文为1933年因反斯大林而自杀的斯克雷普尼克恢复名誉(按：斯克雷普尼克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苏维埃领导人等职)。文章说，“虽然斯克雷普尼克有过个别错误，但这不是主要的，他是忠实的列宁追随者”。“由于中伤和夸大他的错误，他被迫自杀。苏共二十大恢复了他的名誉”。

1月27日 《真理报》就苏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载文说，党组织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提拔了许多内行的、善于创造性地

解决经济、文化、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任务的有才干的群众组织者担任领导工作。他们更多的是工农业专家。经常更新由选举产生的机关，这是党、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可破坏的准则。评价党机关领导人工作的主要标准是工厂和建筑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科学机关、区、州、共和国的具体工作成果。

1月27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废除原来规定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名字命名城镇、街道、企业的一切法令。

1月29日 《经济问题》杂志第一期刊登一篇文章：《论基本经济规律》，反对列昂节夫关于基本经济规律的说法及斯大林的一些论点。说斯大林关于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水平的理论有两个错误：(一)把农庄产品看成是农庄所有制的唯一对象。(二)把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经济问题的重心移到了生活资料的交换方面，并建议不是从生产范围，而是从流通范围内开始共产主义改造。

文章说，每个社会形态只能有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斯大林认为剩余价值规律只有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是基本规律，而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是另外一个基本经济规律——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的规律发生作用，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文章不同意列昂节夫的意见。说否认基本经济规律就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法立场和成果。说在经济计划工作中，忽视基本经济规律会对个别部门造成不良影响，使人放松物质关心。说列昂节夫在主张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后果的同时，实质上抹杀政治经济学从三十年代到

苏共二十大期间的发展。

1月30日 法新社报道，苏联今天恢复了另一个在斯大林的“大清洗”当中的“受害者”、前共产党中央委员皮亚特尼茨基的名誉。

《消息报》透露，皮亚特尼茨基是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消灭”的，他成了“不正当的指控的受害者”。

1月30日—2月2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会上作了《苏共二十二大与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说，斯大林“垄断”理论的“野心”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特点是“仅仅吹捧斯大林一个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只不过导致了哲学和教学工作的贫困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没有提出正确的答复。提到斯大林在理论方面有过功劳。说对在批判个人迷信幌子下粉饰托洛茨基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民族偏差主义等的企图，必须给予坚决回击。

说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的任务是，“向计划机关和领导机关提出经济政策和实践、完善生产和法律关系、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会议在讨论中强调“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是发展理论思想的最重要条件”。强调“新党纲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基础”。会议还讨论了根据苏共二十二大决议和党纲重新修改的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学大纲。决定开设科学共产主义原理课。

1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二期发表题为《苏共——人民的党》的编辑部文章，说1960年苏共接受集体农民为预备党员的人数比1955年增加一倍多一点，其中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人和农业专家占主要地位。在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期间，职员入党的绝对数字增加了，其中大部分是工程技术人员、农艺师、医生、教师、经济工作者和其他专家。

2月7日 《真理报》刊登马利歇夫的一篇文章：《计划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重要环节》，说"赢利应该看成是计划的主要指标，只有利润才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都概括地反映在利润水平上。""物质利益，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和动力。"

2月7日、14日、16日 《红星报》连续载文攻击斯大林的军事论点，说斯大林的下述"错误论点""严重地阻碍了苏联科学的发展"：(一)敌人胜利进攻后的积极防御和反攻是武装斗争的必然阶段和方法。(二)侵略国家比爱好和平国家对战争更有准备。说这些论点是斯大林为了推卸他在卫国战争前夕严重失算的责任而提出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事先同意苏联在军事上落后。

文章还攻击朱可夫破坏加强部队战斗力的原则，取消党对军队的监督方针，在理解对外政策和领导国防部方面有"冒险主义倾向"。

2月1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加重侵害民警局工作人员和人民纠察队员的生命、健康、或人格的责任》的法令、《关于加重强奸的刑事责任》的法令、《关于加重贿赂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法令。

这三项法令同1960年10月通过的新的《苏俄刑法典》中的有关条款相比较，都加重了这些罪行的刑事责任。

法令说，为了加重犯罪分子及其他反社会分子侵害正在履行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重要职责的民警人员和人民纠察队员的生命、健康或人格的责任，规定："不服从"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指挥"或"要求"者，处以"十五天以下拘留，或一个月以下劳役改造，或二十卢布以下罚金"。"侮辱"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者，处以"六个月以下剥夺自由，或一年以下劳役改造，或一百卢布以下罚金"。"反抗"履行维护社会秩序职责的民警人员和人民纠察队员者，处以"一年以下剥夺自由，或同样期限劳役改造，或一百卢布以下罚金"。侵害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生命者，处以"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剥夺自由，并科以两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流放或不流放，具有加重情节者，处以死刑"。

（按：《苏俄刑法典》第一九一条"反抗政权机关代表或履行维护社会秩序职责的公众代表"，第一九二条"侮辱政权机关代表或履行维护社会秩序职责的公众代表"，第一九三条"对于公职人员或社会工作人员实施威胁或暴力"，规定最高刑罚为三年剥夺自由，一年劳役改造，六百卢布罚金〔合新币六十卢布〕。）

2月20日 《教师报》载文要求教育工作者"彻底杜绝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说有的人避而不谈这个问题。说"应期待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把思想教育引上同个人迷信作斗争的道路"。

文章还说选举校长的方法对学校会有好处。

2月22日 火箭部队总司令莫斯卡连科在《消息报》发表文章，说苏联海军“能够远在苏联领海以外的地方解决委托给它的任务”。

2月23日 《红星报》发表格列奇科的一篇文章，说195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和一系列的措施，使领导武装力量的列宁原则得以恢复，1957年以来被接收入党的军人比全会以前增加了几乎一倍半。现在全体军人中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

2月 《哲学问题》杂志主编米丁2月间在第一次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杂志编辑部会议上作报告，说斯大林在哲学上犯了一系列严重的理论错误，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被抬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不可逾越的顶峰”，而实际上这是一本通俗性的著作，并在好些点上包含有错误的判断。

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刊登苏斯洛夫的一篇文章：《苏共二十二大与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说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不少有害后果。为了推崇斯大林，他的著作、文章和讲话被不恰当地称颂为“天才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章说，“停止颁发列宁奖金和设立斯大林奖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公正的，现已由苏共中央完全纠正”。

3　月

3月2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规定对1957年

6月10日的法令作如下补充："允许国际列宁奖金委员会根据1957年以前的'加强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的请求，把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奖状和奖章更换为'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获得者的奖状和奖章"。

3月5—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党在改进对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对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报告，并在闭幕会上致闭幕词。全会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还通过了告全体劳动者书。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农业情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表示了"严重的不安"。他指责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关于"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讲话，说"现在不能确切算出究竟哪一年能解决增加农产品生产的任务"。说"由于对农业领导的放松，农产品生产的七年计划的完成受到严重威胁"，"如果再不解决农业任务，那全国就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报告对十五个加盟共和国都作了批评。

报告说，"如果我们保持目前这种播种面积的结构、饲料作物的安排和单位面积产量，那末非但今天，就是明天也不会有饲料、肉和奶，有的只是决议、号召、呼吁和恳求"。

报告把农业上的失败归罪于威廉斯的草田轮作制，并借机攻击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犯的"错误"，说他支持了草田制，给农业"造成巨大损害"。

报告提出必须改组农业机构，新建农业管理机构，建议各州设立区际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其主要任务是选拔和训练干部、组织生产、实行监督和完成采购计划等。建

议全联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设农业委员会(管理局从属于它)。建议改组苏共中央和各共和国中央的农业部。主张更坚决地实行农产品定购制。报告强调了要加强对农业的物质技术援助。

赫鲁晓夫在闭幕词中说,“要使 1962 年和以后几年成为农业的转折年”。说“农业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具体的、通晓业务的生产管理”。“问题仍然是在于干部”。闭幕词再次提到要修改集体农庄章程。

全会就赫鲁晓夫的报告所通过的一项决议表示,“整个地、完全地赞同赫鲁晓夫的报告。”决议对农业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七年计划头三年农产品生产的增长“大大落后于规定的水平”。决议批评俄罗斯联邦 1961 年谷物、肉类、奶类的产量都远没有达到控制数字规定的指标;批评乌克兰的肉类、奶类、甜菜的产量都没有完成计划;哈萨克执行七年计划的情况“使人极不满意”;1961 年的谷物、畜产品的生产都没有完成任务;白俄罗斯的肉类、奶类生产“严重落后”;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肉类和奶类生产只是“大体上”符合水平;摩尔达维亚在七年计划头三年,肉类、奶类、葡萄、水果、蔬菜的生产都没有完成计划;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生产的肉类“很少”;所有植棉共和国都没有完成棉花生产的任务。说各共和国完不成任务,首先是因为农业领导工作有很大的缺点。批评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等有关机关对农业技术装备等漠不关心,许多党和苏维埃机关不理解机器拖拉机站改组后的新形势。提出“必须从根本上改组”农业领导机构。

决议责成全国各级党组织遵循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具体措施。责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及部长会议在全国范围内改组对农业的管理，并在各州、边疆区及共和国考虑建立领导农业生产的地区性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或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生产管理局和农业委员会。共和国、边疆区及州的农业委员会由相应的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党委会及州党委会的第一书记领导。认为在中央建立全苏农业委员会是适宜的。

决议谴责了草田轮作制，说它"不适宜于社会主义农业"，必须代之以"较集约的农作制"。认为广泛推广种植玉米、甜菜、胡萝卜、豌豆、饲用豆类等高产中耕作物及豆科作物，"这可能根本改进土地利用状况"。强调在增产谷物方面要"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发展畜牧业方面，"应致力于增加饲料生产"。决议要求改进物质技术装备的供应和推广先进经验，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对农产品增长有"特别重要意义"。

3月24日 塔斯社报道：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组农业管理》的决议。决议说，将成立农业管理机构来从事计划工作，并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采购情况实行监督。决定在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成立领导农业生产的区域性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

3月26—31日 作曲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赫连尼科夫在会上作报告，说作曲家的"神圣义务是歌颂苏共新纲领中阐明的伟大思想"。报告说，作曲家"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反映现代苏联人的内心状态、精神世界和他们的英雄气魄"。说现代苏联音乐的特点之一是"各民族的音乐文化接近过程不断加强"。赫连尼科夫在报

告中还“对一切人道主义艺术家的活动表示尊敬和信任”。

3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五期刊登署名波文的一篇文章:《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向全民国家过渡》。文章说,苏维埃国家在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三十年代中期之前),具有鲜明的并为法律所确认的阶级性质,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苏维埃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三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逐渐改变其性质:它越来越从阶级的国家变成全民的国家。个人迷信延缓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的过程。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过程,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向国家的完全消亡又跨出了一步。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停止,发生了以往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局面:国家终于不再成为阶级的统治工具。

4 月

4月5日 塔斯社报道,莫斯科作协理事会举行会议,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沙特罗夫等当选为理事。

4月5日 《真理报》刊登布尔拉茨基的一篇文章:《苏维埃全民国家》。文章认为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不正确地贬低了”列宁的国家学说。

文章说,“现在还有人大肆赞扬斯大林的错误观点,并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全民国家的思想抱怀疑态度。这些人硬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但社会内

部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对社会关系作一次革命性的破坏。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仍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自己敌人的斗争工具而保存下来”。

文章说，工人阶级仍保持其领导作用，“但工人阶级不论在选举方面，还是在国家权力和管理机关中，都不享有任何优先权”。“社会主义民主对整个社会，对所有人都一样，而不论其社会成分如何”。说“全民国家是全民的权力机关。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并且是国家一切事务的主宰者”。

4月18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提高农艺师、畜牧师和其他农业专家在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中的作用》的决议。决议说，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农艺师应该对组织生产及其最后成果负责。农艺师和畜牧师对生产问题的指示，象工厂里工程师的指示一样，同样必须执行。

4月18日 《红星报》刊登历史学副博士达尼列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说斯大林在党的八大以前就在某些军事政策问题上，特别是在利用旧军事专家的经验问题上表现“动摇”。说“军事反对派”在八大发言反对中央的路线。伏罗希洛夫也包括在反对派中。列宁曾批评伏罗希洛夫“庇护游击作风”。

4月20日 赫鲁晓夫在同美国《展望》杂志发行人考尔斯的谈话中说：“在没有建立富裕的条件前，让集体农民保留辅助的园地吧。这些园地不违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而在某种时期是对从集体经营中得来的基本收入的补充”。

当考尔斯问到苏联是否打算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

地时，赫鲁晓夫说："不，我们不打算这样做。主要的不在这里，尽管我认为，这些宅旁园地的主人将来会亲自取消这些园地。但是这要等公有经济发展到能充分满足集体农民需要时才会产生。那时，他们对自己的小块的宅旁园地不感兴趣了。我们严惩那些热衷于取消宅旁园地的人"。

4月25日 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关于制定新宪法的报告，他说，从通过现行的宪法时起所发生的变化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在苏联发展的新阶段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无产阶级民主变成了全民的民主。新的宪法应该是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正在建设的共产主义的宪法。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各国人民的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这些对所有人民说来是神圣的原则，应该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宪法的基础。

4月26日 塔斯社评论员阿尔捷莫夫就制定新宪法发表评论，说向共产主义过渡意味着全面发展个性自由，意味着国家职权的逐步消亡，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公民的自治组织来执行。新宪法"应该为过渡到社会的共产主义自治而准备条件，这种共产主义自治将代替现在的国家"。

4月2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选举基里连科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全会鉴于斯皮里多诺夫已被任命为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4月28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设立"海军元帅"的军衔，它相当于一般军队中陆军大将和兵种元帅的军

衔。法令说，设立这个军衔是为了使海军中有完全相当于陆军的军衔。

4月29日 《真理报》公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一批人员以元帅军衔的法令，全文如下：

特授予：尼·克雷洛夫大将以苏联元帅军衔，帕·罗特米斯特罗夫坦克兵元帅以坦克兵主帅军衔，谢·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以海军元帅军衔，菲·阿加利佐夫空军上将以空军元帅军衔，康·卡扎科夫炮兵上将以炮兵元帅军衔，帕·波卢鲍雅罗夫坦克兵上将以坦克兵元帅军衔。

4月29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根据苏共中央3月全会决议成立了农业委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伊格纳托夫被任命为农业委员会主席。

4月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二期刊登波斯别洛夫的一篇文章：《就苏共二十二大决议论党史科学研究的任务》，说"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长期统治给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党史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说斯大林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上"发生过动摇"，在军事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上也"犯了不少错误"。

4月 《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第四期发表题为《彻底清除苏维埃法学中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的社论，全面攻击斯大林和维辛斯基及其法学理论。说斯大林"企图勾销列宁在创造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方面的作用，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所规定的任务是极其片面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社论说，维辛斯基全部理论的"基本缺陷是不正确地歪曲

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他的全部主张都贯串着镇压、强制、暴力和加强迫害这样一条线”。

社论攻击维辛斯基的一些具体的法学观点，说他在给法下定义时把重点放在国家的强制力量和暴力上。说维辛斯基“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过去多年的孟什维克历史经常对他发生影响”。

5—6月

5月11日 《红星报》刊登谢杰利尼科夫上校的一篇文章，提出苏联军事学说的三个论点是：（一）如果帝国主义者得以发动世界战争，这一战争必不可免地将具有火箭核战争的性质。（二）使用威力无限的核武器并用火箭把它送往任何目标，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在任何距离的广大领土上取得决定性的军事结果。（三）火箭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减低其他种类武器的意义。只有依靠所有武装部队和各兵种配合得很好的共同而果断的行动，才有可能取得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最终的决定性胜利。

5月18日 《消息报》就1937年被捕判刑、1959年恢复名誉的叶努基泽诞生八十五周年发表纪念文章，说他是在斯大林个人迷信下首批牺牲者之一（按：叶努基泽曾任全俄党中央执委会书记和主席团委员，1922年12月担任苏共中央执委会书记和主席团委员。在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5月19日 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共产党人》杂

志第五期发表一篇文章，说在未来的战争中具有极重要意义的是开始阶段，因为这一阶段不但能对战役的进程，而且能对其最终结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时，苏联军事学说还认为，不论火箭核武器的作用有多大，决不意味着武装斗争的其他手段和保存大量的军队就不再是必要的了。

5 月 24 日，马利诺夫斯基又在《红星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新式武器的出现，总能给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崇拜者，他们把新式武器看作是某种绝对的东西，并且把人放在第二位。火箭核武器的出现，自然会引起对它的崇拜，引起夸大技术的一面和削弱对人的注意。这样片面地发展军事事业，包含着严重的危险。

5 月 21 日　部长会议任命叶皮谢夫大将为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

5 月 27 日　总检察长鲁金科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检察监督的权力虽然在宪法上有所规定，然而这些权力被削弱了。对国家保安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侦讯工作的监督实际上已被取消。文章说，1953 年苏共中央 7 月全会揭露贝利亚及其集团罪恶的敌对活动的决议，对巩固法制有重大意义。

6 月 1 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表告人民书，说“党和政府认为有必要直言不讳地说明在供应城市居民肉食品方面所产生的各种困难”。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决定把牛、猪、绵羊、山羊和家禽的肉类采购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三十五，决定把肉类和肉产品的零售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三十，动物油的零售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五。

6月1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规定把应征入伍的年龄从十八岁降到十七岁。

6月18日 《党的生活》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一篇题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和兄弟关系》的文章，强调各民族的“接近和达到完全一致”，说“应当用不调和的精神根除民族主义残余的表现”。文章批评阿拉木图一所高等学校有人提出吸收别的共和国干部参加工作会损害哈萨克民族利益的问题。说有人认为只有本民族代表才能担负领导职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6月19日 合众国际社报道，一位退休的苏联官员伊凡·马钦被开除出共产党，罪名是告发了一些无辜的人，这些人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被枪杀。伊凡·马钦是前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劳动力使用委员会的主席。

6月22日和24日 《真理报》连续发表编辑部长文：《关于即将出版的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文章说，多卷本党史应以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以及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的报告中提出的原理和结论为基础，应当贯串苏共纲领的精神。文章还说，鉴于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许多党史书籍，特别是以个人迷信观点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了许多极重要的历史事实，必须完全克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任何影响。

6月27日 赫鲁晓夫在俄罗斯联邦中部地区农业生产管理局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什么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首先，这是在最现代化基础上改造农业，保证工业和农业高度的劳动生产率，改造生活和文化，不断地关怀整个社会

和每个劳动者物质福利的提高。共产主义使一个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得到满足。如果有足够的肉、牛奶、黄油和其他物品，对于政治上道德上的满足来说就更好了。”

6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刊登科兹洛夫的一篇文章：《苏联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文章说，苏共的成分反映了它的人民性。在1961年入党的人当中，工农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三。在被接收入党的人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工程师、农学家、教师、医生和其他专家。党员中专家的人数已超过了三百万人。

6月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二期刊登军事科学副博士塔蒙诺夫的一篇文章：《论苏军的性质和使命》。文章主要谈两个问题：(一)关于苏军“全民性质”的发展。(二)关于现阶段苏军的性质和使命。

文章认为，苏军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军初期。“红军的产生和任务，与其说决定于内部条件，不如说决定于外部条件”。红军“是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使命不是多数对少数实行阶级压迫”。

第二阶段是全民军队阶段。到1936年，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取得胜利，剥削阶级已被消灭，“苏联已经没有互相仇视的对抗阶级”，“镇压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任务已告完成，军队的职能已经全部彻底地转为对外”。这时苏联实行了普遍兵役制，红军的“性质和使命”便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红军按其成分来说，成了全民的、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的军队”。

第三阶段是真正的全民军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国内也发生了变化，

“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时期”。随着“国家转变为全民国家”，“苏军的性质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谈到现阶段苏军的性质时，文章说，斯大林提出的红军三大特点的论断“需要严加订正”，尤其是“红军是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是把工人和农民从地主和资本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的论点，已经过时”。“在现代条件下，苏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老定义已经过时”，苏军已经成了“真正的全民军队”。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和全民国家的军队，并没有原则区别”。文章说，目前苏军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苏军是“已经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的军队”，它不是“为了准备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的军队；第二，苏军装备了各种现代武器，“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自由和独立的决定性力量”；第三，苏军是“真正的全民军队，它的成员来自苏联社会各阶层”。文章说，“苏联陆海军由全体人民的代表组成；对于原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已经废除了一切服兵役的限制。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适用于全体苏联公民”。

谈到苏军的使命时，文章说，现阶段苏军的“基本使命是，保证苏联的安全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和平条件”，防止爆发使“大批生命财产惨遭浩劫”的战争，“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等。

7　月

7月7日　《消息报》报道，乌克兰利沃夫国民经济委员

会已决定在该经济区成立五十五个联合公司。

7月18日 塔斯社报道，迪姆希茨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

7月25日 俄罗斯联邦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通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修改和补充〈苏俄刑法典〉》的法律。这一法律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1年2月—1962年4月所颁布的一系列刑事法令修订了《苏俄刑法典》。

经过修改和补充以后的《苏俄刑法典》，在总则方面，主要的变化有四点：(一)扩大了适用死刑的范围。(二)扩大了特别危险的累犯的范围。(三)增加了关于严重犯罪的概念。(四)扩大了不适用于假释和将未执行完的部分刑罚易科较轻刑罚的范围。在分则方面，主要的变化有两点：(一)加重了对十一种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二)加重了对许多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扩大了适用死刑的范围。按照1960年12月通过的《苏俄刑法典》第二十三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背叛祖国罪、武装破坏罪、武装伙匪罪、具有本法典第一〇二、第二四〇条(三)加重情节的故意杀人罪，以及在战时或战斗状态中由苏联法律专门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的罪行”。经修改补充后，规定死刑可适用于“苏联关于国事罪的刑事责任这项法律中所规定的国事罪，苏联刑法和本法典规定故意杀人罪责任的条文中所指明的加重情节的故意杀人罪，而在苏联法律有专门规定的个别情况下，也适用于其他特别严重的罪行”。这样的规定，显然比过去扩大了适用死刑的范围。

扩大了特别危险的累犯的范围。《苏俄刑法典》第二十四条的附则，规定有三类人可以依法院判决认为是特别危险的累犯。经修改补充后，在第一类中增加了以行销为目的而伪造货币和有价证券或行销伪造的货币和有价证券罪、破坏金融业务规则罪、盗窃巨额的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罪、贿赂罪、侵害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的生命罪；在第二、第三类中，增加了以销售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财物为常业或销售明知是犯罪所得的巨额财物罪；另外还增加了第四类，即"在剥夺自由的场所服刑的人，不论其以前实施的罪行构成如何，又故意犯罪者"。

增加了关于严重犯罪的概念。修改补充后规定，特别危险的国事罪、武装伙匪罪、破坏劳改机关工作罪等二十九种犯罪行为是严重犯罪。

扩大了不适用于假释和将未执行完的部分刑罚易科较轻刑罚的范围。原刑法规定只有对于特别危险的累犯，才不得适用于假释和将未执行完的部分刑罚易科较轻刑罚。经修改补充后，除了仍以特别危险的累犯作为第一类外，还增加了两类人，即：把那些被剥夺自由而获假释或未执行完的部分刑罚已易科较轻刑罚、但在服刑期未满时又重新蓄意犯罪而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作为第二类；把因犯有特别危险的国事罪第十一种行为而被判刑的人作为第三类。

加重了对十一种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这十一条犯罪行为是：破坏劳改机关工作，对国事罪不检举，隐匿国事罪犯，盗窃巨额的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犯罪性的玩忽使用或保管农业机械，谎报和歪曲完成计划的表报，为贿赂牵线，抗拒民警

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侵害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的生命，侮辱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预备兵逃避应征入伍和军人登记。在这十一种犯罪行为中，“为贿赂牵线”过去附在《苏俄刑法典》第一七四条“行贿”内，现在则分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一条。

加重了对许多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其中主要有以下十种：伪造或使用伪造的货币和有价证券，破坏金融业务规则，盗窃小量的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强奸，非法制造、销售、收藏酒精饮料，受贿，行贿，隐匿犯罪，取得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财物，制造或贩卖麻醉物或其他烈性物品和毒品。

7月25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修改《苏俄刑法典》的法律中，对抗拒、侵害、侮辱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的人，又增加了下述新的条文：

“第一九一条(一)抗拒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

在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执行所担负的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时，对他们实行抗拒者，处以一年以下剥夺自由，或一年以下劳役改造，或一百卢布以下罚金。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时，使用暴力或者以使用暴力相威胁者，以及使用暴力或者以使用暴力相威胁强迫这些人员实行显然非法的行为者，处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剥夺自由”。

“第一九一条 (二) 侵害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的生命——

由于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务活动或社会活动而侵害他们的生命者，处以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剥夺自由，并科以两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流放或不流放；具有加

重情节的，处以死刑”。

“第一九二条(一)侮辱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

由于民警人员或人民纠察队员执行所担负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而对他们实行侮辱者，处以六个月以下剥夺自由，或一年以下劳役改造，或一百卢布以下罚金”。

7月 《经济问题》杂志第七期刊登温什尔的一篇文章：《副业是农产品生产的补充源泉》，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所有制的或大或小的发展，都是从全民所有制的发展，从国民财富的增长派生出来的数值”。“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人所有制同公有经济是不矛盾的”。

8—9月

8月1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公布《关于个人和合作社建造住宅》的决议。决议规定，在今后几年内，在城市和城市类型的村镇中，从个人建造单幢住宅逐渐过渡到吸收居民投资合作建造设备齐全的多套住宅。建议建设银行向住宅建筑合作社提供占造价百分之六十以下的住宅建筑贷款。

8月7日 《消息报》报道，图拉州和坦波夫州的各所中学试行选举校长的制度。报道说，广泛采用这种制度有可能把“有才能的、最可敬的人”提拔到学校领导岗位上来。

8月9日 法新社据《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关于律师业的规定，以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和恢复辩护权利。

8月15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纪念前联共(布)

中央监委主席鲁朱塔克，为他恢复名誉。文章说，“在1938年个人迷信时期，扬·鲁朱塔克成了无理迫害的牺牲品”。文章还说鲁朱塔克“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毫不动摇地贯彻了党的路线”。

8月17日 塔斯社报道，空军参谋长勃拉伊科说，苏联军事学否定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取得战争的胜利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某一种类的武装部队或某一兵种”。勃拉伊科说，“一切种类的武装部队——陆军、防空部队、空军、海军在现代战争中都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8月19日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据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第八期的一篇文章报道说，苏联提出了进行农村民防训练的号召，号召中说，要训练更多的反原子战、化学战和细菌战防御方面的教练和专家，在农村设立民防训练中心并加以装备；要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和电影广泛传播原子防御知识。

8月26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继乌克兰首先成立联合公司之后，俄罗斯联邦伊尔库茨克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成立了一个由三家制鞋工厂联合而成的“安加拉”公司。

9月6日 坦克兵中将康斯坦丁诺夫对塔斯社评论员宣布，苏联已拥有不怕原子辐射的坦克。说在火箭核战争的条件下，坦克部队的作用比在过去的战争中为大。

9月7日 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法律下令，凡服满法律所规定的现役期的士兵、水兵、中士、军士都从陆海军、边防军和治安部队中退伍为预备役。同时号召1943年出生的公民服现役。

9月8日 坦克兵主帅罗特米斯特罗夫在《消息报》发表

一篇文章，说苏联的军事学说认为，“装甲兵种在同其他兵种配合作战以实施决定性进攻行动时，是最重要的机动和攻击手段”。“坦克部队的作用更加提高了”。“它是陆军的主要打击力量，能够在火箭核战争中在战场上积极行动”。

9月9日 《真理报》刊登利别尔曼的一篇文章：《计划、利润、奖金》，内容摘要如下：

苏共纲领提出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应当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使得企业迫切关心接受最高的计划任务，采用新技术和改进产品质量。总之，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

我们认为，只要把按品种的产量计划和交货期限计划下达到企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注意供货单位和使用单位之间的直接联系。

其他各项指标只应当下达到国民经济委员会，不需要把它们摊派给各个企业。

企业应当根据所接到的产量和品种的任务自己编制充分完整的计划，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目、工资、产品成本、积累、投资和新技术等各个方面。

现在企业的初步计划一般都大大低于它们的实际可能性，那么怎么可以委托企业来编制计划呢？

只要企业不仅在执行计划而且在编制计划时也在最大程度上从精神和物质方面关心充分发挥潜力，是可以这样做的。为此应该按每个生产部门制订并核准供长期使用的计划赢利定额。

具体建议：

(一)规定在产量和品种计划经过协调和批准后，企业的

计划全部由企业自行编制。

（二）为了保证国家的公正和企业对最大的生产效果的关心，根据赢利率（利润与生产基金之比）规定各种物质奖励的统一基金。

（三）为各个部门以及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大致相同的各类企业统一批准随赢利率而变化的奖金比率表，作为长期使用的定额。

（四）加强和改进集中的计划工作，办法是把应当遵守的任务（控制数字）只下达到国民经济委员会（苏维埃执委会和主管部门）。取消国民经济委员会按照"已达到的水平"在各企业间摊派任务的做法。责成国民经济委员会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来检查、评价和改进各企业自行制定的计划，但不得改变作为企业奖励基础的赢利比率表。

（五）制定从企业利润提取的统一奖励基金的使用方法，同时考虑扩大企业在把奖励基金用于集体奖励和个人奖励方面的权限。

（六）规定灵活制订新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便使企业生产出更有效的，既对生产单位也对使用单位，即对整个国民经济都能够提供赢利的产品。

9月12日 档案总局局长别洛夫在《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为前红军骑兵督察布鲁西洛夫将军恢复名誉，说他是一位杰出的俄罗斯战略家。说从1948年底以后根本不再提他的名字，是因为"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散布了对布鲁西洛夫的谎言和诽谤"。说布鲁西洛夫所写的《我的回忆》手稿中的反苏性质是他死后别人给加上去的。

9月14日　《文学与生活报》刊登《萨根的春天》作者古里亚的一篇文章：《我们是人道主义者》。文章说，在1937年，发生过粗暴地破坏列宁民族政策的行为，那是斯大林和对他个人迷信的过错。

文章引用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拔出剑来，对准自己的阶级、自己的党”。“斯大林应该对此负责，即使在死后，要是我们不把所有这一切都说出来，那我们就不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这就是确定文学作品的永垂不朽的价值的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任何文学都不存在”。

9月15日　塔斯社报道，列宁格勒经济区成立专业生产联合公司，每一个生产联合公司由同一专业的企业组成。在动力机械制造、机床制造、电气仪器制造和其他部门的联合公司中将包括大企业、设计局和工艺局。基地企业是每个联合公司的主体企业，这个主体企业的厂长就是联合公司的总经理。

9月17日　塔斯社报道，立陶宛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第一批（五个）生产联合公司，这些联合公司是属于轻工业、木器和面包烤制专业的。

9月20日　《真理报》继续刊登利别尔曼的文章。文章认为，利用利润来作为衡量生产的经济效率的总的（尽管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可以取得成效。说利润应当成为衡量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最主要的是不要自上而下地在计划中规定利润率。企业在合同、订货和利润奖额的基础上可以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计划。

9月21日　塔斯社报道，苏联将成立“特许权经售”联合

公司，承办向国外出售苏联发明的专利权和利用苏联发明的特许权事宜。

9月24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说由于目前正在采取进一步提高工农业、大大增加消费品生产、广泛建造住宅的重要措施，需要增加预算拨款，还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加强，必须加强国防，决定延期取消职员的工资税，工资税的税率也暂时延期降低。

9月27日 勃列日涅夫在访问南斯拉夫时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党公开而大胆地揭露和批判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事，对于顺利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有重大意义。消除个人迷信和克服其有害后果为大大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政治和劳动积极性，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创造力和使其更快地向共产主义前进，开辟了广阔天地。"

9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四期发表题为《科学世界观的形成》的编辑部文章。文章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完全和最终的胜利，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发展和巩固了，社会对抗永远消失了，人民在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形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对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统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客观上使得社会利益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这就把人们团结和联合起来，为所有的人都形成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创造了社会的、经济的前提"。

10 月

10月11日　《经济报》第三十八期报道，莫斯科市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成立两个制鞋联合公司，预定在最近还要组织十多个纺织、缝纫、食品、仪器制造和化妆品联合公司。生产日用品的公司有自己的商店。联合公司由总经理领导，他兼任这个联合公司的主体企业的厂长，此外还可以成立由总经理、分厂厂长、公司各主要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理事会。

10月15—16日　在《经济报》编辑部举行的讨论会上，利别尔曼发言说，“我的建议中，利润并不是评价企业的‘模子’，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赢利定额，以便让企业自己努力去提高利润”。

10月21日　《真理报》就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的出版载文说，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当时列宁签订和约的方针，斯大林也采取了错误的、实际上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冒险主义方针联成一气的立场。

10月21日　《真理报》发表反动诗人叶夫图申科的反动诗《斯大林的继承者》。诗中说，“只要斯大林的继承者还留在地球上，我就觉得斯大林仍在陵墓中兴风作浪”。

10月23日　《红星报》刊登尼基京上校的一篇文章：《在伟大的冲击面前》，内容摘要如下：

在个人迷信时期我们的历史著作里，准备伟大十月革命的主导作用被毫无理由地归功于斯大林，说他在发展马克思

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特别是在制订武装起义的策略方面有“特殊”功绩。

当然，在准备十月革命时期，斯大林对党是有功绩的。但是在保卫列宁主义立场方面，他在许多情况下是动摇不定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不服从中央决议，而且走上了骇人听闻的叛变。

历史的真理要求谈谈斯大林对投降者采取的调和主义立场。在《真理报》编辑部其他成员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独断独行地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信。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列宁要求把这两个工贼开除出党的信时，斯大林提议在党中央全会前不解决这个问题，而当大多数中央委员反对这个建议时，斯大林立即示威性地声明要退出《真理报》编辑部。

10月27日 《文学报》报道，最近苏联各界人士举行集会，“隆重纪念”“在个人迷信时期牺牲的苏联作家谢·米·特列季亚科夫诞生七十周年”。

10月27日 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中说：“我国人民、我国政府和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我本人所关心的只是我国的发展和在经济竞赛，在发展文化、艺术，在提高人民福利等方面，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占有应有的地位”。

10月28日 《消息报》刊登一篇书评，吹捧邦达列夫的新小说《寂静》，说此书“出色之处”在于“坚决回击了一切为斯大林个人迷信辩解的企图”。

10月 《计划经济》杂志第十期报道，国家计委国民经济计划局召开会议讨论利别尔曼建议，提出在不同工业部门的

一些企业中试验利别尔曼建议。

10月 《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第十期刊登布尔拉茨基的一篇文章，认为苏共纲领中所提出的全民国家理论，从专门名词来说，是"来自列宁"。布尔拉茨基摘引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一句话："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布尔拉茨基写道，"全民国家的内在思想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社会内部没有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国家"。

布尔拉茨基还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定义已经不适用，并提出了新的定义。他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经下定义说，国家是最强大的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工具，这个阶级借助于政权而成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强制的机关(机器)。这一定义已经不适用于说明现代的苏维埃国家了"。他提出三个定义，第一个是全民国家的定义："全民国家是全民的政权机关，社会借助这个机关而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及对经济和社会过程的领导，维护公民的自由和社会主义平等以及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保障国防和维持与其他国家的交往"。第二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义："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的政权，其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政权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上同时也是对剥削阶级实行统治（专政）的工具"。第三个是一般的国家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同占有一定地域的居民不直接相符合的公共权力，它是经济上最有力的阶级的统治和管理的工具(在存在对抗性阶级的社会里)或者是全社会的对社会事务进行领导的工具（在阶级对抗已消灭

的社会里)”。

11 月

11月2日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六期刊登伊利切夫的一篇长文，谈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重申在整个思想战线上不是防御而是进攻，并声称要彻底铲除个人迷信后果，使党的创造精神占统治地位。

文章说，要使社会科学摆脱斯大林的公式和概念，经济学家不重视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的理论脱离实践的观点起了作用，使理论“迁就”了实践中存在的缺点，并为它辩解。说历史学方面“吹捧斯大林而离开历史真实的情况还很多，首先是缩小历史课题，提到首位的总是那些有斯大林参与的事件，把列宁的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变成了斯大林的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说斯大林“犯了许多理论错误和政治错误”，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混乱的。要求根本改组语言学方面的整个科学工作。

文章还谈到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任务。

11月9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扎夏季科本人的请求，鉴于他的健康情况，免去他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科学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两项职务由洛马科接任。

11月16日 《真理报》报道，利沃夫、拉脱维亚、伊尔库茨克、土库曼、列宁格勒等经济区，以及莫斯科、亚美尼亚、哈萨克等地方都成立了联合公司。

11月17日 波戈金写的以“个人迷信年代中受害者的命运”为题材的话剧《黑鸟》在莫斯科首次上演。塔斯社吹捧这出话剧“很受莫斯科人的欢迎”。

11月17日 《红星报》刊登崔可夫元帅的答读者问，攻击斯大林，说他抛弃党领导红军的根本原则。说斯大林对列宁粗暴无礼，自以为是，无视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把列宁关于党领导红军的根本原则丢到一边。说这种情况直到苏共二十大才停止。

11月19—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发展经济和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问题。赫鲁晓夫在会上作报告。

报告认为，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说从组织上改组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必要性已经成熟。认为党兼管工农业给挑选干部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提出必须把生产原则作为自上而下地建立党的机关的基础，以便保证党对工业、建筑业和农业更具体的领导。报告主张取消现有区党委，建立农业管理局党委和工业生产党委，主张在州和边疆区分设领导工业和农业的党委，苏维埃及其执委会也分成两套。说共和国党中央主席团下设立两个局分管工农业，强调这两个局有广泛的自治，主席团不要干涉和监督。报告还提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内设立领导工业生产的苏共中央局和领导农业生产的苏共中央局。

报告还谈到了国民经济部门的干部配备问题、经济管理方法问题、向资本家学习问题、科研设计统一领导问题、成立生产联合公司问题、把利润作为企业活动效果的经济指标等问题。此外，报告还主张把制定和实现计划的责任完全交给

共和国，说国家计委只从事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工作，而国家经委管年度计划。提出建立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其任务是检查党和政府指示的实际执行情况。

报告还提出了“解决经济生活真正国际化的任务”问题，说“社会主义各国的民族经济愈来愈密切地接近，是它们的生产力国际化的进步过程”。提出“应当着手建立一个包括经互会成员国代表在内的统一计划机构”。

全会通过了《关于苏联经济的发展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决议。决议认为，必须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上而下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在现有的边疆区、州的范围内一般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一个党组织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为工业生产和建筑业服务的学校和科学研究所、设计机构和其他机关；另一个党组织包括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试验站、农业学校和科学研究所、农业原料加工企业、采购机构和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机关和组织。

在边疆区、州党组织中相应地设立：领导工业生产的边疆区、州党委会；领导农业生产的边疆区、州党委会。

决议认为，在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中央成立中央委员会工业生产领导局和农业生产领导局是适宜的。

全会选举：叶弗列莫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工业和建筑业局主席鲁达柯夫为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农业局主席波利雅科夫为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党组织党务问题委员会主席季托夫为苏共中央书记。任命：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为苏共中央化学和轻工业局主席，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为苏共中央思想

工作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书记谢列平为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

11月23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谢列平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波利扬斯基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列谢奇科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建委主席。

11月24日 塔斯社在报道中大肆渲染反动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反斯大林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激起读者"浓烈兴趣"的情况，说这本小说在描写斯大林"个人迷信横行为害"方面有"完满的艺术性和感染力"。次日，《红星报》又吹捧这本小说有权同苏联最卓越的文学作品并列。

11月27日 《莫斯科文学》报道，莫斯科作家协会把雅科夫·叶弗里莫维奇·埃尔斯贝格开除出作协。这个决定是在俄罗斯联邦作协支持下作出的。法新社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埃尔斯贝格在个人迷信时期"把几名有才能的作家"送进了监狱，其中有些人永远没有回来。开除埃尔斯贝格的理由是"他曾自愿充当了反对他的同僚的挑拨者和告密者"。

11月27日 法新社报道，苏联第一次发行纪念被斯大林镇压的人的邮票，这个人是1929—1938年统率远东红军的勃柳赫尔将军（按：即加伦将军)。邮电部发言人对法新社记者说，正在研究一个计划，再发行一种纪念在1938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杀害的图哈切夫斯基将军的邮票。

11月29日 塔斯社报道，苏联首次发表了一批"在个人迷信年代写成的所谓反抗无理迫害的诗"。诗的作者包括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吉洪诺夫、爱伦堡等二百人。

11月29日 《文学报》刊登苏尔科夫的一篇文章，说科热夫尼科夫新写的反斯大林小说《飞逝的日子》是对那些年代里把"每个人压在地上"的"沉重的地心吸力"的直接而公开的进攻。说"一本小说如果没有感觉到二十大后国家所走过的路程，没有说明结束个人迷信后人民肩上卸去了什么重负，就是没有理解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主要和重要的东西"。

11月29日 阿列申写的表现"为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而进行的斗争"的话剧《病房》在莫斯科首次上演。

11月 《经济报》第四十六期报道，国家计委通过决议，建议在乌克兰各部门的企业里试验利别尔曼建议。

12 月

12月4日 描写一名哈萨克妇女同"斯大林的继承者"作斗争的一出新剧《萨乌列》在莫斯科上演。《农村生活报》说这出反斯大林的新剧"对哈萨克和中亚其他共和国有巨大意义"。

12月5日 《真理报》刊登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贺词。贺词中说，"苏共中央11月全会通过的按生产原则建立党领导机关的新结构，能够使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生产问题上。我们党实行改组是为了保证对国民经济所有部门进行具体的领导"。"全会决定建立统一的党和国家的监督。这种监督应该保证系统地检查对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加强国家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协助党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11月全会的决议，是我

们的列宁主义党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时期的条件下，建立一套完整而和谐的经济管理制度的路线的合乎逻辑的继续”。

勃列日涅夫还说，“当我们在谈论克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时，我们指的不单是消除和纠正对革命法制的破坏，而且要在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恢复列宁主义原则，克服思想上的停滞和保守，要完善国家和党的领导形式”。

12月5日 美术家约甘松在《文学报》发表一篇文章，说美术家的任务在于“选择现实的要求，创造那样的作品，使作品十分明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说“规定美术家什么可以画和什么不可以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说“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应该进行到底，不要把新的枷锁套在美术家身上：宣布某一种传统是革新的，而另一种是保守的”。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可称为“我们的社会道德逐步完善的时期，这是艺术发展最肥沃的土壤”。

12月8日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主编科苏利尼科夫在《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说1962年第二版《苏联共产党历史》根据二十二大的决议和材料以及档案文件更加全面展开了对个人迷信的批评。说这本书以实际可靠的材料说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到第十七次党代会时已逐渐形成，而在基洛夫受害后显现了“特别丑恶的形式”。

12月17日 苏共领导人会见文艺工作者，12月26日又召开了苏共中央意识形态会议。伊利切夫在上述会见和会议上都发表了长篇讲话，反对文艺中的形式主义、抽象主义等流派。

在12月17日的会见中，伊利切夫强调“不能容许有任何

脱离我国文学艺术主要发展路线的现象”，批评“有些同志不正确地理解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性质，有时候忘掉了我们的思想立场的不调和性和不妥协性”。说“艺术家的良好愿望也完全有可能使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为敌对力量的利益服务”。他表示党“在文艺中过去和将来始终捍卫党性”，“党执行着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苏联社会的民主的方针”，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高标准，它的核心是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管这种真实多么严酷”。

在12月26日的讲话中，伊利切夫强调“文艺在我们国家发展，不能没有舵，没有帆”，说“党过去和将来始终为生活的真实而奋斗，反对艺术创作中的异己思想”。还说“为最人道、最正义的社会——共产主义——在人世间胜利而满腔热情地战斗，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学艺术的主要使命”，“党主张勇敢的、英勇的、真实的艺术”。他说，“苏联的文学艺术还必须把我国过去向着共产主义所走的、而且继续在稳步走着的、困难然而是唯一正确的列宁的道路反映出来”，“我们的人民需要的是真实的、具有崇高的公民激情的艺术作品”，在这里，伊利切夫举了《一个人的遭遇》为例子。接着，伊利切夫又以《山外青山天外天》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例，说“我们党历来支持真实的、具有最尖锐的批判倾向的作品，只要这些作品站在自觉的立场，贯串着我们社会的理想”。在谈到民族文化时，他对“民族的孤立和限制的倾向依旧存在”表示“遗憾”。说“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特殊化和因循守旧，反对民族主义的残余和偏见，不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如何”。最后他说，“党在艺术领域里过去执行了、今后仍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这样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反对动摇和脱离文艺发展的主要路线(按：即二十二大制定的文艺路线)，为文学艺术的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性，为文学艺术同人民的生活和同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不可分的密切联系而斗争”。

12月18日 莫斯科举行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交响乐演奏会。合众国际社说，这首交响乐“用音乐对苏联的反犹活动作了诗意的打击”。交响乐是根据叶夫图申科所写的五首诗作成的，其中一首叫《巴比雅尔》(按：又译《娘子谷》，是乌克兰首府基辅郊外的一个峡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估计有九千六百名犹太人在那里被纳粹杀死)，这首诗中有两句针对反犹活动的诗文说：“我和犹太人一样憎恨他们，这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苏联人”。

叶夫图申科和肖斯塔科维奇都出席了这次演奏会。

12月18日 《农村生活报》刊登曾于1937年被捕的集体农庄主席丘赫诺的一篇文章。文章恶毒攻击斯大林在农业领导中的“强迫命令的做法”。说斯大林“对人民的意见置若罔闻，冷酷无情，惧怕同人们的联系”。说斯大林晚年“不相信集体农庄制的力量，对集体农庄的不正确领导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12月19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1904年的党员弗季耶娃谈列宁的作风的一篇文章，说斯大林曾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一起反对列宁关于实行对外贸易专营的主张。

12月19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伊瓦舒金在《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说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矛头是向外的，是指向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说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国

家安全机关实际上脱离了党，被斯大林置于他个人控制之下。

12月20日 莫斯科就肃反委员会成立四十五周年举行集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在会上作报告大反斯大林，说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严重地反映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中。说党对这个机关的监督逐渐被斯大林的个人监督代替了，以致这个机关的活动中产生专横和非法行为。报告说，从肃反机关中已清除了破坏法制的人，从党、政、团积极分子中选拔出了新干部来加强这个机关。

12月23日 塔斯社报道，前东战场司令加米涅夫等人写的《国内战争回忆录》已经出版。说这本文集“忠于历史真实”。说过去“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虚荣心，历史事件曾被歪曲”，而回忆录“有助于纠正这些错误”。

12月30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纪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四十周年。

他在文章中说，由于个人迷信的影响，长期来，大大夸大了斯大林在阐述党的民族政策上的作用。把组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要功绩说成是他个人的。

1962年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其所著的《新俄国》一书中说，“十月革命前夕，东正教教会拥有四万六千个教区，自称有教徒近一亿人，到1943年，教区减少了十分之九（教徒数无统计）。但到1962年初，教徒人数又恢复到五千万人左右，约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教堂和教区有二万之多，还有大约三千个非正式的教区。各教会中发展得最快的是浸礼会，现在已经有教徒约六十万人”。

1963年

这一年，是苏修叛徒集团竭力加强法西斯专政的一年。3月，赫鲁晓夫举行了同文艺界人士的会见，6月，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前任务”，8月，召开了全苏“思想工作干部”会议，11月，又举行了意识形态委员会会议。通过这些会议，苏修大力加强思想控制。赫鲁晓夫等叫嚷要“清除”坚持“错误立场”的党员。4月间，苏修还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除检察院和国家保安机关进行侦查外，民警机关的侦查员也有权进行侦查，从而大大加强了法西斯特务活动。

由于随着反斯大林运动掀起的自由化妖风危及到苏修叛徒集团自身的统治，赫鲁晓夫等人又疾呼“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不能脱离苏修的“指导”，不能“反对党的政策”。

在经济方面，进一步在全国推行建立联合公司的试验，到9月已有联合公司一百五十多个。另外在经济界开始“关于社会主义企业法”的讨论，为制定“新经济体制”进行思想准备。农业方面出现了“困难局面”，不得不向国外购买粮食。

这一年是苏修叛徒集团大搞反华的一年；中苏原则争论进一步发展。6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7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苏修中央发表了反华《公开信》；9月，我《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开始发表对苏《公开信》的系统评论。此外，7月，苏美英三国签署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1 月

1月16日 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斯大林不仅是在我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上，而且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关系方面的民族问题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还说，“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我们过去和将来永远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积极捍卫者，只有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下，真正人民的文学和艺术才能成长和发展。我们将努力使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在人民中有良好的开端，帮助人民建设共产主义”。

1月21—24日 农业部全苏农业经济研究所、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全苏农业科学院农业生产经济和组织学部联合举行“农业生产的物质刺激问题学术会议”，讨论有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济核算、集体农庄庄员和领导干部的劳动报酬、集体农庄的收入分配等问题。

1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一期刊登恩·米罗诺夫的一篇文章：《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法制的迫切问题》。文章透露，苏共二十大后，“实施了根本改组国家保安机关、内务机关、检察院和法院机关的重要措施”。“在改善苏维埃立法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法院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的“干部成分有了极大的改善。目前，百分之八十五的检查和侦查工作人员具有高等法律教育程度，百分之八十四点六的检查和侦查工作人员是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约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审

判员是具有高等或不完全的高等法律教育程度和丰富的审判工作经验的人，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

1月 《哲学科学》杂志第一期刊登一篇文章：《论对立面统一的定义问题》。文章说：“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论述对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作用的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对立面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非对抗性对立面的统一的区别。如果对抗性统一的形式的更替意味着对立面愈来愈分离、两者联系的削弱、两者对抗性的加深，并以这个统一的分裂和崩溃而完成，那么，非对抗性统一的形式的更替则表现为对立面的接近、两者联系的巩固、两者差别的逐渐消失，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非对抗性对立面的共同性的比重逐渐增长。今天，在我国社会的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之间，共同性已经多于差别性，为各社会集团所固有的全民特征占居首位，这反映在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全民性上面。”文章还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非对抗性对立面的统一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问题在于，随着非对抗性对立面的统一的经常扩大和巩固，它对斗争的影响也无比地加强；这种影响在斗争过程中实现，它现在不仅决定斗争的表现特点，而且还把对立面的作用本身结合起来，给它们确定相同的方向”。

1月 《经济报》第一、三、五期报道，经济界开始“关于社会主义企业法”问题的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有：企业的定义、权限、义务和责任；企业的生产财务计划；企业的经济核算原则及其在法律上的肯定；企业管理体制，等等。讨论中有人主张扩大企业经理如下权限：（一）在计划方面，企业经理有权

批准企业季度和分月计划；国民经济委员会专业局批准的年度计划，只有经经理同意后，专业局才能改动。（二）供销方面，如受货单位不接受原来订货，销售机构应于两周内另找新主，超过两周，企业有权自由销售这些产品，自行决定停产或继续生产。企业在季度前三十天预告销售机构后，有权拒绝接受分配的物资。企业有多余物资可通知物资供销部门，供销部门在一个月内找不到新主，企业可自由出售给国营机构或合作社。（三）人事方面，除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外，经理有权自主地使用或解雇所有工作人员，这三种人由经理提名，上级任命。

2 月

2月8日 《消息报》刊登《共产党人》杂志总编辑斯捷潘诺夫的一篇文章，攻击斯大林"不正确地"对待农业，在领导农业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因而"严重地损害了工农联盟"。文章说，斯大林的实际活动和对农业的政策"常常脱离列宁的结论和指示"，他"不熟悉农村，也不懂农业，他把农民与其说看成劳动者，不如说看成小私有者，他执行了不正确的低价征购农产品的政策，过多的征税，不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挥创造主动精神。结果，农业处于荒芜状态，使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的威胁"。

《经济问题》杂志第二期载文说，"斯大林在推翻'新反对派'关于我国合作社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这一反列宁主义的论点时，却表现了不彻底性，而且实质上，是离开了列宁对合

作社性质的说明”。文章批评1960年出版的《列宁著作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一书从头到尾贯穿着斯大林的主张。

2月9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为了进一步顺利发展中亚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改进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决定在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共和国经济行政区基础上成立中亚经济区。为了领导工业，在中亚经济区内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

2月12日 《红星报》刊登一篇题为《全民国家的军队》的文章，说“在苏联社会里还有阶级，但这是特殊的阶级。在这些阶级之间没有对立和斗争。再说，现在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政治上没有差别，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独特的政治利益。由于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在我们各阶级之间还存在着经济上与文化上的本质差别。但是，无论如何也涉及不到政治领域，我们完全消除了政治上的差别，苏维埃国家的全体公民在法律上和实际上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因此，我们所有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是一个统一的力量，因而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全民的国家。”

2月16日 部长会议根据苏共中央1962年11月全会关于按照生产原则加强对经济的领导的决定，将全国经济行政区又加以调整，合并调整后共成立四十七个经济行政区，设立四十七个国民经济委员会。

2月22日 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就苏军建军四十五周年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攻击斯大林，说“我们在战争初期的失利，很大原因是由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困难条件。

在战前几年，根据他的指示，我国武装力量中担任领导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遭到大规模的和没有根据的迫害。由于斯大林的粗暴专横，好几千忠于党和人民的苏联指挥员牺牲了。斯大林在判断战争前夕的军事政治形势时犯了很大的错误，他认为希特勒德国不会进攻苏联，不会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在这个月里，马利诺夫斯基、叶廖缅科、比留佐夫等人还分别就斯大林格勒战役二十周年撰文攻击斯大林。

2月26日 《农村生活报》发起改革农场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的讨论，鼓吹建立三——五人的固定机械化小组，在小组内采用包工奖励或按产品计酬的工资制。

3 月

3月2日 《经济报》发表全苏国民经济委员会制订的企业总经济师（经济问题副厂长）示范条例。全条例共三章七条，其中规定了总经济师领导计划、定额、价格、劳动工资、技术、财务经济分析等工作。

3月7—8日 党政领导人同文艺界人士举行会见，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赫鲁晓夫说，近年来文艺界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个人迷信时期”，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出现了一些真实的、从党的立场上来阐明那些年代苏联真实情况的作品”，“党支持真正真实的艺术作品”；同时又说“那些年月并不象敌人所设想的那样是苏维埃社会发展中停滞的时期”，“那些极端片面地评价我国生活中的那一阶段、力图把一切事情都说成漆黑一团、用黑色颜料来描写的作家，是不正确

的"，"是抹黑家"。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在晚年成了多疑症和迫害狂的严重患者"，"曾蓄意消灭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创作知识分子"，"粗暴破坏党内生活准则、专横和滥用权力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同时又说，"对于斯大林对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党也予以应有评价。我们现在仍认为，斯大林是忠于共产主义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殡葬斯大林的时候，许多人，其中包括我，都眼里含着泪。这是真诚的眼泪。虽然我们知道斯大林个人的某些缺点，但是我们相信他"。赫鲁晓夫透露常有人问，为什么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没有揭发和杜绝破坏法制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他表白说，"当时党的领导干部不知道逮捕的全是些无辜的人。他们相信斯大林，甚至不能设想会对正直的、忠于我们事业的人进行迫害这种事"，"我们仅仅是在斯大林死后，在党和人民的头号敌人贝利亚被揭露后才知道的"。赫鲁晓夫在这个讲话中首次透露已为反动女作家谢列布里亚科娃"恢复名誉"。

伊利切夫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自从1962年12月17日会见后，现在"一切都上了轨道"，"人们理直气壮地谈论着艺术的党性和人民性，谈论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保证对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的批评并不是对自然主义的大赦，说"必须防止有人企图借反自然主义打击现实主义美术家，正如同指责在现实主义艺术中探求新形式的人犯形式主义一样"。此外，伊利切夫指名批评了爱伦堡。

3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部长会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是领导全国工业和建筑业的最高国家机关，它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颁布的决议

和决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执行。

会议任命德·乌斯季诺夫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会议还决定编制1966—1970年新的五年计划。

3月17日　《真理报》发表赫鲁晓夫就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周围建立牛奶蔬菜农场问题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赫鲁晓夫强调说，必须就成立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农场问题作出更为坚决的和有目的的决定。

3月28日　《真理报》报道，为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增加生产和把籽棉卖给国家方面的物质利益，以及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认为，有必要从1963年收获期开始，把集体农庄卖给国家的苏维埃品种(中等纤维)原棉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把国营农场和其他农业企业和组织交售给国家的籽棉交售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二。

3月　这个月里，有几起人事变动：

火箭部队总司令、苏联元帅谢·比留佐夫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接替扎哈罗夫)，火箭部队总司令职务由前莫斯科军区司令、苏联元帅尼·克雷洛夫接任(克雷洛夫同时还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成立部长会议国家电影业委员会，阿·罗曼诺夫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按：罗曼诺夫曾担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第一副部长)。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国防科委主席列·斯米尔诺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的发言人宣布，前驻荷兰大使波诺马连科已接替莫洛托夫担任苏联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常任代表。

3月 根据苏共二十二大精神修订的《列宁传》第二版付印。

4 月

4月6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授权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进行侦查》的法令，说“为了加强同犯罪现象作斗争，进一步巩固法制和扩大苏维埃刑事诉讼程序的民主原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议决如下：

（一）决定除检察院和国家保安机关进行侦查外，并由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按：即民警机关）的侦查员进行侦查。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的侦查员根据刑事诉讼立法有关侦查规定的条文进行侦查。

（二）根据本法令第一条，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原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叙述如下：

“检察院的侦查员侦查刑事案件，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的侦查员侦查的犯罪案件由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国家保安机关的侦查员侦查下列各条规定的犯罪案件：关于国事罪的刑事责任的法律的第一条（背叛祖国）、第二条（间谍行为）、第三条（恐怖行为）、第七条（反苏的煽动和宣传）、第九条（为了实施特别危险的国事罪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活动以及参加反苏组织）……关于军事罪的刑事责任的法律第二十三

条(泄露军事机密或遗失军事机密文件)的第一、二、三项”。

(三)责成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本法令对各该加盟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典进行必要的修改。

4月13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撤销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和设立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法律委员会》的法令。

4月17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攻击斯大林“在垄断对外贸易上有动摇,认为削弱垄断是不可避免的”,“在组织苏维埃联盟问题上有错误，他主张所有共和国在自治基础上归属俄罗斯联邦,受到列宁的批评”。

4月24日 赫鲁晓夫在俄罗斯联邦工业和建筑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谈到个别作家“从党所进行的克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的工作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他们不懂得，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决不意味着削弱领导，削弱对国内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有组织的管理。这些人不懂得,这种斗争不能解释为否定权威,贬低领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过去和现在都说:我们赞成权威。工人阶级、建设共产主义的人民应该有当之无愧的权威人物和领袖。我们共产党及其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就是苏联久经考验的领袖，被选入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是我们党内和国内最有威望的人物”。

4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八期载文说，苏共二十二大以来苏共党员增加了六十七万多人,到今年1月1日,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为一千零三十八万七千多人。文章强调吸收新党员首先要看他的生产成绩。说“去年被吸收为预备党员的

每一百人中，就有八十六人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

5—6月

5月6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说“最近，有些投机分子——牲畜拥有者——不从事有益的社会劳动，利用廉价的国家粮食和其他粮食制品来饲养牲畜和家禽，以达到个人致富的目的”。规定对这种人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罚款、没收牲畜和剥夺自由一年的处分。

同日，还规定了个人饲养牲畜（在不禁止饲养牲畜的地区）的头数和税额。

5月6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根据1961年5月4日《关于加强同规避社会有益劳动和过着反社会的寄生生活的人作斗争》的法令而被迁移的人，凡恶意破坏为他们规定的居住地的制度者，应依照人民审判员的决定处以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6月18—2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前任务”。

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反华，同时攻击斯大林和马林科夫。他强调“要改进”对国民经济的领导和计划工作，认为苏联目前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如资金使用分散，对新兴工业注意不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都和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他说，“斯大林本人没有研究过编制计划的问题，但也不愿意让其他人很好地进行研究”。赫鲁晓夫透露苏共二十大在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上“领导人中有过很尖锐

的斗争","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引起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曾经发生过的困难已经过去","人民赞同和支持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方针"。他说,要"把那些爬到敌人立场上的人们,作为敌人的应声虫加以谴责",要尽早"清除掉"在党通过决定、制定路线后仍坚持"错误立场"的党员,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各种派别和色调的味道"是不行的,党是这方面的"裁判"。强调"意识形态武器应当永远处于良好状态,永远处于准备状态"。在谈到苏修的文艺方针时,他说,"我们党站在人民的前列,领导着人民,它过去指导过、将来还要指导思想工作","谁要是想置身于党的政策之外和否认意识形态中的党性,那就等于组成一个非党人士的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我们的党,反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反对我们的现实"。他还表示"赞成在艺术方面的自治,赞成有创作协会的组织",同时他说,"所有……协会,如果企图以自己的活动来反对党的政策,势必要和党、人民发生冲突"。在谈到"写真实"问题时,赫鲁晓夫说,"我们不要求作家、艺术家、电影美化和不真实地反映生活中的事件","现实是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表现,但是要从肯定生活的立场来表现"。"我们号召写真实,哪怕是写最阴暗的东西和反面的东西,但是要写真实,从肯定生活的立场来写"。

伊利切夫在会上作报告,他透露,国内"民族主义残余很顽固",有"恶意煽动者"等"打扰集体"。说苏联"早已没有对抗性的阶级,因而也就不存在它们之间的斗争",但又说苏联有"阶级的、政治的斗争的反响",有"思想体系和行为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给敌人助长声势"的人。说"党公正地驳斥了斯大林的所谓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成就的增长,阶级斗争也

随之加剧这一错误的、有害的论点。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应当放松对我们敌人的阴谋的警惕性。事实说明恰恰相反，必须加强苏联人的革命警惕性”。在谈到对文艺的要求时，伊利切夫批评一些作家“不善于把个人迷信的歪风同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所有发展阶段上的宏伟的革命改造活动区别开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高准绳的核心，就是站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立场上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生活真实”。他要求作家和艺术家“创作描写丰富多采的生活，描写有不同的社会觉悟和道德水平的人的作品”。“要写真实，要突出我们现实中的基本的主导的东西”。他还批评一些创作者“竟开始怀疑党对艺术的领导”，说“党尖锐地批评了犯错误、离开了正确道路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在思想问题上不能有让步和妥协”，但“任务不是把他们‘革出教门’，而是帮助他们认识自己在思想上、艺术上的错误，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会议就伊利切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在会上说，最近几年来，根据苏共中央的倡议，陆海军中的党组织进行了改组。在参谋部，在军事学校和机关，在团队和军舰中，都成立了党委会。绝大多数连、营和航空分队都有了党组织，这是“加强党对军人群众思想影响的重要条件”。他批评宣传工作中“有时忽略了培养人们警惕和准备手执武器粉碎任何侵略者的任务”，对“教育青年学生问题注意得不够”。说“对居民，特别是对青年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是全国性的重要问题，教育部、创作团体和其他团体应该予以最集中的注意”。他还批评文艺作品“在

反映卫国战争事件时，出现了脱离激情、脱离功勋本身的英雄情节的倾向”，说“英雄们在死亡的恐惧下东逃西窜，不由得感觉到作者们实际上是想降低苏联人民的刚强精神和英雄气概，而把人的弱点突出地摆在第一位”。

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在会上作了专题的反华发言，会议还通过了反华决议。

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为苏共中央书记。

这次全会以后，特别是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各创作协会纷纷作出反华决议。报纸不断刊登一些作家的反华文章、诗篇，反华戏剧、电影也纷纷出笼。

6月26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组织劳动改造移民区和把被判处剥夺自由、但有决心走上改造道路的被监禁人送往该区的程序》的法令。法令说，“为了进一步完善改造和重新教育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的工作”，决定成立劳动改造移民区。调往该区的是“已服了一部分刑期并有决心走上改造道路的人”。这种人必须“在原剥夺自由场所有模范表现、劳动态度老实、参加所在集体的业余组织和社会生活的人。对依法可予假释的人，要求在原劳改营服满二分之一的刑期，但不少于已剥夺自由三年；对依法不可假释的人，要求在原劳改营已服满三分之二刑期，但不少于已剥夺自由五年”。“这种移民区没有军队守卫，没有囚房”。调至该区的人“可穿自己的衣服，可同亲人会见，通信，领取包裹和转交物品、汇款以及不受限制地使用现钱”，在这种移民区里，还允许罪犯“家属搬来一起生活，甚至允许获得个人住房和允许从事私人经济活动”。罪犯在移民区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领

取工资”。

哈萨克社会治安部部长潘科夫11月10日在《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们共和国提出了建立新型劳动改造制度的主张。这就是移民区。在那里，犯人开始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工作”。“移民区——它在原则上是这类机构的全新形式。在这里，一切基于对人的信任”。“新型的劳动改造移民区将来可以成为改造和教养犯人的一个主要形式。而且这将有助于顺利地消灭犯罪现象”。

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管理总局的一个处长波德莫夫1964年在《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第四期发表一篇文章，吹嘘“从劳动改造移民区的内容和目的性来看，它是在执行列宁关于以教育机关代替监狱的指示这一道路上的一个新步骤”。“正是对人的信任，甚至对过去犯过罪的人的信任，贯穿在建立移民区的思想中。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前科次数的多少，都不能成为把被监禁人送到移民区的障碍”。说“移民区是开放形式的劳改机关”，“是在工业或农业生产基地上组织起来的，这种基地要保证可供被监禁人及其家属十——十五年的开发工作”。移民区“有中学、俱乐部、商店、食堂、澡堂、洗衣房、诊疗所、幼儿园、邮电局、储蓄所以及具有现代化城市特点的市镇所有的一切设施，供被监禁人和他们的家属共同使用”。被监禁人在移民区可以“给自己盖房子”，“给被监禁人发身份证，允许结婚登记，允许家属搬来一起生活，也允许获得属于个人所有的住房和个人的财产。在法律规定的手续和范围内可以从集体的或个人的菜园中拨给同家属一起生活的被监禁人宅旁园地，允许饲养家禽和供应畜产品的牲畜”。

“被监禁人将被送往其他剥夺自由场所时，不剥夺他们依照自己的意图处理（出售、赠予、转让给移民区中其他被监禁人）这些财产的权利”。文章吹嘘“移民区是苏联劳改法规所规定的制度的最完善的阶段”。

文章还谈到，在彼尔姆州劳动改造移民区的犯人中，百分之八点九是抢劫犯，百分之二十六点六是杀人犯，百分之三十一点五是强盗，百分之五点九是强奸犯，百分之十六点三是国家财产的盗窃犯，百分之十点八是其他罪犯。

7 月

7月2日 乌克兰党中央举行全会，选举谢列斯特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全会鉴于波德戈尔内已提升为苏共中央书记，解除他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7月4日 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阿洪多夫在阿塞拜疆党中央全会上作报告，谈到该共和国许多农庄有分卖国家土地的现象。

在这前后，苏联报纸还透露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如《真理报》5月10日透露，爱沙尼亚一个区里有许多农庄主席“轻率地将公有土地分给所有想要土地的人，……让热衷于扩大宅旁园地的人去播种各种作物，把土地变成私人园地”。《消息报》7月2日报道，“哥萨克营”农场工人每户有一公顷宅旁园地，有的出租，有的雇人耕种。《农村生活报》8月20日社论也谈到在吉尔吉斯、哈萨克、俄罗斯联邦都有出卖国家土地和区党委书记等追求个人发财致富，发展私人经济等现象。

《东方曙光报》8 月 25 日透露，格鲁吉亚有两个管理局所属的各农庄和农场把大量土地分给私人，有的人竟超过规定拥有二点五七公顷宅旁园地。《农村生活报》10 月 19 日透露，乌兹别克一个农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超过规定标准二——三倍的宅旁园地”。《经济报》第十三期报道，目前全国从事私人副业的庄员和职工有一千万人。

7 月 4 日 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维埃文化报》发表一篇文章，要求文艺工作者“用高度警惕的精神教育苏联人民，给他们灌输热烈的爱国主义”等。

7 月 14 日 苏共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反华公开信中说，“现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苏联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占有可以剥削其他阶级的地位”。“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寄生分子被认为是阶级呢？是什么阶级呢？是懒汉阶级还是流氓阶级，是盗窃国库者阶级还是寄生虫阶级呢？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同这样一些人作斗争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完全能够完成并且正在完成这一任务”。

7 月 15 日 《真理报》以《人民的战斗先锋队》为题载文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苏维埃社会一致的巩固，党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党从工人阶级的组织变成了苏联人民的先锋队，变成了全民的党。党的历史道路的必然结果就是这样的。”“其所以必然，是因为就实质和列宁的党为自己提出的目标和斗争任务而言，党在它

诞生时起就已成长为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组织了。”

《土库曼火星报》7月30日也载文说：“共产党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即社会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政党而产生的。但是，自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俄国的工人阶级就已作为全民斗争的领袖，作为革命领导者出现了。因此，那时就已经创造了把布尔什维克党从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的前提”。“就苏共的目标与劳动人民长期以来的向往相适应这点而言，就所提出的任务符合工农根本利益而言，苏共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里（即推翻剥削者的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就已经是一个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了。”

7月19日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苏匈友好大会上发表讲话，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匈牙利问题、斯大林问题等反华，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

关于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说：“我们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坚决消除了个人迷信的任何表现并发生了向列宁主义原则的转变”。“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收到很多信，工人、农民、知识界人士在信中写道，现在苏联人民生活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赫鲁晓夫还说：“如果斯大林早十年离开领导工作，就会有可能更早地开始现在党所进行的工作，那么，苏联人民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好”！“在那个时期，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上班去了，但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再回家，是否能再看到自己的妻子，是否能再看到自己的孩子。”“斯大林不仅向敌人，而且也向自己人，向朋友，向革命的老战士射击。因此，我们谴责他，谴责他的专横、滥用权力。谁也不会去粉饰个人迷

信时期的这些肮脏事情。""因此，那些想改变我国的秩序，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行为大加赞扬并加以保护的人，是白费力气的"，"谁想把斯大林抬到台座上并让斯大林牢牢地坐在那里，那么，他所要的就不是我们党、我国人民所要的东西。"

关于"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说："我们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通过理智很好地理解到这点。有人在评价生活时只根据他所获得的福利多少，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肚皮来领会生活的"。当苏联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方面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甚至仅仅通过胃感觉到生命的人也会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制度，它对我也合适，尤其是因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人桌上的东西比我多。"他还说，"当那些不用脑子思考，而用肚皮思考的人说，共产主义对我并不合适，因为在共产主义拥护者的饭桌和盘子里的东西还没有我们资本主义拥护者的饭桌和盘子里的好吃的东西多，同志们，难道这不是标准吗？难道谁能反对这个吗？不，不！"

7月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卡扎涅茨接替谢尔比茨基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8　月

8月7—16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苏思想工作干部会议。伊利切夫致开幕词；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弗兰采夫作专题报告；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在会上发言；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第一副部长斯纳斯金作会议总结。

会议根据苏共中央6月全会决议讨论了"政治教育"的任

务，认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苏共二十二大、苏共中央11月全会和6月全会所提出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任务，研究现时代的迫切问题”。会议号召研究哲学的人要“了解党同左倾和右倾进行斗争的历史”，要“学会看穿隐藏在大喊大叫的‘极端革命的’词句背后的现代教条主义者的观点”。

8月10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改进出版、印刷和售书的领导”，设立了联盟和共和国国家出版委员会。帕·罗曼诺夫被任命为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

8月22日　部长会议就改进工商企业签订供应日用商品合同的制度作出决议。决议指责在签订供货合同制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缺点”，“对保证商品供应和商品流通计划的完成，保证供应居民高质量的品种齐全的商品产生了不良影响”。批评“许多工商企业领导人对签订合同的工作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国民经济委员会、部、总局破坏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1960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进商业的措施》的决议，在制订商品生产计划时不考虑商业企业的订货，结果是一些工业企业仍然生产不需要的商品而迟迟不改，没有生产足够数量的居民所需要的商品”。

决议要求消除签订合同工作中的缺点，对及时和正确地执行合同加强监督，禁止国民经济委员会、部、总局和工业企业，在未经订货单位同意的情况下修改在订货基础上制定的商品生产计划。决议还提出要进一步发展工商企业之间建立直接的经济联系等。

8月22日—9月2日　南斯拉夫报纸报道赫鲁晓夫在南

斯拉夫的讲话。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说，"我喜欢工人委员会的形式，这是一个进步的现象"。"显然，今天存在的旧的企业管理形式已经过时了，这是官僚主义的形式。"他强调南斯拉夫"在自治方面的经验是有意思的，对苏联可能是有用的"。赫鲁晓夫 8 月 30 日在南斯拉夫参观时还说，"我赞成农业中进行这样的工业生产"，"我打算把我们的专家派到这个庄园上来研究劳动和生产的组织"，"他们会了解你们的工艺规程和设计方法，以便把你们这种确实伟大的经验尽量好地带给我们"。9 月 2 日，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一所大学访问时说："苏联教育制度的主要任务是使每个人都获得高度的专门知识，首先是培养好的熟练工人。"

9 月

9 月 19 日　《真理报》报道，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成立了一百五十个联合公司，很多小企业都不复存在，变成了大厂的车间。

9 月 26 日　赫鲁晓夫在北高加索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今年广大地区气候不利，"结果，1963 年就形成了一个困难的局面，我们收获不到预计数量的谷物……不得不向国外购买粮食"（按：1963 年共进口粮食三百一十万吨，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他说："增产谷物的任务，我们主要是靠扩大播种面积来解决的……这曾经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当时国家没有矿肥，很难把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一倍到两倍"。"现在情况在改变。党为农业化学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

这种条件下，急剧提高谷物和其他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以及生产集约化就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总方向了。”增产的“两个实际源泉”是“增加矿肥的生产和扩大水浇地的谷物生产”。说“肥料生产是现在农业高涨的基础的基础”，“1970年我们要达到生产一亿吨矿肥的水平”。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编辑部文章，说“农业发展速度的减慢引起了党中央理所当然的不安”。说“扩大耕地面积的路线已经结束，现在迫切需要走逐步使农业和畜牧业集约化的道路，坚决放弃千篇一律粗放地采用的草田轮作制”。

10 月

10月14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加强同违反发火武器保管和使用办法的行为作斗争》的法令。

10月18日 科学院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伊利切夫在会上作报告和致闭幕词，此外还有十四人发言。会议最后通过了相应决议。

伊利切夫在报告中攻击所谓“民族马克思主义”“觊觎理论领导权”。提出“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鼓吹“哲学的任务是弄清楚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本性”，说什么“认真研究科学方法论意味着：第一，彻底克服个人迷信在科学中的残余；第二，克服隐蔽在某些科学中的狭隘经验主义”。

费多谢耶夫在会上发言反华，康斯坦丁诺夫发言攻击斯大林。

11 月

11 月 康·卡扎科夫元帅被任命为炮兵部队司令。原炮兵部队司令、炮兵主帅谢·瓦连佐夫由于同潘科夫斯基间谍案有关，被解除职务(按：潘科夫斯基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上校军官。因向西方提供绝密情报，被当局发现。塔斯社于 1963 年 5 月 16 日宣布，潘科夫斯基“因犯叛国罪，已被判处死刑”)。

11 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六期发表社论，说改组后党的领导干部组成都得到了加强。“州和边疆区的工业党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点六受过高等教育，农业党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六点二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多数是专家，有很多副博士和博士”。

11 月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举行会议，伊利切夫作了《鼓舞人民树立功勋的艺术》的报告(刊登在 1964 年《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上)。伊利切夫在报告中批评“一些剧本离开历史真实，常常歪曲时代的特点”，“对个人迷信后果的批评往往在客观上转化为给苏联社会的生活方式抹黑的偏见”。还批评剧本中“常常出现充满怀疑情绪的青年人，他们轻蔑地唾弃一切”，批评“戏剧家在时髦的、实质上是庸俗的理论家面前低头，同青年调情，并放弃作者立场的原则性和思想明确性”。伊利切夫强调“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过去和现在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典型的特点”，反对因“揭露个人迷信”而把苏联人民的劳动及其世界历史性的胜利“一笔勾销”。伊利切夫在

谈到人道主义问题时说，“我们常常听到必需仁慈、对人善良一类的话”，“但有时对人的仁慈的理解是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呢？首先是同根本否认严厉”。说“在驳斥停滞不前的人对新事物采取教条主义的偏执态度的同时，对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理想格格不入的一切东西采取不予容纳的态度是极其必要的”。

12 月

12月9—1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加速发展化学工业是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人民福利的最重要的条件》的报告，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加上国民经济化学化”。全会就此通过了相应决议。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奉行列宁的指示：在革命胜利后，经济建设和经济是争取共产主义的主要斗争场所。如果以为漂亮的词句、一般的革命号召和关于社会主义的幸福和优越性的泛泛议论，比建设新社会的实际成就对群众的影响来得大，这至少是幼稚的”。他竭力为农业困难、大量向国外购买粮食辩解，并污蔑说，“如果我们采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人民提供面包的办法，那么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出口谷物。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当他们出口谷物的时候，这个国家某些地区的人民却因为饥饿而浮肿，有的甚至饿死”。赫鲁晓夫在总结发言中宣布，正在考虑把苏军人数“进一步作某些裁减的可能性”，还考虑提出“关于略微缩减下一年度预

算的军事项目开支的建议”。

全会解除谢尔比茨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选举谢列斯特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2月14日 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博累斯拉夫城发表讲话，说“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以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句出色的话为座右铭的社会”。

12月25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说要“进一步改进对干部的工作，大胆提拔青年人、在工作中成长的同志”，“应该严格执行苏共纲领和苏共章程关于系统地更新被选出的机构的成员、绝对遵守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1963年夏季 乌克兰人民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民族压迫。乌克兰军区士兵拒绝苏修当局要他们镇压的命令。苏修调了另外两个军区的部队去镇压。

1963年 据苏联报刊和西方通讯社的不完全材料，这一年还为亚基尔、乌鲍列维奇、叶戈罗夫(元帅)、埃德曼、科尔克以及1938年曾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巴达耶夫等人恢复名誉。

1964年

由于中国人民、苏联人民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修斗争，由于苏联国内搞得一团糟，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于10月14日被他的同伙勃列日涅夫等人撵下了台。

赫鲁晓夫在下台前继续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加强法西斯专政，特别是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大抓军事动员。

勃列日涅夫集团一上台就立即声明他们忠于苏修二十大——二十二大的修正主义总路线。他们继续攻击斯大林，并与攻击斯大林混同一起，不指名地骂赫鲁晓夫搞个人迷信和主观主义。勃列日涅夫集团把工农业党组织合并，恢复了统一的党组织，同时，以比赫鲁晓夫更大的步子在经济方面复辟资本主义，取消了1956年对自留地、私有牲畜等的限制，宣布一些企业从1965年开始试行“利别尔曼计划”。

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夕，我《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对苏修中央《公开信》的评论已发至第九评，而在宣布他下台的同天，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2月

1月3日和6日 科学院主席团社会科学分组举行讨论

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的扩大会议。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合写的报告说，“个人迷信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降低了社会科学的威信”。报告攻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社会的历史规定为生产发展的历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而“没有”看作阶级斗争的历史(除原始社会外)。

1月12日 《哈萨克真理报》刊登苏沃洛夫上校的一篇文章：《人人在保卫边界》。文章透露，哈萨克党中央工作人员亲赴边防哨所组织“政治工作”，阿拉木图和东哈萨克州党委多次研究“对边境居民进行政治教育、吸引他们保卫我们祖国边界的具体问题”，成立了人民志愿纠察队、纠察队员联合司令部、边防军少年之友队等“居民帮助边防军的良好形式”，在所有边境地区的农庄和农场召开党团员会议讨论“保卫国境措施”，等等。

1月29日 《真理报》报道，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电影问题。会议对反斯大林影片《寂静》、《生者与死者》大加赞扬，说“任务就在于坚决地揭露我们意识形态的敌人、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切阴谋和伪造、诽谤和谎言；就在于以更大的毅力和热情在创作中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确立我们的意识形态——伟大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要求艺术家“扩大眼界，克服僵硬概念的狭隘性，敏锐地觉察在人民生活中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中正在诞生和发生的新事物”。

2月7日 苏军领导人同文艺界人士举行会见。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在会见时发表讲话，说“文艺中有关苏联陆海军过去的、尤其是今天的战斗日子的主题，仍使人感

到不安，有时甚至使人感到不满意”。他批评“某些书籍、剧本、影片、造型艺术作品和音乐对卫国战争时期缺乏广泛的深刻的认识，从历史上真实地反映各种事件和人民的命运不够”，“过分注意描写痛苦和惧怕、恐怖和混乱”。他提出要求说，“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题材是如此迫切和重要，它应当在书籍和歌曲中，在电影和画面中得到更鲜明的、令人信服的和更有成效的反映”。

马利诺夫斯基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当我们党再度肯定艺术创作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方向的重要性时，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反映战斗功勋、武装力量的战斗史和现代生活的问题”。“党坚决地提醒创作人员：文艺发展中的总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真实并且高度艺术地反映丰富多采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现实，鼓舞人心地、鲜明地再现真正共产主义的东西，揭露一切阻挠社会前进的东西”。“党提倡勇敢的英雄主义的和真实的文艺。它动员了巨大的力量来缔造千百万准备献身于劳动和国防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精神面貌”。他批评“最近以来在反映业已过去的这场战争方面出现的错误倾向，在一些文章、绘画作品和影片中出现了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反对战争的主题。把我国人民进行的战争描绘成只是恐怖、损失的堆集，在自然主义的细节中，把渺小的茫然失措的人物引上舞台”。说“我们反对以这种片面态度对待这一重要题材”。他要求“反映这个伟大的斗争”，说“在现在这样做尤其重要：现在还在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同它想捏造战争的过程和结果，贬低苏联人民在击溃法西斯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的企图进行激烈的斗争”。说应该用各种艺术手段来“揭

示我国人民在把欧、亚许多国家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那里解放出来的事业中和拯救文明的事业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还要求艺术家“在描写军队中的反面现象时，必须从肯定生活的立场出发，必须明确理解到，他的活动应当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的思想阵地”。

2月10—1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农业生产集约化问题。农业部部长沃洛夫钦科在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全会通过了相应决议。

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也在拚命地绞脑汁：如何理解12月全会的决议，这是不是放弃苏联迄今一贯坚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现在有人这样说，苏联政府、共产党目前在现实的打击下，在收成不好的情况下，放弃了工业化而采取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方针”。他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现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矛盾”。“只有死硬的教条主义者才会在这里看到什么放弃总路线”。他还说，“列宁并不认为向资本家学习是可耻的事”，“美国农场主加斯特建议我们建筑从‘农场通向市场’的道路。当然，这类概念是资本主义概念”。但是，在苏联“也不失其经济意义”；“苏联裁减一些军费和武装力量的人数，不是由于经济困难，而是出于明智的考虑，出于对各国人民之间和平的真诚愿望”。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影射反华。

苏斯洛夫在会上作了长篇反华报告，库西宁、格里申、费多谢耶夫等八人作了反华发言。全会最后通过反华决议。

2月20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开展

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决议，其中允许大学教授和教师在企业和科学单位兼职，给他们额外贴补百分之五十的工资。

2月24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苏联检察院的侦查员和侦查机关的奖励和纪律责任条例》的法令。

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执行中央2月全会决议的具体措施》的报告。他说，必须大胆和坚决地沿着从物质上鼓励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关心的道路前进。不能在直接生产产品的人们的物质刺激方面节约，要反对平均主义。他还提出了制定物质鼓励制度的实际建议。他并攻击斯大林执行了有害于农庄的价格政策，批评某些地方机构违反了1955年苏共中央决议，把作物的播种计划强加给农庄，在农业技术中硬套死板公式。

2月29日 《消息报》刊登一个"煤矿掘凿工"给编辑部的一封长信，题为《为此必须战斗》。这封信说，他见到有人嘲讽地拿歉收开玩笑，挖苦苏联的"某些不足"。"有人需要加大对已熄灭了的政治'明星'(按：指"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的不健康的兴趣"。有时一些"奇闻变成了攻击"，"使思想工作受到损失"。他说，"这种毒菌就是凶恶的可疑的人的坏话。这种毒菌在我们这里是很少的，但气味很坏，必须同它们进行斗争"，应"区分言论自由和说下流话的自由"，"反对那些居心险恶、说使人讨厌而只对敌人有利的话的人"。

接着，《消息报》3月9日又在《读者在继续议论》的总标题下，刊登了三封"读者来信"。编者按说："矿工"的来信引起很多反应，"读者坚决支持"这封信。喀山的一个"工人来信"说，他看到"一批青年人大谈关于新币、玉米和肥料的流言蜚

语”。一个技师说，“对我们现实的辱骂”，“应视为政治性流氓行为”，他“号召对那些以言论自由为幌子，实际上是在玷污这种自由的下流的人以无情的打击”。一个预备役上校说，“爱说风凉话的人和恶毒的吹毛求疵的批评家”的言论“危害巨大”，他们一遇到某种经济困难或不协调，“就象秋天咬人的苍蝇一样叫起来”。

2月 《青年近卫军》杂志第二期刊登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的一篇文章，说“应当从学龄开始就实施军事爱国主义的教育，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整个教育界都有责任积极推动这一崇高事业。因为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质就在于形成未来爱国者、祖国的坚强保卫者的世界观，而这一任务不是一、两年所能解决的。正是要从学龄开始就使我们社会的未来全权成员领悟这样一种思想：保卫祖国、防御敌人是公民最崇高的义务，是神圣职责，苏维埃国家军人的称号是光荣的、崇高的；理解这一简单而重要的真理：不有效地抵制破坏，就不可能建造起共产主义的大厦”。文章还说，“对适龄公民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是共青团最首要的日常任务之一”。

年初 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举行会议，总结委员会以及同它协作的几十个科学机关对讨论经济问题所作的工作。委员会主席加托夫斯基在会上作报告说，在讨论中，有些人力图回避企业计划和企业刺激中的重大缺点，降低了利润在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还有一些人提出一些没有很好地估计计划经济特点的建议，这些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使企业脱离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实际上，某些人建议把利润变为某种万能的企业工作的自我

调节者。他说，委员会驳斥了所有这些观点。委员会坚持的立场是：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果，必须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同企业的主动性结合起来；必须把计划化和刺激紧密地结合起来；加强经济核算的刺激；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作用；为了物质刺激的目的，更有效地利用价格。

3—6月

3月3日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六期刊登伊林上校的一篇文章，说"近几年，由于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在关于权威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判断。某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人企图把个人迷信同领导人的威信混为一谈。有人把我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看成是否定一切威信，看成是削弱领导作用的方针"。文章竭力强调军队里的"一长制"，并说"随着武装力量的发展，威信的范围和意义在不断扩大和增长。这一客观倾向由于军事上发生的革命而充分表现出来"。

《红星报》3月18日刊登伊利因科上校的一篇文章，强调党对军队的"完全领导"是"苏军建设基础的基础"，攻击斯大林在八大前后"严重地离开党在军事建设上的路线，对军事专家一概不相信，无视俄共(布)中央的某些指示"。

3月5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从物质上鼓励领养老金者参加生产》的决议，决定从4月1日起，吸收有劳动力的领养老金者参加工作，除发给工资外，还发给百分之五十的养老

金；在劳力不足的西伯利亚、远东等地除工资外，发给百分之七十五的养老金；在农庄、农场则工资、养老金均照发。

3月16—18日 苏共中央召开各加盟共和国社会治安部部长、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中央党、政、工、团和公检法的负责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听取并讨论了总检察长鲁金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国家法制》的报告。与会者就党委协助公检法机关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方面，在吸引社会团体和劳动人民集体参与维护法制、在未成年的人中消灭犯罪行为以及在改进对正在劳动感化机关里的罪犯的工作等方面交流了经验。勃列日涅夫向与会者发表了讲话。

3月20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计划工作实践中粗暴破坏和不正常现象的事实》的决议，强调"商品产品量应是新的计划制度的起点"决定：（一）谴责危害和阻挠农业生产发展的公式化计划工作以及从上面把播种面积、结构、牲畜头数和其他生产指标强加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做法。禁止在国家计划之外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规定任何指标的生产任务。责成各级组织向侵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订生产计划的权利的工作人员严格地追究党和国家的责任。这种侵犯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应由那些把农场推到亏本道路上去的人赔偿。（二）作物的收获量、播种面积的多少、牲畜的头数、完成农业工作的期限、农业和畜牧业方法以及利用科学和先进实践经验的措施，应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专家和领导人根据当地条件直接在那里确定。（三）必须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传达的只是国家收购

农产品的计划，而生产计划要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自己来制订，其出发点是必须保证完成国家收购农产品的计划。在制订计划时，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领导人同生产管理局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最后的决定要由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和国营农场场长作出。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 1955 年 3 月《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工作》决议的第五点（规定审查各种作物播种计划和发展畜牧业计划的权利归区执委会），已被认为失效。（四）在规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计划任务时，必须考虑到：每个单位的经济在专业化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高涨的利益，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建立保证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基金，严格遵守物质利益关心这一发展经济的极重要条件的原则，等等。

3 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载文说，去年在总结和改选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州委会的成员更新了一半以上，市委会、市属区委会选出了四分之三以上的新成员。说由于更新，干部的质量成份大大“改善了”。约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业州党委与边疆区党委书记和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农业州党委与边疆区党委书记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国民经济专家。一半以上的市党委、市属区党委、工业生产党委会书记是受过高等和中等技术教育的专家。

4 月 1 日 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埃杰休耳特·伊佐工厂群众集会上提出了“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他说：“光有革命的冲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需要有书籍和良好的住宅。当你有这些的时候，那时你就会懂得你为什么要斗争”。

4月24日 《真理报》发表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关于与实现党的农业集约化方针有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书和苏共中央就这个意见书通过的决议。意见书说，“应该考虑培训广大干部以及专门人材和领导人员的整套制度”，“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保留不懂得专业……的冒牌专家”。意见书吹捧“资本家在建立商品率高的畜牧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说“要把资本主义国家里创造的一切先进东西都运用到农庄、农场里去”。“要深入研究，吸取外国——美、英、东德、西德、丹麦的好经验”。说“应当认真改组我们的畜牧业，改掉我们从小农经济继承下来的习惯，实行新办法，仿效大资本主义农场生产猪肉的工艺规程”。赫鲁晓夫认为“必须坚决执行专业化的方针”，“在工业基础上组织蛋、禽肉生产”，要使“养猪业也建立在工业的基础上”。赫鲁晓夫还批评“生产管理局工作人员今天在领导实践中使用的依然是十年、二十年前的方法”，说“现在这一切都需要从根本上来个大转变”。意见书最后建议改变劳动报酬制，对萨马尔斯基农场的建议——根据所收获的庄稼实行每公担产品的直接报酬——表示“很满意”。苏共中央通过了赫鲁晓夫的意见书并作出相应决议。

4月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莫洛托夫被开除出党。

4月 《社会主义法制》杂志第四期刊登最高法院院长戈尔金的一篇文章：《争取进一步发展苏维埃审判工作的民主基础》，说“1938年通过《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以后，审判监督权高度集中，只有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领导人才能够对已产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提出异议，只有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法院才能审理这类提出异议的案件，而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由于撤销了全会和主席团两个机构，事实上它的审判监督权也是极其有限的，结果案件大量集中到苏联最高法院”。文章说，上述做法“无助于正确实现审判制度中的监督职能，导致了在苏联最高法院中形式主义地对待控告的审查，产生了审判上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贬低了各加盟共和国审判机关的作用和责任感”。文章说，“1957 年通过新的《苏联最高法院条例》后，边疆区、州一级法院也有了审判监督权”。

5月15—16日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大批文化界人士参加了会议。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在会上作了报告，但苏报未发表报告全文，只作了简单报道。伊利切夫说：“我们必须进行斗争，反对在社会主义美学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倾向，反对那些妄想抹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和资产阶级现代派之间的根本区别的企图。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为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的概念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们企图把学究式的庸俗教条强加给社会主义文化”。西方通讯社普遍认为，会上答应在文艺方面实行进一步的“自由化”，以“换取知识分子在反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支持”。

6月5—6日 苏共中央举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的学术会议。波诺马廖夫和伊利切夫在会上作了反华报告。伊利切夫在报告中提出，“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运的团结而斗争，是苏联社会科学各部门面临的重要任务。苏联科学家应当感到，而主要的是，应当象

意识形态阵线的积极战士那样行动，著述创造性地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各个方面的新著作，其中包括著述当代各种基本问题的科学通俗读物”。会上发言的有意识形态部第一副部长斯纳斯金以及康斯坦丁诺夫、波斯别洛夫、托尔库诺夫、尤金、加托夫斯基等人。

6月24日 赫鲁晓夫在瑞典一家造船厂发表讲话，说苏联已不再建造大型军舰，在未来的世界热核战争中，这种军舰不再是了不起的军事力量。

7—9月

7月8日 赫鲁晓夫向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讲话，吹嘘苏联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同时又说，“无论军事技术及其歼灭作用有多大，无论军队机械化和自动化达到什么水平，人还是占第一位”，强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军人有坚忍性和果断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叫嚷“我们发誓保卫我们祖国的边界不受侵犯，准备随时对那些侵犯苏联以及我们的盟邦和朋友的边界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毁灭性的打击”。

7月13—15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执行苏共在提高人民福利方面的纲领的措施»的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两项建议，一项是关于集体农庄庄员的优抚金和补助金问题，一项是关于提高直接为居民服务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问题。他说，“在形成和确立新的共产主义结构的时代里，经济事业被历史发展的逻辑本身提到首要地位”，否则，“完成了革命的人民就不能尝到

革命的现实成果”；“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福利，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

会议选举米高扬接替勃列日涅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调任苏共中央书记。

7月1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提高教育、卫生、住宅—公用事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以及其他直接为居民服务的国民经济部门工作人员工资》的法律。法律规定于1964—1965年将上述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一，同时规定普遍实现职工最低月工资增加到四十——四十五卢布。

同时还颁布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优抚金和补助金》的法律。

8月13日 《教师报》刊登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公布的《关于再度修改普通学校学制》的决定。

前此，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阿法纳辛科在一次报告中说，“五年的经验证明，把中学修业年限延长一年并把这个时期基本上用于生产教学，这种情况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因为可以用较短的时期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使生产教学往往变为无谓地浪费时间。……这种状况常常引起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严重不满”。

（按：这个新决定实际上是在10月间赫鲁晓夫下台后，由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集团完成的，如把普通学校的学制从十一年制又改为十年，大大削减普通学校的劳动时数（12月5日公布的措施），放弃普通学校里实行的职业教育，等等。）

9月15日 赫鲁晓夫在接见日本议员时宣称，苏联已有

了一种"灭绝人类的新武器",叫嚷"谁破坏苏联边界将遭到坚决反击"。

9月底 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强调说,"编制最近时期的远景计划时,必须依据这样的方针: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这个计划的主要任务。如果说在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和战后年代,我们把重点放在发展作为全国经济高涨的基础的重工业和加强国防能力方面,那么现在由于我们有了强大的工业,由于国防水平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党提出了更快地发展那些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的任务"。"我们应当把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摆在第一位"。

10 月

10月1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研究"和"满足了"赫鲁晓夫提出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0月15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解除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10月17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苏共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总路线》的社论,说"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已由党在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和苏共纲领确定了","党实行自己的总路线时,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调和地一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

10月19日 勃列日涅夫在欢迎宇航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并说，“国内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我国社会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福利，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10月24日 《消息报》主编易人。弗·伊·斯捷帕科夫取代了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依。

10月26日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五期载文说，“在目前条件下，由于一系列社会政治原因，由于相当一部分宗教人士政治方针的被迫改变，这就为共产党人与宗教徒的紧密合作和为进步的、人道主义目标的共同奋斗创造了有利得多的条件”。

10月28日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十一期刊登三篇攻击斯大林的文章，其中一篇攻击斯大林在“基本投资计划中的唯意志论”，因而使黑色冶金工业“处于停滞状态，甚至降低了产量”。另一篇攻击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保护工贼并用中央机关的威信来掩护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关于把工贼开除出党的建议”。第三篇则攻击斯大林“忽视群众的经验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只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为依据”，“导致对政策和组织工作的列宁主义原则的歪曲，破坏革命的法制”。

10月29日 塔斯社评论员发表文章，说苏联正在推广消费品生产企业按商业机构订货制定生产计划的制度，使企业根据同商店签订的直接合同制定计划，而不经过中间环节

——中间的批发组织。按照这种计划工作，企业领导人的权力扩大了，现在企业领导人可以自己确定产品品种，并且能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价格。

10月30日 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尼·麦西亚泽夫任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原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马·亚·哈尔拉莫夫被解职，调任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副主编。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赫鲁晓夫在下台前取消了陆军总司令部。

11　月

11月1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重申苏共"始终不渝地执行着"并"永远忠于""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拟订的、在苏共纲领中得到反映的列宁主义的总路线"。

文章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联社会的政治和思想一致的加强，苏共成了全体人民的党"。文章还攻击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11月1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艺术创作的鼓舞人的思想》的社论(按：这是苏共新领导上台以来党报就文艺问题发表的第一篇社论)。社论说，苏共纲领规定的文艺方针是苏联"当前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苏联的艺术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人"。社论号召"艺术知识界为党性和人民性，为文艺作品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技巧而斗争"。

11月4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取消1956

年8月《关于向在城市拥有牲畜的公民征收现金税》的法令。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1月13日也宣布取消禁止在大中城市及其近郊私养牲畜的决定。

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哈萨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加盟共和国相继通过决议，决定取消1956年3月以后对农庄庄员和家住在农村的非庄员宅旁园地和私养牲畜的限制；规定可以按限制前情况恢复宅旁园地、私养牲畜的数目，或根据当地情况重作规定；并规定“今后应停止毫无根据地减少宅旁园地的数量”；还取消1963年一些加盟共和国为限制不从事有益劳动的城乡居民饲养牲畜而征收现金税的法令。

在取消这些限制的同时，还规定要向庄员、职工提供贷款购买乳牛，提供饲料和牧场，要党、政、苏维埃的领导人，“对那些忠诚工作的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在耕种宅旁园地、经营菜园和饲养牲畜，提供牧场和采集饲料方面给予帮助”。

11月6日 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作报告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苏联正进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在我们国家里早就消灭了剥削阶级。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牢不可破的联盟日益加强。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被思想上的一致和政治上的一致凝结在一起的苏联人民，体现着摆脱了社会对抗和民族对抗的新的史无前例的人的一致”。“我们的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自然发展，它表达全体苏联人民的愿望，保护他们的利益。”“共产党的伟大理想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理想，党的纲领成了全体人民实际行动的纲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我党活动的准则。”

“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列宁主义方针已经明确地表达在苏共纲领中。”“我们的经济政策应当保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特别是其中最先进的部门；实现国民经济全面电气化和化学化；加速发展农业和提高其收入；扩大消费品生产和改进对居民各方面的服务。我们整个计划工作和经营工作应当建筑在客观估计和准确情报的巩固基础上，建筑在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科学成就上。生活已经一再表明，凡是以主观主义和随心所欲的决定来偷换对事情应采取的科学态度的地方，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曾经指出：‘我们有很多人喜欢改革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祸’。列宁教导说，关键不在于机构，不在于改组，不在于新的法令，而在于人和检查执行的情况。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实现完善国民经济领导的必要措施，要审慎地进行这项工作，不能匆忙草率。国民经济应当协调地发展，应当符合达到最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重工业的发展应当既服从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更新技术装备的要求和防务的需要，又符合迅速提高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利益。”

“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广泛地采用经济刺激”，“更加充分地运用使集体农庄和庄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的原则，具有特殊意义”，“忽视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为满足本身需要而从事私人副业的条件，是不正确的”。

“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实行了没有根据的限制，而采取这种步骤的经济条件并没有成熟。这些限制现在取消了。”

11月6日 莫斯科各报都发表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

于授予斯大林时期被处死的佐尔格以"苏联英雄"称号»的法令。«真理报»刊登了切尔尼亚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说"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条件下，佐尔格的功绩被遗忘了"。

11月10日 米高扬等联名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纪念1938年6月"个人迷信受害者"奥金佐夫（按：此人曾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七十五岁诞辰，说奥金佐夫是"诚实、谦逊和处处表现高度原则性的共产党员——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是舍身忘我地忠于共产主义胜利的事业的光辉榜样"。

11月13日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主编阿·鲁米扬采夫任«真理报»主编。原«真理报»主编帕·阿·萨丘科夫调任«党的生活»杂志编委和该杂志社的党委书记。

11月14日 莫斯科作家举行晚会，纪念"恢复名誉"的作家巴别尔七十岁诞辰。全苏作协第一书记费定主持晚会。他在发言中肯定巴别尔的功绩，攻击斯大林说，"个人迷信时期没让巴别尔唱完自己的歌"。"这个时期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学，我们也知道，它如何影响了这位作家的生活。"

11月1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决定把1962年11月改组的州、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恢复统一的党组织，设立统一的州、边疆区党委会；过去改组时建立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会予以撤销，改为区党委会。

全会作了以下人事变动：

谢列斯特和谢列平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杰米契夫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科兹洛夫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波利雅科夫被解除苏

共中央书记的职务。阿朱别伊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全会把下列八人从苏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苏共中央委员：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阿·叶皮谢夫、重型、动力和运输机器制造部部长弗·日加林、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瓦·科诺托普、乌克兰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伊·卢塔克、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普·马谢罗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格·波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谢米恰斯内和俄罗斯库尔干州委第一书记格·西佐夫。

此后，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也相继举行会议，分别通过关于恢复统一的工会机构及共青团组织的决议。

11月17日 《真理报》刊登一篇为纳萨列佳"恢复名誉"的文章，说"斯大林企图把在外高加索组织集体农庄时期所犯的错误完全推到纳萨列佳一人身上，于是斯大林把他召回莫斯科"，纳萨列佳就是这样"被斯大林迫害了"。

11月18日 康斯坦丁·卡扎科夫元帅被任命为火箭部队和炮兵司令。原任这一职务的瓦连佐夫在去年因与潘科夫斯基案件有牵连而被降级降职。

11月18日 《真理报》刊登一篇为斯·科西奥尔"恢复名誉"的文章，说他是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说"这位波兰农民的儿子，也遭到了列宁的许多学生的同样命运，成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专横的牺牲品"(按：此人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

11月18日 《经济报》发表社论，说"有时听到一些夸大政治和政治措施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甚至把它们

绝对化的议论。这不是别的，这正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它是早已被粉碎了的反马克思主义潮流的遗迹”。

11月22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艺术家的职责》的社论。社论说，“符合于时代精神的发展，在精神生活中充当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代表的权利，使艺术工作者要求自己承担大得多的义务并对人民负有大得多的责任”，“但远非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能经常地真心地来严格认识这一点”。社论特别提出了“关于艺术家的良心、他的公民责任感的问题，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在文化发展中所负使命的认识问题”。社论说，“在这种情形下，怎能不叫人想起俄国古典作品的卓越传统”，“他们都把公民的战士的职责放在第一位”，“迫切要求提高文学和艺术的质量，提高文学和艺术的思想、艺术水平”。社论批评创作组织在讨论新作品时往往“持有偏见地评价自己同志的著作”，说“迄今还未消除的派别情绪也损害着批评的原则性。那些染上派别主义的人甚至咒骂好的作品，也会把不好的作品捧上天”。

11月25日 《消息报》刊登布琼尼元帅为纪念齐亚夫金七十岁诞辰写的一篇文章，说“齐亚夫金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加之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违法和专横，他被宣判为有罪”。

11月25日 柯西金在土库曼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庆祝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一切成绩，都是由于实现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以及苏共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总路线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它是不可动摇的”。

11月27日 《苏维埃拉脱维亚共产党人》杂志载文说，“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及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个时期，一直推及到完全胜利，是不正确的。大家知道，斯大林就犯了这种错误。这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11月28日 军事学院院长扎哈罗夫重新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接任因飞机失事死亡的比留佐夫。

12 月

12月1日 《消息报》刊登一篇为米柳京“恢复名誉”的文章，说他“被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的诽谤和违法行为所害死”(按：据法新社说，米柳京“一度曾是列宁的反对者”，在1928年以后任国家计委副主席、统计局局长)。

12月3日 作家协会、哈萨克作协和哈萨克文化部联合举行晚会，纪念1939年被处决的哈萨克作家萨肯·塞福林。晚会由俄罗斯联邦作协主席索波列夫主持，他在讲话中称塞福林是“真正的苏维埃诗人，苏维埃作家”，“革命的诗人”。当天的《文化报》还刊登了哈萨克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的一篇纪念文章。

12月6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全民的国家》的编辑部文章，说“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时期，人民群众的作用被贬低，列宁的国家管理方法遭到歪曲，妨碍了彻底贯彻苏联宪法的真正民主的原则”，“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根本改变了局面”。

文章说，“个人迷信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而是对无

产阶级专政的歪曲，这种歪曲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成为可能”。“我们党不仅谴责了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错误和滥用职权，而且也设法建立可靠的保证，防止这种现象”。近十年来，在发扬民主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这项工作的目的是克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

文章攻击持有“在剥削阶级本身消灭后，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甚至在加强）”这样一种论点的人，说“这是为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所特有的唯意志论、专横和目无法制进行辩解的典型手法”，“个人迷信的维护者是不喜欢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全民国家的活动的”，他们“想一笔勾销全民国家的思想，勾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使我国回到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制度中去，这种企图尤其是站不住脚的”。文章表示要“坚定地走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道路”，“没有力量能够使我们离开这条列宁主义的道路”。

文章还说，“当社会主义是国内各阶级斗争的对象时，共产党只有作为工人阶级的党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作用，因为那时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唯一的始终不渝的体现者，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唯一的始终不渝的战士。社会主义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局势。工人阶级的理想、它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成了全体人民的理想、政策和意识形态。与此相适应，党的性质也改变了：它从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了全民的党”。

文章埋怨赫鲁晓夫的工业管理改组措施进行得“太仓猝，没有经过深入的研究，认真的讨论”，说这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的、有计划的领导造成了困难”。

12月7日 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尤苏波夫被解除职

务，原哈萨克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接任第一书记，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伊谢巴耶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

12月9—11日 第六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五次会议。柯西金在会上作《关于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报告。报告强调要大大“改善”现行的计划和经济管理制度，全力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说采用经济核算、规定有经济根据的价格、提高利润的作用和物质鼓励是“加速提高”苏联经济的重要条件；要求扩大企业的经营独立性，扩大企业经理、车间主任和工长的权限；称计划部门在消费者订货的基础上制订消费品生产计划的必要性已成熟，在其它经济部门也将沿着计划工作以消费者定货为基础的道路前进。在农业方面，柯西金重申3月全会的决议，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从国家收购计划出发，能够而且应当自己决定生产中的播种面积和最有利的结构，以及发展农牧业的方向”。报告建议把1965年军费减少五亿卢布，并说从美国政府代表人物言论中可看出美国也打算削减军费。

会议通过了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

会议解除赫鲁晓夫的宪法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替这一职务。

12月12日 《哲学问题》杂志第十二期刊登科尔尼洛夫和尤金的一篇文章：《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民的党》，说“斯大林关于我国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巩固而尖锐化的错误结论，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的遭到粗暴破坏和个人迷信产生的其它反常现象，都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和

共产党的发展”。

12月15日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作者瓦·阿扎耶夫写成了中篇小说《车厢》。小说通过描写斯大林时期的肃反运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文学报》发表了小说片断，并在编者按语中说：“《车厢》一书讲的是我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悲剧插曲，那时候由于革命的法制遭到破坏，许多苏联人受着无辜的苦难”。

12月19日 《消息报》的《星期》周刊第五十一期刊登菲洛诺维奇的一篇文章：《怀疑的阴影》，说一些被“恢复名誉”的人抱怨现今仍不受信任，有些人则对“恢复名誉”的做法表示怀疑和不满。有人问：“为所有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是否太过分了，难道我们不曾有过敌人吗？”“个别的错误也许有过，但总归有点什么问题吧？或者什么也没有，我个人不清楚。”还有人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受过惩罚，可见是有过什么问题，现在的时代是这样，我欢迎总路线，但具体地对被恢复名誉的人还应当再了解了解”。文章称发这种言论的人为“政治市侩”。说拿怀疑的态度反常地理解革命警惕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人道主义的现象”。

12月19日 考涅楚克在《戏剧》杂志发表又一个反斯大林剧本：《一页日记》。在这个剧本中，考涅楚克极力丑化一个被称为“斯大林残余分子”的老画家，而美化一个背叛了过去的信仰、接受了苏修“新纲领”的剧作家。剧中还鼓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宣扬对叛徒“同情”，以保护“人”、“不要评判人”、“友谊”、“仁爱”等等。这个剧本自1964年12月在莫斯科上演以来成了1965年剧目中最受重视的节目之一，

苏联许多重要报刊先后发表著名评论家的文章，赞扬这个剧本。

12月19日 《文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召开关于1964年苏联文学创作的笔谈会，邀请全国的文艺评论家参加。评论家们把1964年说成是苏联小说创作的"丰收年"，证明"文学运动出现了某些关键性的现象"。这表现为：第一，"更进一步体现出苏联艺术的更新，更完满和更深入地认识生活的真实，更积极地为清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及实现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思想而斗争"；第二，"更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对道德问题的特别注意"，作家们"努力克服了对'全人类'道德规范的不信任"。

12月22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布一项法令，决定取消1963年2月5日成立的负责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共和国经济工作的中亚经济区。

12月22日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八期刊登两篇攻击斯大林的文章。一篇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文章说，"斯大林在同'左派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的论战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建议不签订和约，但是开始和谈，实际上就是赞同托洛茨基的招致毁灭的策略。列宁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立场，后来，斯大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赞成列宁的建议"。另一篇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在苏共纲领中的创造性发展》，文章说，"在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克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以后，党合乎规律的发展趋向、逐渐变成全民党的趋向就以新的力量表现出来"。

12月26日 《消息报》宣布，从1965年开始，利沃夫国民

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五个轻重工业企业，包括自动装卸车厂、煤矿、制鞋和缝纫公司等试行利别尔曼建议。利别尔曼亲自参加了制订试验方案。方案规定：只给重工业企业规定产量和品种任务，其它各项经济指标由企业自行制订；轻工业企业则根据商店订货合同完全自行制订计划。利润成为资金的来源，利润愈高，奖金愈多。

12月29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最高法院最近举行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流氓案件审判工作的报告，并作出决议说，“流氓行为属于危害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宁、并且往往是犯其他更加严重罪行的土壤的危险的违法行为，因此，同流氓行为作斗争是法院机关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12月30日 《经济问题》杂志第十二期刊登勃利索夫的一篇文章：《讲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说“斯大林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范围局限在消费品方面，并企图通过进行直接的产品交换更快地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质上这条路线的目的是反对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实际上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同比例混为一谈。”

1965年

这一年举行的三次中央全会(3月、9月、12月),提出了一系列加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

工业方面,决定从1月1日起,在轻工业部门推行产销单位"直接订货制度"的试验。接着,在重工业部门推行以利润为主要指标的试验。5月,在汽车运输业中试行企业"自负盈亏"的制度。7月,又把有关利润原则的试验推行到商业、饮食业和食品工业部门。在9月全会上,制定了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以后又颁布了"国营企业条例",把过去试验和鼓吹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具体化、系统化、制度化。按"条例"规定,在企业内部,经理与工人的关系已经完全变成雇佣和被雇佣、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农业方面,确定以赢利率水平作为"客观评价"农庄、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要求农场在短期内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大力推行包工到组制度,积极扶植农民私人经济。5月间,颁布《集体农庄市场新标准条例》,为进一步自由买卖农产品打开了绿灯。

在文教方面,鼓吹"排除行政命令方法","反对艺术服从于政治",提倡写"普遍人"、"小人物",还试行了影片摄制人員的报酬取决于影片观众数量的资本主义经营措施;废除了高校招生中应主要吸收具有两年以上工龄的生产者的规定,强

调吸收"成绩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并宣传"非常需要用卢布来教育人"。

鉴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反斯大林的强烈不满，勃列日涅夫集团一方面允许在宣传和文艺作品中正面地提到斯大林，另一方面，继续对斯大林进行攻击，并且又为一批人翻了案。在人事方面，继续排除异己，提拔亲信。

3月上旬，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莫斯科召开了有九个党参加的分裂会议。

1　月

1月1日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从1965年1月1日起，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十大城市的全部缝纫和制鞋企业，以及哈萨克、摩尔达维亚、中亚细亚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四百家轻工业企业和一百二十八家纺织和皮革厂推行根据商业部门直接订货进行生产的试验。试行新制度的企业，可根据订货者的需求改变计划，企业经理自行规定总产量、工资基金、工作人员人数等。

还决定，从1965年第四季度起，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一些食品和肉类工厂，推行商店向工厂直接订货的制度。

1月6日　《党的生活》杂志第二期刊登洛马金的一篇文章：《苏共纲领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及其发展》，说"国外有人猜测，甚至断言，10月全会以后，看来苏共会放弃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并会重新审查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这是徒劳的打算！相反，我党关心的是要彻

底埋葬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做法，根除其复活的可能，并更坚定地推行自己的总路线，由党的二十大开始的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不可能也不会重新回到老的做法上去”。

1月8日 乌克兰党中央全会解除了伊瓦申科(女)的乌克兰党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同年10月1日，又解除了她的民族院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按：伊瓦申科长期在基辅工作，1960年起任乌克兰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二十二大当选中央委员，曾多次随赫鲁晓夫出国访问)。

1月9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无愧地反映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社论号召“在艺术创作中体现社会发展的主导倾向，体现共产主义建设的高度热情和我们同代人的英雄性格”。说“苏联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积极地干预生活，不断地探索新的现实主义的途径和形式，新的艺术表现的手段”。“我们的艺术，无论对于在复杂的生活现象面前惊惶失措和把黑暗的色调渲染过甚的态度，或者对于自吹自擂、苟安自满的做法和只用玫瑰色调来表现生活的那种田园式的画面，都一律应该视为异己的东西。”说“在为新的、共产主义的事物以及反对个人主义和市侩习气的没落世界的斗争中，苏联艺术家只能有一个立场——进攻的立场”。“我们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循列宁的遗训，依靠社会主义的创作力量，在党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把这种力量联合起来，一贯坚持我们艺术的思想纯洁性，反对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负责和迁就态度，反对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美学概念。”

1月9日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一期刊登一篇题为《苏共思想工作的重要部分》的文章，说“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坏

境及其引起的后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宗教信仰的加强。破坏法制和民主，大批的镇压，不能不在某些苏联公民心里产生恐惧的感觉，把同宗教信念很相象的、对神化了的斯大林个人的神奇力量和才能的盲目信仰硬加给人们。”

1月13日 《经济报》刊登一篇题为《实验开始了》的文章，说一项新的经济实践已于今年在许多建筑工地和企业开始进行。它们是：中伏尔加国民经济委员会化学机器制造厂，中央黑土地带经济区机器制造厂，吉尔吉斯国民经济委员会房屋家具厂，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日用冷藏器厂等单位。从1965年起，这些企业无论是新建还是改建，都将依靠长期贷款来进行。建造新厂和改建、扩建现有企业的投资，都用长期贷款来代替预算拨款。这样一项实验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用贷款来加强对缩短工期、投资回收、降低造价以及缩减未完工程量的影响的可能性。

1月14日 莫斯科大学举行“遗传学方法论”的会议，会上讨论了普拉东诺夫作的《现代遗传学的几个方法论问题》的报告。普拉东诺夫说，在个人迷信时期，有人往往没有足够根据就把某种学派说成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而另一些人则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1948年8月，李森科就是在斯大林支持下把染色体遗传性理论称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1月17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吹捧几部反斯大林的作品，称《山外青山天外天》和《士兵不是天生的》为苏联文学的“优秀作品”，《布列斯特要塞》一书获1965年列宁奖金，《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真理与诺言》等也搬上了舞台。

1月24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艺术知识界创作协会》

的社论，说"时代迫切要求创造性地动员一切智慧和天才"，"艺术家对人民的责任越来越大"。"任务的高度公民感，把艺术家的爱国主义职责，他对自己的劳动和对同行的劳动的严格要求，他作为一个公民和创作者的良心，提到首要地位"。社论要求"特别重视对青年作家的思想教育，他们中间绝大部分是健康的，认真探索的。这里不能容许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一会儿是粗暴的呵斥，一会儿又是讨好和'赦免'严重的错误"。"党号召创作协会动员艺术知识界的一切力量来提高他们作品的思想性和技巧"，"创作团体的崇高使命是在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则立场上团结艺术家，领导积极的斗争去反对颓废的资产阶级艺术和艺术理论"。

1月26—27日 作家协会理事会举行全体会议，吉洪诺夫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苏联文学"首先是为人服务的"，时代要求"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探索，以便反映今天的现实"，还说"新的时代要求拒绝标准的思维和写法，拒绝对生活现象的萎靡不振和胆怯懦弱的表现。深刻认识已发生的变化，对生活对人抱新的态度，重新理解现时代，会为巨大的、有价值的作品提供新的力量"。

1月 部长会议"责成苏联国家银行向住在农村、城市和郊区并且目前还没有奶牛的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提供买牛的贷款。购买奶牛最多可贷给三百卢布，购买牛犊则贷一百五十卢布，期限均为五年"。

1月 《政治自修》杂志第一期刊登一篇题为《苏共纲领关于党及其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文章，说"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歪曲，这个原则的民主

一面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在个人迷信的环境下，好多年不召开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也没有定期举行，在重大问题上采取独自的决定”。

1月 《经济报》第四期刊登古季莫夫的一篇文章：《柜台旁边的想法》。文章说，去年年底国家贸易委员会下达了有关零售工作人员劳动工资的命令。从1965年1月1日起，日用品的售货员从一百卢布的售货额内开始得到六个卢布的工资，蔬菜和水果售货员——九个卢布，工业品——四个卢布，服饰用品和化妆品——四个卢布五十戈比，等等。

1月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二期刊登图林的一篇文章，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转变为全民国家的军队的过程，实际上从社会主义在城市和农村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三十年代的后半期就已经开始了”，“尽管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之间还保留着本质的差别，可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们的军队是全民的军队，因为这些差别没有对军队的社会本质产生严重的影响”，“从内部条件的角度来说，苏联现在就不需要军队了”。

1月 《苏维埃司法》杂志第一期刊登俄罗斯联邦劳动改造移民区副区长拉什科的一篇题为《劳动改造机关的新形式》的文章，说“建立劳动改造移民区，是国家和人民对犯人的人道主义的新行动。这个行动不仅可以使偶然犯罪的人，而且可以使长期以来破坏苏维埃法律、不顾社会主义共同生活准则的人更快地回到诚实的劳动者大家庭中来”。

2 月

2 月 10 日 李森科被解除遗传学研究所所长职务，任莫斯科"列宁高尔克村"试验农场负责人。农业科学院院长奥尔尚斯基被解职，洛巴诺夫重新担任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2 月 17 日，马茨凯维奇担任农业部部长。原农业部部长沃洛夫钦科被任命为第一副部长。

2 月 18 日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特稿说，伦敦收到的消息说，苏联政府正在把比萨拉比亚州的罗马尼亚族人送到西伯利亚去。拒绝迁移就意味着要受到迫害。

2 月 21 日 《真理报》刊登鲁米扬采夫的一篇题为《党和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吹捧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重大作用"。说"知识分子就其出身，(社会)关系和世界观来说，同工人阶级和农民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这排除了使他们变成特殊阶层的可能性"。又说"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居民的一般知识水平在不断提高，直到最后消除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取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共产党无须对知识分子另外制定一套同党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政策不同的特殊政策"。文章还要求给知识分子以更大的自由，指责"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的一长'领袖'""对脑力劳动者不信任，偏执己见"，强调"要让各种学派、各种风格和体裁存在，让它们之间进行竞赛"，说"全面地自由地发展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是评价一切作品的标准。

2 月 21 日 《真理报》刊登阿巴尔金的一篇影评，说反斯

大林的电影《主席》的作者的探索是“符合苏联艺术的主要方向的”(按：这部影片把斯大林去世时的苏联农业和农庄描写得非常糟，当广播里传出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银幕上出现一片小麦抽穗，预示丰收的画面，接着农庄一切都焕然一新)。

2月22日 《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刊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契夫的一篇题为《教育青年是党的事业》的文章，说“不用隐瞒，在口头宣传中，有时是在报刊中，时而出现对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的片面观点，把过去的缺点、错误放在第一位，遮住了苏联人民伟大的、真正的英雄事业”。创作知识界的一部分人“有时过于醉心于描写个人迷信时期的专横、无辜被判刑的人们的精神感受和肉体上的痛苦”。这“会混淆苏联人的视听，尤其是对青年，有时过分地和不适当地赞扬这种作品，而批评它们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2月 《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第二期介绍了科学机关和法律机关讨论苏共中央决议的情况。法学研究所有二十五人参加的一个讨论会认为，今后法律研究方向是“改善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人民监督和国家监督及其在管理中的作用的提高问题，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法律问题，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法律地位等”。要求“研究结果有助于党和政府解决管理社会和国民经济的重大和根本的问题”。说“应该不是对维辛斯基的个别错误而是对他的全部有关国家和法的基本问题的理论进行根本的和彻底的批判”，“这些理论实质上是搬运到苏联来的资产阶级法学家的工具”。

3 月

3月4日 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其主编的《新世界》杂志第一期上发表长文，鼓吹“写普通人”、“写小人物”。

3月3—7日 俄罗斯联邦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党政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米高扬、波利扬斯基、谢列平、伊利切夫等出席了开幕式。

肖洛霍夫在开幕词中号召“团结”，说“我们要友好地工作，应当象同团的战友，有着同一个目标，同一种关心，我们应该抛弃一切细小的委曲和误解。让我们把使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的东西——关心伟大的苏维埃文学取得新的成就——放在第一位。这是党对我们的渴望，全体人民对我们的渴望”。

作协理事会主席索波列夫在会上作《苏联文学与培养新人》的报告，强调对文学的领导应“具有交流经验的性质”，“排除行政命令的方法”。“二十大为文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用庸俗的意义来解释‘思想性’，说成是艺术服从于政治”。

苏共中央在祝词中号召“对思想动摇现象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情绪及抹黑的种种表现毫不妥协，坚决反对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和抽象的做法”。

大会致苏共中央的感谢信保证“首先效忠于亲爱的列宁的党”，说“我们的党的纲领、苏共二十——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苏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1963年)6月全会决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政治上的指南针，俄罗斯作家按着它

生活和创作，积极地干预生活，在自己创作中发挥和继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真理报》为会议发表了社论，说“苏联作家的崇高使命是：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那些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美学理论进行不调和的始终不渝的斗争”。

3月9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律部主任卡利内契夫向塔斯社记者宣布，“新的苏联民法汇编将在1965年7月1日完成”。

卡利内契夫着重指出，苏联民法不仅宣布公民权，而且在保证其实现，全面地维护个人权利和合法利益。如果说1922年的民事法典把所有制区分为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有制，那么现在规定了两种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

新的立法第一次给集体农庄、合作社组织和社会团体以不受限制地索取从它们那里非法没收的财产的权利。

3月11日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一书说，在1937—1938年和以后期间，当时的五个元帅中有三个被杀，所有军区司令和许多军队政工人员被杀害。许多国内战争时的著名指挥官和英雄都受到了迫害。所有的军长，几乎全部师长、旅长，约一半的团长、军区军事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军、师、旅的大部分政委，三分之一的团政委都受到了迫害。总共有五分之一的军官受到了迫害。

3月11日 苏联公布《关于中等专业学校各专业修业年限》的规定，将修业年限最长的专业由四年改为三年，最短的由三年改为一年半。

在这以前，1 月 14 日公布了《关于高等学校修业年限》的规定，将修业年限最长的由六年改为五年零十个月，最短的由四年零十个月改为四年(按：关于缩短修业年限问题，赫鲁晓夫当政后期就开始酝酿，当时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就强调要缩短年限，加速培养专家，主张“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使学生掌握知识上，不要让他们在学习时间内去搞同教学过程无关的工作”)。

3 月 19 日 柯西金在国家计委会议上就制订下一个五年计划发表讲话，说在制订七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时都存在主观主义倾向。他强调各部门的比例、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发展速度、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他主张经济计划应由计委先提出方案，此方案不是法律，各共和国可以批判地研究，并提出意见。

3 月 14—21 日 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分别在 3 月 14—21 日举行了地方苏维埃选举。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的成员大约有一半是新当选的。

塔斯社 3 月 27 日说，“据这里正式宣布，有二百零八个选区，候选人没有得到必要多数的票，因而不能当选。有十八个选区由于违反法令，选举无效。有十一个选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举行选举。所有这些选区都将重新举行选举”。

3 月 24—26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报告。他说，“1953 年 9 月苏共中央全会具有重要意义，它制订了农业方面的正确方针”，“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对增加谷物生产具有巨大意义”。“近几年来农业的发展减慢了，提高农

业生产的计划没有完成。按照控制数字，在七年计划(1959—1965 年)期间，农业总产量应增加百分之七十，实际上，六年来只增加了百分之十”，“最近五年，平均每年只增加百分之一点九”，“畜牧业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1959 年后农业“实质上是在原地踏步”。

他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规律的要求没有被充分考虑，甚至常常被忽视”，“近几年农业领导的实践中单凭意志行动越来越占上风，特别是在计划工作、规定价格、财政拨款和贷款等方面”。“次数很多的、有时是臆想出来的改组造成了神经过敏状况”。(二)“用必要的经济措施来保证完成任务方面做得不够”。(三)“在提高农艺和提高肥力方面做的工作很少”，“轮作制被破坏了”，“中央发出了关于整地、播种面积结构、改变农作制、牲畜饲养的各种各样的许多公式化的指示，而不考虑自然和经济条件、生产条件和当地的经验”。(四)“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的工作有严重缺点”，“不注意依靠专家，不善于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

他说，“必须更快地纠正农业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主观主义。必须在广泛的经济基础上利用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来发展生产”。他主张把赢利率水平作为客观评价农庄、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应使国营农场在最近时间内实行全面经济核算，给农场、农庄更多的经济自主性，农场的利润要由农场自己支配。提出降低谷物和畜产品收购计划并固定六年不变，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业投资，恢复草田轮作制，取消对私人副业的限制，免除农庄对国家的一部分欠债，从农庄的纯收入中征

收所得税等。

他还强调"必须特别重视加强和提高农庄、农场的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说现行农庄章程中"许多条文已经过时","着手制定新章程的时候已到",准备1966年召开第三次全苏庄员代表大会。

全会就勃列日涅夫的报告通过相应决议,并强调要"加强党和国家机构所有环节和社会生产所有方面的纪律"。

讨论勃列日涅夫报告时,发言者着重批评赫鲁晓夫违反物质利益原则、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推销工业品、大种玉米、大反草田制、瞎指挥和独断专行等,还批评了在肉类、奶类生产方面按人口平均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认为是冒险主义;说赫鲁晓夫改组拖拉机站是一种破坏性的措施,说他提倡的干部轮换制度是假民主等。发言者还具体地暴露了苏联农业一片混乱和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阿洪多夫在发言中还谈到,"我们有百分之二十六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从事家务和私人副业","不久以前,我们通过专门调查研究了二千人从事的工作,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男人从事自己的私有经济"。普斯科夫州委书记古斯托夫说,"据1月份统计,州的集体农庄工作者平均每月劳动报酬是二十九卢布二十戈比,国营农场里是五十四卢布,而工业中是八十三卢布"。"就全州来说,畜牧业人员和农机手除外,大田作业工作人员的工资每月只有十五——二十卢布"。

全会决定,马祖罗夫递补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并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乌斯季诺夫当选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解除了他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最高国民经济委

员会主席的职务），伊利切夫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职务（被任命为副外长）。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诺维科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3月27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服兵役期限》的法令，规定凡受过高等教育的陆海军士兵、中士服役期为一年。在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和工厂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大学生准予延期应召入伍。

3月30日 鉴于马祖罗夫已调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白俄罗斯党中央全会解除了他的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马谢罗夫当选为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

3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刊登了格罗莫夫的一篇文章：《生活的产物》。文章说，"可以认为，生产联合公司的形式已走出了试验的框子而具有群众性了。今年年初，全国已有将近五百个生产联合公司，它们合并了将近二千二百个原先的独立企业"。"苏联的生产联合公司基本上有三种类型。这就是：公司—联合企业、公司—企业以及介乎这两者之间的形式。大多数的联合公司中，其经营单位都是整个公司，而不是加入公司的任何一个企业或分支机构。加入联合公司的企业无权编制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和在国家银行中设立结算账户"。

3月 《政治自修》杂志第六期载文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因此，共产党，即工人党，成了全民党"。

4 月

4月1日 农业部部长马茨凯维奇向塔斯社记者谈了农业领导制度改变的情况。他追溯说，以前，部的作用归结为领导农业科学、培养专家和兽医人员。现在，部开始完全领导发展经济并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负责。

4月5日 《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举行编委代表和著名生物学家的会议，讨论“生物科学发展的迫切问题以及同探讨生物学哲学问题有关的问题”。会上的发言集中地批判李森科及其学说，称他为“伪米丘林学说”、“教条主义学说”、“主观主义的教条”，否认有“米丘林生物学”或“生物学中的米丘林阶段”。说李森科用“米丘林生物学”作为一种掩饰来建立自己的“垄断地位”。说苏联“在最近二十五年内没有现代科学的生物学”。

4月7—9日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现代唯物辩证法问题”的全苏会议，有六百多名哲学家出席了会议。费多谢耶夫作《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对立面”、“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斗争”等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崭新的内容”。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没有对抗性矛盾”，但在社会同反社会犯罪分子之间的斗争具有对抗性质。说把社会对杀人犯、强盗和社会财富盗窃者的态度，对祖国叛徒的态度看成是非对抗性矛盾，那是不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内部存在着阶级对抗”。

4月10日 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通过

决议，规定在按新计划制度工作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企业中实行新奖励制度，并规定当企业完成任务时，企业领导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可得相当于职务工资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五十的奖金。此外，在这一年里，还先后通过了关于在重工业、建筑业和商业企业中实行各种新奖励制度的决议。

4月10—19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苏共中央3月全会决议，先后通过了十四项决议和法令，规定从5月1日起提高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还规定农庄在自己的纯收入中扣除百分之十五的利润以后，再按百分之十二的税率交纳所得税；责成银行免除农庄二十亿一千万卢布的债务及农庄为购买机器欠下的一亿二千万卢布的债务；从1965年起，国家每年拨出款项以补助农庄庄员的养老金。

4月16日 《共青团真理报》载文透露苏联企业内实行"搜身"制度，5月16日该报又刊登了一篇类似的文章。

4月21日 《经济问题》杂志第四期载文，系统地阐述发展私人经济的"理论"。说私人副业是食品的极为重要的补充源泉，它的产品在国家总产品中占相当重要的位置，是苏联现阶段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必要的和最适宜的形式，它和公共生产有一定的分工。文章还大讲宅旁园地的"优越性"，并为农场职工私养牲畜、搞宅旁园地辩护。还说私人副业不能缩减，对它作无根据的限制会引起恶劣后果。文章最后强调："为使私人副业消亡"，必须先帮助其发展，提供机械、饲料和牧场等。

4月27日 苏联从4月25日起降低部分纺织品、照相

器材和一部分鱼类食品的价格。同时决定取消在农业地区出售的某些商品的附加价格。

4月28日 科涅夫元帅在战胜法西斯德国二十周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瑞典记者提出“应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的问题时说，“斯大林是最高统帅，他在战胜敌人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战争初期的日子里，他犯了某些错误，至于对斯大林活动的总的评价，那已经在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中作出了”。

4月底 作家协会和莫斯科分会军事文艺作品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战争题材作品和创作问题。西蒙诺夫在会上说，1937—1938年的事件“连根砍掉了军队中的精神要素、互相信任和纪律”，因而使苏军在战争初期“遭到严重损失”。《十月》杂志副主编特罗科夫认为“个人迷信产生过令人痛心的后果”，但“把1941—1942年我们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迷信，而且仅仅归结于个人迷信，那至少是片面的”。

4月 《经济报》第十五期发表题为《商业上已成熟的问题》的社论，说不久前通过了一项在许多商业企业和商业组织中试行新的计划制度的决议。给商业机构和商店规定了两个指标：商品周转额和利润。至于其他各种指标，则由它们自行考虑。现在十分重要的是有组织地和很好地进行这次经济试验。

5—6月

5月1日 列宁格勒两家载重汽车场从5月份起试验新

制度：规定只为企业下达一项指标——利润的预算提成额。其余指标由车场领导人自行确定。企业领导人可自行确定物质奖励制度、工资基金和工作人员人数。增加了留给企业的基金，现在上缴预算提成为超计划积累的百分之四十，其余的百分之六十留给企业自行支配。企业经理有权决定基建投资、购买设备和出售设备。企业实行全面经济核算。企业可从建设银行取得为扩建和改建企业的贷款，期限五年。

5月7日 《真理报》刊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的一篇文章，说“个人迷信时期是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中的严重歪曲和错误相联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错误没有改变苏联谍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使它同人民和党脱离”。

5月8日 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说“在非常情况下……组成了以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来领导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在动员我国所有力量方面作了巨大的工作”。他说，“我们始终不渝地实现反映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和苏共纲领中的总路线”。

5月13日 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及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规定逐月向农场及其他国营农业企业领导人和专家支付全部职务工资。场长月薪最高可达三百卢布。此外，每超额完成年度产品销售计划的百分之一，发年薪百分之零点三的附加额，还发给职务工资率百分之十的奖金。领导人和专家每年所得奖金不得超过其五——六个月的职务

工资。

5月13日 《农村生活报》报道，阿穆尔州各农庄、农场正在推行小组承包一奖励劳动报酬制，他们把九十五万三千公顷农作物分别固定给一千六百个全盘机械化小组，并确定了对计划产品和超计划产品支付劳动报酬的不同定额。

类似这种包工到组、超产奖励的报酬制也在拉脱维亚、哈萨克、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共和国推行。

5月13日 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公布《关于批准苏联高等学校1965年招生规则》的决定。规定录取全日制高校学生时，根据具有两年以上实际工龄的生产者以及退为预备役的军人和不具备两年劳动工龄的人递交报考申请书的数目，由校长按比例分配名额，从而改变了过去招生总计划中为具有两年工龄的生产者保留百分之八十名额的规定。决定认为原规定"结果证明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成绩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不具有完备知识的生产者却被录取"。该部部长叶留金7月17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渊博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的文章，说"1965—1966学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原则的唯一和基本的要求，是一切考生一律必须具有渊博而牢固的知识"。

同日，该部还作出决定，从1965—1966学年起，除在中等专业学校讲授社会学、苏共党史之外，还增设了哲学知识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历史等社会科学。

5月14日 《消息报》刊登总检察长鲁金科的一篇文章，纪念克里连科八十岁诞辰，说他同列宁共过事，是十月革命的"直接的和积极的参加者"，1938年"成为个人迷信时期无端

镇压的受害者”。

5月19日 部长会议决定成立实验创作电影制片厂。在新的影片生产制度下，摄制人员的报酬将取决于影片观众的数量。制片厂领导人有导演丘赫拉伊、库利扎诺夫、作家西蒙诺夫、电影剧作家叶若夫等。

5月23日 苏联各地为肖洛霍夫六十岁生日大搞庆祝活动。《真理报》说肖洛霍夫是“当代先进的、人道主义艺术的光荣旗手”。共青团中央的贺词称他的作品是“千千万万青年读者的生活教科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给他列宁勋章，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赠给他一把元帅佩剑。

5月27日 部长会议国家商业委员会批准《集体农庄市场新标准条例》。条例规定：允许集体农庄和庄员以及其他公民在市场上按市场上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对市场价格不采取任何限制与调整；允许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组织按国家零售价格参与市场活动；禁止在市场上向交易者索要自产证。

5月 《新世界》杂志第五——第七期发表科涅夫的回忆录《1945年》。该回忆录在描写进攻西里西亚工业区和柏林战役中，竭力抬高科涅夫本人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战役计划都是科涅夫的主张，而斯大林只是充当点头同意的角色（按：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后，在反斯大林方面，为了平息人民的不满情绪，采取了比赫鲁晓夫更阴险、更狡猾的手段。如在一些电影、电视和文艺作品中也让斯大林出场，似乎是在“客观地”反映和描写。但在这中间，实际上是尽力贬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尽力丑化斯大林。影片《“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出

现的斯大林，只是抽烟，一言不发。另一方面，恶毒地反斯大林的作品仍继续出笼。如这一年继续发表的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六卷，用很大篇幅更疯狂、更恶毒地攻击斯大林，说斯大林象个“专制暴君”，在他身上“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结合在一起”，他“象人一样聪明，象野兽一样阴险”）。

6月25日 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在格鲁吉亚党中央全会上作《关于进一步改善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的措施》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当时从我们党的建设的列宁主义原则出发曾准确地和形象地说过：‘我们党是一座堡垒，这座堡垒的大门只对经过考验的人开放’”（按：这是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以来，苏领导人第一次在正式言论中正面引用斯大林的话）。

6月26日 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决议，从第四季度起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一些食品和肉类工厂，推行商店向工厂直接订货的制度，企业有权自行制订生产计划、工资基金、人员编制等。

6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期发表题为《党内民主和共产党人的责任心》的社论，强调共产党员要尽自己的“责任”，要遵守“严格的纪律”。社论说，“相互的严格要求（没有任何例外）是党内民主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教育党员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是党内工作的最重要任务”。“没有纪律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社论说，“3月和9月全会决议成了经济建设中全党活动的基础，是每个共产党员不可违反的法律”；“还有这样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力图用领导经济的

狭隘的行政办法来代替新的经济方法，对利润、价格、经济刺激的作用估计不足，一句话，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我们还有这样一些工作人员（从基层集体到各部）喜欢拿他们是其成员的委员会作为挡箭牌来回避对他们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每个领导人——工长、队长、部长等等必须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决定，执行掌权的人和委员会的命令和指示。”

7—8月

7月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报道，从1964年下半年起至1965年7月1日止，各加盟共和国新的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相继生效，以代替实行了四十多年的民法典。新法典的特点是，“加强了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与1922年的民法典相比较，有以下改变：（一）在所有制方面：把从前所区分为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有制改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二）在继承权方面：现在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有法定继承权。法律扩大了遗嘱自由并允许将遗产交给自己最亲近和同自己有财产联系的人。（三）新的法典给集体农庄、合作社组织和社会团体以不受限制地索取从他们那里非法没收的财产的权利，等等。

7月3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修改和补充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法令：

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3年10月21日《关于加重无必要地擅自停驶火车的刑事责任》的法令，1965年1月26日《关于修改和补充军事罪刑事责任法律的第九条、第十九条和

第二十一条»的法令，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3年10月23日«关于补充和修改同志审判会条例»的法令，以及考虑到适用刑事立法的实践，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

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作修改和补充，主要有：

(一)在第二十四条附则一的第一项“武装伙匪罪(第七十七条)”后，加“聚众骚乱罪(第七十九条)”字样。

(二)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三项和第四项改写如下：

“第一项，在守卫弹药、武器、军用器械的仓库或其它有重要意义的岗位时，违反守卫(值班)勤务规则，以及为补充这种规则而发布的各种命令和指示者，处以六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剥夺自由；

第三项，违反守卫或者巡逻勤务规则的规定，因而发生守卫(岗哨)或者巡逻应当预防的损害后果者，处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剥夺自由，或处以送往军纪营管束，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两年以下；

第四项，在战时或战斗状态中犯有本条第一项和第三项所规定的行为者，处以两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剥夺自由”。

7月8—9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讨论发展商业和公共饮食业问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出席了会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季亚科夫宣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缝纫和制鞋业的所有企业都将采用厂销挂钩的新计划制度，莫斯科和其他五个州的商业企业和组织的经营活动自7月1日起将根据商品周转额和利润两项指标来评定。

同月，部长会议决定，从1965年第二季度起，在俄罗斯联

邦等四个共和国的商店、公共饮食业、消费合作社和其他商业组织推行所谓新计划制度，即只给商业企业规定商品周转额和利润两项指标，其余均由商店自行确定。同时，对零售部门的商业人员，实行补充奖励制度，完成所规定的两项指标者，可发给月薪百分之十的奖金。

7月14日 《农村生活报》开辟专栏，讨论修改集体农庄章程问题，说现行章程“已过时”，“束缚”了庄员的主动精神，“妨碍”了利用内部潜力，“降低”了生产效率。强调农庄经营管理上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求让农庄自行制订生产计划，“广泛发展”农庄、国家、消费者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扩大农庄主席和专家的权力，并要求农庄建立生产队，把土地、技术装备、劳动力都固定给生产队。

7月 《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第七期刊登一篇文章《斯图契卡和他在法学上的理论遗产》，称斯图契卡为“苏共的杰出的活动家，孜孜不倦的苏维埃司法的缔造者和著名的理论家”。

《莫斯科大学学报》(法学部分)第二期也刊登文章，称斯图契卡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苏维埃国家活动家、学者、政论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家”，并说“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斯图契卡对苏维埃法律科学的发展，对苏维埃司法的建设和实践有过巨大的贡献”。

前此，《苏维埃司法》杂志第十期曾刊登一篇文章《法庭演说家克雷连科》，称克雷连科是“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终身为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为实现列宁的伟大理想而斗争的俄国职业革命家队伍中的一员”，“党的天才的鼓动

家、宣传家、三次俄国革命的参加者”。《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第六期也载文说，克雷连科著作中阐述的许多原理，“到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从党和政府根据二十大、二十二大决议一贯坚决执行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路线角度来看，更值得特别注意”(按：近两、三个月来，苏修刊物连续载文纪念三十年代受批判的这两名法学家。这两人当时作为暗害分子受到批判)。

8月7日 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苏共中央3月全会的发言速记记录。书中有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全会决议以及一些重要发言，计二十九篇。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未包括在内。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和新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戈里亚乔夫公开指名批评了赫鲁晓夫。这是苏共新领导上台以来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赫鲁晓夫。

8月9日 《哲学问题》杂志第八期刊登恩·斯·波诺马廖夫的一篇文章，说“个人迷信及其影响的消除和防止重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把工人阶级的政党变为全民的党等等，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内生活和政策也都产生影响”。

8月11日 加拿大贸易部部长宣布，苏联从加拿大买了六百零四万吨粮食(按：据报道，苏联以后又从阿根廷买了二百一十万吨，从法国买了一百二十五万吨，从美国买了九万吨，从罗马尼亚买了六十万吨，总共买了一千多万吨)。

8月 《政治自修》杂志第八期刊登了一篇谈民族问题的文章，说“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成分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全部

生活的进一步国际化。在一些共和国里，基本民族的比重有所降低。例如：在1939—1959年这二十年期间，乌兹别克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全部居民中的比重从百分之六十五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二，塔吉克人在塔吉克共和国中的比重从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三，吉尔吉斯人的比重从百分之五十二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一”。“在各族人民接近的过程和范围内，也有自愿融合的因素。在那些社会生活越来越国际化的地方，这种自然的进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同志不正确地评价居民活动性加强这一自然进程，表现出这样或那样地把自己封闭在本民族、本民族地区范围内的愿望，另一些同志暴露出往往同民族主义一起出现的地方主义倾向。在提拔干部方面，偏重的不是政治和业务质量，而是民族属性。”

8月 《社会主义法制》杂志第十期报道，检察院于8月20日和21日举行会议讨论犯罪问题。会议说，“党和政府对检察长和侦查员表现了经常的关怀，特别是反映在不久前提高了他们的工资”。会议决定“对超公职年龄的人实行工资加补贴”，颁发“共和国功勋法学家”荣誉称号和“司法机关中的优秀工作”胸章。

9—10月

9月7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一篇题为《军队在苏联的影响正在增长》的文章，说“1920年由于阴谋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被处决的、俄国内战中的一名著名将军鲍·莫·

杜万科被恢复了名誉”，“这是列宁亲自称赞过的一名俄国内战时的领导人被恢复名誉的第一个事例”，虽然对杜万科的判决“肯定是列宁赞成的”。说“这件事的含意是：列宁犯了错误。对苏联人来说，这是个新的、惊人的自白”。

9月9日 鲁米扬采夫在《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论苏联知识分子创作劳动的党性》的文章。鲁米扬采夫在文章中大谈“党性”，要作家“从党的立场”进行写作，并表扬了一批为修正主义政治服务的作家，指责《消息报》和《农村生活报》对阿飞作家阿克肖诺夫和田德里亚科夫的批评，说这两家报纸的批评是“以偏执性偷换了原则性，以偏见、片面的立场代替了全面。结果以毁灭性的批评代替了善意的批评”。文章声称党的领导将“保证文艺创作自由”。

9月16日 《白俄罗斯共产党人》杂志载文纪念前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克诺林七十岁诞辰，文章说，克诺林的“生命在1937年悲惨地被中断了”。

9月20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法令，决定对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1年5月4日颁布的《关于加强同规避社会有益劳动和过着反社会的寄生生活的分子作斗争》的法令作如下修改：

(一)法令序言部分第二段改述如下：“但是，在城市和农村还有个别有劳动能力的人顽固地不愿从事诚实的劳动，过着反社会的寄生生活。在集体农庄里，这类人享受着赋予集体农庄庄员的优惠权利，而规避诚实的劳动，破坏纪律，从而使集体农民经济遭受损失。”

(二)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和第六条改写如下：

“一、规定：凡成年的有劳动能力的公民，不愿履行宪法规定的最重要的义务，即不尽自己的能力诚实地劳动，而是规避社会有益劳动并过着反社会的寄生生活，根据区(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强制他们在常居地区范围内的或者该州、边疆区、自治共和国范围内其他地方的企业(工地)从事社会有益劳动。

如果规避社会有益劳动和过着反社会的寄生生活的人，不顾民警机关或者社会团体的警告，在一个月之内不参加劳动时，则由区(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强制参加社会有益劳动的决定，或者由区(市)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强制外迁的决议。

二、区(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或区(市)人民法院对规避社会有益劳动并过着寄生生活的人所作的关于制裁措施的决定(决议)是最终的决定(决议)，不得上诉。

五、区(市)人民法院对规避社会有益劳动并过着反社会的寄生生活的人所作的强制外迁的决议，由民警机关执行，它并且负责监督区(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强制这些人劳动的决定的执行。

在这些人仍然规避劳动时，区(市)人民法院则根据民警机关以及企业(工地)行政和社会团体的提请，处以一年以下的劳动改造，并扣除其百分之十的工资。如果规避服劳动改造，法院可以根据社会秩序保卫机关的提请，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处以剥夺自由。

从新住地逃跑或在前往新住地的途中逃跑者，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一百八十六条判处刑罚。

六、受强制外迁处分的人，如果用模范的行为和诚实的劳动态度证实自己已改过自新时，可在超过执行强制外迁期限的一半以上后，由新住地的区(市)人民法院，根据社会团体的申请，提前释放。”

9月22日 《真理报》主编改由原外交部副部长齐米亚宁担任。原主编鲁米扬采夫调到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工作。

9月24日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四期刊登费多谢耶夫院士的文章：《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文章认为，对抗性矛盾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消失。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的土壤，社会和反社会的犯罪分子之间的斗争带有对抗性质。但是，这并不是社会内部的阶级对抗。

9月27—2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发展工业问题。柯西金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他提出：

(一)鼓励企业追逐利润：以获利润多少确定职工的物质奖励和企业福利设施；把利润作为企业发展生产基金的来源；以支付生产基金的形式，由企业利润中提成上缴预算。在利润分配上，提高超计划利润留给企业的部分。

(二)扩大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减少由上级下达的指标，仅给企业规定产品销售额、主要品种、利润、工资基金、预算的付款和拨款、集中投资额和投产的固定基金、采用新技术和物资技术供应等八项指标。劳动生产率、职工人数、平均工资、成本及其他指标由企业自行确定。将来也可放弃给企业规定工资基金。在物资供应方面广泛发展供求企业间的直接联系。

(三)通过价格、利润、奖金和贷款等手段加强经济刺激；

利润是“引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好办法”，从利润中“留更多的钱”用作企业的生产、物质奖励和各种福利基金；基建拨款要向长期贷款过渡；实行生产基金付费制度；1967—1968年将实行新价格制度。

(四)取消经济行政区、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和部门性国家委员会，成立全联盟部和加盟共和国部。

全会就柯西金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决定实行以利润为核心的“完善计划方法和加强经济刺激的新体制”。

勃列日涅夫9月29日在会上发表了反华讲话。

全会解除了季托夫的中央书记职务，选举库拉科夫为中央书记。全会决定于1966年3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9月30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俄罗斯联邦区、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直属观察委员会条例》。条例规定观察委员会的监督对象是：劳改机关，执行关于流放、驱逐出境、不剥夺自由的劳役改造等法院判决的机关，有交保人犯或从剥夺自由场所开释的人犯工作的各企业、机关和组织。观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劳改机关的活动“进行经常的社会监督，并协助这些机关进行工作”，“对有交保释放，刑满释放或不剥夺自由的人犯工作的企业和单位如何组织和进行教育工作实行监督”，“并对刑满释放的人犯的劳动就业和生活安排给予必要的协助”，等等(按：观察委员会是苏共二十大后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进一步扩大民主”的口号下成立的一种所谓群众性的劳改监督组织，这个组织已存在多年，直到这时俄罗斯联邦立法机关才颁布法令，对它正式

加以规定)。

9月 苏共新领导上台后曾一度停演的话剧《7月6日》又普遍上演。该剧借1918年列宁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批评，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影射攻击我党“好战”。为此目的，剧作者大肆歪曲历史真实和列宁形象，把革命战争的鼓舞者列宁描写成富有“人性”的“和平主义者”。

10月1—2日 第六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六次会议，讨论工业管理体制问题，具体贯彻苏共中央9月全会决议。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业管理机构体制改革和其他某些管理机构改革》的法令。

会议选举勃列日涅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利扬斯基被提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原科学院副院长弗·基里林、原科学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恩·吉洪诺夫(两人均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原石油开采工业委员会主席尼·巴伊巴科夫三人被提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基里林兼国家科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兼国家计委主席)；洛马克和鲁德涅夫两人被解除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洛马克的兼国家计委主席职务也被解除)，分别任有色冶金工业部部长和仪表制造、自动化工具和控制系统部部长。

10月4日 部长会议批准《国营企业条例》。这个条例适用于国营工业、建筑业、农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企业。其主要内容有：

企业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其财产：可出卖“多余”的机器设备、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原材料、牲畜、种子和其他物资；可

出租“暂时不用的”厂房、仓库、生产设备、运输工具；可用自己的“废剩材料”自产自销计划外的产品，所获利润全由企业支配；可用自己的资金搞计划外的基建和购买计划外的设备；可从企业资产负债表上自行注销“陈旧的”厂房、设备、运输工具和其它器材。

企业有权自行制定生产财务计划，招收和解雇工人，有权自行确定企业机构、编制、工资水平和奖金（建筑单位还可以自行确定工资基金），以及“无需上级批准的”产品价格或同订货者“协商议价”，等等。

条例还规定，企业实行一长制领导，经理对企业“负全责”，可“无需委托，即用企业名义行事”；经理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对企业的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或进行处分”。

10月8日 部长会议批准《建筑拨款条例》。规定广泛推行按完工项目进行核算的新形式，扩大银行同施工单位及建筑部门的信贷联系。对工作好的单位实行财政贷款奖励，对工作坏的单位给以制裁。加强银行监督。

10月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为执行苏共中央9月全会（1965年）《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通过了相应的决定：第一，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其中除改变工业管理机构体制的措施外，还确定了新成立的各部和其他一些国家管理机构的基本方针；第二，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规定国家计划要同企业的经营主动性正确结合起来，扩大它们的权力，按生产盈利和完成提供最重要种类的产品的情况来评价活动的结果。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把某些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问题交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解决。

10月13日 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部长巴索夫介绍沃罗涅日州、别尔哥罗德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国营农场实行全面经济核算的经验。说农场可支配全部利润，其中百分之五十用于扩大再生产，百分之三十用作奖金及文化公用设施基金，百分之二十为保险基金。场长有权自行制定生产和财务计划，确定生产项目、工资预算和劳动报酬，农场有权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有权买卖农具和辅助材料。巴索夫说，农场改行全面经济核算的问题已得到了“公认”。

10月14日 原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列夫·托尔库诺夫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原主编斯捷帕科夫调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10月16日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社论，说苏共中央1964年10月全会、11月全会、1965年3月全会和9月全会的决议，是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决议和苏共纲领中体现的总路线的进一步发展。

加托夫斯基在同期《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实行基金付费具有深刻意义，它意味着任何生产费用都应当经常用于取得收入，即一定的利息”，“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利息原则。但是要知道，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什么要把有效利用物资的原则让给资本主义呢？”

另外，沙科夫在10月17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9月全会“所实行的一整套措施的主要意义在于把领导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心转移到经济方法上去”。

10月22日 国家建委建设处处长马留根说，在基建工作中，已试验和将要推行以下新制度：

(一)用"工程定额价值"代替建筑安装总量指标来评价企业，现已在各地区的二百二十个建筑管理局推行。

(二)在四十个建筑管理局实行了只给企业规定投产和盈利率指标的制度，其他一切指标都由企业自行确定。

(三)莫斯科建筑管理局所属的二十七个单位推行只给建筑单位规定投产、利润和利润提成计划，其他指标由企业自行确定。

(四)在明斯克建筑管理局托拉斯试行工作人员定时报酬奖励制度。

(五)1966年将在一系列组织中推行成套的刺激制度，在企业计划、财务、物质奖励等方面，都将大大地扩大企业权力。

10月23日 《文学报》为1946年受严厉批判的反苏作家左琴科翻案。说左琴科的作品是苏联文学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今天仍然是起作用的力量"，吹捧左琴科是苏联"讽刺文学创始者，其杰作含义深刻、独具特色"。

11—12月

11月4日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批评一些地方领导人对去年取消对私人副业的"无根据限制"的决定不解释，不讨论，不进行必要的组织工作，不恢复工人和职员被"无根据"减少了的宅旁园地，不帮助庄员耕种宅旁园地，不给私养牲畜提供饲料和牧场等。批评他们仍非法地给农民规定出

售畜产品的任务，还阻碍他们把剩余产品运往州外。决议还规定向居民出售精饲料和拨给足够数量的手工农具。

11月11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说自1966年1月1日起，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乌拉尔和其他地区的许多企业将改行新的工作制度。将在1967—1968年完全完成这一过渡。

11月13日 高尔基州委第一书记米·叶弗列莫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

11月16日 农业部决定让几个国营农场在生产和财务方面完全独立自主。只给它们规定为期五年的出售农产品的固定计划。它们可以自行处理超计划的产品。销售产品所得的利润完全由它们支配。它们可以用利润来发展生产和进行基本建设，对优秀的工作人员进行物质鼓励。它们可以自己选定组织生产的体制，自己确定工作人员数目和劳动报酬的形式，并有权独立自主地开设附属企业，建立新部门和发展对它们有利的手工业。在国营农场以前要上报的一长串指标清单中只剩下了五项，其中最重要的是，执行国家交售计划的情况和盈利率的水平。

11月18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据苏联《党的生活》杂志文章说，最近三年内，因酗酒和侵吞公款等不良行为被开除出党的党员约有十万人。

11月19日 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波斯科诺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国家银行正在进行贷给企业以保证完成生产和财务计划所必需的全部资金的试验。

11月21日 《真理报》刊登利别尔曼的一篇文章，说“社

会主义利润”一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项“革命创造”。说“改革”发展的前景是:“取消给企业规定工资基金的限额”,“取消产品品种计划,从而在批发贸易的基础上组织供应”,“逐步增加交给企业用于物质鼓励的那部分利润”。说“这是向最高类型的计划经济过渡”。

11月22日 《经济报》编辑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科学院经济部联合举行“经济规律和经济领导、目前条件下的经济宣传”的科学讨论会。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经济学副博士斯捷帕科夫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应当更坚决地宣传9月全会决议,提高利润的作用是全会决议的重要内容之一。说“难道物质关怀不正是提高劳动人民的熟练程度,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接近,提高劳动生产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的因素吗?”他还说,“我想再重复一下:需要、而且非常需要用卢布来教育人”,要“看到钱币的两面,既要看到表示币值的一面,也要看到画着苏联国徽的一面”,“目前围绕着建设新世界的经济问题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已达到尖锐程度,这是敌人射击的靶子,利润问题是反共意识形态的主要进攻目标之一,要坚决揭露敌人,不应处于防守”。

11月24日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阿法纳辛科说,“苏联学校和全体教师最重要的任务是:改进整个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加强各科教学的政治思想性,还应当坚决改进学校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工作方法”,“加紧用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规范的要求的精神教育学生”。

11月 从上月底至本月内,军方有几起重要人事变动:

伊·雅库鲍夫斯基接任基辅军区司令，原军区司令科·科谢沃伊上将被解职；

斯·索科洛夫上将接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原军区司令姆·卡扎科夫大将则接替普·巴托夫大将任华沙条约国联合部队总参谋长；

斯·马尔亚赫因接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原军区司令弗·佩尼科夫斯基大将被解职。

12月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作的《关于苏联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财政部部长瓦·加尔布佐夫作的《关于苏联1966年预算》的报告，以及勃列日涅夫作的《关于把党和国家监察机关改成人民监察机关》的讲话。全会就所讨论的问题通过了相应决议；补选了谢尔比茨基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委员、苏共中央组织工作部部长伊·卡皮托诺夫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

12月7—9日 第六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七次会议。两院分别听取了关于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的报告。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在报告中说，1966年是工业转为新体制的第一年，在推广新计划制度和经济刺激中要大步前进。从1月1日起将有一批企业改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下半年将在一些工业部门推行新批发价格。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在报告中宣布，“在新的计划工作和生产刺激的条件下，利润将成为评价企业活动的极其重要的指标之一，将成为建立物质鼓励、社会文化措施、住宅建筑和发展生产的基金的来源”。“在为改善产品质量的斗争中，现在要广泛利用经

济刺激。允许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提高批发价格。”从1966年起“将实行向农庄征收所得税的新法令”,“逐步实行固定生产基金和流动基金付费”，“把交付安装前的设备费用由预算拨款改为贷款”,以“加强卢布监督”。

会议解除了米高扬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米高扬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波德戈尔内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会议还解除了谢列平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

会议在通过的一项法律中，决定把党和国家监察机关改成人民监察机关。这项法律说,这样做是“为了广泛吸引劳动人民参加检查和监察事务，并提高他们在监察机关工作中的作用”。这项法律确定,“苏联人民监察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州、民族专区、市和区的人民监察委员会，以及设在农村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军队的人民监察小组和人民监察岗,都是人民监察机关。”这项法律还规定，苏联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等人也是政府成员。

原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科瓦诺夫（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被任命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

12月16日 《真理报》载文谈民族问题：说“我们有时会遇到不成熟的人：他们把地方利益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打算从大锅里多捞点，在共同出力时少干点，主要按民族特点来挑选干部”。“共产党员的使命是坚决反对地方主义、民族局限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利沃夫的科学界尖锐地批评了某些为1918年建立的所谓西乌克兰共和国充当辩

护士的工作人员。”

《苏维埃摩尔达维亚报》12月19日也载文，说“在敌意宣传的影响下，人们意识中的民族主义残余复发了。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在某些庸俗的青年学生中，夸张地提出了与我们的意识形态毫无共同之处的问题，提出了贬低和污辱摩尔达维亚人民对我们伟大国家各民族的崇高国际主义情感和兄弟友情的问题”。“应当坚决制止把各民族干部对立起来的做法，制止个别人进行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攻击。”“把摩尔达维亚语和俄语对立起来的某些现象是存在的，这些现象不能不遭到坚决的谴责。”

摩尔达维亚党中央于12月22日举行全会，解除恩·阿·麦尔尼科夫的党中央第二书记和主席团委员职务，选举恩·阿·谢洛科夫为党中央第二书记。

12月22日 《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弗·斯捷潘诺夫被降为编委。该杂志的编委阿·叶戈罗夫升任主编。

12月25日 部长会议决定，“在今后几年改行对集体农庄发放直接银行贷款”。“苏联国家银行将从1966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实行对集体农庄发放直接银行贷款的广泛试验。在改行对集体农庄贷款的新制度之前，国家银行必须以采购机关的名义根据订购合同向集体农庄提供预支现金。将向集体农庄提供短期贷款用于支付季节性生产资金的不足，包括庄员劳动报酬的现金部分”。

12月28日 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列宁格勒军区党代表大会上说，“必须进一步缩短部队和分队投入战斗准备的期限，改善对官兵进行防御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训练”。“我

们的任务在于，今后尽量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和军队经常的战斗准备。”

12月30日 根据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决定，从1966年1月1日起，农村地区糖、糖果、点心食品、棉织品、针织品和其他商品的国营零售价格将下降到城市里现行的零售价格水平。并将按对工业及其他需求者的现行批发价格向各农庄出售汽车、拖拉机、拖车及农业机械等，轮胎、电力设备的批发价下降百分之二十，拖拉机备件批发价下降百分之十。

12月31日 部长会议决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轻工业、食品和肉食奶品工业、黑色和有色冶金业以及建筑材料工业的一批企业，开始实行经济改革的“新体制”。据《消息报》1966年1月30日报道，第一批十七个工业部的四十三个企业，将于最近三个月实行新体制，国家将为这些企业确定物质奖励和社会文化设施、住宅建设和发展生产基金的利润提成额，规定固定生产基金和流动资金的付费额。第二季度将有另一批企业实行“新体制”。

12月 《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二期刊登奥尔洛夫的一篇文章，说“党坚决摒弃把政治看作经济的统帅、认为政治只对经济发号施令而不考虑经济的现状和需要的观点”。

12月 经济学副博士鲍伊科在苏维埃农场部等组织的一次讨论集体农庄劳动报酬的全苏会议上作关于集体农庄劳动报酬的主要报告。他说，“对集体农庄主席实行没有深思熟虑的固定劳动报酬制度和补贴劳动报酬制度，往往使农庄主席的劳动报酬和普通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相差二十倍，或者更多”。

12月 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苏联人民战斗的先锋队》的小册子，介绍苏共组织情况，其中谈到：

（一）党员人数：现有党员（到1965年）一千一百七十五万八千一百六十九人，其中百分之四十二点八是二十大以后入党的。1941年前的党员仅占百分之十点九。社会成分：工人党员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十六点五，职员和学生党员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二。专家党员共有四百零六万三千人，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六。年龄：三十岁以下占百分之二十点九，三十——四十岁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一，四十——五十岁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八，五十岁以上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二。

（二）地方党组织情况：共和国党中央十四个，边疆区委七个，州委一百三十三个，民族专区委十个，市委七百三十八个。

苏斯洛夫6月间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从1961年底起，苏共党员增长了二百万人以上。仅1964年一年，就有八十八万人被吸收为预备党员，其中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三，农庄庄员占百分之十五点一，职员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六。在职员中，百分之七十二是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专业人员、教员和医生。

1966年

这一年，苏修叛徒集团对内政策的特点是，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从舆论到实践，竭力加强资产阶级专政。3月底4月初举行的苏共二十三大，重申苏共二十——二十二大的路线，把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全面复辟措施肯定了下来并在人事方面加以调整。勃列日涅夫等反复强调要“大力加强国家纪律、党内纪律和劳动纪律”，“大力加强法制”，要求“无条件地执行法律”。7月，成立联盟—共和国社会治安部，决定在国内最大的城市增设专门的摩托化民警部队，扩大民警的权力。最高苏维埃颁布了《关于对流氓加强处分》的法令。12月，又通过《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决议。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继续试验和推广各种复辟措施，一系列军事建筑组织也开始试行《国营企业条例》。

勃列日涅夫集团开始修改赫鲁晓夫的战略思想，强调苏军要“保证不仅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而且在只是使用常规武器的情况下粉碎敌人”。海军总司令宣称，苏联“海军成了真正远距离行动的进攻性军种”。

这一年，苏修大力发展同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关系。7月，华沙条约国在布加勒斯特开会，通过了“加强欧洲和平与安全”宣言。10月，苏修无理要求我全部留学生回国。

1 月

1月1日 部长会议国家和劳动工资问题委员会及工会中央理事会决定从1月1日起对工业企业、建筑企业、交通运输事业和公用事业、地质勘探业等工作人员实行节约燃料、电力和热能的新奖励制度，规定每季度发给一个人的奖金总数可达月工资率的百分之七十五。领导人有权批准颁发和扣除奖金。

1月5日 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今后将由银行对集体农庄直接贷款，并从1966年起，开始在全国实行广泛试验。

决议规定，在改行这种新制度之前，国家银行必须以采购机关的名义根据订购合同向集体农庄提供预支现金，并提供短期贷款用于支付季节性生产资金的不足，包括给庄员的劳动报酬。国家银行还要向集体农庄提供长期贷款，用于购买牛和建设农庄的住宅、浴池、保育机构及其他文化生活设施。

1月7日 《真理报》报道，1966年第一季度，已经有四十三个大型企业，其中包括机器制造、黑色和有色冶金、化学、石油加工、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等企业，改为按新经济体制工作。国家给企业规定的指标数大为减少。如沃斯克列先斯克化学联合工厂，以前"从上级接到三十多项指标，现在只有七项"。1966年上级对该企业"只规定了工资基金总额，编制和工作人员人数由企业自行确定"。

1月9日 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把五家汽车场试行

的完全自负盈亏的"经验"，推广到各加盟共和国的许多汽车场和列宁格勒市及该州的全部汽车场。决议规定只给货运汽车场规定利润计划、上缴预算额和工资基金；给出租汽车场只规定利润计划、上缴预算额和出租计划。车场领导人可自行确定其他指标和奖励制度等。

部长会议还决定，1966年在轻工业、食品工业、肉类和奶类工业企业里，用提成的利润来建立试制新产品基金，以奖励试制新产品和改进原有产品的工作人员。

1月14日 《红星报》载文纪念1937年被镇压的伊·乌鲍列维奇，说他是"国内战争中的一位杰出的统帅和伟大的军事家"。

1月15日 苏联开始采用"新型订购合同"收购农产品。"新型订购合同"不仅规定采购产品的范围，而且规定产品送往加工企业的期限，如果农庄、农场违背交售产品的期限，则要受到物质制裁，即向采购者交纳罚金，其数为每逾期一天付产品价值的百分之零点一；如果采购人拒绝接受或不按期接受合同规定的产品，则必须交纳违约金，其数为拒绝接受或不按期接受的产品价值的百分之三，并赔偿运费。

1月18日 《红星报》刊登国防部副部长阿·纳·科马罗夫斯基(负责建设和部队营房配置工作)答该报记者问，说打算在1966年在一系列军事建筑组织试行《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我们的工厂和联合企业遵守民用企业所遵守的那些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则，并享受同样的权利"。"上级只确定这样一些指标，投入生产的项目、利润计划和预算中的利润提成数额。其余的指标——建筑安装工程量、劳动生产

率、成本的降低、工作人员人数等等，则由建筑安装组织领导人自行确定。对建筑人员工作的评定，将只根据最终的结果：投入生产的项目，以及考虑到产品质量的赢利率。”建筑工地领导人有权将预算提成后剩余的利润作为对职工的物质刺激等项。军区和舰队司令从1966年起将根据中央批准的基建计划独立确定建筑内部的工程项目。

1月25日 苏联成立一个制定新的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的委员会，由勃列日涅夫担任主席。

1月30日 《真理报》刊登茹科夫、《历史问题》杂志总编辑特鲁哈诺夫斯基和雄科夫的文章，说苏共二十大后许多历史学家“在克服严重的缺点的过程中犯了一些新的错误，主要是主观性质的错误”。“党和人民揭露个人迷信这一同马克思主义非常格格不入的现象，是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的。”“但是，遗憾的是，在这一工作中也出现了反映在历史学家某些著作中的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主观主义影响。‘个人迷信时期’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术语得到了传播。运用这一术语、夸大一个人的作用，有意无意地造成贬低党和人民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英勇努力，造成历史的贫乏。”

西方通讯社报道，斯大林著作十年来于最近第一次被列入党史必修课的推荐书单中。2月7日，莫斯科电视屏上两次出现了斯大林的形象。

1月 《经济报》第二期报道，全苏学术会议提出在工业中对发展新技术进行经济刺激的建议：在科研和设计部门推行经济核算原则，给这些部门规定利润指标，扩大它们对财务、计划和工资等方面的权力，提高对新技术的奖金数额。

年初 俄国反动作家安德烈耶夫的剧本《我们生活的数日》被搬上舞台。《苏维埃文化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重见天日》的文章，吹捧该剧是"复活过去、召唤将来的光辉的革命戏剧"。

2 月

2月5日 塔斯社报道，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巴·穆拉江为亚美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2月10日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说，在苏联，离婚手续已经修改，比过去大大简化和加快，而且省钱。现在已经规定，人民法院只经过第一审就准许离婚。结婚不到一个月就离婚的占离婚总件数的百分之八点三，在一年内离婚的占离婚总件数的一半。

2月10日 莫斯科法庭公开审讯作家安·西尼亚夫斯基和尤·达尼埃利。他们的"罪状"是：对苏联的政策持敌对立场，将作品非法寄到国外用假名出版，犯了反苏宣传罪。

宣判结果，西尼亚夫斯基（笔名阿勃拉姆·捷尔茨）被判处在严格劳动改造营监禁七年，达尼埃利（笔名尼古拉·阿尔扎克）被判处在严格劳动改造营监禁五年。

2月12日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把更多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转交俄罗斯联邦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各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各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各州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执行委员会解决》的决议。

2月13日 苏联元帅崔可夫对《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

说，苏军“清醒地估计和不缩小火箭核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已成为全国和真正全民事业的民防在目前条件下具有极大的意义。现在，只有武装部队和民防的经常协调动作，才能取胜”。“应当永远记住，一旦发生火箭核战争，全体人民几乎都得参加”。

2月18日 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巴季茨基在建军四十八周年招待会上说，“现在每四个军官中就有一个受过高等军事教育或专门教育。全部军官中约有一半左右是军事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百分之七十以上应征的青年具有某种技术专长。

另据《莫斯科新闻》3月5日报道，“到1965年1月1日止，享有硕士学位的党员和候补党员有六万三千多名，享有博士学位的党员和候补党员约七千名。”

《政治自修》杂志第二期载文，说“格鲁吉亚二百二十一个党的州委、市委和区委书记中，有二百一十七个具有高等教育水平”。

2月19日 格列奇科对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军事科学的出发点是：在战胜敌人方面，陆军、防空军、空军、海军的作用将是巨大的。只有以联合的努力才能迫使敌人投降。但是，无论军队装备有多么可怕的武器，而战斗的胜利最终将由人来决定”。

2月20日 报纸公布1966—1970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指示草案。说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发展农业、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刺激》的决议，决定着今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方法”。“最迫切的任务是不容许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完

成五年计划“将有助于进一步确定和平共处原则”，使“苏联在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中达到更高境界”，“将对加强世界革命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2月21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因犯败坏苏联公民名誉罪”剥夺作家瓦列里·塔尔西斯的苏联公民权。说塔尔西斯是充满反苏情绪的“作品”的作者。他已到伦敦去了。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塔尔西斯说，他是一个秘密青年联盟的主要作家，是苏联出版的一切地下文学刊物的“实际编辑”。

2月23日 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公开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条件下，苏联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力加强防御能力”。“不应当过低估计现存的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2月23日 别尔戈罗德州农庄合办的建筑联合公司理事会主席安皮洛夫在《农村生活报》发表文章，说“农庄合办的建筑组织表现了它的生命力，能够象国家托拉斯那样进行农村建设”。“把农庄合办的建筑联合公司纳入国家统一的物资技术供应系统中”“会对共同的事业有很大的好处。”

2月28日 《真理报》报道，阿塞拜疆党中央全会选举阿洪多夫为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

2月 政治书籍出版社印行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改编的第三版《列宁传略》。书中十四次提到斯大林，其中有八处是攻击斯大林，有几处是正面评价斯大林。攻击的内容是：斯大林1906年“维护”“分田派”的错误观点；1917

年在和平问题上“支持”临时政府的压力政策；六大时对资产阶级要列宁出庭这件事抱有“幻想”；1922年建议将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及其他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地位合并到俄罗斯联邦；1923年列宁“批评他粗鲁、任性、不忠实”；列宁逝世后，“破坏了党的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滥用权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大规模镇压”。正面提法是：1912年选出斯大林等坚强和英勇的中央委员；1917年10月选出斯大林等组成的军事革命中心；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家和大组织者领导了反托洛茨基、右派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斗争。

2月 据《经济报》第六期报道，根据官方对《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的解释，发生以下情况时企业行政领导可解雇职工：

(一)“当缩减机构、企业停办或部分停办时”。

(二)“企业临时性停产，超过一个月以上，不能为职工找到适当工作，或本人不同意调动工作时”。

(三)“经常不履行或不认真执行自己职责，工作能力不高，不胜任担负的工作，不能完成固定工作者”。

(四)“在特殊情况下，领导对管理物资的工作人员丧失信任时”。

(五)“无正当理由整天不上班的旷工人员(酒醉上班的工人和职员也视为旷工)”。

(六)“因临时丧失劳动能力，两个月没有参加工作的人员”。

2月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载文，说现在“对

战争的政治领导的要求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在存在火箭核武器的情况下，政治引导作战行动以及影响武装斗争的进程和结局的可能性正在大大增长。”

“党在给予火箭核武器以头等重要的作用的同时，还指出了这类武器和其他类型的武器相结合的必要性，并且要求对此保持应有的重视。苏联武装力量应当作好准备，以便保证不仅要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而且在只是使用常规武器的情况下粉碎敌人。”

“党批驳了在不久之前还存在的那种对军事建设的某些问题所作的专横、主观的判断，它反对低估空军和海军的作用。”“党认为战略火箭部队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考虑到，祖国的安全和战争的胜利，将要由武装部队所有军种的努力来保证。所以，党经常关心在最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和谐地发展和完善国土防空部队、陆军、空军和海军。党根据时代的要求，也采取了措施来制订更完善的领导部队的形式，加强中央对武装部队的管理和在党的基础上的一长制。”

“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进一步完善国防工业的管理。”

“最近几年，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对陆海军党组织的结构进行改组，因而使党的工作有可能同全军人员接近，加强了党对部队的直接影响。”

3—4月

3月3日和4日 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斯捷潘诺夫在《消

息报»发表一篇文章，说"许多来信要求编辑部解释公有制、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个人所有制与私有制不同，它只供它的主人或其家庭的个人消费，不可能用于谋取暴利、发财致富和赚钱。""私有制在我国已经消失，尽管在法律上允许有依靠个人劳动而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私有经济。"

文章说，"有一些时候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言论：必须压缩私人副业，理由是它会助长私有制的倾向，转移对公有经济的注意，损害公有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说，集体农民可以在集体农庄廉价得到必需的产品。但是限制私人副业的行政措施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巩固公有经济，缩减集体农庄的贸易，却使对集体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农产品供应恶化，因之有利于投机商人"。"在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私人副业是必要的，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应有自己的地位，应帮助公有农业发展。当然，私人经济……可能助长私有制倾向的复活。但是，私人经济的这些缺点比它现在在帮助巩固社会主义所带来的益处，要少得无可比拟。""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有意识地允许的，而且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一直存在着。因此，私有制倾向复活和滋长的危险性是极其有限的。"

文章说，"有些读者在信中询问，是否到了使所有的住宅建筑公有化和结束象他们所说的'这种私有财产'的时候了"，"他们认为，私有财产的这种危险祸害妨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斯捷潘诺夫解释说，"住房和别墅不是属于私有制，而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合法的私人财产"。"根据苏联宪法，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包括住房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文章还说，“社会主义社会全体公民的个人劳动，是私人财产产生和形成的源泉，对他们来说也是唯一平等的源泉”。“在苏维埃社会，‘我们的’和‘我的’概念并不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3月5日 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康德拉齐耶夫和党委书记凯利莫夫等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谈“对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经济刺激问题”。文章认为，“在大型高等院校里可以成功地运用象业务独立性、物质利益和物质责任这样一些经济原则”。“高等学校越来越具有现代工业企业的特点”，“应当是，学校的领导人为了整个工作的利益能够调配人员、材料和资金。”“应当缩减评价高等学校工作的计划指标的数量。它们工作的最后结果（整个的和各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的人数）、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国家对完成这些工作的开支，应当由中央计划。其余所有计划指标可以由校长办公室决定”。“如果校长有权自行确定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和合同工资，有权在工资基金范围内并依靠工资基金确定编外人员工资基金总额和实行兼职补加工资，那么这只会有助于更加合理地使用资金。”“出版社、印刷厂和科研实验室这样一些单位，运用企业所采用的物质刺激，也是适宜和可能的。”

3月上旬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斯图鲁阿在格鲁吉亚党的二十三大上说，“批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所付出的代价表现在，这种批评给反共宣传的某种积极性提供了材料。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主要注意力，曾经一度放在反映以斯大林为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时我们社会生活的阴暗面。这个包括建成社会主义、苏联人民对法西斯德国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胜利和战后争取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文化的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时期，被称之为‘个人迷信时期’，这在客观上贬低了和实际上辱骂了苏联人民在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多年的英勇斗争。某些过分积极的批评家，企图打着反对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的旗帜，来恢复托洛茨基主义、右派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存在于我们党内的其他反列宁主义的思想倾向”。“某些历史学家毫不费力地从一个劲儿的颂扬转为严厉的批评。他们在作品中歪曲为工业化、集体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革而进行的斗争。他们不是把党和人民在实现这些真正革命改革中的成就提到第一位，而是把在我党这个复杂时期中存在过的缺点、漏洞、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放在第一位。近几年来，某些可悲的政治家认为，人文科学已经过时了，现在，放在前面的仅仅是那些同物质生产直接有关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和其他精密科学。”“应当说，可敬的格鲁吉亚的历史学家、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他们对这一极其困难和复杂时期却一点也不感到恐慌和棘手。”

《乌克兰真理报》3 月 12 日载文，对所谓“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作了类似的表述，并说“苏联进入新时期(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要求解决一些理论问题。在斯大林的联共 (布) 中央总结报告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关于国家在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命运问题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按：指苏共十八大) 指出，在存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国家不能消失。代表大会谴责了收缩和削弱国家机构的错误观点”。“苏联政府在缔结这一条约(按：指 1939 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明

白，法西斯德国不会不破坏它。但是，由于签订了条约，我们就使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苏联政府对外政策的这一英明步骤，使我国赢得一些时间来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在战争危险增长的情况下，党的整个对内政策都服从于准备国家的防御和加强国家的经济潜力的工作。”

此外，英国报纸3月25日报道说，据东欧消息，一批苏联军事领导人，包括几位元帅，写信给苏共领导，要求在二十三大上“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名誉”。这是有影响的苏联公民在二十三大前夕向党的领导所作的第二次交涉。法新社说，苏联二十七名知识分子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在二十三大上“不要恢复斯大林名誉”。

3月11日 《真理报》报道，亚美尼亚党中央3月全会选举共和国原部长会议主席科钦扬为党中央第一书记。西方通讯社，原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扎罗比扬于2月份被清洗。党中央的五个书记中有四人被撤，这“同反对莫斯科的指挥有关”。

3月12日 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联合决议，要在企业里每年签订一次“集体合同”，说“集体合同是确定工会和行政相互关系的基本法律文件”。

3月15日 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乌克兰党的二十三大上作总结报告，说“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兄弟团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我国各族人民之间寻找不存在的矛盾，并且竭尽一切努力来恶意抨击列宁的民族政策和十月革命的宏伟成果。为了达到这种肮脏的目的，帝国主义宣传还利用了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背叛了信仰和真理，去为帝国主义服务。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应当更加不调和地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宣传企图在社会主义各民族之间散布不信任情绪和通过复活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残余的途径来破坏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

3月19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为了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选举三十二名民族院代表”(按：原为二十五名；这个法令是在十三个加盟共和国最近召开的党代会上提到民族主义这一问题之后发布的)。

3月 《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为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翻案，说过去对她的批判是“极为不公平的、粗暴的攻击”，说她写的诗是“民族诗歌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伟大俄罗斯诗园中一株有生命力的新枝”。说“她的诗是纯粹地球上和人体中客观存在的现实”(按：在斯大林时期，日丹诺夫曾斥责阿赫玛托娃为“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说她的诗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的诗歌”)。

3月29日—4月8日 苏共举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苏共中央总结报告，柯西金作了《关于1966—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指示》的报告。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说：“苏共遵循党的二十——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以往几年的总结证明，苏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在苏共中央3月全会和9月全会上，制定了领导经济

的新方法，确定了党在我们当前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加强国民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方法和经济刺激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国家计划工作，扩大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经营上的独立自主和主动精神，提高生产单位对自己工作结果的责任心和从物质利益上的关心。”“工业管理新体制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使新建立的集中的部门性的管理机构同大大扩大了的各加盟共和国、企业和联合公司的权力，以及同加强领导经济的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是以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酬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这种社会经济形态必须以经济刺激的作用、物质利益上的关心和吸引千百万劳动群众参加对国家经济生活的领导为前提。”

“苏共中央确定了新的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这项任务就是：在尽量利用科学技术成就、利用整个社会生产的工业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在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进一步大大发展工业和以稳定的高速度发展农业，从而达到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充分地满足全体苏联人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新的五年计划的重要特点是，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同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大为接近。”

“发展农业生产力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社会关系。”提出“我们是否值得在各区、各州、各边疆区、各共和国以及中央建立经选举产生的集体农庄一合作社机构”。

“苏共现在有一千二百四十七万一千名党员和预备党员”。

“苏共组成情况（1966年1月1日，按百分比）

(1)社会地位：		(2)党龄：	
工人	37.8	10年以下	47.1
农民(农庄庄员)	16.2	10年至30年	47.3
职员及其他	46.0	30年以上	5.6

(3)年龄：		(4)文化程度：	
25岁以下	6.2	高等学校毕业或肄业	18.2
26岁至40岁	46.8	中等教育	30.9
41岁至50岁	24.9	不完全中等教育	27.5
50岁以上	22.1	初等教育	23.4”

“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要求全力加强党内纪律。”“对那些违反党和国家纪律的人，对那些忘记自己的党员义务却认为党籍应当给他以某些特权的人，不要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必须从上至下地把所有党的机关的注意力集中在挑选、提拔和教育干部，检查党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和完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这样一些主要的方面”。“要提高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党的机关中的各种委员会在监督党员遵守党和国家纪律方面的作用。”

“我们党一向认为培养社会所有成员的自觉纪律是首要任务。加强劳动纪律，要求无条件地执行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和规则，……是发展和扩大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先决条件。”“党的任务是要经常加强党和国家所有环节中的高度纪律性和组织性。”

“党今后仍将全力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增加苏联武装部队的威力，使军队的战斗准备保持在能可靠地保障苏联人民从事和平劳动的水平上。”

柯西金在报告中说，“考虑到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不得不增加国防开支”。

“七年计划的个别计划所以没有完成”，还由于“七年计划中所发生的错误和失算。这特别牵涉到农业和工业的某些部门。这些失算由于对解决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采取未经周密考虑的唯意志论的态度而加深了，结果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必要的比例遭到破坏。在一系列的情况下，规定了经济上没有根据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新的五年计划中，某些部门到1970年的任务规定得比原先拟定的低一些”。

大会分别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部分修改苏共党章》的决议，其中规定设中央政治局来代替中央主席团，设中央总书记来代替中央第一书记。党章还增加了在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中央可根据需要召开全苏党的代表会议的条文。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在苏共党章中继续保留确定更新和更换党的机关的成员和党组织书记的规则的条文，是不合理的。在党章中保留了这样的指示：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时，遵守系统地更新其成员和领导继承性的原则”。在章程的序言部分增加了“党把违反苏共纲领和党章以及本人的行为损害了共产党员崇高称号的人开除出党”的条文。

大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共十一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谢列平、马祖罗夫、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佩尔谢（按：原

主席团委员中，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落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八人：杰米契夫、格里申、姆日阿瓦纳泽、拉希多夫、乌斯季诺夫、谢尔比茨基、库纳耶夫、马谢罗夫（按：原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叶弗列莫夫落选）。书记处十一人：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谢列平、基里连科、杰米契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鲁达科夫。

上述政治局委员中，有苏共十九大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一人（苏斯洛夫），候补委员两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上述书记处中，有十九大的书记处书记两人（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二十三大选举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五人，其中十九大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四十九人，二十大的中央委员三十三人，二十二大的中央委员八十五人，新当选者二十八人。二十三大的一百六十五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者九十三人。

在大会上，与我毗邻的滨海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发言中要该边疆区"更加提高政治警惕性，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政策，提高苏联远东边界的国防能力"。叶皮谢夫在发言中说，"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有时能对苏联某些不够觉悟的成员产生腐蚀作用"，要"加强纪律"。

4月15日　拉脱维亚党中央全会选举阿·沃斯为拉脱维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以接替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阿·佩尔谢。

4月19日　塔斯社报道，"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所有集体农庄从1966年起都实行货币报酬。苏联国家银行第一次在摩尔达维亚实行向所有集体农庄直接贷款的制度"，"现在，银行贷款不仅仅用于生产需要，而且也用于支付劳动报酬"。

4月21日 《红星报》刊登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列宁格勒海军基地司令伊·巴伊科夫海军上将等的一封信，批评《新世界》杂志发表卡尔金的文章造谣"阿芙乐尔号"没有打炮，只发出唯一的一声空炮等，企图怀疑历史，侮辱苏联爱国者最神圣的东西。还批评贝科夫的小说《死者不痛苦》歪曲现实，侮辱苏军，贬低苏军的胜利。

4月28日 塔斯社报道，利别尔曼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再次驳斥一些参加经济辩论的人说他'伤害'集中计划原则的种种责难"。他鼓吹必须使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得到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保障"，"建议成立一个领导改革的总部，这个总部将有助于改善企业同自己的部的相互关系。"

4月 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斯基在《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七期发表文章，说"过去，战斗行动的结果是各方在作战地区互相消灭武装力量。在现代条件下……对于载有核弹头的火箭来说，布满军队的战线并不是障碍，距离在实际上也不起作用。……通过核武器同时打击生活中心和武装力量已经成了进行火箭核战争的基本方式了。战略火箭部队现在是主要的和最可靠的力量"。"过去，以陆军为主力的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是战略行动的基本方式。在火箭核战争中，提到首位的却是完全新的战略行动方式——用战略核力量打击敌人的军事目标、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即战略火箭部队、原子导弹潜艇和远程飞机的行动。国家防空部队捍卫国家和武装力量不受敌人核打击的行动将成为主要战略行动形式之一。"

5—6月

5月17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建议集体农庄从1966年7月1日起实行对集体农庄庄员的有保证的劳动报酬(现金和实物)。在确定这一报酬时将以对国营农场工作人员规定的生产定额为依据。"发现金一月不少于一次,发实物的时间要由所得产品的情况来定。党中央和政府建议集体农庄要根据最后成果——产品质量和数量或农庄全年收入来支付劳动报酬。"

5月19日 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授奖大会上说,滨海边疆区"对全体苏联人来说是特别可贵的。苏联的滨海地区,是具有英雄历史的土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颂扬着俄国人的勇敢、大胆和爱国精神"。"滨海地区在我国地图上占有某种特殊的位置。""滨海边疆区今天得到的奖励(按:指勃列日涅夫5月18日向该区颁发的列宁勋章),也是对陆海军士兵、军士、军官和将军在履行军人职责时表现的勇敢精神和高度爱国主义的奖励。"

勃列日涅夫5月21日还"参观"了太平洋舰队。(按:塔斯社报道,波德戈尔内6月1日向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颁发了列宁勋章。)

据西德报纸报道,继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之后,每天几乎都有部长和将军在远东边境地区出现。"勋章象雨点般地落到边防战士身上。"

5月中旬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善支援陆

海空军志愿协会工作»的决议。决议说，“在帝国主义侵略性越来越增长的情况下，必须重视进一步加强我国防御能力的问题。群众性的国防工作的水平还不符合这些要求”。

5月21日 «劳动报»在答读者问中透露，根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3月18日«关于集体园艺»的决议，从国有土地、国营林业和辅助农业的空闲地中拨出土地作“集体果园”，如果缺少这种土地，征得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同意，可从它们的产量低的用地中拨出。“集体果园”的参加者，由企业行政协同工厂党委审查申请书并批准。决议规定：每户可分得六百——八百平方米(折合零点九——一点二亩)土地供私人使用。

5月25日 合众国际社报道，«消息报»5月24日载文颂扬1938年被镇压的前乌兹别克总理法·霍扎耶夫。西方通讯社并说，三年前，已为在斯大林之前担任过苏共书记的克列斯金斯基恢复了名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已不再被称作叛徒和间谍。

5月25—2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土壤改良工作是我国建立稳定的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的报告，说“土壤改良是现在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了解并且向全党、全民肯定地说，这不是一个暂时的运动，这是一个农业方面的长期规划，是要求付出巨大努力和不少投资以及物质技术材料的规划”。说要“制定一个为期十年的土壤改良规划”，这个规划“应该包括国内所有地区”。

勃列日涅夫承认最近几年来“在许多没有开垦生荒地的地区的耕地面积缩小了。大量土地由于管理不善变得不适于

耕种了。出现了把这些农业用地报废交给国家处理的倾向”。说“有人提出了关于必须通过一项土地使用法的建议。我想这一建议是值得支持的。在这项法律中，应当规定一个制度以及所有的组织对正确使用土地的责任”。批评“同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各工业部领导人都没有要求在全会上发言”，“部长们在这样的会议上不应沉默”。

全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相应决议。

5月27日　《共青团真理报》刊登该报记者一篇文章，鼓吹“让集体农庄主席自己去高等学校挑选农艺师、园艺师”，“也给高等学校毕业生选择的权利”。文章说，农庄主席去高等学校“相亲”、“建立私人接触”，“会谈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农庄答应为未来的专家提供一切必要条件——住房、工资、甚至答应代找未婚妻，并立即发给大学生每月八十卢布助学金。大学生则保证毕业后在农庄至少工作三年。

5月　《经济报》第十七期刊登了《关于改行工业生产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企业的固定生产基金和周转资金付费上交预算制度的暂行办法》。

6月4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主管机关和财政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企图实行从前的行政方法，有时候形式主义地把陈旧的规章中的各点各条搬用到新的经济状况中来”。

6月8日　塔斯社报道，柯西金在选民大会上发表讲话，说“随着群众直接参加管理生产、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所有形式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到了新的、更高的高度”。“完善苏维埃民主同加强国家纪律和劳动纪律、加强一切生活领域里的

社会秩序，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苏联近几年来在加强社会秩序和法制、改善法院、民警局的工作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民警的人数增加了。”“如果认为，既然共产主义最终应当导致国家强制机关的消亡，那么现在就已经可以不关心加强社会秩序，就可以削弱对苏维埃法律的破坏者的强制措施或者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态度，那是不正确的。”

6月10日 塔斯社报道，勃列日涅夫在选民大会上发表讲话，说“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要求解决……许多任务”，“这就是提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作用。这就是完善所有苏维埃劳动人民代表的活动，……这就是使人民更充分地了解国内和世界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使大家更广泛地了解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这就是完善立法和加强法制。这就是同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切表现作斗争”。“人民政权不能对危害社会的人姑息，无论是流氓还是罪犯，无论是官僚还是懒汉，无论是寄生虫还是人民财产的盗窃者。他们在苏联社会里没有存在的余地。”

6月15日 商业部部长亚·斯特鲁耶夫在全苏商业和合作社工作人员会议上鼓吹“正确安排广告的意义”，说“必须根除单调乏味、毫无内容和不能吸引任何人的刻板的公式化的广告”。他还说，“苏联七万个商业企业从去年7月份起实行了仅仅根据两项指标——商品周转额和利润来进行工作和评定工作的试验”。

6月18日 吉尔吉斯共和国民防参谋长利特文年科在《苏维埃吉尔吉斯报》发表一篇题为《全民的事业》的文章，说“要向居民进行民防教育”。“我国各个城市和居民点，企业和

机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建立了民防组织。”

6月30日 财政部宣布，自7月1日起发行1966年国内有奖公债，利息为百分之三。二十年内将抽签开彩一百六十次(每年八次)。每次抽签将有九千四百张中奖，奖金为四十——五十卢布。公债证券由储蓄所自由售出和购进。1947年发放的同类公债证券，仍可自由流通和参加早些时候确定的抽签。

6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刊登姆·基姆的一篇文章，说“列宁把‘文化革命’这个概念用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就其使命来说是全民的，而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是以无产阶级的文化出现的”，“文化革命意味着创造这样的社会条件，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可以真正地获得文化，能自由地享受文化财富”。“文化革命史上可以划分三个基本阶段：初期阶段或苏维埃文化形成阶段，包括苏维埃时代的大概头十年；文化革命取得决定性成就和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阶段，包括后来的三十年；文化革命的结束阶段，即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及其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文化的阶段。”“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现在经历着全盛时期。正如苏共纲领强调指出的，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里的文化发展是‘伟大文化革命的完成阶段’。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创造必需的思想条件和文化条件的任务就在这个阶段完成。”

7 月

7月1日 立陶宛的“西格玛”计算和管理技术联合公司开始试行“经济核算制”，不仅所属企业，而且它们的管理机构也实行“经济核算”。该联合公司拥有部属总局的权利。

7月20日 《真理报》载文，说“集体性是共产党党组织的灵魂”，“集体原则是所有领导机关——从党支部到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基础，并且联结着党内关系的整个系统”。“共产党不是行政组织（因为行政组织中的关系是建筑在一长制原则之上的），而是以共同的目标、统一的组织原则、共同的责任感所团结起来的人们的自愿联盟”。“个别人，不管担任党的什么职务，都难免有主观片面性，难免会犯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错误。”文章说，“党委书记不是长官，他没有指手划脚的权利。他只是共产党员选出的集体领导机构的班长。他负有更大的责任。但在决定问题时，他和委员会其他委员拥有同样的权利”。（按：西方通讯社注意到《真理报》这个月内发表了好几篇类似的文章，认为这是柯西金派在攻击勃列日涅夫。）

7月21日和8月4日 《文学报》宣传：“卢布是衡量劳动荣誉的尺度”，“有赢利地工作是苏共纲领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营的根本法”，“利润是担任经营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最好鉴定”，“不想赚很多钱就意味着不想有成效地工作”，“卢布能教育人”，“手一放到算盘上就能更有益地说明精神的东西”，“口袋里空空如也的人是担不起无私的称号的”。说“我们无条件地尊重特高工资”，“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

立起来是小资产阶级概念”。

7月26日 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发表公告："为保障对社会治安机关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中的活动进行统一有力的领导，现成立联盟一共和国社会治安部。"“已通过的决议规定了加强同街道、体育场、公园、俱乐部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流氓行为作斗争的措施。国内最大的城市将增设专门的摩托化民警卫队，巡逻放哨以维持社会治安。民警人员在制止威胁公民健康和侮辱公民人格的犯罪行为方面的权力扩大了。规定了改进追查逃避审讯和法庭的人的措施以及加强同寄生行为作斗争的措施”。“为了加强对累犯行为的斗争，认为有必要根据已批准的条例让民警机关对从剥夺自由的场所释放出来的一定种类的人建立行政监督。将对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事立法的基本条款进行补充和修改，以便对那些由于犯有严重罪行已被惩处的人提假释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作进一步限制。”

为了教育违法乱纪的少年，“可设立社会教养院，并加强人民纠察队的活动”。

“规定：根据立法，公民为制止侵犯的罪行和不放走罪犯而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行为，并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其他责任，即令这些行动被迫使罪犯遭受损害”。

塔斯社9月17日报道，尼·谢洛科夫被任命为社会治安部部长(按：谢洛科夫原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

7月26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对流氓加强处分》的法令。

同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颁布了《关于对从剥夺自由的

场所释放出来的人实行民警机关的行政监督条例»的法令，并公布了该条例全文。条例规定，“受行政监督的人必须根据民警机关的传唤在指定时间到达，并对提出的问题作口头或书面的说明；在改换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以及由于公务需要而走出区(市)范围时要通知民警人员；由于私事经民警人员同意后到另一个居民点去并在那里呆一昼夜以上者必须在当地民警机关登记”。

7月30日 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海军成了真正远距离行动的进攻性军种，成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手段”。“强大的潜水艇队及其首领——火箭原子潜水艇是基本的打击力量。”

7月 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副主席拉丘特金在«经济报»第二十六期发表文章，说“在研究各经济区的生产和需求的平衡的基础上完善中央的计划工作，并结合这一点广泛发展生产资料的批发贸易，是适宜的”。“委员会已决定主要部分的产品(六千多种)不作集中分配。已直接委托我们的地方机关供应这些产品。”“供应机关正同各部一起研究关于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批发贸易的建议。现在在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乌克兰、莫斯科、沃洛格达、萨拉托夫等地区就已经有近三十家出售生产资料的小型批发商店。”“1966—1967年将开设二百多家这样的商店。”“供销部门改集中为分散地收购商品、原料和物资有相当大好处”。

7月 «十月»杂志第七期刊登哲学副博士阿尔托夫的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为了使学生好好学习，应当在学生中实行物质刺激。文章说，“在学习中应当有一定的、具体的刺激。

如果一个人看不到他的学习有什么意思，他就会以冷淡态度对待学习”。

8　月

8月2日　波德戈尔内在第七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说，“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的任务，要求在发扬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完善从地方苏维埃到最高苏维埃这整个苏维埃系统的工作”。“对负有报告责任的机关的工作以及对它们执行法律的情况实行监督，将在最高苏维埃活动中占越来越大的位置。”他强调了常设委员会的重要作用，这些委员会预先研究和分析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根据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执行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所有这些委员会“都是平等的，掌握立法主动权，可以向最高苏维埃、两院、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还说，常设委员会工作系统和组织工作的完善，“有助于进一步发展苏维埃国家组织的民主原则”。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第四期曾载文，认为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主席团没有权利指导常设委员会的工作和监督它们的活动。《消息报》于7月29日指责这家杂志的论点“不正确”，因为“这一切导致事实上限制主席团的权力，导致建立常设委员会对主席团的决议的监督”。

8月3日　柯西金在第七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作苏联政府关于国内外政策一些基本问题的声明的报告。他说：

“考虑到已形成的国际局势，我们应该继续采取加强我们国家的防御能力的一切必要措施”。

“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力求加速发展工农业的主要部门。”“现阶段经济政策的本质特点是，国民收入的积累部分将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发展农业和生产人民消费品的工业部门。这绝不意味着削弱对重工业的注意。将象以前那样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整个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的方针。”

“经济领导人和社会团体必须在加强劳动纪律方面做系统的工作，对于破坏纪律者、旷工者和生产废品者，除了教育措施外，还必须采取行政处分和经济处分的措施。”

经济改革“应当不断地普及到国民经济一切部门”。“有时候，在解决一系列有关经济改革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某种保守主义和惰性。”“应当坚决制止对事情采取狭隘的本位主义态度、形式主义的命令主义和上级对企业活动加以琐碎规定的做法”（按：在柯西金作报告后，《消息报》于8月5日和18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批评对待“经济改革”的“僵硬派和保守主义”，说“必须坚决克服这些人的僵硬态度”）。

8月20日　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于组织全苏农业社会主义竞赛》的决定，规定根据全苏农业社会主义竞赛结果颁发给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区的奖金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应该用于奖励农庄、农场的先进生产者、专家和领导人。

8月　米丁在《哲学问题》杂志第八期发表一篇文章（按：该文是根据6月份在苏联科学院哲学和法学部全会上的报告写成的），说现在，对于社会科学活动家来说，“特别重要的是

敢作敢为，批评多年来使某些‘公认的’定理具有不变性的许多论点，过去曾把逾越这些定理看作好象就是破坏所有各种‘原理’似的”。文章说，“同资本主义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社会主义不存在使社会分为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现象、倾向、过程，但是这些都不带有对抗性质，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把这些对立面合理地、协调地结合起来。个人和社会、集中和分散、计划工作和地方主动精神的表现、经济按比例的发展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优先发展，所有这些现象都能够、也应该通过执行正确的政策和正确地组织社会生活而互相结合起来。”

文章还说，“据不完全材料，在国内市场上，某些月份平均每天有七十万集体农庄庄员进行交易，每年花在销售产品上的时间约为两亿五千万人日”。

9—10月

9月4日 《共青团真理报》载文说，“把土地固定给一个人，把技术设备和经济核算权交到他的手中，使他的幸福取决于最终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的产品，这样，公共的就成为自己的，而自己的也成为公共的，劳动就将成为有意义的、愉快的事情”。

9月上旬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改进全国专家的培养和完善对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领导的措施》规定：“用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集中基金奖励高等学校的教授和教师创造和

采用新机器”，“委托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制订关于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规章草案，其中规定学校工作进一步民主化，扩大学校领导人的权利，给予他们在解决教学科学和经济活动问题上更大的独立性”。

9月　《农业经济》杂志第九期说，在阿塞拜疆“巴库工人”集体农庄，1965年农庄主席平均月报酬是一千零七十六卢布，总会计师是七百五十六卢布，总农艺师和总畜牧师各为三百九十一卢布。而在农田劳动的农庄庄员的报酬不超过三十八卢布。

10月1日　苏联开始实行纺织和针织品的新价目表。新价目表“消除了计划亏损品种，拉平了各种产品的利润率”。

10月6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公布一项决议，决定把列宁奖金由每年颁发一次改为隔年一次，但提高了奖金额，由原来的七千五百卢布提高到一万卢布。同时，扩大奖金的名额，增设一项新的国家奖金，得奖人数为六十人，其中文学艺术为十人，每一个奖的金额为五千卢布，每年颁发一次。

为了扩大奖励面，各加盟共和国也都设立了国家奖金。有的还设立了“列宁共青团奖金”，以犒赏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

这一年，一些反斯大林的作品被列入“列宁文艺奖金”候选名单，如叶夫图申科的长诗《布拉茨克水电站》，考涅楚克的剧本《一页日记》、电影《主席》等。

10月14日　《列宁旗帜报》和《莫斯科共青团报》刊登朱可夫的一篇回忆莫斯科战役的文章，说斯大林“为消灭敌人组织着人力和物力”，“他领导着国防委员会并统帅着人民委员

部，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组织了必需的战略后备和物资技术资源的工作。应该说，他以自己严峻的要求做到了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朱可夫在这以后又攻击斯大林“犯了战术错误，致使纳粹前进到斯大林格勒”。

此外，科涅夫于10月1日、4日、6日在《哈萨克真理报》上攻击斯大林在莫斯科危急时“没作任何决定”。而罗科索夫斯基10月18日则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关心莫斯科战局”，“对指挥官在严重局势下的处境很了解，因而善于用极其简短的几句话鼓舞士气”，“经常随之而来的是拨出各种物资和人员来加强部队”。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莫斯科电视台于11月5日映出斯大林1941年在红场阅兵的场面。布琼尼、朱可夫都著文称赞斯大林这次阅兵是“勇敢大胆的极好范例”。勃列日涅夫在格鲁吉亚称斯大林是1917年革命的一个创始人。

10月28日 苏联元帅崔可夫在《乌克兰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核武器是可以防御的！许多处于核爆炸区的人，都可以得救”。“但是还没有充分的保证使敌人的一部分大规模杀伤武器不达到目标”。

10月 《哲学问题》杂志第十期刊登格列泽尔曼的一篇文章，说“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之一”，“利益是人们活动的推动力”，“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给发现历史进程的实际动力提供钥匙”。“按照唯心主义历史观，思想动机是社会发展决定性的动力。”“在历史上曾经真正起过巨大作用并且使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的思想，从来没有离开过利益。”“意识到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社会思想史走向唯物主义历史

观的第一步。”“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被意识到了的利益在人们身上产生某种促使行动的动机，这种动机可以称为刺激。利益是引起人的某种愿望的客观原因，刺激是人们的利益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强调阶级利益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的决定性意义时，当然决不是否定社会利益的存在。有时可以碰到这样的意见：在划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社会利益，因为对立的阶级没有共同的利益。这种意见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在划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中，……社会利益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利益，这种利益首先在于替作为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害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社会利益在这里真正是组成社会的一切社会集团和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不能否认各社会集团——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特殊利益的存在。不考虑这种利益，或者在日常政策中、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忽视它，就会意味着损害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合作。”

9—10月　9、10月份以来，苏联报刊连续载文鼓励自由经营、自由买卖。《农村生活报》9月22日说，“自由地销售自己的商品产品的制度，最符合集体农庄生产的本性”。“给农庄、农场规定交售给国家的产品数量和结构的任务”，“正是计划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因素”。《共青团真理报》10月19日说，“使工业、农业、商业企业以及一切其他企业单位能够独立自主地建立它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那种工作制度，应当成为准则和常规”。《农业经济》杂志第十期说，“将来城乡商品交换中必然会出现等价关系。而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农

庄、农场向国家（国营的组织和企业）自由出售自己的产品是最有效的”。

11—12月

11月1日 边境地区青年纠察队员、共青团积极分子和边防军全苏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在会上发表讲话，并向在中苏边境抓到“间谍”的滨海边疆区纠察队员授奖。受奖人宣誓：“任何一个破坏者都不能通过我的地段”。团中央书记维齐罗夫在闭幕词中说，“在边防地区普遍建立人民志愿纠察队和少年边防队是共青团组织的最重要的任务”。

11月22日 《红星报》发表社论，说“陆海军的实力是直接取决于后方工作的，而在战争情况下后方可能遭到火箭核打击”。“因此，民防具有特殊的意义。”

12月4日 柯西金在法国外交协会宴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有些人甚至说，苏联有排犹主义。我国丝毫没有这种现象，也不可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些人想象的结果，他们企图以相应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因而采取十分卑劣的手段，对所谓有某种情绪的人做工作”。“至于说到家庭的团聚，如果某些家庭想会见，或者想离开苏联，那么他们面前的道路是敞开的，这里不存在任何问题。”“苏联不存在尖锐的民族问题，因为我国没有一个民族受到任何程度的歧视”，“所有民族，绝对是所有民族，在我国都是平等的”。“上述情况完全适用于犹太民族的公民。”

12月10日 《真理报》载文，说鄂木斯克州奥科涅什尼科夫区“金色田地”国营农场工作人员“想出了一项有意义的试验”：“把土地和机器固定给机械化小组”，“参加小组的是能出色操纵拖拉机、康拜因和国营农场其他一切机械的六个人。拨给小组七百公顷耕地、两台拖拉机、三台康拜因等机器”。区经济委员会要求农庄领导人大胆进行试验，并给予各种帮助。

12月12—1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就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通过了反华决议；还就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关于1967年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关于196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并增选索洛缅采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西方通讯社报道，《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12月13日载文，抱怨最高苏维埃目前差不多完全是一个盖橡皮图章的机构。文章要求在议会会议上展开讨论，而不只是让政府随意处理。

12月16日 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在最高苏维埃作关于1967年预算的报告，说“苏联部长会议责成各部、各主管部门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寻求增加出口商品的生产和改善质量的可能性。这就要加强各部和各企业对这件事情的关心。对外贸易联合机构也必须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精神，必须提高对外贸易的效果，保证积累必要的外汇储备”。他还谈到，“改行新制度的商业企业和组织已有七万多家。它们共拥有五十多万人”。

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作了关于1967年经济计划的报告，他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实行了纺

织品和针织品的新价目表。从明年1月1日起，其他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的产品也将实行新的价目表。从明年7月1日起，所有重工业产品应该实行新的批发价格”。

12月18日 《红星报》刊登费利德曼中校的一篇文章，说“部队经济活动拨款的现行制度中许多东西已经过时”。指挥员无权把部队的现金用于建筑生活设施和雇用职工以及禁止用副业生产的收入奖励官兵等规定“束缚着指挥员和经济管理人员的主动性”。

12月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决议。决议说，“许多州的党组织不注意提高经济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对加强纪律和生产秩序的责任感，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影响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措施来对付旷工者和破坏纪律者”。

12月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说，据可靠人士说，在利沃夫、基辅、敖德萨、切尔诺贝尔和伊凡诺沃一弗兰基索斯克进行的秘密审判中，已对七十多名大学教授、学生、教师和新闻记者判处了长期徒刑。他们的罪名是撰写和散发要求捍卫乌克兰文化和把乌克兰语当作乌克兰共和国的正式语言的小册子。基辅、敖德萨和伊凡诺沃一弗兰基索斯克举行示威反对俄罗斯的统治，要求宪法中关于俄语和乌克兰语平等的保证付诸实现。

1967年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适应其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需要，军事上，在继续推行核讹诈的前提下，大大加强了对常规武器的发展和常规战争的准备。具体措施有：(一)废除了1939年的旧兵役法，通过了新兵役法，以增加兵员储备。(二)恢复了赫鲁晓夫当政时被撤销的陆军总司令部。(三)增加国防开支。(四)为了适应常规战争的需要，鼓吹建设一支“能解决进攻性战略任务的远洋海军”，开始建造航空母舰，加强海军陆战队。强调“远程航空兵是苏联空军的主要突击力量”，等等。

人民群众对苏修法西斯统治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6月，在中亚工业城市奇姆肯特发生了工人抗议警察法西斯暴行的大规模暴力示威。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也相继发生自杀事件和示威。为了对付国内人民群众的反抗和不满，苏修叛徒集团大大加强了国内法西斯专政措施，在全国普遍成立“人民纠察队”；制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条文对“诋毁苏联政治”和“破坏公共秩序”的人进行迫害和监禁。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苏修中央专门作出决议，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反对“冒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起责任重大的作用”。

经济方面，在工业企业中继续全面推行“新体制”，通过了

《关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决议，并公开鼓吹实行"集体农庄小组所有制"。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反华宣传大大升级，并提出要召开各国党会议。6月，中东爆发了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战后苏修加紧在中东扩张。随后，柯西金访美，同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会谈。

1 月

1月1日 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实行新的批发价格。

1月4日 《真理报》载文评论前几年出版的一些战争回忆录。文章说："在不久以前的某些回忆录中，在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作品中，出于权宜的考虑，竟错误地阐述了同制定歼敌计划有关的问题，片面地评价了大本营和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活动，夸大了回忆者本人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同时却不谈其他人的巨大的创造性活动和他们对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歼灭敌人事业的贡献"。

1月8日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施瓦茨的一篇文章，说"苏联现在看来正为通货膨胀所苦恼"。文章说，"苏联财政方面的出版物最近刊登的文章已强调需要寻找一切可能办法为居民增加货物和服务，以便迅速吸收日益增长的购买力。以往，这样的评论就是一种暗示，说明对通货膨胀趋势感到担心"。在苏联的西方观察家认为使苏联不安的因素之一是"苏联居民购买力迅速增长，他们的购买力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今年可能增长得更多"。

1月10日 《农村生活报》刊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科卡廖夫的一篇题为《通往赢利的道路是经济核算》的文章透露，决定从今年开始在国营农场实行全面经济核算的试验，以便"有效地发挥价格、利润、贷款、财务这样一些经济杠杆的作用"。

1月15日 《苏维埃拉脱维亚报》载文，说"拉脱维亚共和国人民法院去年处理了约六百件职工对于非法解雇的申诉"(按：亚美尼亚《共产党人报》1966年12月23日的文章《工会和劳动纪律》也透露了这类情况)。

1月15日 《真理报》刊登共青团中央书记茹拉夫列娃的一篇文章，呼吁给大学生"更多独立行动的自由"。文章批评白俄罗斯工学院共青团在选举领导人时"顽固地维护遭到代表会议的大部分参加者所反对的候选人"。说这个学院不久前举行的共青团代表会议上有"四分之一的代表没有出席，四分之一在表决前就走了。在学院的共青团员中，许多人成绩不佳，有不守纪律的现象。他们的群众文化工作也做得不很好。……奇怪的是：就是他们这些人在夏天和睦相处，劳动出色，而到冬天就似乎变样了。而且，只要在共青团会议上坐一会儿，就会马上弄清楚。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对于那些在工地上老练地解决复杂的经济任务和组织任务的工程师和生产指挥员，在学院里差五分钟的时间都不让他们有丝毫独立行动的自由"。"学生在夏季的工地上取得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领导大学生课外活动的共青团组织，在领导建筑队方面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没有琐碎的监督，依靠青年的主动精神和他们的高度的公民觉悟。"

1月17日 国家计委副主席巴楚林在《劳动报》发表谈话，说"应该在今年使许多部的几个主要总局试行转入经济核算。同时，各部必须制定有关使现有联合公司、托拉斯、联合工厂和其他形式的生产联合企业转入全面的经济核算的建议"。"至于谈到把小型企业转入新的计划方法，那么这还有许多问题。""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据应该是，小型企业能够过渡到工业联合公司或总局编制中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实际上就是建立和发展最合理的生产集中形式的问题。"

1月18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说苏共"提拔了许许多多思想上经过锻炼、受过教育、精力充沛的工作人员去担任领导工作。近年来，党的干部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大多数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是具有某种知识、经历过实践活动考验的专家"。"党十分重视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和业务水平的提高。苏共中央委员会不久前通过的《关于从1967年2月份起举办党政领导干部常设进修班》的决定就是这方面的证明。""举办这种为时一个月的训练班是为了提高广大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思想理论水平。将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基础上组织州委、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和各部部长以及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报纸的编辑的进修班"。"还建立了各州合办的、共和国的和各共和国合办的进修班。"

学习内容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苏共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文件。"

同年11月13日，《真理报》报道了苏共中央《关于在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成立重新培训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常设训

练班》的决定。

1月18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阿尔捷姆·戈尔内伊为军事总检察长。实际上他从1957年起就担任了这一职务。现在的这项任命是根据1966年12月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军事检察法作出的。该法规定，军事总检察长今后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

1月23日 法新社自莫斯科报道说，1月22日，苏联警察同在高尔基大街上举行示威的大约二十名青年发生了短暂的冲突。似乎有两个人被捕。

这些青年抗议去年对苏联两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的监禁，还抗议俄罗斯联邦刑法中最近增加的条款，这些条款使"有步骤地散布倾向于诋毁苏联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谎言"成为一种罪行，而且，"参与严重破坏公共秩序或生产劳动的集团活动"现在也要受到惩罚。

1月25日 《农村生活报》载文，说"不能认为，集体农庄所有制是同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力和有计划地组织社会分工相矛盾的。集体农庄小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就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同国家所有制是统一的。而这一点恰恰也为工业和农业的集中的国家计划工作创造了可能性。"

2 月

2月4日 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及工会中央理事会批准《关于改行生产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工业企业工作人员的奖励示范条例》。

2月13日 《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农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和生产水平低下而陷入严重的困境。乌克兰副总理卡尔钦科在农业工作者会议上举出去年的失败有：

(一)乌克兰十四个行政区中有七个未能完成谷物收获计划，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年。

(二)乌克兰无力执行甜菜交售计划，因为平均产量只达到每公顷二百二十二公担。

(三)肉类生产只达到三百八十万吨，计划制订者不得不把下一年度的指标限于同一数字。

奶类生产在下一年度将削减四十万吨，因为牲畜饲养业落后和生产水平低下。

2月14、15日 《真理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通讯，介绍"立陶宛共和国西格玛计算和管理技术联合公司"的"经验"，说这个公司"拥有部属总局的权力"。文章说，"部属总局范围内的经济核算就是如此。目标是，借助经济刺激使企业工作计划精细正确，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全部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西格玛的经验远远超出了一个部的利益范围"。"机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是否考虑到在共和国成立一个类似西格玛的总局呢？""最近，其他一些部门的总局也即将改行新体制"。

2月21日 塔斯社报道，苏联新成立了四个建设部：联盟—共和国重工业企业建设部、工业建设部、建筑部、农村建设部。戈尔金、托卡列夫、卡拉瓦耶夫和希特罗夫分别被任命为上述四个新部的部长。

2月27日 瑞士《素洛图恩日报》载文，说"苏联国内的反

对派力量在增长”。“有一些可靠消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苏联霸占的前波兰领土，现在被叫作西乌克兰的地区传来。这些消息证明，在这个州的居民中，骚乱在持续着。于是利沃夫的一些教授和知识分子重新遭到了党报的指责，说他们‘歪曲解释乌克兰的历史’，从而代表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倾向’。”

“与此相关联的是，苏联国家保安机关不久前进行了一系列逮捕活动”，“迄今大约有七十名知识分子在各种秘密审讯中被判处长期监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押送到波特马附近的集中营”，“逮捕的浪潮从利沃夫开始，但是还扩及到切尔诺贝尔、卢茨克、基辅、伊凡诺沃—弗兰基索斯克和敖德萨等城市”。被逮捕者“被指责为对苏联的制度进行敌意宣传和散布‘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所要求的不外乎是对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给予比现在多一些的重视”。“逮捕行为首先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愤慨，为此还引起了示威（苏联报刊迄今对此保持沉默）。”“示威不仅是抗议逮捕乌克兰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抗议警察当局不久前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类似手段，逮捕了四名青年作家。被捕的有信奉基督教的作家多布罗沃夫斯基、诗人加兰斯科夫、大学生拉什科娃和拉德齐夫斯基。这个集团因为非法出版《1966 年凤凰》杂志而遭到谴责。加兰斯科夫承认对这个杂志负责。他在 1965 年曾因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举行个人示威，抗议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越南的政策而遭逮捕。”“《1966 年凤凰》内容有论文，文艺评论，哲学、历史科学、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指责苏联的文化政策，特别指责了那种

凡对苏联制度进行批评就判刑三年的法令。”“目前苏联许多知识分子把自己称为‘左派民主党人’，他们把苏联制度称为‘左派民主主义’”。

“从可靠消息获悉，苏联有一个在地下进行活动的激进革命小组，这个小组奉行斯大林的亲华的路线，并在不久前发表一份公告，谴责苏联现领导‘右倾’和‘背叛了列宁的革命’”。

3—4 月

3月7日 《共青团真理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文章，说“在米尔诺耶市的基层组织更换团证时，几天内就把约二百人开除出共青团”。“在市执委会一次会议上没收了五十一个人的团证，在另一次会议上没收了三十八个人的团证。”有一个工人给管理委员会青年辅导员提了意见，突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说，他“被开除出共青团了。结果，批评被当作是对自己的起诉书，甚至都没有让批评者参加决定他命运的会议。”

3月10日 勃列日涅夫在选民大会上发表讲话，说“目前把一千二百六十多万的共产党员联合在一起的苏共的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人民生活”。

3月20日 路透社自莫斯科报道说，“一个二十八岁的俄国人豪斯托夫，由于参加1月22日在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上由约五十个青年举行的反对逮捕四个同伙和要求取消反对造谣的新法律的示威，被指责破坏公共秩序而被判处三年徒刑。在审判前，西方报纸消息说，有二十名苏联第一流知识分子已在对一条新法律的抗议书上签名，这条法律威胁说，散

布反苏谣言的人要判处长达三年的徒刑，签名的有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电影导演罗姆和科学家塔姆”。

“自从示威以来，还有两个年轻知识分子被捕。一个是十九岁的金兹布尔格，另一个是赫鲁莫夫，罪名是他们在西方公布的消息中诽谤苏俄。”

3月29日 美联社说，“特瓦尔多夫斯基遭到了苏联文化界斯大林主义捍卫者的尖锐谴责”。“提出这次批评之前，《新世界》的编委会中已安插了三个新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和苏共文化当局之间的小冲突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真理报》今天批评了《新世界》。“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在最近举行的会议上提出的批评集中在《新世界》报道红军和农业生活的阴暗面的文章上。”“《真理报》说，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听了批评以后，对认真的和有原则的分析表示赞赏。”“他向会议保证，《新世界》‘将注意研究这些批评意见，并在杂志今后的作品中考虑这些意见’。”

3月31日 英国《爱尔兰时报》说，苏联“一直在悄悄地进行着”把一块块田地分配给机械化的生产单位的试验。说苏联《真理报》去年年底曾称赞这种分田到户的倒退措施，宣扬这种小组中每个人的产量比国营农场每个人的产量“高五倍”。

3月 《文学报》第十三期载文，说“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着国民经济领导民主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也在使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领导民主化，这不可能避开法院这样一个重要的人民生活范畴”。文章主张建立人民陪审团制度，说“有一个陪审团是合宜的，在陪审团里可发表不同的意见”，“最重要的是会产

生人民陪审员的自主性，摆脱现在陪审长意见占统治地位的情况”。“陪审员只根据自己的理智和良心来决定这个人(按：指受审者)的命运，而且这个决定使在大厅里的人都承认判决的正确性。”文章支持《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布尔拉茨基的观点，并透露“有人反对布尔拉茨基及同意他的人”。文章还提到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庭庭长阿纳什金以目前推行工业领导新形式和新方法为例，认为“最好在进行周密的讨论之后再采用新的人民陪审员工作形式，从而再采用整个法院工作的新形式；先只在某些城市以及个别的区内进行试验。应周密地研究这种经验，讨论所实践的一切优缺点。然后再决定是否可以和需要到处都采用新形式”。

3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六期载文，说苏共中央最近讨论了“关于爱沙尼亚党中央对领导干部进行的工作”的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责“爱沙尼亚党中央对领导干部进行的工作还不完全符合二十三大的要求”。“党政机关并非始终严格地对待挑选干部的工作”，“还有匆忙草率的情况”。“一些很少受过训练和缺乏主动精神的工作人员以及软弱无能的组织者常常被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因此便发生干部的大量流动。”“对提拔妇女担任领导工作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心。”“在挑选共青团干部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一些没有才能的、甚至偶然得宠的人常常被提拔做共青团工作。”决议还说，“共和国的许多企业领导人、车间主任和副主任、建筑组织的领导人、工业和建筑业的工长都是实际工作者，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在任何地方学习过。经济部门的干部配备情况很差。党政机关对正确分配和使用国民经济专家和文化专家没

有给予必要的注意”。“有些企业和工地劳动纪律松弛。有些领导人对人冷酷无情，破坏劳动法。”决议还批评爱沙尼亚党中央“没有很好地教育干部用不妥协的精神来对待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各种不健康表现。许多创作协会在对艺术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提高很慢。”

4月1日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报道，3月30、31日，白俄罗斯共和国举行人民纠察队第二次代表大会。白俄罗斯党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克列茨科夫说，“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来调动志愿人员纠察队的积极性，动员他们完成面临的任务。最近，重新检查了纠察队的组成，用党团员、企业和组织的优秀生产者和领导人来充实纠察队。在各州、许多企业、组织、农庄和农场建立了三百多个新的志愿纠察队”。一个国营农场场长说，“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共产党员们决定改组纠察队的工作。我们执行了这一决定，在所有的居民点都建立了纠察小组。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在那里建立模范的社会秩序”。

4月2日 《哈萨克真理报》报道，哈萨克最高法院举行例行全会。全会指责法院和审判庭“放松对违法犯罪的斗争”。“全会责成共和国法院加强对怙恶不悛的流氓、杀人犯、强奸犯、社会主义财产盗窃犯的斗争。”全会强调“对违反劳动保护和完善设备规定的斗争是司法机关极重要任务之一。共和国仍发生职工残废或其他损害健康的事件”。

4月3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国民经济中的贷款和结算工作以及提高贷款在刺激生产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

4月6日 《红星报》刊登历史学副博士巴宾上校的一篇

题为《党是苏联武装力量的领导者》的文章。文章强调“党的领导是军事建设的基础的基础，是苏联陆海军强盛和取得不可磨灭的胜利的决定性源泉之一”。

文章说，目前“除了有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外，也存在着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性，而且这种危险性并没有缓和。目前，人类已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和侵略性猖獗的事实”。

文章说，“党在军事建设、武装力量和整个苏维埃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提高，是由军事革命、当前国际形势、加强我国的军事威力以及陆海军战斗准备的规模、任务的复杂化和扩大所决定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进程”。

文章说，“要不断完善陆海军的党组织、政治机关的全部活动，要大力提高、完善部队党的政治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党的政治工作要“自始至终贯穿着创造精神、尚武精神、革命热情、进攻精神”。

4月8日 塔斯社报道，苏联前驻东京大使维诺格拉多夫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在对外贸易部工作多年，在被任命为驻日大使前曾任局长。

4月11日 民防管理局第一副局长托尔斯季科夫上将对《劳动报》发表谈话，说“全国各地都组织了民防，每个城市、区、企业、机关、集体农庄，都采取了综合防卫措施”。

4月12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格列奇科为国防部部长。在这之前，格列奇科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和索科洛夫大将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帕夫洛夫斯基大将(原远东军区司令)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同日，法新社评论说，“有资格的观察家最近常预测可能当选新国防部长的人是德·费·乌斯季诺夫。当《红星报》断言党必须拥有对军队的权威时，似乎证实了将任命一名文职人员。由于格列奇科的被任命，使观察家得出结论：已由苏联人士证实的对德·费·乌斯季诺夫的任命可能在军队表示反对以后撤销了”(按：原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已于3月30日死去)。

4月12日 《真理报》刊登苏哈列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说“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工业部门实行了改革，就提出了生产联合企业和部属总局（如果这里适合的话）改行经济核算制的任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最好地实行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化”。“立陶宛西格玛联合公司的经验表明，这里对计划工作的质量的责任心提高了。在这个联合公司中，管理人员的奖金数额取决于企业计划的完成情况。总局改为经济核算制将有助于各部最大限度地关心高度的计划任务”。文章还说，“改革的准备工作和制定改革的总原则要求经济学界改变一系列旧原理和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特别是这些规律的作用的方式。现在，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合适的比例及其根据，确定出一种适应建立这种或那种经济关系的界限”。“其中一个问题是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之间的利润分配。”“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刺激基金的合适标准。”“还有一个问题应予以注意，这就是直接根据利润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根据对工资基金的百分比计算物质奖励基金标准的可能性问题。这种方法的优越性表现在，它可以不只是根据利润的增长率，而且根据利润的总数规定基金的数额。”

4月13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决议。决议规定要"扩大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的经营独立性"，这些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同时，可以自行决定生产经营活动问题"，并规定"减少上级机关给这些企业规定的计划指标数目"。国家的规定仅限于下列指标：(一)生产方面，只规定"向国家出售最主要产品的数量"，其余生产指标均由企业"自行决定"。(二)劳动方面，只规定"工资总额"。(三)财务方面，只规定"利润总额、预算拨款总额和农业用的固定生产基金的付费额"。(四)投资方面，只规定"集中投资总额"。(五)物资技术供应方面，"拖拉机、汽车、农业机器、设备、肥料、建筑材料和由上级组织分配的其他生产资料的供应数额"由国家规定。

决议说，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中心目的是"加强对生产农产品的经济刺激和使国营农场和其它国营农业企业的工作人员对改善企业工作成果从物质利益上更加关心"。

决议规定，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农业企业所获得的利润，除按生产基金的百分之一上交基金付费外，几乎全部归企业使用和支配。

4月14日 《真理报》刊登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帕列茨基斯的一篇文章，说"在新的情况下，加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作用具有特殊意义"。"不久前苏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改进农村和村镇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工作》的决定，其目的也是要解决这些任务。"文章透露，"近两年来，地方苏维埃的成员通过投票被撤销了八百多名"。

4月14日 塔斯社报道，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任命马纽希斯为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在这之前，马纽希斯是立陶宛党中央书记。

原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舒马乌斯卡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4月20日 塔斯社报道，利别尔曼在一篇题为《利润在苏联经济刺激中的作用》的文章中说，“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顺利工作的尺度，作为对生产者的经济刺激的源泉，承认利润的决定性作用，是苏共中央9月（1965年）全会决议中的崭新事物”。“经济改革使利润成为评价生产活动和经济刺激效果的基础。”“只要企业每年都努力用最好的办法利用增加供应量和增加利润的一切条件，就能得到它应该从利润中为建立刺激基金而得到的全部东西”。

4月23日 《消息报》报道，俄罗斯联邦计委召开地区性经济专家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出席会议的九百多人对经济问题的态度“十分不同”，“尽管这样，发言人都有同一个主题，同一个主要的有份量的想法，这种想法归结为改革的第一阶段，探索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该是‘耕’得更深一些，把改革的杠杆调整得更精确一些和动用经常起作用的资源（技术进步、生产专业化和科学地组织生产）的时候了”。报道说，“经济改革是反对各种官僚主义的可靠工具。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又是改革的危险的敌人”。“看来，各部门都还有一些旧工作方法的维护者，他们认为，苏共中央9月全会的决议不是为他们写的。一定要企业防备这种热心的行政负责人。很明显，业务权利落后于改革的需要。宣布

扩大企业的权利还不够，应当保证遵守经济生活的新准则”。

4月 《共青团生活》杂志第八期报道，共青团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组织的奖励基金》的决定。奖励基金用来鼓励共青团机关的负责人员、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奖金数额为共青团区委会、市委会、民族专区委员会、州委会、边疆区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年工资基金的百分之二”，“一年的奖金额不得超过工作人员一个月的定额工资”。“对于顺利执行预算、节约资金和材料，也规定了物质鼓励”。

4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七期说，“1966年开除了六万二千八百六十八名党员出党，接受了一万七千二百四十四名党员的退党要求”。“1966年拒绝了约三万六千人要求作为正式党员的申请和一万二千多人要求作为预备党员的申请。”

到1967年1月1日止，工人（就社会地位来说）在苏共党员中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一，农民占百分之十六，职员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九。1966年接收的预备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八，农民占百分之十二点六，职员占百分之四十点六。入党职员中，四分之三是工程技术知识分子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专家。

4月 《农业经济》杂志第四期刊登经济学博士布祖卢科夫和经济学副博士卡拉瓦耶夫的一篇文章：《论对采购的主要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文章说，“近来出现了大量阐述采购问题的文章”。有些作者提出以下建议：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必须过渡到所谓“自由市场”的轨道上，利用价格作为国家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某些经济学家希

望就国家有计划地领导农业是否合适和完善国家采购农产品的计划工作的问题展开辩论。“作者要求计划服从于市场利益——‘靠卢布在市场上进行的普遍的不记名的平等的投票’”。“这些建议的起草人不应该忘记，放弃中央农业计划，改行自由销售产品，结果就会使农业生产排除在国民经济计划之外，而这是与社会主义经营体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相违背的。”“遗憾的是，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站不住脚的建议在报刊，甚至在书籍中都加以发表。某些行政工作人员也匆忙加以支持。1966年3月17日的《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格奥尔基耶夫生产管理局局长巴拉科夫的一篇文章：《集体农庄的今天和明天》。巴拉科夫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这种采购中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因素：按照严格的指示计划进行收购和自由收购（按：即指超计划出售）。这两者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如3月全会所强调指出的，未来是属于以国家同农庄的自由商品关系为基础的收购的’。”“1967年1月31日这家报纸在《3月的幼苗》一文中又回到了这篇文章上”。这篇文章“反对农庄下达若干年的统一订购计划，建议对这种计划每年作出修正，而这一点已遭到党和农业劳动者的谴责”。

4月 部长会议免去戈留诺夫的塔斯社社长的职务。

部长会议任命拉宾为塔斯社社长。为此，最高苏维埃免去他的驻华大使职务。

5 月

5月4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国营农场的经济核算》的社论，说“经济核算制在国家同国营农场的经济关系中遭到了破坏。这种情况已不能给生产的发展以应有的刺激。所以党提出了国营农场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即自负盈亏的任务。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集体必须主要依靠销售自己的产品所获得的资金以及应予偿还的贷款来实现目前的扩大再生产”。

社论在呼吁国营农场场长“必须充分意识到新形势的严重性”后说，“改行经济核算制就要求提高对国营农业企业的领导水平。上级机关不再对计划中包括的一系列指标作详细规定”。“苏联国家银行及其地方分行在使国家贷款得到更有效的使用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

5月10日 西德《世界报》刊登该报记者海因茨·舍韦(在莫斯科工作了十年)的一篇文章说，在苏联，“忠实于”斯大林和“赞扬他对人民和国家的功绩的人，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的这几年里明显地增多了”。

5月15日 塔斯社报道，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西特宁在讨论苏联价格形成问题的科学家代表会议上说，“价格的普遍水平将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五。提高价格的将有煤、石油、电力、金属和重工业产品。尽管农业机器和矿肥的价格提高了，但这并不触及农业劳动者的利益，因为零售价格的水平仍然不变”。西特宁还说“已通过了关于建立专门的价格形成研究所的决定”。

5月19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解除谢米恰斯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同日，《红星报》刊登一则讣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鲁申科少将在执行公务时不幸身死”。讣告的发出者是“一群同志”。据报道，此人战后一直在苏共中央机关任负责工作。1954年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军队安全。照常规，将军死去一般都要刊登死者照片，但此人未登照片。而且治丧者是“一群同志”。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似乎发生了什么突然事件。

同日中午，莫斯科红场举行少先队成立四十五周年的检阅，苏共领导人没有出场。据认为，“这种现象和此间关于正在举行苏共中央全会的传说相吻合”。“今天莫斯科市中心的交通堵塞，异常紊乱。而且市中心有马队出现”。

5月中旬 据报道，“苏共领导集团为了想挣脱经济困境，近年来绞尽脑汁在捞取外汇方面打主意”：“一、在各大城市开设许多外汇商店，单莫斯科最大的就有五家。各机场、大旅馆都附设外汇小卖部。”“二、向外国记者或外交官收房租时，只收美元。”“三、今年将招徕一百五十万外国旅行者，宣传今年是‘国际旅行年’。”“四、卢布和美元的外汇牌价是九十戈比合一美元。而外汇商店的商品折价平均为一美元合三卢布。”

5月27日 《东方曙光报》说，“在企业和工地、农庄、农场、共和国机关里，‘经常发生不考虑劳动方法、无根据地从企业或机关解雇人的现象。’法院每年审理大量这样的案件；

1962 年——一千零二十六件，1963 年——一千一百三十四件，1964 年——一千一百三十五件，1965 年——一千一百零五件，1966 年——一千零五十二件”。“解雇令中往往不列举可作为废除劳动合同根据的理由和具体事实”，如说一个工作人员“不能胜任工作”，但“没举出任何可证实这一点的事实”。

5 月 29 日　《真理报》刊登列昂节夫的一篇文章，说“不能把列宁的经营原则看成是某种僵死的不动的东西。相反，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完善，列宁的经营原则也不断发展和充实，内容越来越丰富”。“计划并不排除企业有一定的经营的独立自主性、企业的利润工作和真正的经济核算的必要性，相反却以这种必要性为前提。”“这种经济核算意味着：不仅要善于‘算钱’，这是极端重要的，而且要遵守经济单位之间的等价原则，这在根据社会的利益评价企业活动时也是极端重要的。物质刺激，个人和集体从利益上关心生产和对生产负责的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党近年来在完善计划工作和经济领导方法方面实行的措施极其显著地揭示了列宁主义经营管理原则的内容。”“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已有经验证明，把重心移到经营领导的经济方法上是行之有效的。实践表明，以提心吊胆的怀疑态度对待经济方法，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范畴，特别是利润，这是没有根据的。”“在苏共中央 1965年 3 月和 9 月全会的决议以及二十三大的决议中，规定了新经营体制的一系列重要‘发展点’以及发展领导国民经济的经济方法的重要方向。这里包括：经济核算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其运用范围的扩大、价格制度的完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企业同贸易

组织之间直接联系的发展、合同关系的加强、贷款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提高、逐步向生产资料的批发贸易过渡。准备进一步减少由上级规定的计划指标。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把新的领导形式推广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民经济部门，就勾划出经济改革的明天的轮廓。"

5月22—27日 作家协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作协理事会的报告：«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中的苏联文学»，修改了作协组织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苏共中央向大会致了"贺信"。"贺信"要求作家"反击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帮助那些被敌对宣传引入迷途的人找到正确的道路"。最高苏维埃还奖给了作协一枚列宁勋章。

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大肆鼓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作协第一书记费定鼓吹要同西方"文化巨匠"进行"联合努力"。说什么"给世界以和平"是"人道主义文学的非常亲切的口号"。作家马尔科夫大肆吹捧肖洛霍夫的反战作品和西蒙诺夫的反斯大林作品。

乌克兰科学院通讯院士诺维钦科说："消除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党在恢复列宁的社会生活准则方面进行的多方面的工作，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完善，这些必定会使艺术界和理论界欣欣向荣"。

诗人纳罗夫恰托夫认为"文明的大众化和倾向性是苏联诗歌的基本特点"。

列宁格勒诗人杜金说："现在，不仔细观察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发展，不仔细观察大地母亲生死存亡的全球性问题，就不能解决任何生活和诗歌的问题，因为广岛地狱之火已经使

但丁成了我们的同时代人”。说什么“愿理智永生，让愚昧消灭！是我们的箴言，是我们的祈祷”。

修改作协章程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布罗夫卡提出了修改作协章程草案。草案强调苏联文学工作者要“为自由创作、为探索和试验开辟无限的可能性，有助于各方面的革新”。他在谈到可能导致开除作协会籍的情况时，建议把“会员背离章程规定的原则和任务”列为第一项。其理由是“既然不同意协会的基本原则和任务，不仅不维护这些原则和任务免遭我们的思想敌人的侵犯，而且自己破坏这些原则，那么他参加我们的组织有什么意义呢？”草案强调作协的成员“是职业文学家”。

大会在文艺理论方面大谈什么“天才”、“创新”、“人道主义”、“现代性”、“争取人性的胜利”，说什么“诗歌播种着善良和爱的种子，改造人民心灵中由于死伤和痛苦而造成的邪恶”。

5月30日 《红星报》刊登苏联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日林少将和乌卡罗夫上校的一篇文章，反对“片面阐述”卫国战争的所谓“错误和失算”，又肯定了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的某些作用，批评有些回忆录作者“不客观地”把苏军当时的某些挫折和困难推给最高统帅部。文章说，“在大本营的成员中有著名的军事首长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高统帅斯大林表现了很大的坚定性，他正确地领导了整个军事行动，在这方面有不少功劳”。

5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十期发表苏共中央《关于鄂木斯克州委会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指责鄂木斯克州党委会的

活动“并不完全适应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3月和9月全会提出的任务”。批评该州“1966年从工人中吸收的预备党员总数的比重不仅没有增长，甚至降低了”。“州委、鄂木斯克市委和某些区委在挑选和培养干部方面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很少研究他们的实际工作。最近两年，在企业、工地、农庄和农场更换的领导人总数中，因不能胜任委托的工作或因滥用职权而被解职的工作人员几乎达三分之一。”“共青团区委书记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更换。在州的共青团组织中，工农青年减少了。”

6 月

6月1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决定对共和国刑事法典作补充。增加了对“盗窃”武器的人判处不同期限徒刑的新条款，新条款规定：“盗窃武器（无来复线的猎枪除外）、弹药或爆炸物，剥夺自由七年”；“重犯这种行为，小集团事先密谋犯有这种行为，为服役使用而被发给武器、弹药和爆炸物的人或受委托保卫这些武器的人犯有这种行为，剥夺自由十年”；“特别危险的惯犯用掠夺袭击的方式盗窃武器（无来复线的猎枪除外）、弹药或爆炸物，剥夺自由六年——十五年”。

6月7日 部长会议决定，民航部所属企业要在1968年内完成改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的工作。

6月9日 爱沙尼亚农业部副部长皮亚尔特利对《经济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让全苏一万二千多个国营农业企业“拥

有更大的主动权将大大地推动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今年，以试验形式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国营农场将有三百九十个，其中，爱沙尼亚有一百六十八个。”“在国营农场以前要上报的一长串计划指标清单上只剩下几项了。其中最主要的项目是：农产品销售量、工资基金和利润总额。国营农场可以自己处理超计划产品，自己计划生产量，自行确定工作人员人数和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

6月10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说“现在已有三千六百个以上的企业按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工作。它们的产量将占全国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六”。这些企业“生产几乎全部的计算机和组织生产的技术设备、半数的有色金属和将近百分之四十的黑色金属、一半以上的轻工业产品和三分之一的农业机器”。社论说，还应在比较小的工厂——目前盈利少、指标不稳定的工厂实行改革。这些企业顺利改行新的工作条件的最好办法是成立区域性生产联合公司。“成立联合公司并不是企业的简单融合”。“这一经济整体的各个单位应当在专业化和始终一贯的分工基础上在经济和工艺规程方面联系起来”。“改革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不单是企业，而且工业管理机构——联合公司和各部专业总局都将有计划地过渡到经济核算制”。改行经济核算制的总局应当拥有经济杠杆来加速影响生产过程。

6月14日 苏联元帅崔可夫在《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民防对任何国家的生活具有一种极为重要的战略保障的意义”。文章强调，“在目前条件下，加强国家防御能力的最复杂问题之一是合理分散居民和安排生产力”。

6月21日 《巴库工人报》报道，阿塞拜疆安全委员会主席茨维贡被解除职务，调任其他工作。阿利耶夫接替了他。

美联社6月24日评论此事说，“茨维贡的调任是在谢米恰斯内被解除职务一个月之后发生的”，“他的调任是在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同一天宣布的”。

美联社12月21日说，茨维贡少将已提升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6月23日 部长会议决定，自今年下半年开始，交通部铁路系统将过渡到实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

6月25日 《真理报》发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提纲。

提纲在第一部分谈十月革命以来走过的道路时说，“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阴谋，不是一批‘积极的革命者’进行的上层政变，而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千百万人的运动和斗争”。

在谈到卫国战争时说，“在估计希特勒德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对我们进攻方面的失算以及与此有关的准备反击第一批打击方面的疏忽产生了影响。苏联军队当时缺乏在现代战争情况下进行大战役的经验也有影响”。“党采取了有力措施来组织粉碎敌人的工作和把前方后方的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了国防委员会，由约·维·斯大林担任主席。”

在谈到经济问题时说，“苏联的重工业尽管在战争年代受到损失，仍然以稳定的高速度不断发展”。“食品、纺织品、靴鞋以及长期使用的日用品的生产增加了。”“农业方面的情况更为复杂”，“早在1950年农业总产量就达到了战前水平。但是，随后的一些年代里，这个重要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缓慢

了”。“1953年党中央9月全会采取了给予农业物质技术援助和加强农庄和庄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其劳动结果的措施。开垦生熟荒地是使谷物增产的新的源泉。”

“党执行进一步发扬社会民主的方针，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坚决谴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种个人迷信表现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对一个人的作用的颂扬，背离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没有根据地进行镇压以及给我们社会造成损失的其他违背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等方面。这些反常现象，尽管十分严重，但却改变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动摇不了社会主义的基础。”

“党实行了消除个人迷信在各方面的后果以及遵守列宁主义党内生活准则和原则的措施。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在解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方面的权力以及企业领导人的权力扩大了。这一切使得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活跃起来，使得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各部门的工作有了起色。”

提纲在第二部分谈国内建设时说，“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纲领，确定了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主要方向：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新人。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10月（1964年）全会以及以后历次全会的决议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些任务，并且把这些任务具体化”。“苏共中央11月（1964年）全会、3月和9月（1965年）全会制定的、并经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对国家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导的措施》标志着苏维埃社会在向共产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新阶

段”。

“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规律、物质利益原则、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遭到破坏以及农业生产领导中的主观主义等，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不良影响。党曾采取了有力措施来克服农业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苏共中央3月(1965年)全会拟订了一整套加速发展农庄、农场生产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坚决贯彻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体制反映了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日益扩大的规模及其结构上的质变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的要求。经济改革就其实质来说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性质相适应的必要性，它意味着对经济管理的新态度。它的实质在于加强领导的经济方法的作用，改进国家计划工作，扩大企业的经营独立性和主动性，大力推行和改进经济核算制。”

“党在保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迅速发展那些直接满足居民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的工业部门以及对这些部门进行技术改建、加强和扩大这些部门的原料基地和能源基地的方针。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的接近，是国民经济中当前结构变化的重要特点之一。”“苏联经济计划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是对各国人民的历史经验，对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巨大贡献。”

提纲在谈到社会结构时说，“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主导的创造力量。”“农民已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支积极力量。”“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作用在增长。”在谈

到民族问题时说，“苏共始终不渝地同残余的民族局限性和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进行斗争”。“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保持和发展自己优秀的民族特点和传统，改善陈旧的形式的同时，创造性地利用其他民族的文化上的成就。俄语成为各民族间互相交往以及交流科学和文化财富的工具。”

提纲在谈到国家体制时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正在成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民政治组织”。“全民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向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它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即共产主义建设，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在国际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在苏联社会发展中，工会是学习管理经营的学校、共产主义的学校，它的作用在加强。”“它享有立法动议权。”

在谈到党的部分时说，“关心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关心使每个共产党员都能无愧于和不辜负苏共党员的称号，是党和它的所有组织生活的法律。在党内，工人阶级现在占有、今后仍将占有主导地位”。“党保持着总方针的继承性。党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分子以及其他反列宁主义派别的集团的不调和斗争中捍卫了这个方针。”

提纲在谈到文化时说，“苏联文化是高举革命人道主义旗帜的”。“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岁月里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其特点是深刻的人民性和共产主义的党性、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公民责任感、真实感和对现实的深刻了解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不妥协性。我们的艺术具有高度

的思想性、对一切阻碍前进的旧东西的不妥协性，具有创新和大胆的艺术探索精神。”

提纲在谈到意识形态工作时说，“现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在发展和加深苏联人的社会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的形势下，在国际上紧张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它的主要任务是由苏共纲领和二十三大决议确定的”。“党认为，对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改进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反对异己的习俗和传统的影响，克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方面的消极现象，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项严重任务。”

提纲在谈到国防时说，“社会主义各国和一切反帝力量的战斗联盟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已不占主导地位。各国人民现在拥有足够的威力以积极的、协调的行动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只要帝国主义存在，爆发掠夺性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苏维埃国家始终维护和平和国际安全，过去和将来都把它的国防力量保持在最高水平上。我们的武装力量备有各种现代军事装备，包括火箭核武器。国防费用数量不小，但是苏联人民懂得，这是必要的。”“全力加强国防的问题，把这个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予以注意——这是五十年来的一个主要结论。”

6月27日 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契夫被解除职务，格里申被选为市委第一书记。西方通讯社说叶戈雷契夫“一直是苏联最高领导机构中的一个反对派的发言人”。

6月28日 法新社报道说，“今天在列宁陵墓的外面，有一个人用炸药把自己炸死，以抗议阿拉伯一以色列战争停

火”。美联社说，“自杀原因仍然不明”，“抗议中东停火”是“共产党人士立即散布的消息”。

塔斯社 6 月 29 日说，此人生于 1900 年，名叫克雷森科夫，领养老金生活，识字不多，1961 年曾因企图杀死自己的妻儿而被维尔纽斯（立陶宛）法院判处徒刑。后来由于脑血管极度硬化，住院治疗。

6 月 29 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题为《全心全意同党在一起》的社论，说“曾经有过不少反对列宁的激流和集团，他们曾企图使党离开正确的道路。但他们都成了政治上的破产者”。

据报道，“近日来，各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已先后开会‘支持’苏共中央 6 月全会‘决议’。莫斯科市委没有开这种会，而是开了一个市委全会，首先把叶戈雷契夫撤职”。“此间传说，苏共中央 6 月全会上有很大的争吵”。

《红星报》6 月 29 日载文强调军队的重要性。据认为，这同上述情况有内在联系。

7—8 月

7 月 1 日　塔斯社报道，莫斯科市举行党员积极分子会议，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传达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塔斯社说，“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完完全全地赞同苏共中央 6 月全会的工作结果及其决议，并将作为坚定的指南加以执行”。党的积极分子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莫斯科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义务是，更紧密地团

结在苏共中央的周围，以新的精力动员劳动人民为进一步加强国家的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全力提高苏联人对帝国主义阴谋的警惕，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而斗争”。

《真理报》7月2日报道这一会议时说，“莫斯科市党员积极分子会议”首先“一致”推选“党中央政治局”为“会议的荣誉主席团”。与各地的做法不同，会议决议中有六段专门谈“拥护”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三段谈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宣传提纲。另外，会议决议和会议给中央的信中都强调赞扬苏共中央对中东问题政策的“灵活性”。决议中说，“在近东危急的复杂条件中，苏共中央政治局行动迅速，采取了深思熟虑的、富有原则性的灵活决定，保证了停止军事行动，给予了遭受侵略的阿拉伯国家以巨大援助”。

7月1日 重工业产品开始实行新的批发价格。其中，煤的新价格提高百分之七十八，石油和矿石提高百分之六十以上。

《经济报》说，改变批发价格是现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采掘工业产品的批发价格提高最显著，因为这些部门的开支一直在增长，修订价格的目的是使之接近于生产费用。

7月5日 勃列日涅夫在对军事学院毕业生的讲话中说，要加强苏联武装部队，“国防问题处于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强调应该经常处于这样的准备状态：“能排除侵略者使我们措手不及的最微小的可能性”。

说现在在军事上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集体使用武器。强

调军人要有高度的组织性、经常的集中性和无可指责地执行命令。

7月7日 法新社报道，“消息灵通的外国共产党人士今天说，苏联‘最著名’的反斯大林的历史学家之一——涅克里奇教授已被开除出党”。“这些人士说，还在全国各地对其他的‘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作家和电影制片人采取了纪律措施。”“涅克里奇的《1941年6月22日》这本书最出名。”“据这些人士说，对涅克里奇的一些朋友，包括老布尔什维克斯涅戈(他一直在对斯大林时期进行私下的研究)，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据说对某出版局局长和历史研究所所长杰鲍林进行了制裁”。“反斯大林的小说要受审查”。“编辑甚至拒绝出版西蒙诺夫的《战争笔记》的续篇，一些电影未能获准上映。”“这些人士说，在‘自由主义者’和那些要给斯大林恢复名誉并通过恢复名誉来造成国内政治路线强硬化的人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人们认为叶戈雷契夫是争取部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7月7日 部长会议分别作出决定，海运部和加盟共和国内河航运部所属企业过渡到实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

7月9日 空军主帅维尔希宁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说“远程航空兵是苏联空军的主要突击力量。它的飞机的基本部分是能飞越远距离、到达地球上任何一点的携带火箭的洲际飞机”。

7月10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部的权限》的决议，并批准《苏联部的总条例》。

7月11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捍卫十月的成果》的社论，说"我们清楚地知道，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新的侵略战争的危险"。"只有爱好和平的反帝力量经常保持警惕性，对反击侵略者作好准备，才能制止反动派和战争势力。"

社论说，"我们的军事理论的出发点是，在现代战争中，胜利是由各军种的努力及其战斗手段保证的，但是，在战斗中起头等作用的是人——战士、爱国者"。"苏联军人有能力""不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有最小的可能突然侵犯我们"。

7月11日 工会中央理事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谢列平为中央理事会主席。苏斯洛夫在会上发言说，"苏共过去和现在一贯认为联合了八千万人以上的最富有群众性的劳动人民组织——苏联工会的活动巨有重大意义"，"我们希望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谢列平将无愧于担任工会的领导人"。

7月21日 《真理报》用两页篇幅刊登一篇关于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那里的领导人不接受批评，不作自我批评。美联社在报道上述文章时说，"这次批评是针对那里的负责人托尔斯季科夫的"。还说"这里的外交人士认为这篇文章和6月28日解除莫斯科党的负责人叶戈雷契夫的职务以及7月11日任命谢列平为工会负责人的事情有关。谢列平仍是政治局委员，但预料他将失去他在书记处的有影响的职务"。"叶戈雷契夫和托尔斯季科夫是谢列平的人"。

7月21日 《红星报》刊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雅库鲍夫斯基的一篇题为《陆军》的文章，声称苏联陆军由于配备了火箭核武器，发生了质的飞跃，但"不能把核武器的作用和可能性

绝对化”。又说，人在战争中起“头等作用”，常规武器“丝毫未丧失意义”，陆军应作好准备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作战。

7月30日 《消息报》刊登高尔基州捷尔任斯克建筑管理局副局长西加尔的一篇文章，说出售生产资料的“集市”是一个“良好的创举”。文章说，“在高尔基集市之后举行的供货人会议上”，“经营管理人员说，在集市上不仅必须卖多余的物资，而且要卖定额外的物资。同时必须把那些不能出售的物资和设备勾销，而不是象迄今所做的那样，从一个品名表上转到另一个品名表上”。“对多余物资的及时报道具有巨大意义。要使我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来从事这一工作。”“这样的集市要教会做生意的复杂艺术。而且还要教会经济上内行地、更合理地和更有效地从事经营。”

《文学报》第三十四期刊登鲍林的一篇文章，介绍他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主席迪姆希茨的谈话。说这一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研究“有趣的新问题”。“今天，某些供应方法已经过时。国民经济中的‘配给制’惯例反而给经济带来相当大的损失。”“正在举办集市，在这样的集市上，工厂在我们的活动中第一次把自己不需要的、多余的设备卖给别的工厂。要开设批发商店。说集市、批发商店、地方管理局的广泛供应权限——这就是建筑在统一的、科学的国家计划基础上的国营生产资料市场的首要步骤。”

7月 《军事历史》杂志第七期刊登苏联元帅克雷洛夫的一篇题为《战略火箭部队》的文章，宣传带有强大核弹头的火箭成了达到战争战略目的的决定性手段。说它们实际上是无法抵抗的，可在战争的最初几分钟达到主要战略目的。强调

保持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是现阶段苏军建设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8月10日 国防部副部长巴夫洛夫斯基在《红星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军人守则是教育士兵的最重要的手段。军人守则定得越严格,它对军人意识的影响也就越深越活,部队的战斗力也就越强”。

文章说,“士兵应当经常感到,他的所作所为,指挥员全都看到,全都知道,必然会看出他的每一个缺点。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教育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士兵的举止、工作、学习和行动的监督的可靠程度”。

8月13日 《红星报》刊登国防部副部长科马罗夫斯基上将的一篇文章,说军事建筑业中已有许多企业改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

8月20日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刊登一篇题为《集体农庄市场》的文章,鼓吹在自由市场设中介商——“商业服务站”。这种服务站有权调节市场价格,保证价格降低。经过服务站销售的产品,每公斤比国营商业的低十五——二十戈比。服务站人员还亲自深入偏僻农村,以低价收购农产品。

8月22日 《真理报》报道,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坚持原则,坚定立场”。说“揭露在‘研究’苏联和苏共历史问题、世界共运、工运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方面进行活动的职业反苏分子和反共分子,是苏联科学家的一项最重要的职责。

他们应在反对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对毛泽东主义的大国反苏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起责任重大的作用”。说苏联“科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和效果之所以下降，是由于苏联科学院、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没有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组织、计划和协调等方面的新形式。社会科学的学术情报状况严重落后于当代的要求”，决议“促请科学研究机关、党组织和在哲学、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历史、法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注意更有效地和全面地研究巨大的理论问题”。决议并提出了在哲学、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苏共党史和其他历史科学方面以及法学等方面的一些“研究题目”。决议“委托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负责协调党史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批评在“有关苏共历史的著作中，对党的领导作用的无所不包的性质揭示得不够深刻。写综合性的巨著的工作做得不够积极，这种著作应当能够表明苏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以及它在十月革命后五十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发展方面的作用，深刻地揭示苏共同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民族主义偏向分子以及其他与党为敌的集团和潮流进行的斗争”。决议还要求“以苏共二十三大决议为基础，开展广泛的科学工作和大规模的宣传工作”。

8月29日 《劳动报》报道，在改行新体制后，运输企业与管理部门的矛盾尖锐化了。说“在某些企业里，运输成本有所提高”，“对于管理局来说，成本指标本来就是很重要的，因为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主要奖金正是靠降低成本来取得的”。“管理局千方百计地拉长运输距离和增加货运量，以使每吨

公里的费用（成本）降低。而运输企业为了利润则搞短途运输”。

8月30日 合众国际社自莫斯科报道，苏联对三个作家进行秘密审讯。他们是：德隆、布科夫斯基和库歇夫。罪名为出版一本反苏的地下杂志和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非法示威。布科夫斯基被判剥夺自由三年，两个同伙缓期执行。

9—10月

9月1日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刊登斯托穆叶雷的一篇报道，说位于苏联中亚心脏地区、有二十万居民的工业城市奇姆肯特于“6月10日成为大规模流血骚乱的地方”。“事情是以警察的野蛮行动开始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阿法纳西耶夫由于稍微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捕，他被拘留在派出所，遭到了有组织的痛打。”“不省人事的阿法纳西耶夫被送交给他的妻子。两小时后他死去了。”“激怒的人们立即把事情通知该城其他地区的同事。一群人聚集起来——突然间，几年来压在心头的对警察的仇恨爆发成了暴力行动。工人们袭击了市民警总部以及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克服了一定程度的抵抗之后，他们抢劫了上述两处建筑物，然后把它们烧毁。”

“于是这次暴动成为政治示威，每分钟都在增加的人群开始向当地监狱进行长达四英里的进军，目的是要释放狱中的人。”“害怕了的当局向七十英里外的塔什干发出了紧急的救助呼吁。”“坦克和装甲车火速地开来了，他们不发出警告就开了枪，并继续射击。几十人被打死了。”“到傍晚时，奇姆肯特

恢复了平静。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队在到处巡逻，逮捕幸存者。”

9月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第三十六期刊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全文如下：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在克里米亚居住过的鞑靼族公民》的法令：

在克里米亚于1944年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以后，曾经把在克里米亚居住过的鞑靼人中的一部分人同德国侵略者积极合作的事实，毫无根据地加在全体克里米亚鞑靼族居民的身上。这种对克里米亚鞑靼族全体居民不加区别的判决应予撤销，尤其是，已经有新的一代人进入社会的劳动和政治生活。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

(一)废除各国家机关关于对在克里米亚居住过的鞑靼族公民的不加区别的判决的相应决定。

(二)指出，过去居住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现在已定居在乌兹别克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土上，他们享有苏联公民的一切权利，参加社会政治生活，被选为最高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的代表，在苏维埃、经济和党的机关的重要岗位上工作，还为他们进行了无线电广播，发行本民族语言的报纸，实现着其他的文化措施。

为了进一步发展鞑靼居民区，委托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一如既往地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给予鞑靼族公民以支援和协助，并要考虑其民族利益和特点。

9月1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一项法令，决定恢复

被赫鲁晓夫取消的苏联勋章获得者的特权。这项新法律适用于苏联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三级荣誉勋章的获得者。这些特权将于11月1日生效。包括"个人年金"比通常付给一种特殊工作的年金要高，对获得住房有优先权(如政府认为一个高级勋章获得者的住房没有达到标准的话)，房租比一般情况低百分之五十，每年有一张在全国旅行的一级车票或船票供假期使用，市内交通免费(出租汽车除外)，一年一度在疗养院或休养所中免费度假。

9月15日 《共青团真理报》刊登勃拉根斯基教授和经济师别卡尔斯基的一篇文章：《经济核算的界线在那里》。文章反对"在各级都推行经济核算关系"。说"经济核算是不能无限制地推广的"。文章说，"经济关系有两个范畴。其一是计划组织范畴。要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就必须规定最主要的国民经济比例，并解决与之有关的价格问题、工资水平问题、财政和贷款政策问题。中央计划机关和经济机关以社会的名义从事这一工作。当然，这些机关无论是同下级机关和企业，或是在这些机关之间，都不应当建立任何买卖关系(要知道，没有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实行经济核算)。它们另有任务：对经济实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全国性领导，确定经济发展的前景"。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机关应当深入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对经济脉搏的任何跳动要有敏感的反应。为此必须使这种脉搏跳动得尽可能的清晰。经济核算的广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提高有助于做到这一点，不过是在另外一个范畴内：在总局和企业之间，按规定的比例直接付诸实现"。

“我们认为，要在这个领域推行现实的经济核算，首先应当把实行经济核算的部门性和部门一地区性的联合公司作为计划工作的下级基本单位。企业仍将是实行经济核算的主要生产经营环节。它们的经济自主性不应当受到限制。我们认为，联合公司一般说应当包括该部门设立在州里甚至共和国或大经济区里的所有企业。随后，可以根据所积累的经验，把联合公司的规模扩大到全苏范围（如全苏钟表工业总公司）。企业和联合公司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必须建立在全面经济核算之上，建立在互负经济责任之上，这里，联合公司的机构应把下级单位同其他企业和组织之间实行联系的最重要的职能集中起来，并有全权给加入联合公司的下级单位规定主要计划任务。正是这种管理形式符合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9月16日 法新社报道，“可靠人士今天在这里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波斯别洛夫已被解职。他自1949年起任该院院长，今年5月被解职”。“这些人士说，他的被撤换是在去年他本人同中央委员会中的元老派（老布尔什维克派）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之后。这个分析涉及到该院编的《苏共党史》第三卷”。“他们说，他（波斯别洛夫）歪曲某些历史事实，他们特别批评了他对当时列宁的伙伴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及其他人之间关系的叙述。”

《真理报》9月7日在一篇报道中证实费多谢耶夫已被任命为该院院长。

9月26日 塔斯社报道，苏共中央9月全会作出决定，说“鉴于谢列平同志已当选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中央全会免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9月26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福利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从1968年1月1日起实行下列措施：

（一）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人和职员的最低工资额提高到每月六十卢布。

（二）规定远东和欧洲部分的北部地区职工工资的比差。

（三）扩大对在极北地区和类似地带工作的人员的优待。

（四）把现在总的休假期为十二个工作日的职工休假期增加到十五个工作日。

（五）职工工资税继续降低和取消。

（六）职工暂时丧失劳动能力的补助额，工龄在八年以上者提高到工资的百分之一百，工龄在五——八年者提高到工资的百分之八十。

（七）改进优抚赡养，提高各种补助金额。

9月 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军事历史》杂志第九期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死后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他从来也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只是独自作出政治军事的决议。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10月10日 《真理报》转载《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苏共党员的情况：1967年上半年吸收了预备党员三十三万九千三百七十一人，到1967年7月1日，党员总数为一千二百九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六人。

"最近十年来，党员专家人数增加了二百五十万人以上。"

10月10日 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在最高苏维埃作关于1968年预算的报告。其中谈到"国际紧张局势要求对加强

防御能力更加注意，国防拨款为一百六十七亿卢布”。

塔斯社评论员阿尔捷莫夫在谈到此事时说：“与今年预算相比，国防开支增加了二十二亿卢布”。

10月12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了《关于企业、机关和团体职工改行有两个休息日的五日工作周》的法令。

10月12日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的《普遍义务兵役法》。民族院法案委员会主席尼沙诺夫说，新法律“有助于加强苏联的防御威力”。教育部部长说：“中学青年实行军训是一项及时的和必要的措施。”共青团中央书记帕斯图霍夫说：“苏联青年认为保卫十月成果是光荣的任务。共青团不断培养青年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警惕性”。

10月12日 塔斯社报道，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最高苏维埃作关于新兵役法的报告，说“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帝国主义的阵地已大大削弱了，但是其侵略本质并未改变”。帝国主义国家使“国际局势尖锐化，加剧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国防能力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战略火箭部队和国家防空部队的打击威力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战斗潜能是根本无法比拟的”。“现在迫切需要使兵役法中的一切条款完全符合党当前对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要求。”

报告说，新兵役法规定苏联陆军、海军航空兵、边防军和内务部队士兵的服役期限为两年；海军舰只和海军岸防部队以及边防军海巡部队士兵的服役期限为三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保留一年服役期。

新兵役法规定：缩短现役期一年，为全体居民规定统一的服役年龄为十八岁。原每年征兵一次，现改为两次。缩短适龄公民的缓征期。对青年进行初级军事训练。这种训练要对所有适龄前和适龄的青年按强制计划普遍进行，不因生产和学习而中断。新兵役法规定对正式学院的大学生实行缓征，业余学院和函授学院的大学生不予缓征，因家庭情况获得缓征权的人数将扩大。

关于最高应征年龄，新兵役法规定，得到延期服役或因其他理由而没有在规定期限内被征集服现役的人，在他们二十七岁以前可以被征集入伍。

关于军官服现役，新兵役法规定，扩大服现役的最高年龄，少尉和中尉为三十——四十岁，上尉为三十五——四十岁，少校为四十——四十五岁，上校为四十五——五十岁。

关于陆海军军官和士兵的预备役期限，新兵役法规定，女军官服预备役的最高年龄到五十岁，而女士兵的最高年龄到四十岁。

关于对预备役军人进行集训，新兵役法规定，集训总时间从三十六个月缩短到三十个月。

格列奇科最后说："只有不断加强的达到极限的军事力量，才可能抑制侵略者的好战欲望，保证我国免遭可能的突发事件"。

10月15日 勃列日涅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英雄纪念碑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下对这个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军事首长有：华西列夫斯基、瓦图京、沃罗诺夫、叶廖缅科、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罗科索夫斯

基、崔可夫、舒米洛夫等同志。这是军、师、团、营、连和炮兵连指挥员战斗技能的胜利。这是我军高度士气的胜利。我们也知道，为了这个胜利，军队的党组织、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政治机关的首长、我们的忘我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做了多少工作。”

10月19日 意大利《晚邮报》刊登奥托内的一篇文章，说“和我谈过话的不少人对斯大林都表示尊敬”。“对赫鲁晓夫的谴责是一致的、全面的，对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人们怀着一种含糊的等着瞧的想法。对这个政权的批评是相当多的。有一个人以讽刺的口吻对我说，资本家如果机灵一点的话，也会在他们的国家采取这种共产主义，因为这样做既没有罢工，又能拿着上级定的固定工资，确保自己的钱财不会丧失。这些批评给人们留下一个到处都有反对派的印象。”

10月22日 合众国际社据美国海军将领的消息说，苏联正在建造它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这些将领说，这艘航空母舰“将有远程航行的能力”。“显然，这艘航空母舰是计划在苏联大陆的界限以外使用的。”

10月24日 路透社报道，“西德内政部新闻公报今天说，在过去十年中，有一百多名共产党高级情报官员投奔西方”。“最近一名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搞秘密情报的中校叶夫根尼·隆格”。“(苏联星期日发表一项声明，否认隆格曾在秘密情报机构或军队中任职，并说，西方关于他的报道‘从头到尾是捏造’)。”

10月26日 《共产党人》杂志刊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利扬斯基的一篇文章，说“更迅速地发展重工业这一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党的首要任务”。“多年来

农业的发展比工业慢得多。”“苏共中央7月(1953年)全会制订了一项方针，这项方针的实施对进一步提高生产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然而，这些成果没有得以巩固。在七年计划年代里，农庄和农场生产发展速度减慢了。其原因不仅由于战后年代的特点和个别年份的欠收，而且由于在领导农业中所犯的错误。”“现在，高速度发展农庄和农场生产，象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一样，是客观的必要；这种发展速度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是生活所需要的。”“在目前条件下，特别重要的是保证社会生产所有部门的按比例发展，首先是确定工农业之间比较正确的比例。”“遗憾的是，远非经常考虑到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就抑制了农庄、农场生产的高涨，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初步估算，我国国民经济每年创造的纯收入中，农业部分大约占三分之一。然而，在一个时期内用于农庄、农场需要的钱，同这部分相比要少得多。个别领导人对农业问题的主观主义态度，造成了农庄和农场不能用自己的产品充分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的情况。”“苏共中央3月(1965年)全会决议意味着急剧加强对这一生命攸关的重要部门的注意。”中央全会“规定对农业进行大笔投资”。“急剧加强农庄和农场生产及其固定基金的增长速度，要求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作某些有利于农业的改善。”“在我们的计划和经济机关的一些环节里，正如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地指出的那样，至今还表现出来不理解最迅速地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仍然企图‘平衡’数字以利于其他社会生产部门，靠损害农庄、农场来纠正这些部门中的事情。”

文章还鼓吹“给农庄、农场领导者提供更多的解决一些问

题的主动权”,“普遍寻求可以保证农庄、农场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全年工作的途径”。“在农村，应建立越来越多的有良好设备的修理农业机器的小型工厂，而在冬季它们还能制造木器、建筑配件和构件以及各种用具，从而更广泛地组织生产建设和住宅建设”。

文章谈到“进一步完善价格制度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遗憾的是，实践中有过、现在仍时有发生的大大背离等价交换原则的现象，不能经常保证严格遵守国家和农庄利益的一致，以及农庄生产中积累和消费的程序”。文章承认“农庄庄员不得不注意搞自己的私人副业”，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私人副业在农产品生产中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农庄庄员和职员的私人经济，并不妨碍公有经济的加强。”文章指责“一些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至今还不理解”改行有保证的报酬制的意义。“国家银行的个别领导人甚至不止一次地企图阻挠实行有保证的报酬，阻挠给有保证的报酬发放贷款。这种行为只能说明他们在政治上鼠目寸光。”

英国《每日电讯报》10月26日说，波利扬斯基的文章暴露了执政的十一人政治局中存在的分歧。波利扬斯基—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中的联盟只能是针对柯西金总理和他的不知名的支持者的。

意大利《晚邮报》10月27日说，波利扬斯基在文章中说有些人“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在我们的计划经济制度中迅速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这种态度是“十分危险的”，这句话“可能是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勃列日涅夫指的是谁呢？最合乎逻辑的假设是指柯西金。”《晚邮报》还说，“三星期

前，柯西金在基什尼奥夫说，苏联已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和机械化的农业，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到消费品生产上的条件已成熟。这种态度在苏联政府中最近是占优势的”。1968年的国家预算中，“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要超过重工业，同时削减了对农业的投资”。该报说，“这篇文章披露了主张迅速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柯西金和提倡经济更加平衡的发展的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对立”。

10月26日 路透社报道，最高法院院长戈尔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制订法律的人正在考虑从某些种类的罪行中取消死刑”。戈尔金还说，“1953年犯下的错误不会重演，最高法院已建议不对那些犯有‘特别危险’的罪行的人实行大赦”。

10月31日 最高苏维埃发布大赦令，说“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并本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对那些初次犯有对社会主义无很大危害性的罪行的公民可以实行大赦”。

“大赦适用于被判处剥夺自由两年以下的人以及被判处剥夺自由五年以下的某几类人。”

11 月

11月1日 英国《卫报》刊登佐尔扎的一篇文章，说苏共党史出版前争论激烈。“这本书1966年9月送往出版社，直到今年6月才签字付印。这件事大大地有助于证实：关于此书内容的分歧意见一直上达到领导本身。”还说“此书第一稿

的主要反对意见来自三十四名‘老布尔什维克’，他们给克里姆林宫写了一封信，于是克里姆林宫批准他们同编写此书的官方党史学家举行一次会议。偷运出来的会议记录表明，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站出来为这场革命中‘被消灭的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辩护，要求‘确切地、忠实地’叙述这场革命”。“事实上是走向修改官方对三十年代事件的说法的第一步。”文章还说，“草稿中对托洛茨基的判断，受到了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挑战，他说：‘你们写道，托洛茨基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而你们却对斯大林以斯大林主义代替列宁主义不作一声’”（按：这本党史最后保留了原来对托洛茨基的判断）。

11月4—5日 《真理报》刊登十五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的讲话。

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谢罗夫说，白俄罗斯的党员、工人阶级、集体农民、知识分子“今后仍将象儿子一样忠于自己亲爱的党，忠于自己的不倦地加强社会主义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威力的神圣职责”。

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说，“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有原则性的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由于历史命运的意志，哈萨克人一向认为自己是伟大俄罗斯的忠实儿子”。

立陶宛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涅奇科说，“立陶宛共产党给予任何民族主义表现以坚决的回击”，它“一向神圣地维护、今后仍将维护和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友谊”。

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鲍久尔说，“在同伟大俄罗斯人民的永世牢固的联盟中，体现着我们的力量和未来胜利的

保证”。

11月6日 英国《约克郡邮报》发表社论，说“俄国发生了变化，而且正在变得同列宁——更不用说马克思了——原来打算的或者期望的那样比起来面目全非了”。

11月7日 英国《卫报》发表社论，说“现在克里姆林宫的论点，同列宁为他的继承人所拟定的论点大不相同”。“在苏联和美国，如果要使工业管理效率高，其组织方法就必须类似。在组织形式上，可能有地方的差别，但是它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差别，都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所以从经济观点上，美国人责骂已经死去的共产主义之手，或者共产党人仍用过去那一套陈词滥调来看待资本主义，都不再有什么意思了。两者都在一起玩同样的游戏，现在的鸿沟是在经理人员和被他们管理的人之间。”“随着苏联在经济组织方面变得更象美国，两国的对外政策也愈益变得更相称。象竞争一个国际市场的两家大公司一样，这两个超级大国允许并预计到在他们势力范围的边缘，影响会有某种起落，但是哪一方都不认真地希望或企图把对方挤垮。”

11月7日 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阅兵式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党考虑到已经形成的局面，正在尽一切力量进一步提高国家的防御威力，加强苏联陆海军的战斗准备”。

11月8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多年未曾出现的苏联海军陆战队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参加了莫斯科红场的军事检阅。

11月9日 日本《每日新闻》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谷

烟的一篇通讯，说“三头体制（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在这三年中一直在坚实地加强着权力基础”。“所谓的经济政策（利润导入方式）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三头体制的作用和特征。这不是他们首倡的，而是前任赫鲁晓夫痛感其必要并极力主张过、但却终于未得实现的政策。新政策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它并且试验了它”。

文章说，“苏共党内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意识形态官员的衰落和技术官员的上台”。“1967 年 1 月 1 日在一千二百六十八万名党员中有二百零九万是大学毕业的优秀知识分子。另外，在过去十年中入党的大专学校毕业的技术官员和专家数目达到了二百五十万。这在百分比上没有超过工人、农民。但在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年轻的领导’阶层。”

11 月 11 日　列宁格勒军区政治部宣传鼓动处处长特卡契夫上校在《红星报》发表一篇谈军官“思想理论修养”的文章，说“党组织应当在保证共产党员政治学习的高质量方面起特别重大的作用。它们应当利用一切监督形式来监督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思想成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训练班的评语逐年载入军官的个人档案是合理的。”

11 月 17 日　《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十月》杂志主编科切托夫、《青春》杂志主编波列伏依和《文学报》主编恰科夫斯基获得列宁勋章。叶夫图申科获得功勋奖章。

11 月 19 日　社会治安部部长谢洛科夫对《消息报》的《星期》周刊发表谈话，说“现在民警的主要注意力是用于制止和防止罪行”。“在国内，匪帮早已绝迹，强盗行为这个字眼本身已从我们的字典中消失，已不存在有组织的匪帮了”。

11月19日　美联社援引"五角大楼人士"的话说，"苏联显然正在建造第二艘直升飞机母舰"。"这种发展是一种迹象，说明苏联人可能在模仿美国，建造一支能够用类似海军陆战队的部队来干涉海外危机的力量"。

这些人士说，苏联第一艘直升飞机母舰的存在，是仅在大约一个月前才透露出来的。它长约一百八十米，不到三万吨，现正停泊在黑海敖德萨附近进行装备。

11月30日　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在《红星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共产党对武装部队的领导、加强党组织在陆海军中的作用和影响，是军事建设的基础的基础"。"苏共的政策是军队战略领导的基础。""党在制定和执行军事政策时，考虑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军事潜力本身的看法的各种条件和新的因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军事联盟的任务和其他问题一起提上了日程。"

12　月

12月18日　《真理报》刊登三封党员来信，其中一封（机械压力机厂工程师写的），谈到由于批评了车间主任、总建筑师而被剥夺奖金和被迫离开工厂的情况。说在基层党组织中发言的，"基本上就是车间党组织的书记和那些由于职务不能不发言的人。普通党员却是沉默"。还说"许多党员缄口不言，没有表现出真正的积极性"。

12月19日　《红星报》刊登海军中将、总参谋部学院副

教授、教研室主任契罗科夫的一篇题为《海军的突击力量》的文章。文章说，苏联正在“建设一支经过妥善平衡的、能解决进攻性的战略任务的远洋海军，一支潜水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水面舰艇及其他兵种得到和谐发展的海军”，说“潜水艇部队和海军航空兵是海军的两个主要兵种，核武器是达到战役目的的主要手段”，“苏联海军已变成一支进行远距离活动的现代化军种，成为最高统帅部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它能够在辽阔战场上对武装斗争的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今，海军军事技术的发展目标是探讨如何最有效地和真正科学地使用海洋舰队的强大的战役战略能力”，“例如海军直接打击侵略者的基地和领土的能力”。

12月20日 《真理报》就保安机关成立五十周年发表社论，说“国家保安机关，同武装部队一起，构成了国家强大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从他们诞生的最初日子起就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可靠盾牌和利剑。”“国家保安机关在前几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同间谍活动、经济上的反革命活动进行了胜利的斗争。在他们协助下，国际和国内反革命破坏国家国民经济的企图遭到了破产。”社论还说，“同整个国家机器一样，我们的国家保安机关最重要的特点乃是同人民的紧密联系和受到劳动人民的广泛支持。”“共产党始终不渝地遵循列宁关于加强我国保安机关以及它们同广大劳动群众的不断联系、关于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指示。列宁的指示乃是教育肃反干部以及他们一切实际活动的基础。党的直接的日常的领导是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力量的主要源泉，是它们成功地完成自己任务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取得

胜利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团结的条件下，国家保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免遭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的危害并及时揭穿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计划。”

12月21日 美联社报道，苏联四名知识分子在列宁格勒被判刑，罪名是“阴谋推翻共产党政权”。这四个人是在今年3月因“发现了暗藏的武器”而被捕的，他们还被指责“犯有叛国罪”，“参与了在苏联三个主要地区的秘密的反对派组织”。这四个被告中，一个是列宁格勒大学的西藏问题专家奥古尔佐夫教授，被判剥夺十五年自由。另一个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全集编辑委员会的一个秘书欧根·瓦京，被判处十三年徒刑。另外两个没有宣布姓名，一个被判十三年徒刑，另一个被判八年徒刑”。案件涉及到“包括作家、教授以及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有关的学生”，“总人数在二十五——四十人之间”。

12月23日 《消息报》宣布苏联撤销部长会议所属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12月23日 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维埃乌克兰建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共产党用列宁的民族问题纲领，用工人阶级鲜明的民族团结立场以及各族人民平等、友好和博爱的社会主义思想来对抗无原则地玩弄民族感情的做法。这种思想一直在我国占上风。”他还说：“各民族彼此接近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里不允许有轻率的急躁，不允许有人为的强制，不允许任其自流。在这件事上，既应当考虑到各个社会主义民族的利益，也应当考虑到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及整个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1967年底 苏联恢复了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撤销的陆军总司令部，并指派国防部副部长帕夫洛夫斯基兼任陆军总司令。

1968年

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东欧国家的政局动荡、西欧国家人民运动的高涨以及8月苏修武装侵捷，在苏联国内外造成很大影响，给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带来很大困难。苏修叛徒集团从各方面大大加强了军国主义化和法西斯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把社会治安部改组为内务部，加强了民警，对人民的思想和政治控制也加紧了。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苏联历史上最高的军事预算，勃列日涅夫叫嚷"必须加强国防"，"应对局势的任何剧烈转变作好准备"。远东军区司令要远东苏军"处于高度战斗准备状态"。同时，加强了对苏联人民，包括中小学生的军事训练。

在经济方面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新阶段"。5月间，召开了"全苏经济会议"，最高苏维埃12月会议通过了《苏联土地法立法原则》，并且准备在总局和部一级实行"新体制"。

这一年苏修外交活动中心是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8月，苏修公然出兵占领捷克，在武装侵捷后，苏联的外交活动，包括同西方的对话，一时几乎处于瘫痪状态。11月，勃列日涅夫提出"有限主权论"，为侵捷辩解。

1—3 月

1 月 4 日 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就实施缩短服役年限的新兵役法在《红星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新法律旨在使陆军和海军中的青年军官固定化，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和权益状况”。“新的普遍兵役法旨在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和武装力量的战斗威力”。之所以颁布这一新法律，是“由于有必要加强人民的军事训练”，因为“人类又感到面临着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事实”。

文章说，“现在，在青年入伍前对他们进行训练的意义提高了”，“这项工作今后将进一步加紧进行”。

1 月 13 日 据《莫斯科晚报》报道，莫斯科市级法院判处青年知识分子加兰斯科夫、金兹伯格、多勃罗沃利斯基、拉什科娃刑期不等的徒刑。他们的“罪名”是“同外国反苏组织有罪恶联系”。

据 3 月 27 日出版的《文学报》第十三期在主编“答读者”中透露，苏联文艺界对此表示怀疑和不满。

1 月 18 日 《红星报》刊登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莫斯科军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格列奇科在讲话中强调说，由于“世界形势可能发生种种意外以及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挑衅”，“我们要尽一切能力来使每一个军人(士兵、军官、将军)经常十分敏锐地感觉到必须进一步提高警惕性和战斗准备”。他说，在使军队经常保持战斗准备方面的任务日益提高了，因此，“关于军队士气和党政工作的决定性意义的列宁主义原

理，现在已特别现实地表现出来”。

1月22日 苏共召开“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人员会议”，研究“苏维埃政权五十周年和党组织在文化方面工作的某些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各部部长、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俄罗斯联邦各边疆区、州党委书记和主管意识形态的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中央报刊编辑。

1月24—26日 物资技术供应经销和组织问题科学研究所在莫斯科举行“完善物资技术供应工作问题”的学术会议，讨论生产用物资的批发贸易问题，鼓吹生产用物资的供应向自由批发贸易过渡。

1月31日 《消息报》刊登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为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二十五周年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必须对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作出应有的评价。

2月14日 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宣布自1968年第二季度起，第二批四百个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制。决议责成农业部和各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向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提出根据本决议而实行过渡到全面经济核算制的这批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改变计划的必要的计算，但不改变联盟与各加盟共和国预算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银行将在上述计算的基础上对1968年的长期贷款计划、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出必要的变更（按：第一批三百九十个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是根据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1967年4月13日决议，于1967年开始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

2月16日 中央各报发表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布的

《关于为基本建设配备干部的措施》的决定。决定中谈到，"在建筑业生产的组织工作中，仍然没有消除严重的缺点。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部门没有完成投资计划，没有克服新生产设备投入生产方面的落后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固定的技术熟练的建筑干部。

决定强调说，"先进的劳动报酬和劳动刺激体制的广泛采用，各环节制定定额和经济核算的有效方法，应当对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决定认为"有必要在建筑方面优先实施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指示中有关提高中等工资工作人员工资的规定"。

2月16日 斯特鲁米林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利润》的文章，指责利别尔曼的"最大利润原则"。文章把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同二十年代的新经济政策相提并论，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国都必须在经济政策方面作断然的转变"。"在这两个阶段，向照顾最落后的经济部门的需要这方面转变，首先要考虑到市场在价格形成上的决定作用"，即价值规律。

文章说，在这两个阶段，都有"某些热心的人"鼓吹"最大利润原则"。文章指责利别尔曼的"最大利润"原则"忽视社会积累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文章还说，"要知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有依靠高价才能取得高额利润"，而高价只会使劳动者"工资的实际价值降到最低限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是靠工人暂时放弃一些消费而形成的，主要是为了扩大生产"，但是，在扩大生产基金增长的同时，工人的日常消费基金也应当增长，"只有能保证这两种基金都得到"

合理比例下的增长的"那种计划和价格才是最合理的"。

文章反对某些人要求把"全部剩余的利润由企业独立支配"的主张，说这种主张会使经济上的比例失调扩大到不能允许的地步。

2月17日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格勒州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经济是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主要战线，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他吹嘘苏共二十三大和1965年以后苏共中央全会"所制定的发展工农业的经济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说"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方面的情况也有显著好转。"

2月21日 苏联元帅崔可夫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谈民防问题。他说，"只有全盘解决国防问题，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战胜敌人。""苏联的武装力量配备有最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它永远处于战备状态。然而，现在很难完全保证，敌人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一点都不会命中目标。"一旦发生"火箭核战争"，"将没有前线和后方的界限"。"不仅武装力量，而且交战双方的居民及其经济"都将卷入战争。因此，应不断改进训练居民免遭大规模杀伤武器伤害的组织工作，加紧宣传民防的意义。

2月21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修改和补充军事法庭条例》的法令，其中规定：

(一)除了根据军事法庭条例第八条成立的军事法庭外，还可以根据需要成立武装力量各军种军事法庭。

(二)由某一军种、军区、军队集群、舰队等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转到另一军种、军区、军队集群、舰队等的军事法庭，要

由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在某一军种、军区、军队集群、舰队的范围内转交案件，则由相应的军事法庭庭长决定。

（三）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编制内的军官职位的名单和与这些职位相应的军阶，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最高法院院长和国防部的共同提名予以批准。

2月23日 苏军建军五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一节日前后，苏联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并发表了不少文章，炫耀武力，鼓吹加强战备。

《真理报》1月23日发表社论，强调战争威胁，说"目前的国际局势又孕育着以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企图挑起的战争冲突"。"苏联人民认为""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是自己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义务"。社论要求"宣传（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全面开展"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红星报》同日发表建军五十周年宣传提纲，说"帝国主义越来越经常地企图在军事挑衅和直接武装干涉中寻找出路"。苏联正在"大力加强国防"，"尽一切努力不让任何人使我们措手不及"。

总参谋长扎哈罗夫1月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帝国主义依然是战争危险的经常的根源"。因此，必须"使武装力量处于常备状态"，"永远保持警惕，不让侵略者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扎哈罗夫吹嘘苏联各军种的"威力"，其中提到了海军，说"苏联海军的实力及其进入世界大洋，终止了曾流行一时的所谓帝国主义国家海军在海上独霸统治的观点"。

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2月14日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拥有能够有效地完成各种任务的远洋舰队"。苏联的"海军陆战队是特种用途的优良部队"（按：这个部队在

去年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第一次参加了莫斯科的军事检阅)。它的"战斗装备和各种技术装备保证它行动神速、攻无不克"。苏联的"全部海军力量保持经常的战备状况"。2月11日,戈尔什科夫还曾在《红星报》发表一篇文章,宣称苏联正在建立一支能打核战争的"远洋海军潜水航空舰队"。组成这种舰队的有:核潜艇、火箭、潜水艇、带火箭的海军航空兵、"高度机动的"海军陆战队及岸上火箭炮兵部队。

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2月23日在建军节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说"现代帝国主义远不是'纸老虎'","我们应该格外警惕","最危险的事情是对敌人估计不足和以我们更为强大而自慰"。并说苏联"武装力量的一个决定性军种"是"战略火箭部队"。

格列奇科还谈到斯大林主持国防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他说,"由于力量对比一开始不利于我们而产生种种困难,加重了对法西斯德国进攻的可能期限的估计的某些错误,加重了同这有联系的在进攻开始时就予以反击的准备工作方面的疏忽"。"苏联变成了统一的战斗营垒。为了使前线和后方的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主持的国防委员会。党使苏联人坚信我们的正义事业将胜利。它制定了一个广泛的、十分全面的、彻底粉碎侵略者的斗争计划,并使自己的一切活动服从于这一计划的实现"。

2月27日—3月4日 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谢列平作中央理事会工作的总结报告,强调"实现经济改革原则的工作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竞赛的主要内容"。"随着过渡到新的经营体制,工资的提高密切相关地取决于企

业工作效率的提高。”

谢列平再次当选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大会对工会章程作了修改。修改的部分指出："工业管理的部门原则、始终一贯地实现经济改革、扩大企业的权利和经营独立自主性，这一切会进一步地提高工会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任务、制定国家计划以及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方面的作用。”

3月4日 《真理报》刊登鲁米扬采夫、哈恰图罗夫等的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与商品生产》的文章，指责对价值规律存在两种错误解释，说“有些经济学家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商品生产的存在，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在承认商品生产存在的同时夸大地解释价值规律，没有充分强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作用的原则性区别”。文章说，对价值规律“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同经济改革的全部意图及其实际措施大相径庭的”。“不断完善运用”价值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和共产主义建设有重要意义”，价值规律在达到国民经济必要的比例方面“起着很大作用”。而“赋予价值规律以主要调节者的作用就意味着转到‘市场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有人建议以自由买卖代替农产品义务交售计划是对价值规律调节作用“估计有些过高”。固定交售计划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证农场、农庄赢利“起巨大作用”。

3月12日 远东军区司令洛西克在《远东》双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竟诬我为大战新发源地，说“以美国统治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和毛泽东集团方面的不断挑衅，

前所未有地产生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真正威胁”，“帝国主义军队在远东的活动和毛泽东集团的反苏路线，前所未有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远东的苏军要提高警惕性并处于高度战斗准备状态”。

3月29日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莫斯科市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党的铁的纪律”和“加强纪律”。说要“正确地、列宁式地运用批评武器”，而不要“庸俗的批评”。强调不仅要“思想一致”，而且要“行动一致”，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说“有人认为党的纪律在经济和民主改革时期已失去尖锐性，这就大错特错了”。强调不论在什么时期，包括“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都需要有严格的自觉的纪律”。“对违反党纪国法的干部，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过去有什么功劳，都要严加处分”。

他宣称，“所有党组织都一致赞同和支持”苏联的内外政策。“党在苏联人民中有着巨大威望，得到高度信任”。

他说，“现在正在进行尖锐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帝国主义者正在利用“知识分子中思想不成熟和动摇的表现”，“他们指望的主要是民族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说“各种反苏组织和机构正在搜罗那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人，而那些爱好吹嘘、用各种政治上可疑的手段夸耀自己、不嫌弃我们的思想敌人的奉承的人往往落进这些反苏组织和机构的罗网。苏联公众严厉谴责这些两面派人物”。“背叛者是不能指望不受到制裁的。”他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中，“首先是”“对青年的教育，这是全党、全国的大事”。

勃列日涅夫还谈到了经济问题。他说，“要在今年完成工

业、建筑和运输部门向新的经营管理体制的过渡”。各级党、政、军组织“在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效果方面面临着更大量的工作”。“目前要求把中央集权同地方的首创精神，把计划工作同经济刺激，把委员制同个人负责更好地结合起来。”说“党采取的使消费品生产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接近起来的方针正在顺利地贯彻”。“农业情况也有好转。”他要求党组织和经济领导人在关心每周两个休息日的同时，“应该毫不松懈地注意”五个工作日的“更有效的利用”，“更迅速地解决有关每周五日工作制的劳动组织问题”。说“应该在不断加强共产主义觉悟的同时，把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说“把一切都只是归结为物质利益是不正确的，这会使苏联人的内心世界贫乏化”(按：西方通讯社认为勃列日涅夫的这次讲话是苏联对捷、罗事件的反应，是“对苏联知识分子最强烈的公开回答”。《真理报》社论说，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谈到了各级党组织“在现阶段的迫切问题”)。

3月 《新时代》杂志第十期载文，主张“外贸组织专业化”，鼓吹生产企业直接同国外市场挂钩，以捞取外汇，“刺激生产”。

俄罗斯联邦作协刊物《莫斯科》杂志第二期在一篇题为《土地的灾难》的文章中透露：苏联的土地由于侵蚀，每年造成的损失达四十亿卢布。仅欧洲部分遭受水蚀的耕地就有近五千万公顷。乌克兰的农业用地有三分之一变劣，阿塞拜疆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遭水蚀，哈萨克受沙暴侵蚀的耕地已达二千万公顷，等等。

文章赞扬1948年通过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同时影射赫鲁晓夫对这一伟大计划的攻击。文章说，“斯大林不是农业专家，也不是林业专家”，但“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国务活动家”，“他善于爱惜国库和倾听专家们的意见”。1943年他在林业方面作出的决定至今仍是惊人的，他批准的改造自然计划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和全世界的赞赏。文章接着不指名地指责赫鲁晓夫取消上述改造自然计划和攻击草田轮作制，说赫鲁晓夫在1962年3月5日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背离了真理”，“是不顾事实说话”。

3月 《经济报》第十一期透露，苏联在一些企业搞“裁员试验”。

1—3月 各州和边疆区陆续举行党代表大会，讨论生产情况，“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以及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央政治局委员除谢列平和波利扬斯基外，都分头下去参加了会议。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2月中旬分别在列宁格勒州和明斯克州党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

4—5月

4月3日 《经济问题》杂志第四期在一篇题为《使用物质奖励基金的某些问题》的文章中供认，物质奖励基金的绝大部分为特权阶层所侵占。文章说，“大部分企业把从利润中抽出的物质奖励基金主要用于提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工资”。“奖金在工人工资中的比重仍然很低”，“有些企业，尽管用来奖给工人的款额不大，却也没有全部使用。”而用于奖励

技术人员的奖金中大部分又为“总设计师”、“生产科科长”、“工程师”等特权阶层所得。

4月5日 《消息报》发表评论，强调“没有法制和法律”不行，“民主有一定的界限”和“限制”，攻击有人“庸俗地理解民主”，有“小资产阶级的松懈现象、无组织性、无政府主义”。指责“资产阶级辩护士”“力图动摇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信任”，说要认真“应付”敌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计划”。

4月8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村镇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力和义务》的法令，规定大大扩大村镇苏维埃在计划工作、拨款、土地利用方面的权力。

同日，部长会议还通过《关于加强村镇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物质财务基础的措施》的决定，其中规定了扩大村镇预算收入来源的措施。

4月9日 《消息报》刊登《婚姻和家庭法原则》草案，供“全民讨论”。6月27日，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了这个《原则》。

4月9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队伍统一，行动一致》的社论，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作用”。社论说，党解决的任务越艰巨，它的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就要越高。要“进一步增强党的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力”。

4月9—1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运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会议就这一报告通过了决议。

决议强调要加强苏联人的“思想坚定性”，说在当前的情况下，“同敌对的意识形态作不调和的斗争、坚决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对苏共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以

及加强党的整个意识形态活动，具有特殊意义”，要求各级党组织“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攻，积极反对想在某些文艺作品和其它作品中带进与苏维埃社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观点的企图”。要求它们用“现有的一切思想教育手段”，加强苏联人的所谓“共产主义信念”、“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感情”，“加强思想上的坚定性和抵制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影响的本领”。

决议还要求“进一步加强”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威力”。

全会选举原高尔基州委第一书记康·卡图谢夫为苏共中央书记(按：此人生于1927年，1951年后当过设计师和汽车厂的总工程师，1952年入党，二十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4月12—14日 《真理报》就苏共中央4月全会连续两次发表社论，吹嘘国内“团结”，鼓吹“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加强“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工作”。社论强调，“全会关于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指示特别重要”。“同敌对的意识形态作不调和的斗争”具有“特殊意义。”说“帝国主义决不可能削弱苏联人民在党的周围的团结”。要求“更加关心对劳动者的思想锻炼”，特别指出“对青年的思想教育，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

《消息报》4月11日也发表社论，重弹4月全会调子。

4月中旬—5月间 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党组织都大抓“贯彻”4月全会决议。全会以后，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动到各地参加“党积极分子会议”，作报告，进行思想灌输。各共和国党中央及各级地方党组织也举行会议，根据4

月全会决议，讨论加强思想控制的问题。莫斯科党委会全会就叫嚷要“反击异己观点和情绪的任何表现”，并说意识形态工作要“特别注意组织劳动人民实现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发展生产和提高生产效率的范围”，“它的最重要方面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4月21日 《消息报》载文，宣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说“破坏党的领导作用”的“这种企图对工人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4月22日 《真理报》就列宁诞辰发表社论，说“在当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急剧尖锐化的条件下，加强每个共产党员和苏联人的共产主义信念、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培养思想的坚定性和抵制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影响的能力，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4月25日 苏联颁布一项《关于苏联公民申诉》的法令。法令说，根据现行关于失职的法律规定，凡是无视这种申诉或拖延采取行动的官员应该受到纪律处分或面临刑事诉讼。法令还规定，任何“怀有中伤目的”提出不满意见的人也要受到法律处分。

4月30日 合众国际社报道说，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费多谢耶夫在为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五十周年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斯大林“尽管有严重错误，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出了一些重大贡献”。费多谢耶夫说，斯大林的一些理论著作，特别是有关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4月 《经济报》第十七期刊登两个经济学副博士的一篇文章：《工业和商业：经济联系》，鼓吹把工商企业之间签订的供货合同作为国家计划的基础。说“这种制度要保证主要的国民经济比例同工业企业按照商业定货来确定产品产量和品种的巨大业务独立性结合起来”。文章还鼓吹“改变制订计划的程序”，说“工业企业同批发基地、百货商店以及这种产品的其他大买主建立直接的合同联系，是合宜的”。要“使工业企业有权同商业组织一起在一定的范围内修改某些种类商品的现行零售价格，并确定新产品的价格。”

5月14—17日 全苏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和改进经济工作的任务的报告，许多经济机构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在会上发了言。

“会议认为，1969年应该把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实际地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领域”（按：1965年苏共中央9月全会原定在1968年在工业企业中完成推行新体制的工作）。

（一）会议鼓吹，在从现在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中，首先要在各企业内部进一步贯彻“新体制”，把这种“体制”的主要原则“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推行到企业的每一个环节。不仅要把“产品销售和利润这些指标转到所有生产车间”，而且要在辅助车间、工段、生产队和企业各科室都改行“经济核算”。还要推行“班组和个人经济核算”，做到使每一个工人“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更有效的劳动，怎样和在什么范围内，才能得到不仅以工资的形式、而且以物质鼓励基金的特别偿付的形式提供的奖励”。同时要大大扩大车间主任的权力，让他

们根据本车间的利润提成，建立自己的奖励基金，自行制订本车间的奖励条例。

（二）为了提高企业负责人制定“紧张的”计划、追逐超额利润的兴趣，会议决定把过去在企业实行的名目繁多的奖励制度和各种“经济刺激基金”提成办法，改成单一的按“稳定的”定额从利润中提成的办法；把原来的按计划利润提成，改成按实得利润提成。

（三）在“使领导各企业和各部门的方法完全适应新体制的要求”的名义下，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部门的领导体系按照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蓝图进行大改组，全面推广建立大型生产联合公司的所谓“试点经验”。巴伊巴科夫在报告中鼓吹，这种按照“全面经济核算原则”经营的大型工业联合公司可以使“中小型工厂加入具有大型生产的各种优越性的现代化组织系统”。

（四）会议决定推行生产资料的自由买卖制度。巴伊巴科夫在报告中说，“必须通过批发贸易来完善计划分配生产资料的做法。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直接联系的基础上发展批发贸易的同时，向通用生产资料买卖过渡就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主席在发言中表示，要“逐步向生产资料的批发商业过渡”。

（五）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改变国家同企业的关系，鼓吹取消国家对企业的集中投资，同时，扩大企业制定产品批发价格的权利。巴伊巴科夫在报告中一方面要求“在价格形成方面实行国家统一领导和控制”，但又说“这并不意味着全部价格必须由中央规定”。鼓吹“更快地用工业本身的资金和苏联建

设银行的长期贷款来代替预算拨款进行建设”，建立一种“企业同国家财务关系的新形式”，按照这种“新形式”，国家将越来越不过问企业生产情况，而只以拨款或贷款形式把钱交给各企业，而企业则以“基金付费”或利息的形式分一部分利润给国家。

（六）会议鼓吹大规模裁减职工人数，加强劳动强度。巴伊巴科夫在报告中说：“要使劳动报酬制度促进兼职，在减少职工人数的同时增加产量”。

近一年来，《经济问题》杂志刊登了不少谈生产联合公司的文章，鼓吹从工业部到企业全部实行“经济核算”原则，建立工业部——生产联合公司——企业三级“经济核算管理体制”。其中的生产联合公司是“大型的地区——部门性的生产综合体”，它应包括几十个生产企业，以及科学、设计、情报等单位，工业部则通过联合公司领导下属的企业。认为这种联合公司，“第一，可提高生产社会化的水平；第二，可组织部门内专业化和合作化的合理体系；第三，更便于组织产品销售和研究行情（这点在发展市场联系的条件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文章还鼓吹在制定联合公司的方案时，“应利用”美国的“组织系统图”，“说不能轻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管理的经验”，现代最大的工业垄断组织的管理结构是：中央机构——康采恩分公司——企业。宣传资本主义康采恩的“最新管理趋势证明，销售、供应、运输、保管等在康采恩范围内集中化是合理的”。

5月19日 《红星报》刊登萨夫罗诺夫中校的一篇文章，指责苏联作家写的关于战争的作品只谈痛苦与死亡，说这样

就“贬低了艺术在培养人们以乐观的态度对待战争结果的作用”，鼓吹多写“爱国主义题材”，多写今天的军人生活和“以党性的态度描写战争”。

5月 电影工作者协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格拉西莫夫在会上作《苏共中央4月全会的结果和苏联电影事业的任务》的报告。

5月 苏联革命组织“斯大林小组”散发一篇题为《文化革命的真相》的文章，极其热烈地赞扬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痛斥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和无耻诽谤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行径。

5月 《十月》杂志第六期刊登一篇题为《不应该忘记！》的文章，为已被禁止出版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一些作家的长篇小说，如《幸福》、《顿巴斯》和剧本《难忘的1919年》等鸣不平。文章指出，1956年以后，许多以前已不出版的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书得到了复生，与此同时却“开始渐渐地、然后是更加露骨地忽视”上述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不准它们再出版，这只是因为这些作品中描写了斯大林。文章强调战后初期是苏联文学极有成效的发展时期，“需要把今天也能作为导师和朋友的文学作品还给读者”。

6—7月

6月2日 《红星报》就《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按：作者是当时总参谋部的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发表评论，谈到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承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功而

坚定地指挥了军队”，说这是苏军获胜的“一个重要条件”。还说“书中客观地、用具体例子说明了最高统帅斯大林的作用”，“本书激起了为我们的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我们的最高军事领导而自豪的感情”。

《书评》第二十五期刊登总参谋长扎哈罗夫的一篇称赞什捷缅科回忆录的文章。文章说，“卫国战争期间，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及其工作机构总参谋部牢牢地掌握住了对战争和战役的计划和领导”。“大家知道，方面军或军队集群的每一变动无不得到它的同意，可是，我们觉得，仍然不能把前线上的每一次失利，特别是战争初期的失利，都归咎于大本营和总参谋部”。扎哈罗夫认为什捷缅科的回忆录“有助于不受激烈事件的压力而镇静地来评价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说书中所列举的事实“相当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在指挥各方面军的活动方面的作用有多大。并且驳倒了某些显然贬低最高统帅部的作用的叫嚣”。还说书中引用的证据“反对那些想歪曲历史真相，胡乱寻找有关某些个人的无用的编造材料的人”。并说大本营否定赫鲁晓夫的一次建议是正确的。

6月8日　《红星报》载文，鼓吹要“培养苏联人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情感”，指责一些作家“歪曲苏维埃国家和苏军的历史”，“歪曲社会主义现实”，“受伪造历史的人的支配”，“粗暴地歪曲了苏共在战前时期和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政策”。还指责《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中的某些文章“违背历史真实”，“把(苏联工业化时期)工业的高速度发展说成是‘斯大林及其左右’的错误，说什么他们违背国家的现实可能性并使‘人力过

度紧张'"，等等。文章说，"这种歪曲大大伤害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无助于爱国主义教育事业，特别无助于对青年的教育"。因此必须对"这种做法实行坚决的进攻战"。

6月12日 共青团中央全会选举叶·佳热利尼科夫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解除谢·帕夫洛夫的第一书记的职务。

6月25—27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问题。葛罗米柯在会上作报告恶毒反华。会议就这一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婚姻和家庭法的新原则以及加强保健工作的决议。

6月 苏联发表《土地法立法原则》草案，供"全民讨论"。

6月间 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如塔吉克、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召开全会，专门讨论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问题。

7月2—4日 全苏教师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普及十年制教育问题。教育部部长普罗科菲耶夫作了《关于普通中学的现状和进一步改善其工作的措施》的报告，提出要在1970年完成普及十年制教育的过渡，说"这将成为全民文化和技术进一步高涨的重要手段，是克服现有的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最有力的杠杆"。

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反对想要消灭艺术家个人特点的企图"。"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揭示困难、不良现象和错误。但是，对生活及其矛盾以及新与旧的斗争的深刻过程的艺术描绘，同被我们的敌人称之为所谓'自由'的艺术创作顶峰的那种仅仅片面地揭示阴暗面的现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7月4日 西德《内部消息》刊登一则消息说，“苏共中央曾在致党的重要干部的一份指示中号召提高思想警惕，原因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苏联的一些地方引起了骚乱。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基辅的大学生秘密团体是这种骚乱的起点。党的干部们接到指示，要把思想上的各种偏向报告给党中央”。

7月8日 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在为高等军事院校毕业生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

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说，“当前的国际局势”“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国防”。他说，“我国奉行和平政策”，但是“我们应该对局势的任何剧烈转变作好准备”。“鉴于当前的整个形势和意识形态战线上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对军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提高了。”

格列奇科在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化”要求军人“表现出高度政治警惕性”。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那么战争将不仅仅是技术和武器的较量。人依然是武装斗争中的决定性力量”。

7月8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苏联邮电部系统的邮电营业企业和生产技术管理局改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决议。

7月9日 《红星报》报道，苏联正在加紧对十八岁以下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这些青年在假期里还要参加军事演习。

7月25日 海军元帅、海军副总司令卡萨托诺夫就海军节（7月20日）向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海军“能够给地球任何部分的侵略者以回击”。

7月27日 《真理报》刊登中央统计局国营农场统计处主任潘科娃的一篇文章:《国营农场的经济核算》,谈在国营农场推行"经济改革"的情况和问题。编者在按语中说,在国营农场中实行旨在发展和巩固经济核算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第四年了。在经济改革中,国营农场计划自己生产的权力扩大了,正在实现向稳定的产品出售计划过渡,交售价格提高了。

文章说,为了执行苏共中央3月全会(1965年)和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逐步过渡到完全经济核算》的决定。对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农场已使用较高的集体农庄价格,改变了利润分配制度,扩大了银行贷款的范围。

7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七期刊登一篇根据统计材料写的题为《1967年内接受新党员工作总结和苏共成份变化情况》的文章,说去年接受为预备党员的有三分之一是职员。这些职员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七十点四——是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教员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其他专业人员。

文章说,到1968年1月1日为止,苏共党员中按成份来说,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农民(集体农民)占百分之十五点八,职员占百分之四十五点四。其中职员共产党员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专业人员。

8—10月

8月4日 德通社报道,苏军副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已提升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兼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参谋长。

8月9日 《真理报》刊登历史学副博士罗吉昂诺夫的一篇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的文章，强调“纪律性”和“反对派别活动”。文章强调“党的严格纪律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说“共产党的有效的活动，是建立在善于把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同广泛的深刻的民主结合起来，把自由讨论、真实的民主生活同无条件执行共同通过的决议结合起来的基础上的”。

文章说，苏共党内长期来“曾同分裂的反对派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对“反对党内严格集中制和纪律性，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和组织领导，主张无边际的和没有任何限制的民主制”的人“给予了坚决的回击”，首先禁止派别和集团存在“具有永久性和合法性”。说要实行“党内民主”，但“不能容许”“越出党性的界限”。说“有批评和讨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削弱党的纪律，容许派别主义和派别活动”。指责“宗派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夸大党领导机关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打着批评自由的旗号来进行分裂活动”。还指责“派别主义者”觊觎特殊地位，通过要求民主、批评自由和反对官僚主义进行分裂活动，“嘲弄集体通过的决议”等，说要对这些人“作出严格的组织结论”，并要其他党从苏共的经验中得出“教训”。

8月10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筹备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决定。

8月21日 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9月11日 塔斯社报道，六十六岁的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部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已被解除职务，说他“需要退休”(按：缅希科夫是1962年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部长的，

在这之前曾任苏联外贸部部长、驻印度和尼泊尔大使、驻美大使)。

9月15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提高地方报纸在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的作用》的决定，规定了一些措施，以“改进对地方报纸的领导，提高其思想水平以及在争取贯彻党和政府的决议的斗争方面”的“组织作用”。

从9月16日开始，苏共中央高级党校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地方报纸编辑轮训班。

9月中旬以来，全国各地分区相继举行了“思想工作者会议”，讨论“加强思想工作”问题。军队系统也举行了“全军报刊工作者会议”，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在会上作了报告。

9月 斯特鲁米林在《经济问题》杂志第九期发表一篇题为《从十月革命到共产主义》的文章，再次指责利别尔曼的“最大利润原则”。

文章说，“近几年，作为比较我们经济综合组织或单个企业的极为重要的经济标准而提出的，往往不是劳动生产率，而是它们的赢利率指标。由于在计划工作方面的新改革，以及采取发展市场关系和加强经济核算的方针，围绕着同这些任务有联系的一系列争论问题”而展开了辩论。“在讨论新方针时，我们往往碰到了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一系列有教益的类似现象”。

文章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些经济工作者“强使苏联的托拉斯接受‘最大利润’的要求”。而现在，利别尔曼则宣扬，“苏联企业取得高利润率可以作为企业工作效果的最好标

准”。他的一些拥护者也提出以‘获取最大利润’作为‘合乎理想’的计划工作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文章说，“高利润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高利润率必须要求实行高市场价格的政策”，“但是，这种价格只对卖方有利，而对买方，首先是全体劳动者极为不利”。“这样，那些对我们要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人，也就是在提倡降低苏联的实际劳动报酬”。“这种政策未必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文章还指责由企业支配全部利润的主张。说过去“在国家的总积累中，除了各个企业所必需的作为更新和现代化用的基金外，仅有那些对每个企业的劳动者个人和集体十分微薄的奖励基金可由各企业直接支配。目前实行的改革大大地扩大了用企业各种各样的基金对劳动进行经济刺激的可能性”。然而，某些人“要求在发展经济核算方面走得更远”，认为利润应“属于本企业”，要求“企业按照一定的标准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用于上交预算款项，归还银行贷款，偿还利息。剩下那部分利润用于发展企业，对工作人员进行补充物质奖励，并建立储备基金”。斯特鲁米林认为，“从这里已经可以感到离开社会主义而偏向工团主义的明显的倾向，同时对统一的计划工作也有着潜在的威胁”。“同样，如果利润最大的劳动部门的全部纯积累，不顾国家的需要而完全用于它们的进一步发展，不是以统一调拨的方式使用于最需要的地方，那么这只会违反计划经济的一切要求而导致比例失调，并将给经济带来瓦解和混乱的因素。”

9月 据《哲学问题》杂志公布的编委会名单，《哲学问题》杂志编委会最近已改组。6月份，解除了米丁的主编职务，

将其降为一般编委，由弗罗诺夫任该刊主编（按：1958年后才露头角的哲学副博士）。7月份，又解除了科瓦尔楚克的副主编职务，撤了十名编委的职，任命了十一名新编委。8月份，从新编委中任命马马尔达什维利为副主编（按：1961年后才露头角的哲学副博士），在新编委中，有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和曾担任过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哲学博士康斯坦丁诺夫。这次改组是在苏共中央4月全会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后进行的。

10月6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苏联共青团五十年和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决议。

10月9日 苏联当局审讯8月25日在红场上反对苏侵捷的五个苏联公民，并以“破坏秩序”、具有“危害社会的观点”和“危害社会的行动”为“罪名”判处他们徒刑。

10月30—3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关于苏共二十三大和历届中央全会对农业问题的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说，在1965—1967年这三年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达七百五十亿卢布”，比前三年的每年平均总产值高百分之十五。谷物总收获量达“一亿六千五百多万吨”。“畜牧业的发展也更加稳定了。”“产量不断增长。”“集体农庄的经济巩固了”，“国营农场的状况也改善了”。然而，他不得不承认，“在一系列产品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方面”，还没有达到五年计划（1966—1970年）“规定的水平”，“有些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农产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还很低”。许多农庄、农场对农业机器的“使用情况不好”。在发展畜牧业上

"存在着很大缺点","还没有有力地解决畜牧业问题"。"在某些集体农庄里,人们不够关心公共生产的增长,公积金的提成不断下降",等等。

勃列日涅夫说,这些问题和"缺点"的造成,一是"由于农庄、农场的生产纪律和国家纪律松懈";二是由于"农业部、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在更加充分地利用农庄和农场生产潜力方面往往没有起到组织作用和表现不坚定";三是由于农业投资计划没有完成。他说,"为了保证农业按预定速度发展",原规定五年计划头三年用于"生产建设和购买技术设备的国家集中性投资"为二百一十二亿卢布,"而实际上投资将是一百七十三亿卢布"。此外对矿肥工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的投资也减少了。

勃列日涅夫说,在五年计划最后两年中,"必须挖掘资源来解决苏共二十三大和苏共中央全会在农业方面所提出的任务","必须实施新的巨大步骤,并在最短时间内大大超过目前国内农业生产的水平"。他提出,要在近几年内使谷物平均年产量达到一亿九千万至二亿吨,肉达到一千四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吨,奶类达到九千万至九千五百万吨。为了"达到高度的生产水平",必须为农业"奠定更加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实行"化学化、土壤改良、水利灌溉和全盘机械化"。说苏共在农业方面的"路线和全部实际活动","应该是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农业实行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全会根据勃列日涅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决议认为,"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之所以不够快,主要还是由于化学化、土壤改良和全盘机械化实现得缓慢,由于农业中推行最新

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不力”。因此决议规定：(一)要“以新的技术装备对农业进行技术革新”，说这是下一个五年计划中“一个极重要的方向”。(二)必须在今后几年内大大加速矿肥生产。(三)责成有关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完成苏共中央5月全会(1966年)批准的土壤改良计划”。(四)要求把现行的刺激超计划收购谷物的制度推行到其他一些农产品上去。同时允许国营农场把由于超产而在固定价格之外增加的收入的一部分用来作为对国营农场工作人员的奖励。

这次全会还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外活动的报告，并通过决议“完全赞同”这一报告。

10月 苏联革命组织“斯大林小组”散发了一张题为《走斯大林的道路》的传单，号召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打倒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11—12月

11月6日 马祖罗夫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作报告，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和“纪律”。他说：“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党的思想政治团结和组织团结、民主集中制以及党的纪律乃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不保证高度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就不可能在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采取切实的步骤。”

11月12日 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有限主权论”、“普遍规律论”。勃列日涅夫说：“社会主义国家主张严格尊重

一切国家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干涉任何国家的事务，反对破坏它们的主权。

“苏联为实际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做了不少工作。苏共一直主张每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考虑到本国民族条件的特点来确定自己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具体形式。但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背离了这些规律，就可能离开社会主义本身。而当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仅是这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

“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

11月19日 战略火箭部队总司令克雷洛夫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战略火箭部队是我国防御威力的基础。它成了制止国际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强大手段。”

11月26—28日 美术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党政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出席大会。大会的报告和苏共中央的贺信，都要求美术家“表现出思想坚定性”、“不调和地对待”“异己影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采取不调和态度”，“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阴谋以应有的回击，向它进行积极的、进攻性的斗争。”

11月29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社会治安部改名为内务部，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加强苏联民警措施》的决定。决定说，社会治安部及其地方机构的现有名称没有反映它们在国家机关系统中所履行的一切职能。决定给内务部及其地方机构提出了在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工作的任务。决定说，最近几年来，在改进民警、检查机关和法院的活动方面实行了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加强许多城市的法制。

11月 《经济报》第四十五期刊登国家计委副主席巴楚林同该报记者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谈话。巴楚林说，"现在已经有两万五千多个企业"实行了新体制，"在新体制条件下工作的企业生产了全部工业产品的百分之七十，提供了利润的百分之八十"。今年，苏联全部二十六条铁路、海运部全部十六个航运公司都已完成了向新体制的过渡。"现在受苏联部长会议的委托，正在起草关于直接管辖工业企业的部门性总局向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过渡的建议。""1968年在一系列工业企业中已开始试行从利润中直接扣除经济刺激基金的方法。""每个企业将要制定合理的、同经济核算指标制度相协调的物质鼓励条件，这种条件要把全体生产人员都包括在内；同时明确地规定，每个人员怎样才能从企业物质鼓励基金中得到钱和得到多少钱"。

12月10—13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法立法原则》。这些原则将于1969年7月1日开始生效。

根据这个《立法原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可以自由转

让和变相出租归其使用的国有土地，允许用农庄公共土地扩大宅旁园地，等等。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69年经济计划草案报告和预算草案报告。根据预算草案，1969年军事预算达一百七十七亿卢布，比1968年增加十亿卢布，占全部预算百分之十三点二，为苏联历史上最高的军事预算(按：西方通讯社猜测，苏侵捷和中东紧张局势是苏增加军费的主要原因)。根据计划草案，国民收入增长率和轻、重工业生产增长率平均低于1968年。

在这次会议上，最高苏维埃两院都决定设立“青年事务常设委员会”，并要求这个委员会“能保证预先准备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的同青年的教育、职业技术训练、劳动和休息有关的问题”。

12月16—20日 作曲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出席大会，波德戈尔内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作曲家“更积极地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12月19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关于苏联人民监督机关的章程》。

12月31日 《消息报》刊登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的关于给建筑业职工加薪的决定。决定说，“考虑到必须加强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缩短建设期限、改进建筑工程质量和加快建筑材料生产的发展速度”，规定从1969年起，分期分批把建筑业工人的各级工资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建筑材料工业——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并把建筑业中等工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各级职薪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二，建筑材料工业——提高百分之九。

与此同时，又决定提高生产定额。决定说，“在规定提高了的新的各级工资的同时，将重新规定现行的生产和服务工作定额，其中要考虑到已达到的技术水平以及生产和劳动组织工作水平”。

12月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三个苏联公民由于在红场上抗议苏侵捷而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其中有卫国战争前苏联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的孙子帕维尔·李维诺夫。

另外还有三个苏联青年知识分子因“持有、翻印和散发反苏印刷品”而被判处总共八年的徒刑。

1969年

这一年，苏修当局继续大搞军国主义化，特别是在进犯我珍宝岛制造流血事件之后，一些军事头目在各种场合炫耀武力，叫嚷要“加強战备”、“提高警惕”、“反击侵略”……等等，贼喊捉贼。同时大造反革命舆论，鼓动作家写反华作品，写“军事爱国主义”作品，強调要描写“战争的胜利”，反对写“失败和挫折”。

随着苏修内外政策的全面反动，人民中的不满情绪增长，民族矛盾加剧，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增多。苏修当局也相应采取了加強镇压的措施，增设反动法令，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強了控制。

在经济方面，继续推行“新体制”和“奖金挂帅”的政策。在工业中宣传联合公司的做法，并在建筑、商业、科研等单位搞各种各样的“改革”，推广谢基诺的裁员“经验”。在农业方面，召开了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的集体农庄章程，把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法律化。

这一年，苏修反华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先后于3月在珍宝岛、8月在新疆铁列提克地区制造了两次大规模边境冲突。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10月，在北京开始了中苏边界谈判。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有七十五个党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1　月

1月3日　《消息报》载文，鼓吹对农业管理机关进行"革新"。文章主张农业部应成为"统一的主人"，"要对农产品从土地到消费者的全部过程负责"。为此要建立两个新的单位，一个协调农产品的运输和保管，另一个"协调同农业有关的一切非经济问题"。

接着，《消息报》于1月11日又载文对农业管理体制提出另一种主张，即"完善"部门间在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方面的"合作"。认为这种"合作"可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按地区原则建立"国营的、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和销售联合组织"，并在州、边疆区和共和国以至中央建立相应的联合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机器、拖拉机的维修、物资技术供应等"全部领导完全集中于这些联合组织"。第二阶段，"提高社会化水平"，"把联合组织活动范围内的所有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一些制糖厂、制酒原料厂、育肥站交给联合组织管理"。第三阶段，把所有的糖厂、罐头厂、净棉厂、制油厂、干酪厂、亚麻厂、奶品厂、肉品厂、蔬菜、土豆批发基地等"都交给联合组织"。

1月3日　苏联海洋法协会成立，塔斯社报道说，该协会的成立"是由于苏联商船队的迅速发展而引起的"，它"将保卫苏联商船队在世界上的利益"。

1月4日　《真理报》刊登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沃尔科夫的一篇文章，解释1968年底关于给建筑

业职工加薪的决定。文章说,"广泛采用建筑工人劳动报酬包工制和包工奖励制,具有特殊的意义"。

1月7日—2月6日 苏共中央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意识形态干部"学习班,学员有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以及各军区政治部主任。学员听取了关于苏共历史、哲学、经济和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的报告。

1月14—17日 苏联在14、15两日先后发射宇宙飞船"联盟-4号"和"联盟-5号"。16日,这两艘宇宙飞船在空间实现连接。17日返回地面。

1月20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苏联最近有几百名工程师和科学家被集体流放,原因是在去年春天组织示威,反对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的审讯。

1月21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伏尔加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卡尔波夫的一篇文章,对经济改革中的一些做法以及物质刺激等提出疑问。文章指责《新世界》杂志宣传奖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社会主义教育,"主张放弃任何精神刺激"。文章鼓吹把精神刺激和物质刺激"正确地、巧妙地结合起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施加精神影响","用事实说明,怎样由于对劳动采取自觉态度而使工资增加"。

1月22日 莫斯科隆重欢迎宇宙航行员时,在红场发生枪击事件。来自列宁格勒的中尉伊林向宇宙航行员乘坐的汽车队开了几枪,当场被捕。外交部和科学院1月24日就这一事件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伊林是个"精神病患者"。

西方通讯社普遍认为这次开枪是针对苏联领导人的,因

为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的汽车就紧跟在宇宙航行员汽车的后面。认为其原因可能是人民的不满、对侵捷的抗议或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西方通讯社并注意到当天柯西金未出席欢迎宇宙航行员的集会。

1月24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指责《青春》杂志对工人的批评"表示沉默"(按：去年《苏联工会》杂志曾刊登工人来信，批评《青春》杂志刊登的一些诗"选题狭隘"，"思想脱离时代")，指责有些作家和导演"往往离开阶级的标准"，"成为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观点的代表者"，"片面地评价党和国家历史上几个重要时期"。要求文学工作者"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成为积极的意识形态战士"。

《青春》杂志第七期公布的编委成员有改变。原编委叶夫图申科、阿克肖诺夫和维什尼亚科夫等三人已被库兹涅佐夫、阿列克辛、阿姆林斯基和库利耶夫所代替。

1月26日 中央统计局发表196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宣布国民收入比1967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二，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八点一，农业总产值达八百一十亿卢布。粮食产量为一亿六千九百二十万吨，钢产量为一亿零七百万吨，石油产量为三亿零九百万吨。

公报宣布，"到年底，按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工作的有二万七千个工业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占全部工业产品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上，上缴利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国营农场正在继续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

1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一期报道，苏共中央《关于塔吉克共产党中央在执行苏共二十三大决议方面的工作》的决议，

批评了塔吉克党在执行苏共二十三大决议中存在“严重缺点”。决议着重批评了三个方面：(一)没有充分利用新的经营原则来发展经济，列举了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的问题。(二)在干部的选拔、配置和教育方面，“常把一些没有具备必要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许多干部“破坏党和国家纪律”，“弄虚作假”。(三)在思想教育方面，“无神论的宣传削弱了，宗教活动活跃起来了”，轻视妇女、逼婚等现象严重。

《真理报》2月23日报道，塔吉克党中央举行全会，讨论贯彻这一决议。第一书记拉苏洛夫在会上作报告检查缺点，说已制订了具体措施来“改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全会还指出，党和苏维埃注意的中心应是“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各族人民友好的思想”，在发扬民族传统的同时，要更积极地树立各民族间的“全苏传统”。

1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一期刊登立陶宛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涅奇库斯的一篇文章，指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要使立陶宛脱离苏联，拒绝同俄罗斯人民友好”。

《真理报》1月24日刊登《立陶宛真理报》总编辑齐曼纳斯的一篇文章，强调立陶宛“各级党组织思想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对任何公开的和隐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表现展开斗争”，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残余常常反映在对人民的历史、对人民的过去的不正确的学术观点中”，“民族主义残余的特别危险之点是常常以党的政策作为掩护”，而“克服民族主义残余需要很长的时间”。叫嚷“最危险和最有害的东西是对待民族主义残余及其代表者的调和主义”。

1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一期刊登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西特宁的一篇文章，说“把制定价格的某些职权交给企业，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以免企业利用这一权利“损害国民经济利益”。供认查出“许多抬高价格的事实”，有的企业破坏价格形成制度来增加利润(按：6月份，《经济报》第二十四期批评化学和石油机器制造部，电工器材工业部，建筑、筑路和公用工程机器制造部的企业有这类问题)。提出要完善批发价格，定期修改某些产品的价格。鼓吹价格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推行“活动价格”，以刺激技术进步和提高产品质量。

《共产党人》杂志第二期刊登格拉西莫夫院士的一篇文章，认为“必须制定一个改造苏联自然的总计划”。透露有三分之二(近一亿五千公顷)的耕地水分不足，有五千万——六千万公顷土地受到侵蚀的影响。建议把一部分西伯利亚河水引到哈萨克和中亚，“以保持咸海的水量并进一步发展中亚平原的水利”。

1月　《农业经济》杂志第一期刊登两篇文章，就集体农庄收入的分配问题谈了如下几点：(一)近几年不补充公积金的集体农庄大批增加，这类农庄在1967年占农庄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二)行政管理机构庞大，本来规定每百名集体农民可有十一名行政人员，但许多集体农庄大大超过，行政人员的报酬占劳动报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三十；(三)工资悬殊，有的集体农庄主要专家的工资比普通庄员高六倍。现在有百分之九十二点二的集体农庄采用了货币劳动报酬。

2　月

2月4日　农业科学院举行会议，“研究苏联今后十——十五年发展农业的各项建议”。农业科学院院长洛巴诺夫说，“今后要走的道路”仍将是“不断地集约化”和使职工“从物质利益上更加关心增产”。增加谷物总收获量仍是“注意的中心”。要求谷物年产量“最近能达到约一亿九千万至二亿吨”。说重要的任务是“将在进行土壤改良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生产谷物的广大区域”，“为农业和畜牧业的全盘机械化和电力化制造更完善的技术手段和成套机器”，在畜牧业中推行“以工业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工艺规程”，实行“专业化和集中”。

2月5日　《农村生活报》刊登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赫辛的一篇文章：《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反对以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追求最大利润的主张，说每个企业的首要天职是完成生产基本产品的国家计划任务。

2月6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吸收妇女参加农业专业技术劳动》的决定，要求广泛吸收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担任拖拉机手等工作。并规定给妇女机械手较长的休假期和较低的工作定额。

2月8—9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劳动报》分别发表社论，谈领导人的作风问题。批评一些人高傲、自满、摆架子、要求特权，说“自高自大对领导人是特别危险的”，“如果被成就冲昏头脑、滥用职权、自命不凡、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不再

和人们商量，那就糟了”。“遗憾的是，某些领导人往往忘记这一点。”并提到列宁曾坚决反对别人对他歌功颂德。

西方通讯社认为这两篇社论是针对现在某些领导人的，说《真理报》、《消息报》、《党的生活》也发表了类似文章。

2月11日 《红星报》报道，苏军总政治部最近召开了“思想工作”会议。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在会上指责“有人试图主观主义地、片面地解释苏联军事史上和苏军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批评一些作者在分析社会现象时“脱离阶级标准”。要求“进一步加强军内的意识形态工作”。

《红星报》2月13日发表社论，说不久前出版的一些书籍和文章“忽视历史事实，贬低卫国战争前夕党在加强防御力量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的意义”，“歪曲战争初期的事件”。

2月12日 《真理报》经济评论员发表文章，鼓吹按列宁格勒的方式在工业中发展大型联合公司。

文章介绍了联合公司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参加联合公司的企业失去独立性和法人权利，成为联合公司的生产单位，而联合公司本身拥有企业的权利；第二种是混合性的：一些企业失去法律上的独立性，另一些企业仍保持其独立性，对联合公司的关系，有的把它当作企业，有的把它当作经济管理机构；第三种：所有参加联合公司的企业都是独立的，联合公司是它们的经济管理机构。

文章介绍了列宁格勒一家联合公司的经验：按经济核算制原则组织起来，国家拨给必要的固定基金和流动资金。按统一的国家计划工作，有独立的收支平衡表，是法人。它直接同部联系，在材料和半成品方面同国家和供货方结帐，在销售

产品方面同消费者结帐，获得并偿还贷款，拨给经费进行基本建设，购置固定资产，订立经济合同，确定技术经济政策和发展前景。参加联合公司的工厂不享有法人权利，在公司内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活动，每个厂有管理机构，由厂长领导生产。联合公司通过利润提成建立自己的基金，并自己支配生产发展基金和大部分文化设施和住宅建设基金。把这一基金的剩下部分和计划中的全部物质奖励基金交给工厂支配。

文章称这种联合公司是“苏联工业未来结构的萌芽”，是“独特的苏联式的康采恩”，“最符合改革的要求”。但是文章透露有些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思想不通，对此有怀疑，所以近三年来列宁格勒联合公司的数目没有增加，还不得不进行说服工作，以保持已经建立的联合公司。

2月19—23日 格列奇科、莫斯卡连科和雅库鲍夫斯基等军事领导人就建军节分别发表文章、讲话和命令，要求军人“机警地注视世界帝国主义的阴谋，加强战备”。夸耀苏军的“威力”。称“战略火箭部队已成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基础”，“已用无限射程的洲际火箭武装起来”。吹嘘洲际固体燃料火箭可移动的发射综合装置是“最近的重要新事物”。还提到战争史是“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残酷的场所”，要“揭露资产阶级的战争历史伪造者”。

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二期刊登一篇文章：《伟大卫国战争史上激动人心的几页》，评格列奇科、科涅夫、麦列茨科夫、罗科索夫斯基、什捷缅科和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等人写的战争回忆录。文章说这几本回忆录“有助于恢复（斯大林）作为战争年代苏联武装力量领导人——最高统帅的形象，彻底

戳穿了所谓他在军事上是外行、他‘根据地球仪’指挥战争、不容许别人提意见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尽管斯大林的性格有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仍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路透社 3 月 21 日说，格列奇科的书《高加索会战》“热烈称赞勃列日涅夫的功绩”，“很少提斯大林”。

2 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刊登一篇文章：《阐述苏共历史要坚持列宁的党性》，指责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党史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错误和缺点上”，说有人打着科学发现的幌子，“企图修改经过生活检验的真理”，“修改党对历史事件所作的原则性批评”。文章具体批评了如下几个方面：

(一)有人“贬低党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集团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为它们的头目恢复名誉”。

(二)利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把那些年代描绘成全是错误和挫折”。

(三)“有人以保卫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名，捍卫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相抵触的不正确论点”，要求“深入阐明”党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四)“把机会主义分子的分裂行为同列宁跟机会主义分子决裂混为一谈。”

(五)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一些著作中遭到歪曲”。

(六)一些作者忽视在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党为反法西斯侵略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2 月—6 月　《科学与宗教》杂志第二期至第六期连续

刊登哲学博士库罗奇金的一篇文章：《现代俄国东正教的进化》，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基督教”的思想。说“共产主义基督教的观念构成了对俄国东正教进行社会解释的核心”。在东正教中，“人间天堂的建设日益同世界的共产主义改造联系在一起”，教会“支持苏联实现平等而公正的人道原则”是“由于这些原则符合基督教的要求”。

3 月

3月2日 苏军侵犯我珍宝岛。

3月10—11日 俄罗斯联邦作协和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联合召开“军事爱国主义文学”会议。崔可夫元帅和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卡拉什尼克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就3月2日珍宝岛事件反华，鼓动作家对“当代人”加强“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会上还反对写那些渲染战争恐怖、否定英雄人物和突出失败的作品，批评《青春》、《青年近卫军》和《涅曼》等杂志上刊登的一些作品。

共青团中央和作协3月25日，又召开全苏青年作家会议，进行军国主义宣传，鼓动作家反华。共青团中央书记卡姆沙洛夫说，“没有文学的帮助”，“就不能有效地完成对青年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这一重要而复杂的任务”。他说，“爱国主义的职责是抵制那些企图在青年人心灵中播下民族主义种子的种种做法”，也要“反对忽视和不尊重民族圣物以及历史文物的现象”。

3月12—15日 《真理报》以整版篇幅刊登肖洛霍夫的

反斯大林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章节。作者诬蔑“1937 年好象从天而降”，他通过拖拉机站站长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的嘴，攻击斯大林“从 1937 年起”，“瞎着眼睛过了五年”,“闭着眼睛管理国家大事”，受“假情报蒙蔽”，“诬害了很多很多好人”。

3 月 18 日 滨海边疆区党委举行全体会议,选举维·洛马金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原第一书记瓦·切尔内晓夫调任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3 月 19 日 《农村生活报》报道,农业部研究如何完善已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国营农场的工作。说农业部系统已有三千七百三十一个国营农场(按：1969 年全苏有一万四千三百一十个国营农场）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制。该部确定了扩大国营农场在全面经济核算方面的自主性并改进其工作条件的措施。

此外，农业部副部长沃洛夫钦科 2 月 14 日在《农村生活报》上说,农业部系统的国营农场“总的来说”是盈利的，1968 年利润超过十亿卢布,但在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有些条件需要完善,如价格问题,现行价格使各行各业内部的赢利率有很大差别，同时，制订和下达农业计划的制度没有改变，在许多方面不符合新的条件,所以在实践中常常遇到困难。

3 月 20 日 塔斯社和《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苏联向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附近地区移民。

3 月 25 日 《真理报》介绍莫斯科卡尔波夫物理化学研究所对科研人员试行新的劳动报酬制度。说现行工资制度是按学位和职务定的,不考虑研究效果。新的办法是对“优秀的

工作人员”增加劳动报酬。对研究人员的保证工资比通常工资低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如工作效率高可比通常工资高出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经济报》第二十四期（6月）报道，部长会议批准了对科研机构工作人员实行鉴定制的章程。章程规定，鉴定工作从1969年开始，定期举行，每三年举行一次，对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能否胜任其职务作出结论。领导人可根据鉴定结果，对某些工作人员进行奖励、降职或解职，解雇工作无需征求工会同意，只要发给被解雇者相当于两周工资的退职金。

3月26日 美联社报道，伊凡·雅希莫维奇因散发传单反对苏侵捷而被捕，他同红军前少将格里戈连科共同起草了一份反对侵捷的致苏联公民书。雅希莫维奇原是拉脱维亚“青年近卫军”集体农庄主席，曾获得“集体农庄模范主席”的称号，苏联报纸曾刊登过他的日记摘要，但由于去年写信给苏斯洛夫抗议对四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而被解职。美国报纸说，他在被捕前还散发了致罗素、杜布切克、萨哈罗夫、工人、农民和各国共产党人的信。

3月27日 塔斯社报道，商业部门“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对商业企业的考核“只根据商品周转额和利润两项指标”。改革的第二阶段将是“制订一套对工作人员的物质刺激的灵活办法”。

3月29日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报道苏联克里米亚鞑靼族人民斗争的情况。说原克里米亚鞑靼族人曾于去年7月起草一份“致世界公众的呼吁书”，有一百一十八人签名，呼吁帮助他们返回克里米亚，去年4月，克里米亚鞑靼族人举行公

众集会，当时有三百人被捕，5月，又派出五百人的游说团去莫斯科(领头的遭逮捕)。该刊说，大约有十名克里米亚鞑靼族人不久将在塔什干受审。支持克里米亚鞑靼族人斗争的有前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的孙子帕维尔·李维诺夫和前少将格里戈连科等人。

4—5月

4月5日—5月17日 《红星报》先后报道了十七个将军死亡，讣告说其中有两人是“悲惨死去”，三人是“突然死去”，其他病死。西方通讯社对此推测纷纷，认为其中一些人的死亡是由于意外事故，如试验武器、火箭爆炸之类。

4月25日 《红星报》载文评不久前出版的朱可夫回忆录《回忆与思考》，称它是“对苏联军事历史科学的贡献”，“在进一步发展苏联军事思想方面将起重要的作用”。

西方通讯社说，朱可夫在回忆录中称斯大林是“令人尊敬的最高统帅”。西方通讯社认为，对斯大林的这种赞扬是目前苏联领导机构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一个最新行动。

4月26日 《消息报》报道，部长会议批准了生产技术产品供货条例和消费品供货条例，以代替1959年批准的供货条例。

4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六期刊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的一篇文章：《列宁主义——培养苏联军人的基础》。文章强调政治工作是加强军队战斗准备的“最重要的手段”，“胜利最终取决于在战场上洒下鲜血的群众的精神状态”。透露

战略火箭部队和防空部队“已经在履行战斗值勤”，海军舰队“在海上和大洋上值勤”，各兵种正在解决一些重要任务。

4月 美国《明星晚报》7月27日报道，乌兹别克人于4月份在塔什干一次足球赛中打死十五名俄罗斯人。该报据乌兹别克报纸的报道说，事后对那些被指责为耍“流氓行为”的人进行了审讯，三名主要被告被判五年徒刑(另有报道说，在塔什干的骚动中，当局先出动警察，后调遣军队镇压，有一百五十人被捕，其中有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女儿)。

塔什干市委于6月4日举行会议，讨论“对流氓行为加强斗争”问题，拉希多夫出席。乌兹别克党中央于6月12日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讨论“加强维护公共秩序的措施”。

4月 《新世界》杂志第四期刊登杰明捷夫的长篇文学评论：《论传统与人民性》。文章主要攻击《青年近卫军》杂志1968年刊登的恰尔马耶夫的两篇文章《伟大的探索》和《不可避免性》，同时也涉及到《青年近卫军》杂志刊登的一部分散文和诗歌的主要倾向。

文章围绕着所谓“爱国主义”、对乡土的感情以及西方的影响等问题展开，杰明捷夫认为历史上有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既有“争取解放斗争的爱国主义，也有御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他引用列宁的话说，“大俄罗斯要按人类平等原则对待邻国”，“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他说，“要把保卫祖国独立的正义战争与沙皇的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区别开来”，指责恰尔马耶夫的语言是“斯拉夫优秀人种论的语言”。

文章认为对于西方的影响“没有夸大它的必要”，他反对借口“反对敌对思想影响而滑到闭关自守的立场上去”。

7—8 月间，《星火》杂志和《苏维埃俄罗斯报》分别载文指责杰明捷夫的文章。《社会主义工业报》7 月 31 日刊登劳动英雄扎哈罗夫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公开信，除指责杰明捷夫的文章外，还说在《新世界》杂志上找不到使他高兴的文章，要求《新世界》杂志对批评作出“党性的回答”。

5 月 1 日 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帕列茨基斯在《新时代》杂志第十八期发表一篇题为《各民族平等》的文章，说列宁认为斯大林是民族问题方面有研究的专家，曾高度评价斯大林的著作《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又说斯大林在实现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建设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建议让独立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搞“自治化”。

5 月 4 日 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拉脱维亚里加大学一个青年学生自焚，原因是抗议苏联当局歧视犹太人。接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犹太族学生向西方发出呼吁书。该报说，苏联十一万犹太学生中，约有三万人已申请去以色列。

5 月 7 日 路透社报道，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红军前少将格里戈连科在塔什干被捕，因为他支持克里米亚鞑靼族人的斗争，支持那些受审讯的持不同政见者，并散发传单，同已经被捕的雅希莫维奇起草“致全体苏联公民书”，反对侵捷，还把一份批评法共杜克洛的文件秘密送到国外。

5 月 16—17 日 塔斯社报道，1 月 5 日和 10 日发射的“金星 5 号”和“金星 6 号”星际站在飞行了一百三十天以后，

在金星大气层降落，把带有列宁浮雕像和苏联国徽的标记送到金星。《真理报》5月20日发表社论，吹嘘这是“苏联探索宇宙空间和太阳系行星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5月22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持不同政见者彼·亚基尔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苏联维护人权。有五十五人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

英国《观察家报》6月15日报道，以亚基尔为首的“苏联保卫人权行动小组”有十五人，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一年来每两个月出版一期刊物。其成员除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代表外，乌克兰和中亚的代表特别多（按：彼·亚基尔生于1923年，是原乌克兰军区司令约·亚基尔的儿子。约·亚基尔于1937年被镇压。彼·亚基尔当时也被捕坐过十几年监狱，1956年恢复名誉）。

5月29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以《毒箭射向何方》为题，谈知识分子中的问题。说有些知识分子“不理解党克服个人迷信所做工作的实质”，“由于醉心‘搜集’个人迷信有害后果而偏离主要方向”，“帝国主义用批评自由的口号使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阶级中立的道路”，有的知识分子“堕落到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要求对“误入歧途”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工作”。

5月 基辅水电站工人因住房问题同当局发生冲突。工人们游行示威，并派代表团向中央委员会送交有六百人签名的呼吁书。提出抗议的领头人后来被捕。

5月 《文学报》6月4日报道，5月份在西伯利亚举行了西伯利亚生产力发展和布局问题的学术会议。会上有人承

认，地区工资差额高的地方，人员流动性也特别高，“成了迅速发大财的地方”。该报记者说，“开发西伯利亚资源的新阶段，可能就从1969年5月份算起”。

《共青团真理报》6月10日号召青年到远东和西伯利亚建设四十二项“重点工程”。

5月 苏军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分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七期和《党的生活》杂志第九期发表文章，谈军事理论问题。他引用列宁的话说，“对敌人估计不足和安于我们比敌人强大的想法，是战争中最危险的东西”。他鼓吹在战争中使用“出其不意的打击，采取主动”的打法。说苏军“正在研究在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武装斗争的方法”。

5月 《远东》杂志第二期至第五期连续刊登扎多尔诺夫的反华小说《黄金狂》，歌颂老沙皇的领土扩张主义，煽动反华仇华情绪。

6　月

6月7日 勃列日涅夫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6月5—17日在莫斯科召开）上发言。内容分三大部分：(一)“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反帝斗争”。(二)“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斗争中统一行动的某些问题”。(三)“苏共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勃列日涅夫在讲话的第二部分中反华，集中攻击我党九大路线和方针政策。

在讲话的第三部分中，勃列日涅夫说苏联经济改革“对国民经济起了良好影响”，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必须首先注

意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任务”，还将解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但是，国际形势使得”苏联不得不把“大量资金用于国防”，“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在谈到国内社会政治领域里的任务时说，“处于首位的是：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巩固苏维埃国家”，这“要求完善我国民主的立法基础”，还需要“对人民思想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进行坚决的斗争”。“重要任务是继续加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所有大小民族的联盟”。

6月26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结果》的报告，全会就这一报告通过了决议。

6月15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保证1969年农产品收获和收购的措施》的决议，决定用给粮食、高工资、和奖金的办法紧急动员城市车辆和居民下乡每日两班抢收抢运。规定“到新垦区的人员可购买十公担以下的谷物。付给提高百分之五十的计件工资，同时保留原工作地点月薪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奖金另算”。

6月19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说，苏联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特殊的战争经济”。其理由是：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业企业用于军事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费用很大，在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量投资是一种经济上的战略倾向，在战略物资方面奉行自给自足的方针。

6月20日 《消息报》刊登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完善基本建设的计划工作和加强对建筑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决议规定从1970年起，建筑安装组织改行“新体制”。实行新体制时，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有：确定生产能力

和项目的投产期限；确定建筑安装工程量；全年度的工资基金；利润、预算缴款和预算拨款。

在建筑安装组织中建立物质奖励基金、发展生产基金、社会文化设施和住宅建设基金。以上基金由利润中提取。规定提高对生产能力和建设项目按期投产的奖金。提高信贷的作用。

决议还要求国家计委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在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规定未完工建筑额指标。并从1971年起，每年确定总投资额。

6月30日 《真理报》评论员发表文章，指责《文学百科全书》有严重错误，"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没有"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文学的斗争中"采取明确立场，过于称颂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什塔姆等作家，没有"揭露"西德"复仇主义情绪和新纳粹主义文学"，没有描述"反对美学中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并建议该书增出附册以纠正错误。

6月 《军事理论和实践的方法学问题》一书出版，作者是哲学副博士科兹洛夫中校。该书第五章谈到经济与战争的关系。宣传使经济事先为战争做好准备"具有很大意义"。"既要从经济上保证核战争，也要从经济上保证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强调军火生产"成了国民经济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对高质量的军事技术装备(核武器，各种火箭、原子潜艇、携带火箭的飞机、无线电电子设备)的需要提到了首位。"

说"现代战争彻底消除了前线和后方的界限"，现代化兵器可使敌人后方的经济区"完全瘫痪"，同时也承认核打击不可能使一个大国丧失军事经济潜力。

谈到发展军事经济潜力时，说美国工业目前有三分之一是直接或间接为战争而生产，苏联为了“防备帝国主义侵略”，“在平时也不得不一贯重视军事经济，即国防工业系统”。说经济的生命力问题“占特殊地位”。透露正在做大量工作，以便合理地安排生产布局，“在苏联全境疏散物质生产基地和居民”，以“提高军事经济潜力在战争情况下的稳定性”。

鼓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军事经济合作”，“协调国民经济计划”，“加强社会主义分工”。

《红星报》9月25日刊登军事科学院博士拉戈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内容与该书第五章相同。

7 月

7月7日 法新社报道，最近苏联中央和地方军区司令部进行了改组。至少有八名高级军官调任新职。法新社列举的名单有：

空军原第一副总司令库塔霍夫元帅接替空军主帅维尔希宁任空军总司令。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上将任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参谋长。帕维尔·巴季茨基大将任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司令。彼·约诺夫将军任边防军副司令。坦卡耶夫上将任北部军队集群（驻波兰的苏军）司令。亚·舒鲁波夫上将任敖德萨军区司令。米·霍穆洛上将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西索耶夫海军中将任黑海舰队司令。

7月11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民族院法案委员会

主席尼沙诺夫在会上作《关于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劳动改造立法原则、预押条例以及刑事立法原则补充修改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上述三项法案。

《劳动改造立法原则》规定了监狱、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营的方针、任务、关押对象以及各种惩罚和管理制度。劳动改造的机构有：劳动改造营(关押着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犯人)、监狱和劳动教养营。劳动改造营又分为普通、强制、严厉和特别四种，另外还设有劳动改造营——流放区(没有军队守卫，犯人可在区内自由行动)。

《预押条例》规定对"可能被判刑的人"和"嫌疑犯"可采取"强制措施"，把他们预押在侦讯隔离室、监狱预押间或禁闭室，进行"搜查、指纹登记和照相"，"特殊情况可监禁在单人牢房"，如有反抗可使用"手拷或紧身衣"，甚至"武器"。

《刑事立法原则补充修改法》规定，犯有特别危险的国事罪、群众性骚动罪、谋害维持社会秩序的民警人员和人民纠察队员罪、盗窃枪炮、弹药或炸药罪而情节严重者，犯有盗匪行为罪、伪造货币罪而情节严重者，犯有盗窃巨额国家财产以及制造、购置麻醉品等罪的罪犯，属于"特别危险的累犯"，这种人不得假释或减刑。

7月15日 《真理报》报道，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维利·阿洪多夫被解职，由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利耶夫接替。阿洪多夫被任命为阿塞拜疆科学院副院长。

7月15日 路透社报道，《第比利斯晚报》刊登了格鲁吉亚共和国禁止吸毒的政府条例，条例规定，未经医生许可而使用毒品者，处以强制拘留十天或十五天，重犯者，处以拘留六

个月至一年，经营毒品者，处以可监禁多达十五年，引诱吸毒者，可处以监禁十年。该报承认“我们到处有一些年青人……吸毒”。

7月18日 塔斯社报道，部长会议举行例会，讨论“继续实行经济改革问题”，决定在整个仪表制造、自动化工具和控制系统部试行“新体制”，并“拟定了一些有关进一步完善生产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措施”。

7月20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集体农庄市场》的社论，宣传集市贸易“在满足居民食品需要方面有巨大意义”。说全国有七千五百个集体农庄市场，每年交易额约四十亿卢布，在罗斯托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市场交易额占职工购买食品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十一。1968年有一百个市场试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方法，即自行确定服务人员人数、工资额、大修费用和其他指标，现在自负盈亏的市场全部采用这种“新方法”。

社论要求“加强”集市贸易的“物质技术基础”，如建造各种设备、旅馆、提供运输汽车等，批评有些地区没有把发展集市贸易“当作十分重要的事情来做”。

7月27日 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就海军节下令海军“准备反击对苏联国界的任何侵犯”。莫斯科举行了海军陆战队登陆演习，列宁格勒举行有潜水艇和火箭艇参加的海军阅兵式，其他港口也举行了类似活动。电视台播放了“莫斯科号”(一万八千吨)直升飞机航空母舰的特写镜头，西方通讯社说这艘航空母舰有三十架直升飞机，装备有反潜艇武器和舰对空导弹。

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7月25日向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拥有火箭核舰队、潜水艇舰队和航空海洋舰队，能顺利完成战略任务，包括在世界海洋任何地方完成进攻性任务”。苏联舰队正航行在苏联“安全利益需要去的一切地方”。

7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一期刊登经济学家克隆罗德的一篇文章，说“经济改革的出发点是把集中的计划和管理同企业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核算结合起来。把经济方法的领导提到首位，不对企业进行行政监督，把指示计划任务减少到最低限度，进行中期和长期远景规划”。具体措施是，“加强企业的经济独立性并扩大其权力，组织经济核算的联合公司，建立由企业支配的巨额经济核算基金，加强合同关系，以生产资料的批发贸易代替生产资料的调拨，实行灵活的价格，加强利润和信贷的作用”。

7月 《青春》杂志编委、青年作家安·库兹涅佐夫叛逃英国。7月31日，他被开除出作协。库兹涅佐夫叛逃后，改名为安·阿纳托利，并先后发表四封公开信，攻击斯大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创作自由”，也对苏侵捷表示不满。

西方通讯社认为库兹涅佐夫是继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之后逃往西方的“最重要的俄国人”。

8—9月

8月6日 法新社报道，苏军战略火箭部队的前第一副总司令托卢勃科上将已被任命为远东军区司令。法新社说，这一新任命证实“靠近中国边境一带的苏联火箭部队加强

了”。

8月13日 苏军侵入我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

8月14日 哈萨克党中央书记季托夫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鼓吹加紧该共和国的备战活动。叫嚷现代战争“可能扩大到辽阔的区域内”，“不仅巨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连平民也会被卷入战争的轨道”。“工业、运输、邮电和农业工作将受到严格检验。”“要预先保证民防的可靠性。”

文章说，“民防是成套的措施，其中包括准备防护建筑、从大城市疏散职工和居民，在各个生产部门组织特殊编制——支队、小队和小组，提高他们的行动准备”，要“普遍进行民防教育”。透露地方苏维埃“正在讨论民防问题”，卡拉干达市已建立“常设防御委员会”。

民防第一副司令、空军上将奥·托尔斯季科夫9月16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也鼓吹要在“接近实战条件”下进行民防演习。透露在许多工农业单位中“防御工作同生产活动列于同等地位”，工厂里已按工段、科组编成民防小队和小组，并要求经常“复习”民防知识。

8月20日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七期（8月20日付印）载文说，苏军已成为“全民性的机构”，“补充苏联武装部队的阶级原则已失去意义”，军队的使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们的“对内职能消失了”。认为军队的阶级性表现在党对军队的领导。

9月6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附设预备科》的决议。决议规定“从先进的工人、庄员和复员军

人中挑选有中等学校毕业程度、并有一年以上工龄的人”，由工厂、农庄和部队的党、团、工会推荐，在预备科学习八——十个月，经过考试后升入大学一年级学习。

9月18日 阿塞拜疆内务部部长扎杰在《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谈地段监察员的作用。他称这种地段监察员是“内务系统的重要人物”，“刑事侦缉处的助手”，“在民警机构系统中占重要地位”，“象是一个小规模的警察分局”。他们有权对居民进行“突然检查”，对遵守公民证件制度以及执行各项命令、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

他要求各企业推荐积极分子担任地段监察员，并透露阿塞拜疆已有近七百名地段监察员当选为苏维埃代表。

9月18日 塔斯社报道，苏联在有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设立居民职业介绍安置局。

9月24日 部长会议采购委员会改组为联盟—共和国采购部，齐亚·努里耶维奇·努里耶夫被任命为采购部部长。

9月25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没收武器的法令，规定由村镇苏维埃作出决定，即可“通过行政手段，没收那些一贯破坏社会秩序、酗酒或患精神病的人的猎枪、其他发火武器及其弹药”。

10　月

10月9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动员全体劳动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的工作经验》的决议，要求各部推广这一经验。

这个厂的经验是：用兼任工种、增加管理机器台数、合并机构、更新设备等办法来加强劳动强度，减少职工人数，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规定工资基金几年不变，由于缩减人员而节省下来的资金大部分用作奖励基金，个人所得奖金不得超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

10月9日 《真理报》介绍列宁格勒州建立的集体农庄庄际委员会。说它不是象农庄合办建筑组织或合作饲养牲畜那样的小范围的组织，而是由九个农庄达成协议充分协调全部生产活动，"即由几个合作组织组成一个合作组织"。它"不是在行政的原则上，而是在民主的原则上"建立关系。联合组织的最高机构是农庄代表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选出任期两年的委员会和委员会主席。农业专家是受委员会雇佣的，由委员会确定编制、工资定额和奖励办法。有关生产的远景计划先由各农庄提出建议，在联合组织内调整，然后同计划机关进行谈判，基本上是采用农庄的建议。说国营企业也可加入这种联合组织搞"合资经营"。

10月11—18日 11—13日，苏联连续发射三艘载人(共七人)宇宙飞船"联盟6号"，"联盟7号"和"联盟8号"，并在空间进行编组飞行。到18日陆续返回地面。西方通讯社说苏联原打算实行停靠或连接，但是没有成功。

10月18日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二十一期（10月18日付印）刊登海运部部长巴卡耶夫的答记者问。巴卡耶夫宣称，苏联商船队已"拥有一千三百多艘船只，其中百分之八十船龄在十年以下"。说"苏联商船队每年获得总吨位近一百万吨的新船只"，除本国工厂产品外，还有波兰、东德、芬兰、

日本、意大利等国造船厂的产品。

10月20—21日 苏军召开武装部队意识形态工作者会议，“交流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和讨论改进这项工作的办法”。

10月24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完善管理机构和减少其开支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责现在的管理机构“庞大”、“重叠”，要求各部门裁减“多余的编制”，把1970年的行政开支减少到十七亿卢布。

10月24日 西方通讯社先后报道，三名海军军官在塔林被捕。这三人原在波罗的海舰队核潜艇上服役。他们起草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实行自由化。他们被捕后，塔林有数百人被审问，三十户被抄，调查范围扩展到列宁格勒和里加湾、东部的伯力、南部的巴库和乌拉尔的彼尔姆。

在其他军种中另有四百名军官在受审查。其中有几名陆军的上校和少校。

11 月

11月6日 波德戈尔内在十月革命五十二周年庆祝会上发表讲话。他承认工农业生产提高缓慢造成了“某些困难”。声称“‘新体制’几乎已推广到全部工业企业的四分之三，整个工业百分之八十三的总产值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利润就是从这些企业获得的”。并说“要把改革原则推行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在逐步扩大‘新体制’范围的同时”，“调整和完善‘新体制’的整个结构”。

11月10日 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就民警节在《消息报》

发表一篇文章，说民警“本身已成为革命的武装部队”。强调要“同反社会现象作斗争”，使“任何一个罪犯都不能免于惩罚”。

11 月 12 日　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瓦西里·切尔内晓夫病亡。

11 月 18 日　路透社报道，苏联建立了一个新的军区：中亚军区，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三个加盟共和国，总部设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新军区的司令是尼古拉·利亚申科大将。这个军区是从原土耳其斯坦军区分出来的。

西方通讯社评论说，这个变动是由于“有必要建立一个能集中力量专门对付中国威胁的新的司令部”。

11 月 25—26 日　国防部召开全苏青年军官会议。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会上作长篇报告，谈青年军官的作用、任务和责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还发出了“号召书”，要求苏青年军官“为祖国立功”，“不要忘记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在策划对苏联发动新战争”。

11 月 25—27 日　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发表讲话，要点如下：

(一)说“今年对农业来讲是艰难而复杂的，许多地区受到自然灾害极为严重的打击”。“必须记住国内人口逐年增加”，“需求日益增长”，“还必须有国家储备”。“尽管苏联幅员辽阔，但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耕地面积每年都在减少，目前每人只有零点九四公顷”。畜牧业“没有充分满足需要”，饲料工作中“有严重疏漏”，“牲畜头数减少”。这是“不健康、不正常的倾向”。

(二)说“农业政策的主要方针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机器

技术基地、广泛进行土壤改良和农业化学化”。“这一政策的重要特点是收购农产品的新的计划制度，以及对农业生产的经济刺激。”大力发展农业和加强其物质技术基础是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各个环节工作的协调，更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需要组织性、纪律性和责任感”。

（三）说谷物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应作为“注意的中心”。要逐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量和收购量。今后发展畜牧业的道路是“农庄和农场的专业化，在工业基础上发展畜产品生产，但是，在专业化问题上不能陷于极端，不能超越阶段”。

（四）要逐步发展农工联合企业，把农业同农产品加工有机结合起来。说“农工联合企业无疑有着远大前途，这不仅是新的组织形式，而且是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应当切实着手这项工作，要防止错误，防止作出没有经过周密考虑的、匆忙的决定”。

（五）提出建立经选举产生的集体农庄理事会，以“发扬集体农庄民主，集体讨论农庄活动中最重要的问题，总结组织生产方面的经验，提出建议”等，说集体农庄新章程是“建设共产主义时期集体农庄生活和劳动的法则”。

此外，还谈到集体农庄制度是“伟大的历史成果”，批评有人“至今喜欢夸大伟大革命事业中的缺点”。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波利扬斯基就章程问题作了报告，要点如下：

说三十四年前通过的章程“已同现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水平和农村社会关系的性质不相适应，当时提出的任务都已解决”。“农业物质技术基础的加强，使农庄、农场生产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农业工业化阶段，它使农业同工业进一步接近，在统一的工业基础上建立综合性的国民经济。”新章程的“重要特点”是“为提高农业的公有化水平、生产的集中化专业化，为使集体农庄所有制进一步接近全民所有制创造组织上和法律上的前提”。

说新章程加强和扩大了集体农庄所有制，扩大了集体农庄的经济独立性和主动性，加强了农庄经济核算，规定了庄员获得有保障的工资和享受优抚保障的权利。新章程还维护了庄员从事私人副业的权利，“不能无根据地缩小这种副业”，“不能同意限制在农庄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权利”。

大会决定从 1970 年起实行农庄庄员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并通过建立全苏集体农庄理事会的决议，选出了有一百二十五名成员的全苏集体农庄理事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农业部部长马茨凯维奇为理事会主席。

11 月 26 日　《文学报》报道，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作家协会。该报指责索尔仁尼琴“近两年把一系列信件、声明、手稿和其他材料，通过非法途径传到国外，在西方大量出版”。“这些作品充满明显的反苏倾向”。“他实际上已经以自己的行动和言论，同那些反对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人同流合污。”

同时，据美国报纸 3 月份报道，索尔仁尼琴的三部反斯大林作品，其中《第一圈》和《癌症病房》已在西方出版，《古拉格群岛》的手稿最近传到了西方。

11 月 30 日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介绍苏联“自由派”知

识分子安·阿马利里克写的一本书《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

该书认为苏联已背弃马克思主义，而代之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说“苏联目前存在着导致第一次和第二次俄国革命的某些条件”。他认为“俄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这场战争，“苏维埃制度将垮台”，但他污蔑我国有“侵略性”。

11月30日 《真理报》刊登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章程分十二部分，谈了农庄的宗旨与任务，庄员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报酬和收入分配等。章程规定：

农庄按照全体庄员大会通过的计划经营，农庄制订计划的出发点是：必须扩大公有经济再生产、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和其他订购合同；农庄可以建立和发展各种辅助性企业和各种手工业，可以同工业企业和商业组织建立合同关系，在农庄中设立生产各种制品和商品的分支机构，可以参加农庄合办的以及国家和农庄合办的企业和组织，可以同各种组织和社会团体签订各种合同。

农庄可根据合同出售农产品、购买机器、物资、牲畜和其他财产，出售辅助企业和手工业的半成品和制品，完成各种工作和劳务。农庄的生产和劳动的组织形式是：工段、牲畜饲养场、生产队、小组和其他生产分队。

农庄的劳动报酬制是：计件工资制、包工工资制、计时工资和计时奖励工资制。除了基本劳动报酬以外，还实行额外报酬和其他形式的物质刺激。

庄员宅旁园地的面积在零点五公顷以内（包括房屋占

地），如是水浇地则在零点二公顷以内。“庄员家庭可以拥有一头带有一岁以内的小牛的奶牛，一头两岁以内的小牛，一口带有三个月以内的小猪的母猪，或两口肥育猪，十头绵羊和山羊，以及蜂房、家禽和家兔”。

12 月

12月2日 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病逝。塔斯社消息中提到莫洛托夫为他守灵。

12月10—11日 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作曲家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党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参加了会议。

四个协会的领导人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谈到以下几个内容：

（一）强调“党性和人民性”，指责有些艺术家“在评价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创作思想问题时，离开了阶级的标准”。（二）要求创作“军事爱国主义”的题材。（三）批评电影和文艺作品“绘声绘色地描写个别的阴暗现象”，不注意“新生事物”。（四）批评西方颓废流派在文学、电影、音乐和美术领域中的影响。

会议通过决议，强调“文艺同党的政策、同人民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是文艺创作的决定性条件”。

12月14日 南斯拉夫《战斗报》谈苏联黄金产量和储备情况，说黄金储备为一百亿美元，年产量介于七百万和一千万盎司，1946—1968年共向西方出售三千七百七十吨左右，价值四十二亿多美元。

12月1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通过了1970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预算草案。

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国内外政策的报告。报告内容当时未透露。

12月16—19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和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分别在会上作1970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巴伊巴科夫宣布1969年粮食产量为一亿六千零五十万吨。粮、棉、油和甜菜都未完成计划。农业总产值比1968年下降百分之三。工业方面轧材、煤、化肥等未完成计划。"工业企业几乎有四分之三实行了经济改革。"

计划报告中规定1970年国民收入将增加百分之六,工业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六点三,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百分之六点一,消费品生产增长百分之六点八。农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八点五。提出要重视农产品,特别是肉类的超计划收购,以保证国家需要。要降低远东的食品价格,增加该地区的住房建筑和工资补贴等,以稳定该地干部。

预算报告中规定1970年预算收入为一千四百四十八亿卢布,支出为一千四百四十五亿卢布。军事开支为一百七十九亿卢布,占全部拨款的百分之十二点四。

会议批准了《保健立法原则》。

12月21日 《真理报》就斯大林诞辰发表编辑部文章,说对斯大林的评价仍遵循1956年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

文章说,在斯大林时代,实现了"宏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

任务，即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发展文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文章称斯大林是“大理论家和组织者”，领导了反托洛茨基等人的斗争，他的著作和实际工作“对列宁主义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文章又说斯大林“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犯过错误，这种错误在他的晚年具有严重的性质”。攻击斯大林“背离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过高估计个人功劳，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结果出现了没有理由地限制民主和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以及“没有根据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的现象。

12月23日 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长篇提纲发表。内容涉及苏联对国内外事务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政策。提纲说苏共是“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方面非常国际主义化了的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提纲多次提到要“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作斗争”，并影射反华。在国内方面，提纲说“社会主义全民国家正在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并谴责“个人迷信”和“主观主义”，反对“低估民族特点”和“夸大民族特点”的现象。

提纲说，“在两个体系竞赛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影响世界革命的主要杠杆是它的经济政策”。认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它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提高社会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工业有进一步的显著发展，保证农业有稳定的高速度发展，并使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提纲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和所有民主力量、解放了的民族和被压迫民

族，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独立、社会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来取代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1970 年 3 月 19 日，英国《苏格兰人报》刊登索尔兹伯里的一篇文章，说苏共在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提纲中“把长期反对列宁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鲍威尔说过的一段话说成是列宁的话”。乌布利希看到这个错误后“立即气愤地打电话给莫斯科”。事后，在以小册子形式出版这个提纲时，把这段错误的引语删去了。被删去的一语是：“列宁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草稿中提出工人阶级之所以有力量的五个‘社会因素’：(一)人数。(二)组织性。(三)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四)积极性。(五)教育。”

12 月 24 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介绍在苏联国内出版的地下刊物《时事纪事》（按：该刊自 1968 年开始出版），说它是“反抗运动的主要喉舌”，“是一个文件性记录”，它不仅刊登大多数重要公开信的摘要，而且报道示威、审讯、逮捕、流放、工人闹事、从苏联逃跑以及军队中闹事等情况，它的投稿人“遍及整个苏联”。

认为《时事纪事》所反映的民权运动的开展是对苏联“政权的一个挑战”，但“决不是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的前驱”。它不可能动摇苏联统治的基础，但却是苏联政权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因素。

12 月 25 日 土库曼党中央举行全会，选举穆·加普罗夫（按：原任土库曼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为中央第一书记，原任这一职务的巴·奥维佐夫被解职。奥拉兹穆罕默多夫当选

为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八期发表题为《计划与国家纪律》的社论，强调“计划具有法律效力”。说“企业的权力已扩大了，它们执行计划的责任也提高了”，指责“某些企业严重破坏计划纪律”。宣传“根据双边合同义务，发展各企业之间的长期的稳定的联系是加强企业的纪律性的有效措施”。

12月　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以及工会中央理事会批准《关于建筑业和修建单位工人的计件奖励工资制和计时奖励工资制条例》。

1970年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开始打破"三驾马车"的局面，突出自己，经常单独活动，发表讲话，越过政府机构，自己召集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长开会讨论农业生产问题。此外，还出版了勃列日涅夫言论集。

在经济方面，由于1969年农业歉收，加深了国内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深，预算收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推诿责任，对今后怎样管理经济意见分歧，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总的还是贯彻1969年12月全会的精神，把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改进计划工作和提高集约化程度作为发展经济的"战略方向"。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工业方面，推广谢基诺"经验"、组织生产联合公司；在一些工业部试行三级管理或在部、总局一级实行"新体制"，自负赢亏。在农业方面，强调加强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大搞化学化、机械化和土壤改良。与此同时，宣称可以以"出售黄金，增加进口"的办法来"克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在政治方面，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增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苏修当局进一步加强法西斯专政，镇压持不同政见的人，撤换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强调"加强法制"，成立司法部。

在军事方面，3月，在白俄罗斯举行了有各兵种参加的

“德维纳”演习；4 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举行了海军“海洋”演习。

这一年，苏联外交活动的中心放在欧洲，就欧洲局势先后举行了欧洲二十八个党莫斯科会晤和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最高级会议。8 月，签订了苏联西德条约。

1 月

1月1日 《共产党人》杂志第一期刊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杰米契夫的一篇文章：《列宁和文学艺术的党性》。文章说，“文学艺术是紧张的意识形态搏斗的重要战场”，“当代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复杂和具有多面性。它要求我们具有党的不妥协性、进攻性、周密性和明确的政治方向”。文章宣称创作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是维护、捍卫、发展和丰富真正的艺术这一优秀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传统”。说在苏联出现了“引起不健康的轰动、具有恶劣的政治意味的‘作品’”，这“博得我们敌人的高兴”，“他们匆忙地把这些‘作品’封为杰作”，“称这些作家是‘天才’”。

文章在谈到民族文化时说，“近几年来苏联人对苏联各民族的建筑古迹、绘画史、文学史等等的兴趣有显著增长”，“有时对以往的赞赏是盲目的，它转化为某种复古的浪漫主义幻想，直至对不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想和理论的迷恋”。

文章认为现阶段艺术界任务的特点是：“以最好的方式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提高理论工作水平和改善文艺评论”。此外，杰米契夫还谈到要老一代

和青年一代艺术家"真正合作","共同充实提高"。

1月5日 苏联宣布降低远东地区主要食品价格。面包、动植物油、糖、干酪等平均降价百分之六——十。

1月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第一期公布了关于剥夺斯大林女儿斯维特拉娜苏联国籍的决定。决定说她"犯有败坏苏联国籍这一称号的过错"(按:斯维特拉娜于1966年12月离苏去印,1967年叛逃美国,同年底发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1969年又发表《仅仅一年》,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斯大林和列宁)。

1月7日 《文学报》第二期刊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遗著科研委员会主席普罗科菲耶夫和艺术博士克里斯吉的一篇文章,对我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进行辩解。文章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05年革命后"不是逃往",而是到西欧各国作巡回演出,所带的"绝不是"歌颂沙皇、贵族的戏,而是"在酝酿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起过作用"的高尔基和契訶夫等人的剧目。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心全意地接受十月革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虽"产生于反动年代",却是"在苏维埃时期达到发展高峰"的。

1月11日 《消息报》载文,介绍列宁格勒一家科学生产联合公司的经验。这个"正电子公司"由科学研究所、工业设备设计局和两个大工厂联合组成。《消息报》编者按说,这类联合公司的"主要优越性在于:它们能够比较简便而容易地解决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及其技术更新问题,并且在生产新产品、掌握新的工艺规程时对集体的损失较少"。说"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是今后发展的合乎逻辑的步骤"。

1月13日 《真理报》就1969年苏共中央12月全会发表社论，透露了全会的一些内容。社论说，“全会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前景，分析了党在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的政治和组织工作任务，讨论了近几年党和国家工作的初步结果，同时也讨论了在制定未来的计划中，包括制定新的五年计划中出现的某些重大问题”。

说“过去四年的主要经济结果是，在极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指标方面将完成”第八个五年计划，“主要政治结果是”，“在加强我国经济潜力和防御能力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苏联的国家防御能力空前牢靠”。

说12月全会指出了党政机关、全体人民“都应致力于克服困难和缺点。批评许多工业部门发展迟缓、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得缓慢”，基建“往往突破”预算拨款，非生产性项目的建设“经常超出国家计划”。

说“遇到困难的原因实际上在于：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不容许按老办法工作，而需要采取新方法作出新决定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全会十分重视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苏联经济远景发展的中心问题。”“党正确地确定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这就是坚决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今后必须首先依靠经济发展的质量因素，即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集约化程度。”认为这是两个体系经济竞赛中“获胜”的“主要途径”。

说“全会强调了完善计划管理，特别是完善计委和整个计划机关的工作这项任务的迫切性”，苏共一贯“把管理问题看成是政治问题”。

社论还说，全会批评有些工作人员“丧失责任感，有敷衍

塞责和破坏纪律的现象”，这“首先表现在对完成国家计划持轻率态度”。点名批评了黑色冶金、煤炭、建筑材料、化学、森林和木材加工、造纸以及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等工业部和运输业。还批评了公共畜牧业中的缺点。

美国报纸报道，“苏联人士说，这篇社论包含了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讲话的‘实质’”。

1月14—15日 弗拉基米尔·西特宁被任命为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古任科被任命为海运部部长，原部长巴卡耶夫退休。瓦尔德马尔·莱因被任命为食品工业部部长。原部长瓦西里·佐托夫被解除职务。

1月15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加速发展西伯利亚石油开采工业》的决议。决议说，“1970年这些油田(按：指秋明油田)至少将开采三千万吨石油”。要求“保证在1975年使这一地区的石油开采量达到一亿——一亿二千万吨，在1980年达到二亿三千万——二亿六千万吨”。决议还要求交通部门“保证在1974年使跨过鄂毕河的秋明——苏尔古特铁路线交付使用，在一九七五年使苏尔古特——下瓦尔托夫斯基——斯特列热沃耶铁路线交付使用。”

1月15日 《红星报》刊登哲学博士苏利莫夫少将的一篇文章：《苏联军事建设的坚实基础》，宣传党的领导是“军事建设基础的基础”。党指导军队的几个“基本方向”是：“制定军事政策和军事理论”，“对居民进行战争的心理训练”，“制定和实际贯彻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建设的原则”等。

文章还认为科技进步要引起军事革命，要改善传统军种，实现组织改编，建立新兵种——战略火箭部队。说世界核战

争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重新考虑军队战备，对居民进行军事群众工作，组织全国民防等制度"，"加强培养军事干部"。

文章否认西方所传苏联存在"军界工业界集团"以及"苏联军队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有分歧"等说法。

1月17日 部长会议公布《关于向在职领养老金者颁发养老金的制度》的决定，规定在1970—1975年给工勤人员发给定额国家养老金，给已达到领养老金年龄而继续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教师等发百分之五十的养老金。《消息报》说，这是"为了更广泛地利用国民经济中领养老金者的劳动和进一步提高有劳动能力的领养老金者对继续工作的物质利益关心"。

1月22日 《社会主义工业报》报道，根据苏共中央决定，全苏学习谢基诺经验讨论会在图拉举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各部、各州、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和各企业经理出席了会议。会议认为，学习的主要方向是"实行有技术根据的劳动定额，一身兼几职，扩大看管范围和充分利用工作日"，"完善管理结构"，"合并车间和生产部门"，"技术设备修理的集中和专业化"等。

2月2日苏联通过一项法令，规定被遣散者在三个月内保留工资并接受生产方面的再训练。

《苏维埃俄罗斯报》1月6日曾载文介绍巴什基尔石油化学联合公司的"裁员"试验，称这是谢基诺试验的"第二阶段"。

1月24日 中央统计局发表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宣布国民收入比1968年增长百分之六，工业产

值增长百分之七，农业总产值相当于最近四年的年平均水平。说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了严重损失。粮食产量为一亿六千零五十万吨，钢产量为一亿一千万吨，石油产量三亿二千八百万吨。说“农业原料供应方面的困难，影响了一系列企业的工作”，“瓦斯开采、黑色金属、矿肥、纸张、水泥、纺织品、糖等产品没有完成年度计划”。

公报宣布，“到1970年初，已有三万六千家工业企业按新体制工作，它们生产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三点六”。

1月24日 《教师报》介绍列宁格勒一所中学进行“初级军事训练”，鼓吹在中学对青少年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说该校已“成立军事办公室，选择现代化直观教具，建立藏枪仓库，修造五十米长的优等室内射击场”。说“这是根据普通兵役法实行的学校初级军事训练制度的重要一环”。

此后，《消息报》编辑部、共青团中央、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教育部等单位决定从4月1日到5月9日“在全苏范围内对普通学校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进行观摩”。

1月29日 《红星报》发表社论，说1969年苏共中央12月全会“对管理军队的工作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要求改善管理军队的方法和体制”。

社论透露，“陆海军中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改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关的活动方法”，并说“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必然导致军队质量的变化和军事行动的进一步集中化”。

1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一期刊登一篇文章：《发展列宁主义的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公开鼓吹“通过招考制选

拔领导人”。文章要求经济领导人“大胆克服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不坐待指示，也不用以掩盖自己的行动，善于把对事业的政治态度和经济态度结合起来，把管理的一长制和委员制统一起来”。鼓吹“根据招考成绩任命各种业务领导人”。

《经济报》从1969年12月以来，曾多次刊登广告“招聘”和“招考”各种领导人，如总工程师、总机械师、计划经济科科长以及教研室主任、实验室领导人等等。

1月 《农业经济》杂志第一期刊登一篇文章：《列宁论国营农场的管理与经济核算》，鼓吹“国营农场托拉斯化”，声称“国营农场托拉斯的出现是近几年来国营农场生产迅速集中和专业化过程的直接结果”。认为“托拉斯能帮助国营农场充分利用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可能性”。

2　月

2月3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肉品和奶品工业部党委工作》的决议，要点如下：

(一)批评该部党委的“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大大落后于要求”，“缺乏锐气和战斗性，没有形成互相严格要求和对缺点不容忍的气氛”。(二)指责该部近年来基金回收率降低，完不成生产计划的企业越来越多，工资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不执行党和政府关于削减行政管理人员的指示。(三)部的机关“没有很好地对执行命令和指示以及部委的决定进行监督和组织”，“常常不能按时完成政府的委

托”。(四)党委常常表现“自由主义和无原则性”,对“某些党员丧失责任感、破坏国家纪律等没有给予尖锐的政治评价”等。

决议还点名批评了该部的正副两个部长。责成该部根据1969年12月全会的要求,从根本上从新安排党组织的工作。

《真理报》2月25日就这一决议发表社论,强调该决议对各部、各主管部门和各苏维埃机构的党组织“具有重大意义”。

2月6日 《苏共党史》增订本第三版出版,该书把苏联党的历史一直叙述到1969年6月。

《真理报》就此发表书评,宣称该书“反映了苏共同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自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进行的原则斗争”。“1964年苏共中央10月全会是党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使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中的主观主义错误得到克服,结束了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中不正确的改组。”

西方通讯社对此书评论很多,说新版党史对1962年版作了“成套的修改”,把有关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大部分段落都“取消了或改动了”。“有限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降低了赫鲁晓夫的地位”,“把1962年版对赫鲁晓夫成就所作的夸大描述压低了”。

2月10—12日 作家协会为响应科涅夫元帅等人的呼吁,召开各加盟共和国、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作家组织军事文学委员会主席会议。会议强调“描写现代军事文学”的“重要性”,表示要“动员全体新老作家写苏联陆海空军的功勋”。

2月11日 摩尔达维亚农业部部长涅格鲁—沃德在《农村生活报》发表一篇文章,鼓吹农业工业联合企业,并介绍

了几种类型：集体农庄企业、农庄与农庄合办的企业、国家与农庄合办的企业，以及工厂国营农场。文章说，这种农业工业联合企业主要是把农产品的种植和加工结合在一个企业里，这种农业工业联合企业的建立是“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过程”。

2月12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工会中央理事会、共青团中央联名给各级组织和劳动人民一封信，题目是«关于改进挖掘生产潜力和在国民经济中加强节约制度»。信中透露国民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低于五年计划的规定，生产效率不高。某些工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五年计划指示的规定，其中包括燃料、电力、冶金、农机等，相当大一批工业企业、建筑和运输组织没有完成国家计划。1969年一系列地区的肉、奶、蛋减产，农作物产量和畜产品率低，破坏国家纪律和劳动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核心问题”。号召“全体劳动人民积极投入争取胜利完成五年计划的全民斗争中去”。

«真理报»等自3月3日起连续几天报道全国各地企业讨论这封信的情况。«真理报»3月3日所加的按语说，“挖掘一切潜力来完成1970年的计划，——这就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努力方向”。«真理报»3月5日发表社论说，此信是“有巨大政治意义的文件”，是“为进一步加强祖国威力的斗争中的具体的行动纲领”。

2月14日 英国«每日电讯报»引用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的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话说，“俄国目前在核武器上花的钱为美国的两倍”。1970年“俄国将在进攻性和防御性核武器

上花七十五亿英镑。美国将花二十八亿到三十三亿英镑。到1974年,俄国的开支将增加到一百零四亿英镑”。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古德帕斯特说,“苏联今年在国防方面的费用将近有七百亿美元”。

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发表题为《共产党的党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极其重要的原则》的编辑部文章。说从事唯物辩证法问题研究的绝大多数哲学家“目前正在忙于研究狭隘认识论或狭隘逻辑学问题”。最近进行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出一定的不良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于对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采取了非辩证的态度”,“力图从抽象的逻辑前提的立场出发,脱离社会政治实践来看待问题”,“使哲学范畴的内容出现了贫乏的现象”。在社会研究工作方面“规模宏大而代价高昂”,“结果是毫无新东西”。抱怨哲学战线“落后于实际生活、国际局势、意识形态斗争和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任务”。说二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初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苏联“遇到一定困难”,在哲学著作中出现过“错误和缺点”,但哲学还是“一往直前发展的”。

文章指责“某些学者力图使不成熟的、欠考虑的、仓促写成的著作成为广大公众的东西”,许多学术会议“降低了对学位论文,特别是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并指名攻击彼得罗夫关于分析“东方思想家的世界观”的论点(《哲学问题》杂志1969年第一期文章),声称“对社会思想史的任何歪曲——欧洲中心论或亚洲中心论倾向,都要进行彻底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文章还指责《新世界》杂志1969年第三期发表的对佩尔希茨等三人所著《原始社会史》的评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解

决国家和宗教的起源问题的某些原理表示怀疑”。

2月 《文学报》第七期刊登经济学博士比尔曼的一篇文章:《改革的第五年》，谈经济改革的“某些问题”,说经济改革“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影响”,“经济核算加强了”,“经济工作水平提高了”。但也透露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提出“社会生产的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的速度”,“基金回收率提高得很慢”,“加速技术进步方面没有改观”,“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慢”,“企业没有腾出劳动力”,“工资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等。他承认所有“这些缺点和困难是存在的”。改革不能“一下子就摆脱比例失调所造成的一切困难、不善经营的现象和其他种种缺点”。但他认为,“无需”对新体制的“最初原则作某些根本性的改变”,而是要“更坚决地使改革的地位上升”。使改革从企业一级推行到总局和各个部。他认为下个阶段改革的实质是“要加强集中的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同时扩大企业经营上的独立自主”。

2月 《苏联财政》杂志第二期在一篇题为《完善企业对预算上缴利润的制度》的文章中透露,“在新体制下,很大一批企业完不成上缴预算的义务”。文章称剩余利润“属于整个社会,划为预算收入合情合理”,归企业或部门“会破坏集中计划基础,导致比例失调,缩减国家财源”。同时宣传基金付费“在新体制下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月 《新世界》杂志第二期公布的编委名单表明，原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已被解职，由科索拉波夫继任。该杂志另外四名编委维诺格拉多夫、康德托维奇等同时被解职。

3　月

3月4日　塔斯社报道，勃列日涅夫召集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开会，讨论"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生产和出售的问题"。波利扬斯基、库拉科夫、马茨凯维奇等参加了会议。

3月4日　《消息报》发表题为《艺术的崇高使命》的社论，说"艺术的党性、人民性和阶级性原则，对资产阶级思想不妥协的原则，是苏联艺术大师创作的思想基础"。透露去年各创作协会联合会曾"激烈地批评了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歪曲现实"，"把苏维埃人写成平庸、头脑简单和感觉迟钝"。

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罗曼诺夫3月5日在《文化报》发表一篇文章，要求提高电影的"思想艺术水平"，说电影艺术应是"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搏斗的不屈不挠的战士"。文章表示对一些电影制片厂去年的情况"十分不快"，这些电影制片厂生产了许多"艺术低劣、内容贫乏"的影片。

《文学报》3月4日的文章还透露在今年2月举行的全苏评论委员会上"有不少争吵和辩论"。

3月4日　以部长会议副主席迪姆希茨为首的一批犹太族人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宣传苏联"一贯奉行"列宁的民族政策。

3月7日　《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列宁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文章，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说"共产党领导整个国防事业、军事建设、武装力量发展的原则，是列宁保卫社会主

义祖国学说的核心”，“列宁坚决谴责军队或个别军事机构脱离党的领导”。

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3月13日在《真理报》上也提出“党的绝对领导是苏军威力的主要源泉”。

3月10—15日 苏军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德维纳”军事演习。塔斯社宣传这次演习的目的是“检查和进一步完善部队的战斗训练水平和司令部的战役训练水平”。参加演习的有一系列军区的各个兵种，包括火箭部队等，演习由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指挥。勃列日涅夫出席观看并在总结会上发表了讲话。

《红星报》3月18日发表社论，说这次演习是“苏联武装力量发展的重要阶段，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军事技术和用现代作战要求来完善训练”，并透露这次演习是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进行的。

3月11日 路透社报道，据“在贝尔格莱德和布拉格的可靠的共产党人士声称”，“苏联政治局的三名委员苏斯洛夫、谢列平和马祖罗夫在一个文件上署名”，“抨击”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党的经济工作上存在严重缺点”。说“他们三人散发一个文件，以便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

此消息盛传一时。据法新社报道，苏联外交部发言人扎米亚京3月13日断然否认这一传闻，说“这个消息不过是外国通讯社的重大挑衅而已”。

3月19日 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同遗传学若列斯·家麦德维杰夫和物理学家图尔钦联名写了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和波德戈尔内的信，要求保障人权和制定一个"进一步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纲领"。信中列举了经济上的一系列问题，认为根源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至今尚未彻底消除的那些反民主的传统和社会生活准则"。信中提出了要求在四、五年内实现的"十五点计划"，包括：高级党政机关发表进一步民主化及其实施方法的声明；逐步扩大同外国的情报交流，直到完全取消限制；广泛建立具有高度独立性的综合生产联合公司；停止干扰外国广播、自由出售外国书刊；大赦政治犯；废除在身份证和调查表上填写所属民族的规定；改革教育；扩大苏维埃机关的权力；恢复斯大林时期被强迫迁移的民族的一切权利；在各级机关内设立有熟练专家参加的谘询性科学委员会，等等。

3月24—27日 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党政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杰米契夫等出席了开幕式。作协主席索鲍列夫致开幕词。会议强调要搞军国主义教育。

《苏维埃俄罗斯报》为此发表社论，指责某些作者"思想立场不清楚，过分注意生活的黑暗面，对我国人民的成就持怀疑态度，有时给它抹黑"，"苏联文学创作协会内部有这种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和愿望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

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当选为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

俄罗斯联邦戏剧家协会也于5月12日举行代表大会。会议主题与作协代表大会相同。

3月31日 塔斯社报道，哈萨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巴伊肯·阿希莫夫为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原部长会议主席

别伊谢巴耶夫退休。

3月31日 苏联元帅铁木辛哥病死。

3月 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七期发表一篇文章，谈现代战争和战斗准备问题。他说，“谁在经济、科技、社会政治、道义和军事方面占优势，谁就能在战争中取胜”。在谈到现代战争的性质时说，苏联“十分注意火箭核武器同常规武器的合理结合”。他认为战斗准备“现在已不是暂时的和非常的状态，而是经常和必定的状态”。这种准备要求“不仅能迅速行动，而且要在恰好符合具体情况的那种规模和地点使用适当的手段”。

4 月

4月2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于完善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制度》的决议。

4月5日 《红星报》刊登苏军总参谋长扎哈罗夫的一篇文章：《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军事科学》。文章在谈到战争的战略目标问题时说，“在过去的战争中，战争的目标主要是武装力量，目前则包括交战国的经济、工业区、交通枢纽以及国家和军事管理体系”。

4月7日 《消息报》报道，部长会议最近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仪表制造、自动化工具和控制系统部生产经营活动的计划工作和提高经济方法的作用》的决议，决定扩大该部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的独立性”，“整个部都转为完全用自己的

收入抵偿支出的制度”。

《文学报》第二十七期(7月)刊登比尔曼的一篇文章，说经济改革过去四年半的特点是，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在企业一级进行的，“这只是改革的第一阶段”，“它主要是向广度发展，很少涉及经济领导环节——总局和部”。今年的特点是，“将改革提高到第二阶段”；整个仪表制造部门和莫斯科汽车运输总局采用新的经营方式。这使经济改革“不仅向广度，而且向深度发展”。说第二阶段的变化在于，国家对部“每年只批准三项指标：产品产量；新的生产能力和项目的投产量；物质技术设备供应量。其余指标由部自行计划”，所获利润在部和国家预算间按一定比例分配。“国家预算完全停止对该部的一切拨款”。工业部“一切都靠自己的资源”。

4月12日 勃列日涅夫到哈尔科夫，向哈尔科夫州和哈尔科夫拖拉机厂颁发列宁勋章。4月13日，勃列日涅夫在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职工大会上发表讲话，承认经济困难，说“某些问题是客观产生的。比如，前几年在国际上产生了一系列麻烦”，“给苏联经济带来了某种额外负担。近两年来的气候条件也使我们为难”。强调“经济发展方针的主要问题”是“坚决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说加速科技发展并广泛用于生产是“经济战略上极其重要的任务”。“另一重要任务是完善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这就使计划管理的任务变得非常迫切”。宣称提高农业是“全民事业”，说畜牧业发展有“重大缺点”，“居民需求的增长超过了畜产品生产的增长”。

4月14日，勃列日涅夫在向哈尔科夫州授勋的大会上发

表讲话。法新社4月14日说，苏联所有宣传工具大事宣传勃列日涅夫在哈尔科夫的讲话是为了使勃列日涅夫“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引人注目的、大大改变了的形象”。说他一改过去“三驾马车”的做法，单独一人访问布达佩斯和去明斯克，表明了他“个人重要性的明显增加”。

4月12日 南通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许多河流冲决了堤岸，许多城市遭淹。奥卡河水位比正常情况高出十四米，说这是有水文记载以来的几百年中从未达到过的高度。

瑞士报纸5月30日也报道说，乌克兰灾情“极其严重”，是“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

4月14日 部长会议批准了全苏农庄理事会《关于建立和使用社会保险基金的办法》，规定从1970年起，庄员如暂时丧失劳动力，生育，安葬，去疗养院休养，旅行，参加农村少先营活动等，都可享受按不间断的工龄长短分别发给的一定比例的补助，这种补助由庄员社会保险基金支付。

4月14日 国防部宣布，将于4、5月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举行海军“海洋”演习。“全部苏联海军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都将参加演习”。

合众国际社据“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人士消息”说，“参加演习的军舰数目为一百七十五艘到一百九十艘”。

4月19日 《真理报》公布中央统计局关于1970年人口普查结果的通报，说截至1970年1月15日，苏联人口为二亿四千一百七十四万八千人。在1959年普查后的十一年里，苏联人口增加了三千二百九十万人，即增加百分之十五点八。

4月21—22日 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大会在克里姆宫举行。有六十六个外国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勃列日涅夫于4月21日向大会作了长篇报告。在谈到苏联当前情况时，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今天的社会“是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各大小民族和各代人的友谊与合作”。“今天的苏联社会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体现。”在谈到国内经济问题时，他说，“苏联经济正在进入重要的新阶段”，“必须制订出符合国家发展现阶段情况的那种经济政策、经营方法以及组织和管理方式”。并说经济方面“遇到的复杂情况，往往在于计划的不完善，还在于执行计划不够准确”。在谈到“发扬民主”时，他说，民主是“每个公民、每个集体、每个加盟共和国参加解决社会生活问题和同偏离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准则和原则的现象作斗争的权利”。强调对群众“进行教育工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说“不容许低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按：自从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提纲发表以来，苏修当局组织了各色各样的“学术会议”、“国际会晤”、“国际讨论会”、“展览会”，并在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纪念文章)。

4月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摄大型彩色历史文献纪录艺术片《解放》。影片共分五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史实”。其中多次出现斯大林活动和讲话的场面。

4月 斯捷帕科夫被解除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职务，后调任驻南斯拉夫大使。米哈伊洛夫被解除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职务并退休。罗曼诺夫被解除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职务，后调任《苏维埃文化报》总编辑。麦西亚釆夫被解除国

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职务，由原塔斯社社长拉宾接任。阿利哈诺夫被解除阿塞拜疆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布拉吉莫夫接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扎米亚京调任塔斯社社长。

5 月

5月1日 苏联提升一批军事领导人的军衔。授予原海军上将尼·德·谢尔盖耶夫以海军元帅军衔。授予原驻德苏军总司令维·格·库利科夫、远东军区司令伏·费·托卢勃科和阿·费·谢格洛夫以大将军衔。

5月1日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一书开始出版。第一卷包括1964—1967年的言论，第二卷包括1967—1970年的言论(按：包括1970—1972年的言论的第三卷和包括1972—1974年的言论的第四卷也已出版)。

5月7日 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卡恩别尔津被解除职务，由原部长会议主席维·彼·鲁宾接任。

5月8日 莫斯科集会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二十五周年。党政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出席，格列奇科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增强了许多倍”，“现在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掌握着历史的主动权，社会主义正处在历史的进攻阶段”。格列奇科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祖国的利益，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使我们还必须从远东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得出最严肃的结论。我们已经采取、今后仍将采取

一切必要的措施，使我们的国防，无论是在西部，还是在东部，都是坚固和牢不可破的”。格列奇科还要求科技人员“保障陆海军拥有符合时代要求，并体现科技进步最高成果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

5月15日 哈恰图罗夫院士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透露“经济机关、科研和设计部门中已在拟定1980—2000年的长期预测计划”，说“未来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仍是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电气化”。

5月19—20日 作家协会和苏军总政治部联合召开“全苏军事爱国主义文学会议”。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沙乌罗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作家在今天如何表现军事爱国主义题材以及什么是提高和发扬英雄主义传统的途径”。会上强调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新战争的危险”，并制定了具体的鼓励军国主义作品的办法，要求作家通过描写战争反映苏联人民的“思想一致”，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打仗时的“前后方一致”。

另据《苏维埃俄罗斯报》5月31日报道，5月29日全苏戏剧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在伏尔加格勒召开了“关于戏剧如何表现军事爱国主义题材”的现场会议。查列夫在会上宣传“军事爱国主义题材”在戏剧中有“重大意义”。

5月21日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一期（5月21日付印）刊登雷宾的一篇文章：《现代战争及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文章把当代战争分为五种基本类型，说“战争的类型是由当代主要特点和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武力手段解决的矛盾性质决定的”。他认为的第一种类型是“两种对立的社会体

系之间的战争”，说世界核战争的危险“是很大的”，“世界战争也可能在局部冲突发展的过程中爆发”。第二种类型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但他并不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将国内战争看成是夺取政权的必然形式”，而是“宁愿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三种类型是民族解放战争；第四种是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的战争；第五种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战争，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说它们“联合的倾向和分裂的倾向正在斗争”。

5月26—30日 共青团举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党政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参加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发表讲话，对青年提出的要求是：(一)“保卫父辈成果，实现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二)“掌握知识，对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有强烈敏感性”。(三)成为“意识形态战线上的积极战士”。说“国际局势要求加强苏军的战斗准备”，而“共青团及其光荣的军人队伍在为苏联武装力量培养这样一代的事业中起着重大作用”。

佳热利尼科夫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5月28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就完善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煤炭工业的管理结构分别作出三个决议。

前两个决议规定把化学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由联盟—共和国部改为全联盟部，这两个部的管理体系是：部——全苏工业联合公司——企业，并建议进一步减少行政开支。

第三个决议规定煤炭工业部的管理体系为：部——联合企业——企业的三级管理体制。

煤炭工业部部长勃拉特钦科2月15日曾在《社会主义工业报》发表文章谈三级管理体制。这种三级结构是：(一)“合并煤区和煤矿，撤销大多数煤业托拉斯和一些其他机构”，让煤矿和选矿厂等直接隶属于联合企业。(二)联合企业由部领导。它“对完成国家的全部数量和质量指标的计划负责，对本地区远景发展规划和技术进步情况负责，对安全技术设备状况和根据新体制从事经济经营的情况负责”。(三)“加强部里各分支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在计划工作、部门的技术发展、组织劳动和管理生产、物资技术供应和财政方面的分支机构的作用”。

同日，还通过了关于成立国民经济管理学院的决定。

5月29日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反对派遗传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由于反对邮政检查，抗议当局阻止科学家同外国科学家合作而被捕并被关进精神病院，后因萨哈罗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等人的抗议，于6月17日获释，并在生理和生物化学研究所任“高级研究科学家”。

5月 《对外贸易》杂志第五期刊登外贸部副部长阿尔希莫夫的一篇文章，说“苏联作为一个最大的开采金矿的国家也可以以出售黄金来增加进口，克服无法预见的情况，例如歉收或者受外部原因影响而引起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文章说，“战后时期，苏联总共给了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贷款一百三十亿卢布，给了发展中国家五十多亿卢布”。而苏联在1964—1969年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银行获得贷款十一亿六千四百万卢布，其中英国为二亿三千四百万卢布，法国为四亿六千三百万卢布，意大利为三亿七千九百万卢布，奥地利为

八千八百万卢布。另外，近年来从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以贷款形式购买价值三亿三千万卢布的汽车厂设备，向意大利、西德和奥地利的公司和银行贷款六亿多卢布以购买瓦斯管道等设备。

6 月

6月3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国家地震地区建设》的决议。决议要求“把新的工业企业分布在从地震角度来看是有利的地区”。“在地震烈度为九度的地区，必须限制建设和扩建与加工当地原料资源和直接为居民服务无关的那些工业企业，限制设立科学研究所和设计院、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

6月7日 《真理报》刊登副博士鲁基扬诺夫的一篇题为《全民国家和民主》的文章，说“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继续。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全民国家，乃是建立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同一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说“工人阶级政权之所以变成全民政权”，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意志成了社会其他各阶层共同的意志”。文章否认全民国家是工人阶级“把政权交给整个社会”，说工人阶级没有把政权交给任何人，“而是发动社会以及所有社会集团和民族集团积极参加行使权力”。

6月12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修改民警机关对刑满释放的人实行行政监督条例》的法令，规定增加一条把由于“蓄意犯罪”而两次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以及在服刑期间

或刑满释放后“表现不好”的人作为监督对象的条文。监督时间由半年改为半年至一年，必要时还可延长。

6月14日 苏联举行第八届最高苏维埃选举。塔斯社6月16日报道，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了一千五百一十七个选区当选的代表，其中七百六十七名是联盟院代表，七百五十名是民族院代表。当选代表中，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七，农庄庄员占百分之八点六。代表中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二点三，非党人士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七。妇女占百分之三十点五，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占百分之十八点五。

6月20日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斯大林的墓上树立了一座斯大林的半身雕像。同时在伏罗希洛夫的墓上也树立了一座伏罗希洛夫的半身雕像。

6月 6月初起，苏联领导人为参加6月14日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分别向选民发表讲话。

6月10日，柯西金在讲话中说，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针之一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逐个实现经济改革”，“改革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已有了“重大的积极成果”。说认为“改革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放弃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强调“科学空前密切地同生产结合在一起”，在科技进步的现阶段，“提高设备的使用率这一任务变得特别迫切”。说苏联“已创建了这样一种强大的经济潜力，它足以使我国的防御能力保持在应有的高度，同时也有助于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6月11日，波德戈尔内在讲话中说，“二十三大在重要

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方面规定的任务正在顺利完成”。“在现阶段，坚决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社会生产的集约化已经成为加速发展我国经济的主要因素。”“解决任务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在经济建设的一切部门保持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法律“有助于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可靠地保卫着社会主义制度”。认为“苏维埃国家成了人民的无所不包的政治组织”，在各级苏维埃中“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6月12日，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说，“完全有根据对前四年作出肯定的评价”，“党在上次选举时的纲领已经实现”。四年来，在经济改革方面“学会了许多东西”。“这不仅能使我们明确地确定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强化国民经济和大大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主要任务，而且能使我们找到解决这些任务的正确方式、途径和办法”，在改进计划工作，完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方面，还蕴藏着“加速发展经济的巨大潜力”。“目前应该从科学技术进步和改进管理事业的衔接方面去寻找许多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在经济建设各条战线上，克敌制胜的科学，实质上就是管理科学！因此，研究管理科学正成为我国干部首要的职责”。强调要为农业建立“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增加投资，增加机器、矿肥的供应量，完成土壤改良计划，改善农村建设，把饲料生产转到现代化工业基础上和建立强大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在工业方面，“首先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及保障经济的动力基础和决定科技进步的那些部门”。声称特别重视“已经确定的干部工作作风”，“信任并尊重人”，使干部能“发挥主动精神”。但是，“不打算恢复遭到党坚决谴责的行政命令方法”。说这种工作作风“同严格要求、

切实监督和批评缺点不可分割”。“如果某个工作人员没有从批评中得出应有结论，他就无权指望会继续尊重他。”强调“加强法纪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一项全国性的、全党的任务”，法令“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不论其地位、官衔和级别如何”。在谈到苏维埃的活动时说，苏维埃代表的义务是“遵循党的政策，为实现党的纲领而斗争”。说“党和党中央委员会今后将经常关心提高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

7 月

7月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农业问题，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关于党在农业方面当前的任务的报告。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透露，苏共中央政治局最近曾多次讨论农业问题，并通过《关于提高畜产品生产盈利率》的决议和《关于增加农业投资，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设备》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承认在农业方面“尚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谷物生产状况不能使人满意”；“棉花生产发展缓慢”，“蔬菜水果产量很低”，“畜牧业长期落后”；承认过去为解决农业问题的各种努力都“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

他说，进一步发展农业是“一项巨大的国民经济和政治任务”，“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增加粮食生产”，“今后几年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

他提出下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农业指标和具体措施是：粮食的平均年产量由上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亿六千二百万吨提高到一亿九千五百万吨，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求每公顷

的单产提高四公担（按：前四年的平均单产为十三点二公担）；粮食年收购量六千万吨计划不变，另高价收购二千万——二千五百万吨；1975年棉花收购量为六百八十万吨；肉产量要达到一千五百六十万吨，办法是广泛采用工业方法并增加牲畜头数。批评有人"认为增产任务可以靠提高畜产品率而不必增加牲畜头数来完成"。

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投资为七百七十六亿卢布，比本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其中用于建设安装工程的近四百五十九亿卢布。1975年将生产矿肥九千万吨。下一个五年计划"土壤改良工作的特点是：在苏联历史上将出现一个个生产谷物的大面积水浇地区"。说"广泛发展土壤改良，这是我国农业的前途"，"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畜产品成本的决定性因素"。要不惜力量使农业机械干部固定在农庄、农场。说政治局认为，要使"一切工业部门"，"任何一个工厂"都"不置身于（生产农业技术装备）这项重大而崇高的事业之外"。

他指责农庄、农场领导薄弱。有些人对完成收购计划漠不关心。说收购计划是"必须遵守的法律"，要加强同违反纪律、缺乏责任感、浪费和经营不善等现象作斗争。

全会就勃列日涅夫的报告通过相应决议，并决定"1971年3月召开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

全会后，各加盟共和国先后召开党中央全会，贯彻7月全会决议。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陆续通过了《关于对土壤改良系统的管理》、《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改变国营农场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增加马铃薯、蔬菜和水果产量》、《增加饲料生

产»、«加速发展微生物工业»等决议。

7月9日 最高法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1962年通过的«关于贪污案审理办法»的决议。说审判实践表明，“上述犯罪行为在我国并不是普遍性的，然而却是一种对社会很危险的行为，并要求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根绝”。

7月14—15日 第八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一次会议。阿·希季科夫当选为联盟院主席，雅·纳斯里金诺娃当选为民族院主席。柯西金再次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批准了柯西金提出的政府组成名单。政府主要成员中未发生人事更动。波德戈尔内再次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会议选举了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柯西金代表新政府发表了讲话。会议还通过了«劳动法立法原则»。

7月15日 最高苏维埃颁布«劳动法立法原则»，共十五章，对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的内容，对职工的工作和休假时间、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保护，以及对青年和妇女的劳动条件等，作了具体的规定。

在关于劳动合同一章中，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同企业机关之间的契约，可分为不定期或以完成某一工作为期，不定期合同可由职工或行政部门提议而废除，职工废除合同要在两周前通知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则可根据职工技能不够、不适于所担任的职务，或由于裁减人员或职工无故旷工等情况而提出废除合同，但需征得工会的同意。

在关于工资一章中，规定“计时或计件地发给职工劳动报酬”，并实行计时或计件奖励制。在完不成生产定额或出废品

的情况下，如由于职工本人的过错，可降低报酬。职工在履行劳动义务时由于自己的过错给企业造成损失时，职工要对直接实际损失承担物质责任。

在关于劳动纪律一章中，规定对不缺勤、不出差错、工作有成绩的给予表扬或奖金等各种奖励，对违反劳动纪律者可给予警告、降职或解雇等处分。

7月28日 西德慕尼黑苏联问题研究所《当前苏联情况剖析》第六百一十期报道说，苏军总参谋部竭力要"建立一支和平时期强大的军官队伍"。现有一百三十所军事学校，每所军校在规模和编制上相当于旅，但享有师级地位，每年训练出四、五百名中尉级军官。

7月 部长会议广播电视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联盟一共和国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

斯图卡林被任命为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

7月 《经济报》第三十二期刊登国家计委副主席巴楚林就苏联国家计委经济改革问题跨部门委员会的工作任务问题对该报记者的谈话。巴楚林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他说，跨部门统筹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有计划地领导在国民经济中实行经济改革的工作；批准苏联各部、各主管部门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提出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建立经济刺激基金的起码标准和定额，并监督这些定额的实行是否正确；研究和总结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新的经营体制的经验，详细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计划制度和经济刺激制度的问题。同各部、各主管部门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共同拟定关于完善生产管理组织的建议，是给跨部门统筹委员会规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在

某种程度上崭新的职责”。

7月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工人工资的示范条例》和《领导人员和专家工资的示范条例》。

8 月

8月5日 关于建立生产联合公司问题的全苏会议在列宁格勒举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有关人员约八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称建立生产联合公司是工业发展的“方向”。8月25日，国家计委副主席巴楚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未来属于生产联合公司”。

8月8日 《消息报》宣称，苏联开始在远东弗兰格尔湾建造新海港。该港规模将超过纳霍德卡港。通往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航线将从弗兰格尔湾开始。

8月11日 《真理报》刊登阿法纳西耶夫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文章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党的政策是苏“社会的生命基础”。“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不可动摇的”。“党的经济政策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意义”，“苏共决议贯穿着列宁的政治和经济领导统一的原则”。文章说，“目前，集约化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总渠道”，“开展科学技术进步是集约化的有力手段，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加速发展经济的巨大潜力在于改进计划工作，完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

8月11日 法新社据《巴库工人报》报道，阿塞拜疆部长

会议副主席奥鲁杰夫因“严重失职”被解职。《真理报》3月份曾报道该共和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书记克亚齐莫夫因“工作中有严重缺点”被解职。

8月22日 《真理报》刊登经济学副博士鲍尔迪列夫的一篇谈人口迁移的文章，说每年“约有一百五十万人从农村迁到城市”，“近几年来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对农业发展有不良影响”，“迁往城市的主要是青年”，“有的地方，从事农业者的平均年龄为五十多岁”。说从欧洲部分向东部地区移民的任务“由于有些人从东部倒流回来而拖延了，结果国家遭到严重损失”。

8月28日 勃列日涅夫去阿拉木图参加哈萨克党和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哈萨克“过去是沙皇俄国的荒芜的、落后的民族边区，现已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五十年代进行的垦荒“将永远作为全民的功绩”而“载入史册”。勃列日涅夫去哈萨克后，又去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等四个加盟共和国活动，直至9月9日才回到莫斯科。

8月 《新世界》杂志第八期刊登彼得拉科夫的一篇文章：《经济的管理和经济利益》。文章说，应当使企业领导人感到“卢布的直接压力”，以此来纠正官僚主义。文章还鼓吹用“市场和商品货币手段”“纠正计划方面的错误”，利用价格取得供求平衡，即“选择”一个能“消除对这种商品的排队现象的价格”。

费多连科院士也曾在《经济问题》第三期发表文章，鼓吹以“纯利润”作为“估价企业工作的原则”。说巴楚林（国家计

委副主席）和斯特鲁米林教授认为这种做法会引起“市场关系不适当地加强”的说法是“错误设想”。

《真理报》10月30日刊登索洛维耶夫的一篇文章：《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关系》。文章强调“国家担任着经济中心的职能”，指责“右倾修正主义者过份夸大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否定集中的计划管理，导致‘市场社会主义’”；强调“国家领导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和强大因素”。

《贸易报》11月14日也载文反驳彼得拉科夫文章中有关排队问题的论点。

在此之前，苏联报刊曾就“市场经济”问题发表过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巴楚林曾于3月份发表谈话，《真理报》曾于5月份发表哈恰图罗夫的一篇文章，都批评“市场经济”的观点。

9 月

9月1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司法部（联盟—共和国部）。弗拉基米尔·捷列比洛夫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决议批评“司法机关和检查机关的工作不能完全符合加强法制和国家纪律、防止和消除犯罪行为的任务”，要求检查机关“更积极地揭露和杜绝经营无方、浪费和破坏纪律等事实并追究责任”。

西方通讯社认为苏设立司法部是要加紧对经济的控制，确保对“浪费国家财产和管理不善”的现象给以“严厉的惩处”。西方通讯社还报道苏联对经济罪犯判处死刑，如格鲁吉

亚共和国一个厂长因舞弊十一万多卢布被枪决，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一个居民因盗窃十万多卢布被判死刑。

9月8—9日 《红星报》报道，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国防部副部长帕夫洛夫斯基、空军元帅库塔霍夫、工程兵上将科马罗夫斯基等去远东军区和后贝加尔军区活动，“访问了参谋部、训练场、机场和兵营”。格列奇科“对指挥官、参谋部、政治机关和党组织提出高度要求”，要他们“对部队战斗准备情况负责任”。他在后贝加尔军区时叫嚷“必须保持每个兵团、部队的高度警惕和战备”。

塔斯社报道说，格列奇科等人还于9月9—11日去蒙古活动。

9月12—24日 苏联发射“月球16号”自动站，将月面土石带回地球。

接着，在11月11日又发射“月球17号”自动站，将一个月球车“月行者1号”送上月球，在地面操纵下对月球表面进行研究。

9月14日 美国《新闻周刊》载文，谈苏联的“斯拉夫复兴运动”。文章说，苏联近年来大力“发掘”老沙皇的“遗产”，达到了“接近于全国性狂热”的程度，过去禁用的沙皇时代的装饰品现在到处作为时髦物张挂，政府已花费数以亿计的卢布来修复老沙皇的别墅和教堂，邮电部发行了印有古老俄国建筑的邮票，出版了数十种有关古代文化的书籍。

9月15日 《教师报》刊登部长会议于9月8日批准的《中等普通教育学校章程》。

9月中 法新社报道，阿马扎斯普·巴巴扎尼扬已被任

命为苏军坦克部队司令。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调任驻华大使。由第二书记格里戈里·罗曼诺夫继任州委第一书记。苏联新闻社社长布尔科夫因退休被解职，由乌达利佐夫接任。

9月30日—10月4日 勃列日涅夫去巴库参加阿塞拜疆党和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庆祝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谈了一通"成就"之后，批评该共和国最近几年在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方面"有点落后"，认为在农业方面在提高棉花、谷物和饲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上还有巨大潜力。强调"要提高干部的国家纪律水平和对所担负的工作的责任感"。

9月 《经济报》刊登《集体农庄内部的示范规章》。

9月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七期（8月18日付印）载文，谈生产力布局同国防的关系。

文章说，"配置生产力要考虑到不断加强苏维埃国家的防御能力"，以"保证在一旦发生热核战争的情况下经济具有足够的'生存力'"。文章主张发展东部地区，"把集中的原则同分散的原则结合起来，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经济基地"。

文章说，一旦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将成为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决定性交锋"，并"将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卷入这场战争"。火箭核武器将成为"主要的决定性手段"，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用常规武器作战"，因此，"在工业分布稀疏的新开发领土上有计划地建立工业枢纽是生产力布局的一个重要方针"。"生产力地域布局的主要战略要求是：尽可能符合经济上合理的考虑，同时要有足够的分散性和可以得到防御并因

此而相对地减少核打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在分布特别重要的军事工业设施时，不得不使某些经济上的合理考虑为现代战争所要求的战略利益让步”。

10 月

10月5日 全苏畜牧工作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讨论下一个五年计划畜牧业发展问题。

10月7日，《真理报》载文称近年来对国民收入和物资的分配作了有利于农业，尤其是畜牧业的重大变动。但近两年来肉类生产仍处于同一水平上，给肉食供应造成了“一定困难”。

10月8日 瑞典科学院宣布把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金授给索尔仁尼琴。《真理报》10月21日说，此举是西方“冷战性的政治挑衅”。

10月15日 苏联一架民航机被劫往土耳其降落。西方通讯社报道说，这是“对苏联国内航线的第一次成功的‘劫持’尝试”。劫持者是苏联两名犹太族人。

10月20日 《党的生活》杂志第二十一期（10月20日付印）刊登苏共中央《关于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党委工作》的决议。决议批评“党委会在教育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着重大的缺点”，对研究所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状况分析不够，“对资产阶级学者的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作斗争时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坚定性”。

决议责成该党委会要“进一步完善思想教育工作”，“教育

科学家用不调和的态度去对待反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按: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是该研究所的成员)。

《真理报》于12月2日刊登了该研究所党委书记西林对该报记者的谈话。西林强调说,"我们连一分钟也没有权利忘记当代世界上的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有人以自己的'无党派'而轻举妄动,简直是给敌人撑腰"。

10月23日 《真理报》载文阐述消灭城乡差别的道路;提出建立高度发展的农业,进一步完善两种所有制并使之接近;提高庄员工资和文化福利生活;扩大农庄、集中农业居民以减少自然村落等。说由于近年来扩大农庄和进一步发展农庄生产的结果,农庄已接近农场甚至工业企业。

10月26日 外贸部宣称,有二十六个大型外国公司和组织,包括法苏和芬苏商会在内,在莫斯科设立了常设代表处。其中意大利有三家,日本有十一家,法国有五家。

10月 《经济问题》杂志第十期刊登沃罗比尧夫的一篇文章,强调"粮食生产集约化"。他说,"靠扩大播种面积进一步增加粮食生产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在科技革命时期,集约化就是农业方面扩大再生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

10月 西德慕尼黑苏联问题研究所《公报》第十期刊登一篇谈苏联民族问题的文章,说在民族问题上,苏联现在"有一种动荡的气氛"。"不同类型的民族政策提倡者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官方提倡"各民族的融合",建立一个"讲俄语、以斯拉夫文化特色占统治地位的苏维埃国家"。但这一政策"在一些共和国遇到很大的抵抗"。亚美尼亚一位学者表示,"民

族不能在没有'兴旺'的情况下'同化'"，各民族"经济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对抗情绪"。格鲁吉亚一位学者则撰文强调"各民族的自愿联合"。

慕尼黑苏联问题研究所的这篇文章还举例说明现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重要部门和职务，如党的组织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军队指挥官，多半由俄罗斯人执掌；尤其是1965年9月全会以来，各共和国管辖的部门逐步减少，司法、教育、社会治安等先后划出共和国职权范围，中央直接控制的企业百分比上升，使有的共和国"被置于象'非自治领'那样的行政托管之下"。

11 月

11月3—4日 作家协会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了戏剧、电影、电视剧作艺术的现状及其在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中的作用问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各种戏剧创作描写"现代生活、现代人"。要求剧作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劳动题材上"，积极表现在"加速科技进步和经济改革条件下的现代工人"，表现"农村的社会改造过程，特别是1970年7月全会后的过程"。会议参加者抱怨"近些年来戏剧评论的兴趣转向古典戏剧——俄罗斯的和外国的，转向西方的现代戏剧"。

11月4日 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和查利泽等人组成了"苏联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成立宣言中称，"将以世界人权宣言为指针，从承认苏维埃法律的特点出

发”，对苏联社会提出“建设性批评”。

11月6日 苏斯洛夫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说，“当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采用科学成就、最新技术和最新工艺，不断完善生产结构，改进劳动组织，充分利用现有一切设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社会生产效率。以最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产品，这就是工业以及农业当前的主要任务”。

他说，经济改革“把集中计划的优越性同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采用经济杠杆和刺激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应当提醒注意的是，我们党过去从不认为，现在也不认为，经济刺激作用是唯一有成效的”，“必须善于把经济刺激制度同对集体或每个工作人员的精神鼓励结合起来”。

他说，要在“祖国安全的一切问题上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及时揭露和制止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不断地用最现代化的武器完善和装备陆海军”。

11月14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生活》周刊将从11月23日起连载《赫鲁晓夫回忆录》。11月16日，赫鲁晓夫对新闻界发表声明，说他“从来没有把任何回忆录或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过任何人”。对该回忆录的真伪问题，西方通讯社传说纷纭，据美国记者艾尔索普说，该回忆录是阿朱别伊夫妇通过维克托·路易斯弄到西方去的。

11月19日 苏联元帅安德烈·叶廖缅科病死。

11月26日 俄罗斯联邦举行村镇苏维埃主席全俄会议。苏斯洛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要求“国家各级政权机关都能

适应它们所面临的新任务”，说会议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实现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执行规定村镇苏维埃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同极微小的违反集体农庄民主原则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在今后几年内“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一步使农业集约化”，要村镇苏维埃采取“许多办法、手段和可能性来更有力地促进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包括“帮助”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发展私人副业。

11月28日—12月1日 勃列日涅夫去埃里温参加亚美尼亚党和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在庆祝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宣布最高苏维埃授予亚美尼亚共和国“十月革命勋章”，称亚美尼亚是具有“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共和国。

11月30日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苏联在10月底11月初第一次试射了一枚“多目标导弹”，假弹头在西伯利亚东北部上空落下。

12 月

12月3日 阿塞拜疆党中央举行全会。阿利耶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报告说，苏共二十三大规定阿塞拜疆“工业总产值要增长百分之六十，而实际上只增长百分之三十七”，关于发展极其重要的工业部门和增加极其重要的消费品生产的五年计划任务均将“完不成”，石油开采、石油加工、石油机器制造、电机、冶金、动力等工业部门都“存在着严重问题”，“轻工业发展速度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居民需要的食品，包括

面包，“供应情况很糟”，“大宗日用必需品无货”。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和国计委工作不能令人满意造成的”。

报告透露已撤换了一批“不能执行党的路线”的领导人并点名批评了一批市、区党委和经济领导人。

另据西方通讯社12月23日报道，阿塞拜疆内务部部长里亚泽夫被解职。

12月5日 美联社报道，苏联宪法节那天，苏联一批知识分子，约三十人，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举行“静静的示威，以检验他们自由举行示威的权利”。示威者被警察驱散。

12月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关于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关于1971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全会闭幕时发表了讲话。

12月8—10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作了关于1971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作了关于1971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计划规定1971年国民收入将增加百分之六点一，工业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六点九（其中乙类的产值将增加百分之七点四），农业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五点五。巴伊巴科夫在报告中说，1971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是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发展农业，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他说，计划规定将以更高的速度增加消费品的生产。

预算规定1971年国家预算收入为一千六百零九亿卢布，支出为一千六百零七亿卢布。国防开支为一百七十九亿卢

布，占全部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十一点一。

会议还通过了《苏联和加盟共和国水源立法原则》。

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农业委员会主席鲍里辛科就这一立法原则作报告时说，水利资源“很富饶”，但“水源保障和水利保护问题在现时是一个严重问题”。他说，“水源的使用要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今年7月苏共中央已拟定了“1971—1985年土壤改良、为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而调整和重新分配河道经流的远景规划”。

苏各报曾于4月27日刊登过这一立法原则的草案。

12月12日 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在邻近我新疆边界的地区新成立两个州：伊塞克库尔州和纳里扬州。

12月15日 《红星报》报道，不久前，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军事爱国主义委员会”。

12月17日 《真理报》刊登伊戈尔·亚历山德罗夫的一篇题为《反共主义的贫困》的文章，指责西方宣传机构同苏联国内的不满分子“合作”来“诽谤”苏联。文章说，“西方意识形态破坏中心千方百计诋毁苏联的现实，歪曲苏联的内外政策”，“在这里抱成一团的有帝国主义侦察机关的间谍、以虚伪报道著称的年高德劭的教授和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报刊的撰稿者”。“帝国主义的宣传走卒同间谍合作，以寻找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

文章点名骂了一批在西方出版作品的人，如塔尔西斯、安·库兹涅佐夫、阿马利里克和布科夫斯基(按：前两人已逃往西方，后两人被苏修当局逮捕)，说他们是“精神病患者”，“无

赖汉”,“卑鄙的诽谤分子”,“一小撮叛逆者”。

文章指责西方围绕着索尔仁尼琴的名字“掀起阵阵叫嚣”。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西方反苏运动的合适材料”,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奖金“不是因为他有才华,而是由于他诽谤了苏联的现实”。

西方评论这篇文章是苏联“官方第一次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同持不同政见者的小集团联系起来”,是“迄今对他进行的最猛烈的公开的人身攻击”。还说文章的署名亚历山德罗夫,“只是有关重大政策的文章才用此名”。

12月18日 科学院副院长维诺格拉多夫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介绍科学院远东科学中心。该科学中心是根据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1969年8月作出的决定在海参崴建立的。文章说,建立远东科学中心“是开发远东富源和发展远东生产力历史上新的一页”。这个科学中心将下设太平洋海洋学研究所、地质和地质构造研究所以及远东地区经济研究所等。

12月23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国民经济中的法权工作》的决议。

12月24日 列宁格勒法院判处一批“企图劫持飞机”的犹太族人。十一名被告中两名被判处死刑,其他九名被判处四——十五年徒刑。此事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应,纷纷抗议。12月底,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将两名被判死刑者改判为剥夺自由十五年。

西方通讯社说,6月份以来,苏联已有约三十人因劫持飞机未遂而受审。

12月29日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内务部最近分别举行"加强社会秩序"会议。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参加了会议，当地党政领导人也都出席了会议。

1971年

3月底到4月初，举行了苏修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大会上的报告表明，国内经济问题是注意的中心之一。

苏修当局由于大搞扩军和推行“新体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混乱，财政拮据，市场供应紧张等。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在寻找解决困难的途径方面意见分歧，使原定于1970年举行的二十四大推迟到了1971年。经过长期争吵后，在二十四大上提出了几点措施：

（一）调整工业甲、乙两部类的发展速度，使乙类产品的增长速度超过甲类产品的增长速度，拨出比以往为多的钱来发展农业。同时强调“并不取消加速发展生产资料生产这一总的路线”，要“使国防能力保持在应有水平上”。

（二）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强调要进口西方先进技术。

（三）“完善管理体制”，加强生产集中。进一步推广大型联合公司，搞农庄合办的联合企业和大型畜牧场。

由于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苏修当局除用“经济福利”进行物质引诱外，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暴力镇压。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四大提出更换党证，清洗党内异己，并说要继续“加强法制和法律秩序”。但其结果是，人民群众的反抗情

绪反而有所发展，特别是民族矛盾日趋公开化。

二十四大通过了一个“和平纲领”。苏修加紧在欧洲和南亚的外交活动。8月和10月，勃列日涅夫先后访问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和法国。9月，同美国、英国、法国签订柏林协定。8月，同印度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并支持印度于11月发动肢解巴基斯坦的战争。

1 月

1月3日 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苏联现有一千个集中营，关押着一百万政治犯。

1月5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党的严格要求》的社论，说“列宁主义工作作风同党的严格要求、同实际监督和对缺点的原则性批评是分不开的”。并说，根据1969年12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各级党代会要对那些“工作马虎，没有主动精神，破坏党和国家纪律，对人民财产没有主人公感的人不客气”。《劳动报》也载文说，要“用卢布惩罚”那些“浪费钱财的人”，“未完成任务，未能合理使用给你的权利的，就要受到处分，予以罚款，降职”。

1月19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对该报记者的谈话。扎哈罗夫说：“党确定的建立完全现代化的海洋舰队的方针完全符合火箭核战争的要求。”海军副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2月19日对《消息报》附刊《星期》周刊记者说：“最近两年来苏联舰艇曾有一百多次分别驶入六十个国家的港口。”

1月20日 《红星报》刊登陆军总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大将的一篇文章:《新阶段的陆军》。文章说,苏共二十三大以来的几年,是苏军"实力进一步提高"的年代,军队"组织结构和装备发生了重大变化","陆军拥有复杂的战斗装备和第一流的武器",陆军的"主要火力"是火箭部队。文章还说,"第聂伯"和"德维纳"演习是陆军发展"新阶段"的表现。"陆军的决定性力量是具有高度专业技能的指挥官、政治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

1月20—21日 共青团中央举行全会。第一书记佳热利尼科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团基层组织活动的措施的报告,说"每个共青团组织和每个共青团员的纪律性和责任感问题具有特殊意义"。现在"共青团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是组织性,组织性,再一个组织性"。报告还详细谈到了"对青年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全会就这一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1月27日 《真理报》摘登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改进国民经济中法制工作》的决议,说"新体制"扩大了企业的权力,有必要加强国民经济中的法制。决议批评一些单位、企业和区、市苏维埃"对法律工作估计不足,执行得不能令人满意"。要求"广泛利用法律手段来有效解决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率、加强国家纪律、完成计划任务和合同义务"。规定"制订专门的法律条例来改进各企业在缔结和执行经济合同工作方面的领导"。

1月29日 《真理报》刊登一篇题为《农业中的技术进步》的文章,宣称今后的任务是"在加强物质技术基础的基础上保

证农产品生产高速稳步发展”。说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九，农业固定基金占全国固定基金的百分之二十。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阶段，重工业有最重要的意义，现在情况变了，能够为农村拨出大量的投资。强调农业工业化是“现代科技革命的共同规律”，是“克服城乡差别的物质基础”。

《经济问题》杂志第六期透露，“目前农业劳动的基金装备程度比全盘机械化所需要的要少三分之二多，动力装备少五分之四——六分之五”，“每公顷耕地的平均施肥量比需要量少百分之七十——七十五”。

1月　南通社报道，利别尔曼出版了一本新书：《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经济方法》。书中称：中央集权制订计划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争辩的特点，市场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社会是不相容的。说以市场为方向是反动的观点。

南通社认为利别尔曼的观点有了改变。

1月　英国出版乌克兰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伊凡·久巴写的一本书：《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出版者介绍说，“该书依据文件仔细研究了苏联民族政策的实施情况，主要是这种政策运用于乌克兰的情况”。

1月　《经济报》第四期刊登拉脱维亚科学院副院长雅库巴伊季斯的一篇文章，介绍拉脱维亚一科学研究所进行改革的情况。改革的内容之一是通过对工作人员的工作实行全面鉴定（按十分制）来确定工资，鉴定时除参照教育程度和工龄外，要兼顾本人的技能、学术著作和发明创造等，达到五分的工作人员工资无变化，六至十分的，工资有相应的提高，一至

四分的工资有所下降。说评定结果有百分之三十五点七的工作人员保留原来工资数额，百分之四十九点六的工作人员工资提高了，百分之十四点七的工作人员工资减少了，还有百分之七点二的工作人员因鉴定评价太低被解职。

1月　据《文学报》报道，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接连举行会议，讨论《新世界》杂志和《青春》杂志的工作。会议指责《新世界》杂志"未注意党的路线，未注重劳动阶级，编辑部所发表的作品未经过适当的选择"等，要求该杂志今后必须更充分阐述"今天的观点及苏联多民族文学的经验"，"引导作家去研究现代问题"，"更多地刊载描写城乡劳动、现代苏联军队的生活和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斗争问题的作品"。

会议批评《青春》杂志"最关心的重点是城市青少年中的'困难情况'和'难于管教的人物'"，"很少刊登描写今天苏联军人和青年战士形象的作品"，却刊登些"纯粹是消极的"，"完全是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模糊不清的诗歌"等。要求该杂志今后"特别重视扩大现代题材和研究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1—3月　据塔斯社报道，1月份，各个州和市的党组织先后召开总结选举代表会议。有近三分之一的基层党书记被撤换。

2、3月份，十四个加盟共和国陆续召开党代表大会，各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另据统计，自苏共二十三大以来，有三分之一的州委第一书记被撤换。

2 月

2月4日 中央统计局发表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宣布国民收入比1969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五，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八点三(其中甲类增长百分之八点二，乙类增长百分之八点五)，农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农业总产值为八百五十八亿卢布。钢产量为一亿一千六百万吨，石油产量为三亿五千三百万吨，没有公布粮食总产量的数字(按：勃列日涅夫后来在苏共第二十四大报告中宣布为一亿八千六百多万吨)。

公报宣布，按新体制工作的企业的产品总值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三，所获利润占工业利润的百分之九十五；向全面经济核算制过渡的国营农场有五千个，占国营农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按：《经济报》第十六期和第十七期综合报道，到1971年第一季度末，按新体制工作的已有四万二千多家工业企业。农业方面，有八千多个国营农场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制。改行新体制的建筑安装组织达二百二十个。运输业和邮电事业已在1969年和1970年以前完成了改制工作)。

公报还宣布，1970年有四百个新的大型国营工业企业交付使用。

2月11日 爱沙尼亚党中央全会解除瓦杰尔的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职务，瓦杰尔改任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全会选举苏共中央组织部处长列别杰夫为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和中央常委。

2月13日 《红星报》发表社论，强调经济潜力是军事力量的“首要基础”，“在制订和贯彻经济战略时，全面考虑进一步加强国防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2月16日 《消息报》透露，诸兵种合成军队在后贝加尔地区举行演习。指挥这次演习的后贝加尔军区司令别利克在《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要求苏军战士继承“战斗传统”，保持“父兄的战斗荣誉”和“功勋”。

2月17日 国家计委常委别尔乌辛在《文学报》谈生产力布局问题。他说，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东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年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九点二（全苏是百分之八），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将达百分之二十，首先将在那里发展原料和燃料动力部门、石油瓦斯工业和森林工业等，但他认为把东部的原料运到很远的地方去不合算，因此也要发展加工工业，在西伯利亚建立地区生产综合体。他主张在中小城市设置工业企业，以便更好地利用当地劳动力。

《真理报》3月2日载文说，“计划机关重视小城市的命运是正确的”，反对“某些经济学家把大城市的优越性绝对化”。白俄罗斯计委主席科霍诺夫2月28日在《劳动报》发表一篇文章，强调“中小城市以及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今天尚未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说中小城市的发展问题“没有各联盟部的支持，要较快地解决是不可能的”。

地质部部长西多连科曾在《共产党人》杂志1970年第十八期上发表文章，表示要加紧在欧洲部分寻找和勘探石油、瓦斯和煤，认为这对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具有极大的意义。

2月22日 国家计委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在莫斯科

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党政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在会上作了报告。

巴伊巴科夫和国家计委其他领导人连日在各报发表文章，强调计划经济能在短期内保证战争需要，"反对贬低集中计划的作用和夸大市场作用"。这些文章说，在"加强国家集中领导"的同时，必须"发挥地方机构和企业集体的创造积极性"，制订国家计划时必须坚持"部门和地区性原则"。这些文章多数还谈到"加强监督"、"严格国家纪律"和"开发远东和边疆地区"等问题。

2月25日 乌兹别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拉赫曼库尔·库尔巴诺夫被解职。

2月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二期强调"民族问题是最复杂的、政治上最尖锐的社会生活问题"。说列宁赞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在提到斯大林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这一著作时，说他关于"民族"概念的论述在揭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方面"起了作用"。

该杂志第八期在总结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时肯定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是正确的，说这一定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归纳，同时说"不能教条地对待"这一定义。

《真理报》1月8日曾载文说，"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是同进一步巩固我国各大小民族的劳动人民的民族团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2月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康·格·佩辛因

"退休养老"被解职。

3 月

3月1日 苏联宣布降低一些牌号的电视机、洗衣机和摩托车等的价格。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西特宁说："与此同时，也提高了某些不是居民最必需的商品——珠宝、毛皮和酒类的零售价格。"西方通讯社认为这次降价是为了在苏共二十四大前欺骗人民和推销存货，"想避免发生"类似波兰去年年底发生的"骚乱"。

3月3日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决定出版一套由二百部反映战争题材作品组成的《功勋》丛书。

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文学报》列宁勋章。

3月4日 苏联报纸在明显地位报道伏罗希洛夫九十诞辰。《真理报》刊登一篇伏罗希洛夫传记，称他是列宁主义革命家(按：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时曾指责他"参加了反对同个人迷信作斗争的派系"，说他"应对许多无辜领导人、特别是军队领导人遭到的报复负直接责任")。

3月7日 《真理报》、《消息报》和《红星报》载文纪念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五十周年。说"十大"特别重视党的团结，不允许党内有派别和集团存在，"十大"还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消息报》还谈到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说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历史文献今天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3月10日 来自拉脱维亚、乌克兰、立陶宛和高加索等

地的一百多名犹太族人，在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所在地举行静坐绝食示威，要求当局准许他们离境去以色列。数百名警察把他们推出大厅。第二天，他们又到内务部示威，同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辩论”，结果大多数人被允许拿到出国签证。

3月11—12日 全苏集体农庄理事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讨论了农业和集体农庄生产管理方面的紧迫问题”。会议通过了“全苏集体农庄理事会章程”、“集体农庄合办企业示范条例”，以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附属企业和副业示范条例》。

3月14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进一步改进区、市苏维埃工作》的决议，规定“进一步扩大区、市苏维埃的活动和提高它们的作用”。区、市苏维埃的使命是：“解决其所属境内的一切地方性问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协调和监督所有企业和单位的工作”。决议批评在区、市苏维埃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和“形式主义成分”，对缺点“不作严肃的批评”，对遵守法制“监督不够”，没有同“破坏国家纪律的现象”作应有的斗争。

3月2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一决议颁布了相应的法令。部长会议也作出了《关于加强区、市苏维埃执委会物资财政基础的措施》的决定。

3月18日 美联社报道，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于3月15日打电报给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抗议当局强迫政治犯服毒品。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3月20日和21日报道，苏联一些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抗议当局强迫他们服毒品。

3月20日 拉脱维亚第一书记沃斯在《真理报》发表一

篇文章，说国际反动势力至今仍在侨居国外的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下企图“破坏拉脱维亚人民与其他苏联各族人民，尤其是俄罗斯人民的友谊”，叫嚷“不能对某些人的观点和情绪中的地方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狭隘性置若罔闻”。透露有人反对在拉脱维亚建立大型工业和其他项目，理由是这会使“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的非拉脱维亚人数增加和共和国的民族成分混杂”。

3月22日 据美国《纽约时报》新闻社报道，从1955年到1970年，苏联的对外“军援”总计达一百九十亿美元，现在每年达八亿美元，本年度经援和军援略高于二十亿美元。

3月25日 《真理报》刊登商业部的一篇文章，批评一些工厂内追求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而生产昂贵产品，取消耗费劳动多而又赢利小的产品的生产，使商业部失去许多消费者急需的“小东西”。

苏共中央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部长帕·康·西佐夫在《经济报》第二十期发表一篇文章，谈扩大消费品生产问题，指责一系列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没有完成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生产能力投产计划，某些建筑单位的领导人仍把这些部门的工程看成是“次要工程”，强调新建和改建企业“是扩大消费品生产的首要问题之一”。

《真理报》10月29日刊登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保障进一步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措施》的决定，规定“各部和主管部门的企业，只有征得苏联商业部的同意，才可以取消某些消费品的生产或减少这些消费品已经达到的产量”，要坚决制止“取消或缩减人民所需要的商品的生产”。

3月29日 外交部新闻司举行记者招待会，由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院长米·拉夫连捷夫和远东分院院长卡皮查介绍这两个分院的“建立、发展和任务”。

拉夫连捷夫说，西伯利亚分院已成为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全苏第三个科学中心，“今后俄罗斯联邦将以西伯利亚的发展来加强其潜力”。

卡皮查说，“远东科学中心着重研究同堪察加、雅库特、萨哈林（库页岛）、阿穆尔（黑龙江）、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沿海边区一带有关的问题”，它现在已有八个研究所，并“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增设研究所”。他除谈到对远东地下和天然资源的研究外，特别强调对太平洋的研究。

3月30日—4月9日 苏共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四千九百六十三名。波德戈尔内主持开幕式，勃列日涅夫作总结报告，柯西金作第九个五年计划报告。有六十名国内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有一百零三个外国代表团到会，四十九名外国代表在大会上致贺词。

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谈经济问题。他说，“经济是主要的政治”，其“成就在决定性程度上决定着苏联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决定着苏联“国际地位的巩固”。

他宣称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在主要经济指标方面的指示已顺利完成。

他谈了当前经济政策中的三个主要问题：

（一）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问题。他说，“提高人民福利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现在积累起来的生产潜力将

使乙类产品的增长速度快一些，但并不取消加速发展生产资料生产这一总的路线。“重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仍完全具有其意义”，因为“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奠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所需的物质技术手段”，都取决于重工业，“不发展重工业就不能使国防能力保持在应有水平上”，也“不能解决提高人民福利的根本任务”。他还提出要直接在重工业企业内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说目前国防工业总产量中有百分之四十二是供民用的。他还强调“广泛利用国家总的经济潜力”是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要加速发展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

(二)“调动各种资源来解决当前任务的问题”。他强调要提高生产效率，把加速科技进步提到首位，完善工业组织形式，建立大型联合企业，以及合理使用资源，减少劳动消耗、改善生产基金和基本投资的使用等。

(三)完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他认为提高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是“头等重要任务”，把长期规划同五年计划结合起来“能有效地解决发展中的根本问题”。说“加强生产的集中是必要的”。“建立联合公司的方针必须更坚决地加以贯彻——它应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生产集中过程在农业中也应加以发展。”声称“完善管理结构，要求同狭隘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报告在谈到苏联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时说，在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人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不能容忍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及任何形式的民族狭隘性和傲慢情绪”。要继续“加强法制与法律秩序”。说“国家安全机关起着重要作用”，这一

部门“由于已委派了政治上成熟的干部而得到加强”。

报告在谈党的部分中说，“现在苏共拥有一千四百四十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一名党员”(其中包括预备党员六十四万五千二百三十二人)。“在党员的成分中，工人占百分之四十点一，集体农民占百分之十五点一，职员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八”，而“工程师、农艺师、教师、医生、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占职员党员的三分之二以上”。二十三大以后加入的有三百万人。说“各级党组织开始更坚决地把那些破坏党和国家纪律、滥用职权、其行为有损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开除出去”。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提出要更换党证。他说，“自上次更换党证以来，已过了十七年，有效期已满”，称更换党证是“一个重大的组织政治措施”，“有助于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和纪律性”。

柯西金在关于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说，“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规定的政治任务和主要社会经济任务已经胜利解决”。上一个五年计划中，国民收入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农业年平均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一。

他说，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期间，规定国民收入将增长百分之三十七到四十，工业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四十六(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四十五，消费品生产增长百分之四十四——四十六)，农产品年平均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十二。要求到1975年钢产量达到一亿四千二百万——一亿五千万吨，石油达到四亿八千万——五亿吨，全国谷物产量不少于一亿九千五百万吨。

他说，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在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并提高其效率的基础上，在科技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宣传这个五年计划“是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加强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的重要阶段”。

柯西金在谈到生产力布局问题时说，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在加速发展欧洲北部、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和中亚的自然资源方面，将要完成大量工作”。东部地区的建设“主要是有色冶金企业和化工企业，钢铁工业和木材加工工业也将有很大的发展”。

柯西金宣称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各物质生产部门与服务行业中的经济核算单位将完全改行新体制。他说，“国民经济管理机构的进一步合理化”是五年计划中“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两级或三级的管理组织体制是最适宜的”。“生产联合公司的建立，是完善管理体制的新的重要因素。”他强调综合性计划的必要性，谈到长期预测对计划的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指示性的计划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商品货币关系可以并且应该用来加强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和根据经济核算原则来发挥企业的首创精神”，“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新内容。当然，我们反对以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一切错误观点”。

此外，西佐夫在大会上作中央检查委员会总结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关于部分修改苏共章程》的决定，规定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把监督行政机关工作的权利的规定扩大到科研、文教、医疗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以“提高基层党组织对

执行党的政策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加强它们在本单位劳动者中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

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共三百九十六人，比上届增加三十六人。其中正式委员增加四十六人（由一百九十五人增为二百四十一人），候补委员减少十人（由一百六十五人减为一百五十五人），这次新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有一百三十四名，占整个中央委员会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4月9日，苏共举行第一次中央全会。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共十五人：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格里申、基里连科、柯西金、库拉科夫、库纳耶夫、马祖罗夫、佩尔谢、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谢列平、谢列斯特、谢尔比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共六人：安德罗波夫、杰米契夫、马谢罗夫、姆日阿瓦纳泽、拉希多夫、乌斯季诺夫；中央书记共十人：勃列日涅夫、杰米契夫、卡皮托诺夫、卡图谢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波诺马廖夫、索洛缅采夫、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按：政治局、书记处完全由原有的二十五人组成，只是将原来的三名候补委员和一名书记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使正式委员名额由十一人增为十五人。被提升的四人是：协助勃列日涅夫抓农业的书记库拉科夫，管哈萨克工作的库纳耶夫，管莫斯科工作的格里申和管乌克兰工作的谢尔比茨基。库拉科夫在二十四大上大肆吹捧勃列日涅夫。）

3月31日 波·阿·阿希莫夫被任命为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3月 格列奇科在《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一篇文章，称苏军“强大的主要源泉在于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并说“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确保苏联国防实力的进一步增长”。

3月5日，《红星报》曾刊登巴拉诺夫上校的一篇文章，说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物质条件，即经济条件”，“为了争取在力量上的优势，要不断加强军队的物质基础”，要求“国家经济既要为保障军队当前的需要，又要为弥补在战争中的大量物质技术损失作好全面准备”。新的五年计划草案“反映出经济任务和国防任务的统一”。政府正在“通盘地解决加强国家防御能力的任务”。

宣称正在“大规模组织核武器的生产”，“用核武器可以同时解决战略任务和战役战术任务”。同时说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更加增长。

3、4月间 六万名克里米亚鞑靼族人给苏共二十四大写了一份呼吁书，要求返回克里米亚，恢复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恢复所有因参加鞑靼民族运动而被开除的党员的党籍，释放因此而被判罪的代表。

5月9日，少数民族麦斯赫特人(即麦斯希人)组成代表团赴莫斯科请愿，要求返回家园，但遭拒绝(按：麦斯赫特族是一个约有二十万人的苏联突厥族少数民族，1944年被全部从苏土边境地区迁往中亚。自1964年2月他们成立争取人民返回家园的临时组织委员会以来，曾多次要求重返故居，遭当局拒绝和迫害。1968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曾公布法令，规定麦斯赫特族人“永久地定居”在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等地)。

美国《时代》周刊8月17日载文说，苏联的麦斯赫特人于

1964年在塔什干附近举行的该民族第一次人民会议选举产生了“一个争取人民返回家园的临时组织委员会”，到 1969 年已举行了“二十六次这样的人民会议，最大的一次有七千名代表参加”。

4—5 月

4 月 20 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于改善劳动条件和巩固农业机械干部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说，农机手成了农庄、农场“生产中的中心人物”。决议规定，“将改善农机手的居住条件和日常文化和生活条件”，“提高拖拉机手的工资定额，并根据他们的连续工龄规定每年额外的、工资照付的假期”，以及“较高的补助金”。

4 月 22 日 《真理报》报道，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内务部部长、一系列边疆区和州执委会的内务局局长和内务部中央机关负责人等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作了《内务机关在贯彻苏共二十四大决议中进一步加强法制和社会主义法纪方面的任务》的报告。

4 月 23 日 苏联发射载人飞船“联盟—10 号”，与 4 月 19日发射的“礼炮号”实验站实现停靠，4 月 25 日返回地面。

4 月 25 日 苏联用一枚火箭发射了八颗“宇宙号”人造卫星。西方通讯社说这是自去年 10 月三艘载人飞船编队飞行后的第一次重大发射。

4 月 25 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在工业基础上发展畜产品生产和进一步扩大蛋类和禽肉生产的措施》的

决定。决定说，“有可能在目前这个五年计划里扩大大型综合畜牧场和养禽厂的建设”，为此要“建造一千一百七十个在工业基础上生产肉品和奶品的大型国营综合企业，以及建造和扩建五百八十五个养禽厂”。

4—5月 《农业经济》杂志第四和第五期报道说，“私人用耕地在全部耕地中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三”，但是“私人副业花费的劳动量占农业总劳动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说缺乏劳动力的远东、西伯利亚和西北等地区，劳动力的流动率很大。例如，远东有劳动能力的庄员的外流率为百分之七点七。农业机械人员的流动率更大，每年从农庄走掉十分之一，从农场走掉五分之一。

5月11—13日 电影工作者协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波德戈尔内在会上授予电影工作者协会列宁勋章，并要电影工作者“创作出使苏联人具有崇高爱国主义品质的影片”。大会根据二十四大决议讨论了电影艺术的现状和任务。

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一书记库利扎诺夫在会上作报告，说“电影界的首要任务是完成苏共二十四大所提出的战斗任务”。他指出“目前电影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今后应“重视提高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创造更多具有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

5月14日 勃列日涅夫和格里申等去第比利斯参加格鲁吉亚党和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大会上就苏联内外政策发表长篇讲话。他在谈到格鲁吉亚著名的革命家时，提到了斯大林的名字。同时声称，“由于消除了个人迷信以及主观主义错误的后果，在党内和国内造成

了一种有利于良好而和谐的工作的道德气氛”。他号召加强“苏维埃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他代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给格鲁吉亚共和国十月革命勋章。

格鲁吉亚《东方曙光报》2月份曾报道说，斯大林的出生地哥里市重建计划规定：一条主要街道将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哥里市仍然保存着斯大林在1879年出生的那所小屋。

5月21日 党政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乌斯季诺夫等在国防部的一个试验场观看新式作战飞机和直升飞机。

在这以前，5月17日，勃列日涅夫等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观看了新式喷气式民航飞机和直升飞机。

5月21日 著名电子学家阿纳托利·费多谢耶夫作为苏联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巴黎航空展览会时叛逃(按：1972年，费多谢耶夫在西德出版的白俄杂志《播种》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内的法西斯专政)。

5月26日 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在《青年共产党人》杂志第五期发表一篇文章，承认青年犯罪情况严重，儿童酗酒现象增加，一些地方有长期活动的犯罪集团，其中有的成员是团员。文章说，“最近几年来，在喝醉酒的情况下犯罪的青年人的数量有所增加”，“这种现象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显得特别突出”。

5月27日 拉脱维亚最高法院判处什皮别尔格等四人一——三年的徒刑，他们的“罪名”是：曾“在里加和其他城市印刷和散发反苏传单”以及蓄谋劫持客机未遂。

5月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五期发表一篇题为《苏共在加强苏维埃国家国防威力方面的活动》的文章。文章援引格列奇科的一次讲话说，“根据苏联的军事理论，新的世界战争如果由帝国主义挑起，它将是两个社会体系的决定性冲突”，“火箭核武器将成为进行战争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手段”，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使用常规武器”。说这些军事论点决定着苏军现阶段“军事建设和训练的原则”。

文章谈到“苏联武装力量发展到现阶段的特点”，是它同华沙条约国部队的“战斗合作进一步扩大和加强”。

5月 苏联于5月19日发射“火星—2号”自动站，5月28日发射“火星—3号”自动站。飞行了六个月之后，“火星—2号”自动站于11月27日进入火星轨道，“火星—3号”自动站于12月7日在火星软着陆，着陆后工作了二十秒钟即停发讯号。故障原因不明。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2月16日就此联名发表公告，说这是苏联科学技术“新的卓越成就”。西方通讯社说这是一次失败的软着陆。

6 月

6月3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提高职工养老金最低限额》以及《关于进一步改善集体农庄庄员优恤金的措施》的法令。

法令规定从7月1日起，把职工的最低养老金从每月三十卢布增加到四十五卢布。

法令还规定把优恤金制度向农庄全体庄员推广，庄员的最低养老金为每月二十卢布。对农庄中其他病残者和失去供养者的家属也分别作了具体规定，降低了远东和边远地区领养老金的年龄标准。

6月8—19日 苏军在克里米亚地区举行代号为“南方”的军事演习。有陆海空军兵种参加，历时十二天。

6月9日 塔斯社报道，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批准了莫斯科总发展计划的决定。决定说，“莫斯科将成为具有完美布局、现代化建筑、高级公用设施……的共产主义模范城”。计划期限是1985—1990年。莫斯科现有居民七百多万。

6月11日 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在巴黎出版。该书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作者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6月13日 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选举。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都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候选人，分别在各选区同选民见面并发表讲话。

6月16日 塔斯社报道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结果，当选的“有几千名代表”，“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工人和农民”。“在一系列的共和国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代表都不是上届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6月17日 苏联成立以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十卷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总编辑委员会，该书计划1974年开始出版，1977年完成。

6月19日 朱可夫就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三十周年对《星火》杂志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军事方面的科技革命绝不

否定在将来采用上次战争中采用过的作战方式，因此，研究上次战争的经验可以找到许多对当前有益的东西，特别是在武装力量的战略指挥、各兵种间密切的协同动作、全面保证战役和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等方面。但是，另外一点不容争辩的是，某些军事艺术原则，形式上虽然相同，而内容却改变了”。

6月25日 法新社报道，苏联改变划定领海的方法。领海距离将根据在特别弯曲的海岸线的最突出点之间的直线来划定。修改了1960年8月规定领海为十二浬的划界。

6月29日—7月2日 作家协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等出席开幕式。作协理事会书记马尔科夫在会上作报告，说苏共二十四大“对目前苏联文学艺术的状况作了精确分析，对它们提出了崇高的任务”，指责近年来的“一些文学辩论使文学思想陷入死胡同”，声称“文学主人公是劳动者”，要作家“认真研究农村现实的变化”，叫嚷“文艺对苏联陆海军人员有特殊义务”，要“为了永远高度备战”而写作。

会议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费定任作协主席，马尔科夫任作协第一书记。

6月30日 塔斯社发表公告，宣布“联盟—11号”宇宙飞船乘务组格·季·多勃罗沃利斯基中校、随船工程师弗·尼·沃尔科夫、试验工程师维·伊·帕查耶夫三人身亡。三名宇航员死亡的原因是保持飞船内压力平衡的一个阀门被震开，舱内空气跑了。

7—8 月

7 月 5 日 《经济报》第二十八期报道，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措施》的决定。决定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必须在加盟共和国各部和主管部门的 1971—1975 年计划中规定下来”，恢复了原来已经从计划中取消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决定指出，“1971—1975年经济刺激基金利润提成的固定定额，完全由各部和主管部门来决定”。但设立经济刺激基金，必须“保证遵守在经济上有根据地提高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和其他计划指标的比例，并在五年内消除各企业和各部门对工作人员进行物质鼓励时在数额上的不合理差别”。

7 月 16 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 1971—1975 年发展铁路运输》的决定、《关于改进工业铁路运输的工作》的决定；并同工会中央理事会一起通过《关于提高铁路运输和地下铁路职工的低工资、提高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额以及减少铁路运输干部的流动性的措施》的决定。

7 月 16 日 《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发展和接近》的文章，强调经济“不是各民族经济的算术总和”，“应把全联盟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全国利益要求加速发展的地区”，反对“机械地拉平”。说“对于同化的过程，只要自然而然和不采取暴力，马克思主义者是持积极态度的”。

7 月 22 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沃罗诺夫被解除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改任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

7 月 28 日，苏共中央任命中央书记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7 月 27—29 日 据《真理报》8 月 7 日报道，经互会于 7 月 27—29 日举行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综合纲要。规定综合纲要的期限为十五——二十年。

《真理报》曾于 1 月 29 日发表社论，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方针"是苏联的"总方针"。

7 月 影片《军官们》上映。这部影片以俄国和苏联各重大历史时期为背景，描写了军官特拉菲莫夫三代人的家史。影片突出的主题是要热爱"保卫俄罗斯祖国"的军人职业，"将门虎子"代代相传，鼓吹军官职业的"光荣"、"可敬"，宣扬"自我牺牲精神"。影片上映后，报刊纷纷为它叫好，称它是"苏联电影艺术的不寻常现象"，"对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无疑将起到重大作用"。

8 月 20 日 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认为新体制会自动发挥作用是不对的。新体制在不断完善，但是，坦率地说，它还没有足够明确地安排好。遗憾的是，新的经营方式的优点并未充分地运用，有时甚至被歪曲。个别企业不认真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及时完成协作供货，一味追求利润，毫无理由地提高产品价格。"要各级党组织"过问违反国家纪律和计划纪律的现象"。

8 月 23 日 英国《卫报》介绍苏联地下刊物《政治日志》，说它的编者是一个"非正式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小集团"。他们对斯大林及其遗留下来的一切事物持批判态度。说该刊自赫鲁晓夫 1964 年被推翻以来每月出版。总共已出

版了八十二期，其中十一期传到了国外。

8月25日 《真理报》报道，最高法院举行有各加盟共和国司法部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参加的司法部部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讨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防止违法行为、改进国民经济中的司法工作、加强对居民的法律教育等问题。

8月30日 《真理报》载文透露，苏联盛行西方的扭摆舞和抖摆舞。说“部分青年、某些教师和乐队领导醉心于西方的‘新货色’”，跳“很粗野的舞蹈”。

8月 美国波罗的海研究促进会刊物《波罗的海研究公报》第八期刊登一篇题为《苏联少数民族的处境》的长篇研究文章。文章说，苏联的民族政策“几乎在所有非俄罗斯共和国内部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而在波罗的海、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尤为突出。认为苏联采取的“非民族化”政策在七十年代成功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一旦“中苏大战”，被压迫民族“将构成对苏维埃政权的一种政治威胁”。

9 月

9月1日 苏联宣布降低卢布对十五种外币（日元、英镑、加拿大元、意大利里拉、西德马克等）的比价，对美元和法郎的比价不变。西方通讯社说这是1961年以来第一次改变官方宣布的卢布价值。

9月11日 赫鲁晓夫病死。由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联名发出了一个简单的讣告，称他为“领特别养老金者”。赫鲁晓

夫被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9月16日 《真理报》报道，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进对劳动人民的经济教育》的决定，指责"经济宣传工作的规模和内容不符合二十四大的要求"，不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对执行计划和义务怀有责任感"，要求"采取措施来根本改进"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以及广大工人和集体农民的经济教育。

9月22日 原驻德苏军总司令维·格·库利科夫大将被任命为苏军总参谋长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原总参谋长扎哈罗夫调任他职(按：任国防部总监察员)。

9月24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保证合理使用和保护贝加尔湖地区自然资源的补充措施》的决议，要求使用该地区自然资源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防止贝加尔湖流域河(湖)水污染，疏浚由于木筏沉没而堵塞的河道，严格遵守伐木规定，克服在捕鱼、繁殖方面的缺点。

《劳动报》曾在1月9日发表土壤改良和水利部部长叶·阿列克谢耶夫斯基的答记者问，透露苏联河流湖泊污染严重。他说，"有些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很少关心建立净化系统"，"远非所有企业领导人都对保护和合理使用水利资源怀有责任感"。

9月29日—10月1日 《真理报》报道，召开以《苏共二十四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为题的学术会议。苏斯洛夫、杰米契夫、波诺马廖夫等在会上发表讲话。

苏斯洛夫在讲话中强调二十四大在国内国际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巨大贡献"，说二十四大"制

订了广泛的社会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提高各阶层居民的福利，在首先使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逐渐拉齐的基础上，使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接近”。

在国内问题上，苏斯洛夫谈了以下几点：(一)苏联“发达的社会主义具有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体现充分民主的全民国家”。“共产主义建设的主要经济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复杂的、综合性的任务，需要很长的时间”。强调要确立“单一性的社会”。(二)关于民族问题，提出要把各民族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发展水平拉平”，“以保证苏联人民全面地发展社会进步”。(三)强调党的领导是“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一切问题的必要条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理论分析的重要题目。”

杰米契夫在讲话中谈到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各民族的接近以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

波诺马廖夫在讲话中主要谈了国际问题。

9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共产党人的信念和行动的统一》的社论，强调必须“全面提高党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巩固全体苏联人行动和观点的统一”。要求“提高每个共产党员的思想坚定性和抵制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影响的本领”。宣称要加强“党的队伍的团结”，“消除产生阶级冲突和党内派别的土壤”，坚决清洗“思想异己分子”，对违反党和国家纪律的工作人员“表现出不妥协精神”。在文艺方面要“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为所欲为”，“警惕社会主义敌人的思想颠覆”。

9月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利亚林少将在英国提出

政治避难。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由于他提供的情况，导致苏联在英国的一百零五名间谍被驱逐。

9—10月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八期和第二十期刊登两篇文章，谈现代战争和经济的关系。该刊编辑部推荐把这两篇文章作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军事和现代战争的经济保证的根本变化”这一课题的阅读材料。文章强调“进行战争的方法依赖于国家的经济条件”，同时“经济已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为国民经济提供原料和材料的部门对现代战争的经济保证具有特殊意义”，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加强国防的重要条件等等。说美国经济正在加紧军国主义化，苏联的经济“不能不建立必要的火箭核武器和其他作战手段储备”。但认为“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少”。文章强调要制订发展军备和军事技术并用它来装备武装力量的长期规划。

10 月

10月4日 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斯维斯尼科夫曾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城乡，现在私人存款超过了五百亿卢布，每年支付居民存款的利息达十二亿卢布。斯维斯尼科夫强调“进一步稳定卢布价值”。

另据《经济问题》杂志1970年第四期和第十一期承认，居民储蓄额增长快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商品供应不能满足需求，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实际收入”。《苏维埃俄罗斯报》1970年8月14日曾发表社论，说“市场上缺乏商

品资源，不仅妨碍劳动人民更充分、更好地利用工资，也给国民经济中的资金周转造成困难”。

美国报纸今年1月2日曾报道说，苏联银行存款在1970年底猛增，已达到四百三十亿卢布，这对经济“正在形成一种通货膨胀的压力”。

10月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报道，最高苏维埃发布法令，规定对传染性病者从严处理：凡回避治疗性病者，剥夺自由两年或罚款一百卢布，凡有意把性病传染给别人者，判处两——五年的徒刑。据美国报纸报道，在苏联，性病正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增加着。

10月12日 国家银行理事会决定在每个加盟共和国的一两个企业内试行通过储蓄所向劳动者支付工资的办法。认为“过去不再周转的大量资金，现在能够长期或短期地受国家的支配”。

10月13—16日 苏军召开全军思想工作会议。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卡拉什尼科夫作《关于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进一步改进陆海军思想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格列奇科和叶皮谢夫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卡拉什尼科夫在报告中号召“学习和宣传列宁关于保卫祖国的学说和苏共决议”，“增强武装力量的精神素质”。批评有些部队把思想工作当成“短期运动”，贯彻党的内外政策“缓慢”，强调要“向全军深刻解释党在共产主义建设和加强军事实力中不断增长的领导作用”。

格列奇科在讲话中批评“军事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军事实践的要求”，称军事理论的头等任务是“研究保持陆海军常备

不懈和粉碎侵略者进攻的问题”。强调要“全面深刻地研究进行战斗的方法和完善军事组织等问题”。说“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和青年军官，是有东西可学，是有人可作为榜样的”。

叶皮谢夫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军纪教育”，并“针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歪曲宣传”，阐述“无产阶级政策的实质和党加强华沙条约组织的活动特点”。说“正如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一样，军事理论方面也在进行着残酷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关于战争和军队的两种对立观点，对军事问题的两种态度……发生着冲突”，“军事理论方面意识形态颠覆的另一个方面，是想歪曲和贬低我们党在武装力量中的领导作用”。声称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日益增长，是苏军建设的客观规律性”。

《红星报》9月3日曾刊登奥加尔科夫的一篇文章，强调学习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指责某些军事领导人“落后于科学思想的发展”，不学习，“凭灵感办事”。说“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方法，……不能用以往战争的尺度来看待今后可能发生的战争”。

《红星报》9月20日还载文批判“人们的共同利益是不要核战争”的“普遍性”思想。说这是推行阶级中立主义，其要害是“滋生乌托邦幻想”，“削弱对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警惕性”。说“反共分子的思想颠覆正在影响个别人，包括个别思想上不成熟的军人”。说“在思想搏斗中不可能有中立者”。

10月19—20日 全苏大学生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基里连科、波利扬斯基、格里申、库拉科夫、杰米契夫、乌斯季诺夫、卡皮托诺夫、卡图谢夫和波诺马

廖夫、叶皮谢夫、科涅夫、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等出席了会议。在开幕式上，勃列日涅夫发表长达一小时的讲话，说二十四大决议“要求苏联青年进行一场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接力赛”，“号召青年走在争取生产与生活的高水平、争取在实际生活中确立共产主义准则的战士的最前列”。称关于改善大专学校学生物质条件的决定是“有盈利的投资”。鼓励大学生要“好好学习”，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在谈到党在高等学校的作用时说，“鉴于已授权高等学校党组织监督行政管理当局的活动”，“高等学校工作中任何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都不应为党组织所忽视”。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佳热利尼科夫在讲话时特别对勃列日涅夫表示“儿子般的谢意”。

10月25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公布《关于进一步改善大学生以及中等和中专学校学生的物质生活和居住条件》的决定，规定从1972年9月1日起大学生助学金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中等和中专学生提高百分之五十。

10月27日 波德戈尔内向新闻、军事、科学、文艺界一批人物颁发勋章。塔斯社社长扎米亚京、《真理报》总编辑齐米亚宁、《消息报》总编辑托尔库诺夫、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宾、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斯图卡林等十人获得列宁勋章。

10月29日 苏共中央召开中央报纸、杂志、电视、电台、通讯社和出版社领导人员会议。苏斯洛夫在会上发表讲话。会议讨论了群众性宣传机构在实现二十四大决议方面的任务，强调宣传活动“应当服从于顺利完成经济和文化建设各个方面的计划任务，完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发扬群众的劳动

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精神，提高管理水平、纪律性和干部对经营结果的责任心”。

10月 《历史问题》杂志第十期刊登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研究所副所长杜金斯基的一篇文章，谈“发达的社会主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是个“比较长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就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成熟程度而言与共产主义有相当大的区别”，“自有一套社会发展规律在起作用”。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有几个阶段：“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时期；发达的社会主义”。前两个阶段是“集聚力量并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发达的社会主义“更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它将“占据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说“另一种观点认为继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之后，还应当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即成熟的社会主义时期”。文章认为这一时期“就是完全共产主义的直接的初始阶段”。文章认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工人阶级专政国家变为全民国家”，“社会对经济的要求迅速增加”，发展国际“社会主义一体化”，“提高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等。

11—12月

11月5日 《真理报》就新公布的《工厂和地方工会委员会权利条例》发表社论，说条例规定了基层工会的权利，如有权听取企业领导人关于生产计划执行情况和集体合同义务履行情况的报告，草拟生产中的规章制度文件，分配物质刺激基金和社会文化设施与住房建设基金，确定奖金和物质救济的

数额等。条例规定，工厂和地方工会委员会可"通过一般性会议、生产会议和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吸收劳动者参加生产管理"，"参加制定生产计划，采用新技术、基本建设、建造住房和文化生活设施的计划，以及社会发展计划等工作"。

11月18日 美联社报道，美国批准向苏联卡马大型卡车制造厂提供五亿二千八百万美元装备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这是批准给苏联的出口许可证中最大的一次。到目前为止，美国今年已批准向苏联提供的物资总价值超过十一亿美元的许可证。去年美国只批准了一亿一千八百万美元的对苏出口许可证。

11月19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取消军人超期服役而改行准尉制》的法令，规定从1972年起在苏军中实行准尉制，超期服役者可授予准尉或海军准尉衔。

11月22—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关于苏共中央自党的二十四大以来的国际活动的报告（未发表）。全会就这一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关于1971—1975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以及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关于1972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决议。

全会选举米·谢·索洛缅采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1月24—26日 第八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批准第九个五年计划和1972年国家预算。柯西金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九个五年计划和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加尔布佐夫作了关于1972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柯西金在报告中说，体现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的党的二十四大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实行社会人力、财力、物力的“调整”，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增加消费基金，增加消费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进一步大力发展重工业，保证农业投资的“优先增长”等。

加尔布佐夫在报告中说，1972年国家预算全部收入为一千七百三十七亿卢布，开支为一千七百三十五亿卢布，其中规定军事开支为一百七十九亿卢布，占全部开支的百分之十点三。

会议最后通过1971—1975年的五年计划以及1972年的计划和国家预算。规定五年内国民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点六，工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四十七，其中消费品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六，生产资料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三，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将比上个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十三。将保障更充分地满足居民对食品以及工业对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求。1972年计划规定国民收入将增长百分之六点二，工业产值拟增长百分之六点九。消费品生产将增长百分之七点一，生产资料生产将增长百分之六点八。

11月 由于搞“谢基诺试验”有功，化学工业部一个副部长、一个副司长及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的经理、党委书记、总经济师获1971年度苏联国家奖金，该企业获列宁勋章。

12月3日 《消息报》刊登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发展肉品和奶品工业生产技术基础》的决定，规定1971—1975年肉品和奶品的总产量将增长百分之四十，并制定了使现有

肉品和奶品工业进一步专业化和技术改装等措施。

12月7日 苏中友协主席安·安·安德烈耶夫逝世。由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等署名的讣告称他为"党和国家的著名工作人员"(按：安德烈耶夫在1914年入党，1932—1952年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2月18日 特瓦尔多夫斯基病死。由勃列日涅夫等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其他人士共八十八人署名的讣告称他为"杰出的诗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2月21日 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安·格特曼大将就该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向《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该协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来切实贯彻二十四大决议"。强调该协会要"积极参加对苏联人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称该协会"是苏联武装力量的可靠后备军"。据苏联报刊报道,五年来有九百多万人参加了"支协"组织，其中有四百万是团员；建立了两万多个新的基层组织。目前共有三十万八千多个基层组织，其中九万个组织设在学校。

12月24日,阿·伊·波克雷什金空军上将在闭幕会上当选为该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21—23日 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新的教学大纲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苏斯洛夫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理论工作在各方面的任务。他说,"苏共二十四大为社会科学家确定的主要方向是从理论上探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科学论证发

达的社会主义逐步长入共产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在经济方面的任务是，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生产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等。在社会政治方面有“克服”三大差别、“各民族的接近”、“加强国家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不调和斗争”等问题。在国际政治方面有苏联同各类国家的相互关系、“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团结”等问题。

说苏维埃国家“具有了全民国家的性质。同时，在存在阶级的整个时期中，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社会实行阶级领导以及实现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的工具”。

12月24日 苏共中央召开哲学会议，成立哲学协会。参加会议的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者、专家、教员和党的工作者。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参加了哲学协会成立大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院长费多谢耶夫在会上致开幕词，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在会上作报告。会议强调哲学家在“完善思想工作和教育新人”方面应起积极的作用，“要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揭露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多做工作”。

会议通过了哲学家协会章程和致全苏哲学家书，建立了哲学家协会理事会，康斯坦丁诺夫院士被选为协会的会长。

1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八期刊登苏哈列夫斯基的一篇题为《苏联经济——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文章。文章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目前已经成熟”。“六十年代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同一类型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它们

具有的经济规律也是同样的”，“差别只涉及生产的规模、社会主义优越性实现的可能性、经济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以及对经济和国民经济领导提出的客观要求”。

12月 英国《冲突研究》杂志1972年第三十期在题为《苏联的种族压迫》专辑内报道，“乌克兰民族阵线”在1971年散发一份传单，说该组织是“由包括乌克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在内的乌克兰爱国者组成的……它以争取乌克兰独立为目标”，这份传单谴责“俄国新沙皇”，说“新沙皇”占领波罗的海国家，使中欧社会主义国家屈从，不肯把“白色沙皇”掠夺的中国领土还给中国。还指责“俄罗斯法西斯主义”搞种族绝灭，强迫乌克兰人迁移……等等。传单强调乌克兰有分立权，这种权利必须实现。

英国《外事报道》8月26日曾报道该组织散发的传单主张“建立乌克兰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传单还号召苏军中的乌克兰人在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掉转枪口对准奴役他们的人，或者“向社会主义国家投降”。

1972年

这一年的重要活动是"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苏修当局利用这一活动大反"民族主义"，在一些共和国进行清洗，撤换一些"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领导人。尽管如此，苏联少数民族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息，各地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也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地下组织和刊物。

面对着国内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苏修除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外，还不断加强法西斯专政，修改法律，逮捕闹事者，对日益发展的社会问题也都采取强硬措施。

在经济方面，1972年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最糟的一年，农业严重歉收，粮食比上一年减产一千三百万吨，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批粮食；工业指标也低于原计划数字；"大大提高人民福利"的诺言落空。197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又降低了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率，为此，国内围绕着工业甲、乙两类的比例问题又引起一番争吵。

苏修为改变其工农业落后状况以及解决当前的困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乞求帮助。除了大量购粮外，还乞求贷款，购置设备，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这一年苏联外贸逆差达五亿六千多万卢布，为苏联外贸史中仅有的四次逆差中最高的一次（前三次为1938年、1946年、1964年，每次都不超过一亿

卢布)。

这一年苏修在国际上的不利处境也突出出来。2月，尼克松访华，7月，苏联驻埃及军事人员被赶走；同时，苏修在"缓和"的口号下也加紧了同美国的争夺，5月，接待尼克松访苏，同美国签订了"限制"战略性武器的条约和临时协定，11月，正式开始了欧安会的筹备工作。

1—2月

1月10日 宣布塔斯社晋升为国家委员会一级的机构，授予社长以部长级职衔。

1月23日 中央统计局发表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宣布国民收入比1970年增长百分之六左右，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七点八(其中甲类增长百分之七点七，乙类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农业总产值约八百七十亿卢布，相当于1970年的水平。钢产量达到一亿二千一百万吨，粮食总产量为一亿八千一百万吨，比1970年减少五百万吨，石油产量为三亿七千二百万吨。

公报宣布，到1971年底改行全面经济核算的国营农场有六千一百个，占国营农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公报还宣布，截至1972年1月1日，苏联总人口为二亿四千六百三十万人。

1月24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文艺评论工作》的决议，批评当前的文艺评论工作不符合要求，对一些思想艺术的废品采取"容忍态度和宗派态度"，评论中犯有"片面性"，有的对

作品进行毫无根据的吹捧。指责各级党组织对评论工作缺乏“应有的监督”。要求加强“列宁主义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坚定不移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1月26日，作家协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这一决议。作协理事会书记奥泽罗夫强调“文艺评论要对文艺方针起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文艺界应用文艺的语言贯彻宣传“党的方针”，“同苏联社会矛盾的观点作斗争”。“坚决批判错误倾向。”

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阿里耶夫1月20日曾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批评该共和国出版了不少毫无价值的、甚至有严重错误的书籍，“曲解现实”、“集中描述阴暗面和美化落后现象”。他要求对文艺工作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实行党的监督。

1月26日 《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创作的经济学》的文章，说在目前的电影生产制度下，“电影工作者不会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采取“用卢布进行监督的方法”，实行自负赢亏的经济核算制。

1月30日 苏共中央就改进商业和商业技术装备问题作出决议，批评商业机关没有很好研究供销关系以致某些商品供销脱节，一些共和国的批发部门没有完成共和国之间的商品供应任务。建议各共和国推广自动售货方法来出售食品和其他商品。批准国家银行可以为建造城乡集体农庄市场和食品工厂仓库提供长期信贷。

1月31日 苏军原总参谋长扎哈罗夫病死。

1月 拉脱维亚共和国十七名共产党员联名写信给党和

国家领导人，揭露统治集团欺压少数民族的罪行，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年复一年地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歪曲，列宁的教导被用来掩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信中还揭露了统治集团对“少数民族强行同化”的做法。

1月　《经济报》第一期刊登一篇题为《综合发展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的文章，说已形成不同类型的地区性生产综合体，最大的由苏联的经济区组成，其次由面积较小的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等地区的“经济核心”组成，再其次是新工业区和工业枢纽。农工综合体是特殊性质的地区生产综合体。

《真理报》3月15日载文宣传建立农工综合体的“必要性”，称农业联合公司“将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环节”。

文章介绍了农工综合体的几种形式，其中最流行的是国营农场—工厂，或把罐头企业同专业化产品种植场合在一起的联合公司，如畜牧业联合公司是把混合饲料工厂、畜牧场、加工奶类和肉类车间联合起来的企业。文章说它的好处是“改进生产活动，精简行政机构”，但又承认当前“发展缓慢”，“很难管理”，只有在生产专业化和集约化水平高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

《真理报》7月26日介绍了摩尔达维亚果品蔬菜农工联合公司。

2月7日　苏联上映以珍宝岛事件为背景的反华影片《俄罗斯田野》。

2月8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完善农庄和农场的管理》的社论，鼓吹在农庄、农场改行部门管理体制以代替地区性管理结构。介绍某农场组织四个经济核算部门：种植业部门、畜

牧业部门、机械化部门和建筑部门以代替过去的生产队。认为在土地集中、专业化较深、生产积聚水平高和干部受过专业训练的地方实行部门管理结构"效果最大"。

2月9日 战略火箭军总司令、苏联元帅克雷洛夫病死。

2月13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颁布《关于提高甜菜收购价格》的决定，规定从1972年起，"超计划向国家出售的甜菜，按收购价格增加百分之五十"。

6月30日又通过《关于1972—1975年进一步增产甜菜和发展制糖业措施》的决议。

2月19日 《消息报》刊登布坚科教授的一篇文章：《重要的历史时期》，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短的时期，而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长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的当前任务是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苏联社会"近三十年来不断完善，具有了新的特点，逐渐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五十年代末就有一切根据宣布社会主义完全彻底胜利"，"近十年来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使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更为发达"，"这就使二十四大能够全面地揭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根本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直接转变为共产主义的重要前提"。但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在这里，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的规律和原则正在充分发挥作用"。

文章说，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和原则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它的经济、社会政治与精神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协调一致的发展"。

2月22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筹备庆祝苏联成立五十

周年》的决议，提出宣传要点，并要求各级党组织拟订庆祝计划，展开广泛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工会、共青团、部队、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机构、一切意识形态部门、文教机关都要拟定筹备措施。

宣传提纲的主要内容有：

（一）强调民族问题在苏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之一”，新制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正确解决”。

（二）吹嘘联盟带来了“丰硕成果”，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民族对抗已经消灭”；各民族的语言得到“全面发展”，并“自愿选择俄罗斯语言作为民族间交往和合作的通用语”；各族人民生活的“国际化”、“相互影响”在加强，已出现“苏联人民”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共同体”。

（三）宣传民族政策已取得“完全胜利”，鼓吹联盟的成立和发展具有“巨大国际意义”。

（四）说民族问题是国际上和思想领域的“尖锐战线”，“资产阶级宣传企图利用民族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及时从政治上对复活民族主义情绪和观点的企图作出评价，坚决揭露反共思想家、‘左’右倾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2月2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全党全民的事业》的社论，强调要“同民族主义残余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问题”上，“不容许表现有丝毫的民族主义局限性、地方主义和沙文主义”。

2月 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发表一篇题为《苏联武装力量》的文章，称苏军的发展有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建立新型军队“抗击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进攻”;第二个阶段是“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成时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军队”;第三个阶段是从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和建立华沙条约组织开始,任务是“保卫苏联和兄弟国家劳动人民的成果”。

2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四期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减少浪费工作时间和消除违反职工作息制法令的措施》的决议,指责许多单位停工、旷工、迟到早退等现象多,要求加强劳动纪律。

2月 苏共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发表一篇文章,说“苏共——工人阶级的党——已成为苏联全体人民的党”。

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刊登一篇题为《苏共的经济政策和生产力的布局》的文章,说计划机关拟定了1971—1980年生产力布局的总计划。生产力的远景分布图“决定着东西两大地区经济发展和改变地区比例的基本方向”,强调其特点是“加速东半部的经济开发工作”。建立带有集中建设区的“国民经济大型综合体是加速发展东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在中、西部和乌拉尔—伏尔加河一带,“生产发展的主要形式应在不大量增加人力的情况下用新技术、新工艺对现有企业进行改装和改建”。南部和中亚地区发展需要劳动力多的生产部门。

国家计委经济科学院院长叶菲莫夫9月29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说长期远景计划在制定五年计划和年度计

划中起着巨大的组织作用和确定方向的作用。直到1990年的远景规划包含了全部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

2月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刊登苏霍古佐夫上校的一篇文章:《经济在现代战争中的生命力问题》。文章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工业生产分散布局。(二)生产两重制,即任何种类的军工生产,要在不同地区的几个工厂生产。(三)综合发展经济区,在一个经济区内组织各企业间的协作,认为专业化的生产协作关系在战争条件下会因交通线受到破坏而造成困难。(四)建立分散的物资贮备。(五)加强民防工作,把企业转入地下。(六)发展各类交通,并建立管道运输,认为这不易受核打击危害。(七)保护农业。(八)建立战时经济管理体制。认为以上几点是发生火箭核战争情况下保证经济生命力的主要措施。

5月,《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九期载文强调,"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对军事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武器系统的复杂化、结构上的自制性和配套产品的多样性,使得武器的制造过程综合化。现在必须很好地发展专业化(包括部门性的、地区性的、项目上的和细目上的专业化)和协作,才能制造出大量的作战技术兵器。""现代化军事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巨额资金","加重了用于战争的经济负担","而且要有可使军工生产经常保持高水平的庞大的科技和工业综合体,还要作好能使经济潜力迅速转入战争用途的准备"。

3 月

3月3日 国家标准委员会主席波伊佐夫在《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质量计划》的文章，称从今年开始推行产品质量计划。现在已开始推行三级质量指标：(一)国家的产品质量指标。(二)属于更新的产品质量指标。(三)属于有待撤销生产的产品质量指标。

文章强调要同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的现象作斗争，主要采取经济制裁办法。

3月6日 苏共中央发表决议，批评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在执行苏共二十四大决议中存在“严重缺点”，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现象斗争不力，对知识分子和青年“不注意”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等。责成该市委克服缺点，对“违犯党纪国法和滥用职权的工作人员”“严加惩办”。

《东方曙光报》4月4日、4月27日报道，格鲁吉亚党中央和第比利斯市委接连举行会议，强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同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指名批判格鲁吉亚民族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西达莫尼泽的《格鲁吉亚1917—1921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史》一书，说该书作者错误地评价某些历史事件，把当初脱离苏联的“格鲁吉亚独立”说成是进步的行动，此书是为“民族主义分子恢复名誉”，西达莫尼泽及该书编辑都受到处分。

7月25日，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洛拉什维利被撤，由格鲁吉亚内务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接任。

3月10日 白俄罗斯明斯克无线电厂外壳车间发生严重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联名打电报慰问。事故的原因是“在设计该车间通风装置中有错误，使用通风装置时忽视安全技术规则而造成的”，同事故有关的各级领导受到了严厉处分。9月8日，最高法院宣布判处该厂厂长、总工程师、设计院院长等人以期限不等的徒刑。

3月17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防止未经净化废水污染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流域的措施》的决议，命令“俄罗斯和哈萨克部长会议采取措施使以上两河流域的所有城市在1980年前停止排泄未经净化的生活废水”。

3月20—24日 工会举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就内外政策发表长篇讲话。宣传苏联“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工会的主要职能之一是“直接地积极地参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发展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国民经济”。工会“有义务保护劳动者”，但是“不应当也不能够保护那些破坏社会主义纪律的人”。勃列日涅夫要求把社会主义竞赛“同党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说工资“应当处处作为劳动所得来看待”，“直接依赖于自己为集体的生产成就所作出的贡献”。

谢列平在会上作工作报告，并再次被选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目前，苏联共有六十四万个基层工会组织，九千八百万会员。所有集体农庄都有基层工会组织，有八百万会员。

3月23日 苏军军事院校领导人会议在伏龙芝举行。会议讨论了“军事院校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以及改进训练军事专家的途径和办法”。

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会上作《根据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军事院校所面临的任务》的报告。

3月27日 内务部副部长舒米林就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问题向苏联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1971年约有一万名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整个战后移居以色列的约有二万一千人，认为申请出境者的数目是“微不足道的”。舒米林为苏联的政策辩解说，允许出境的主要是老人和妇幼，“受过军事训练及工作涉及到国家利益的人”限制出境。

3月27日 法新社报道，立陶宛有一万七千多名天主教徒联名致勃列日涅夫一项备忘录，抗议对天主教徒的迫害。

3月 哲学家格列泽尔曼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月刊第三期发表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的文章。文章说，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阶级对抗的土壤已“消失”，但矛盾仍然存在。认为“社会主义最普遍的矛盾可以分为两类：过去遗留下来的矛盾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矛盾”。强调“生产力的进步迫使生产关系、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形式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解决在这一领域内出现的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基本矛盾，“根本不能按照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由产生到灭亡的道路的那种基本矛盾的类推法来提出并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问题”。文章攻击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论断。

3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社论，强调“不能形而上学地把各民族的繁荣同他们的接近对立起来。造成这种对立的是，把民族繁荣不正确地解释为只是发展民族特点的特殊性方面，而把民族接近不正确地解释为只是民族之间的一

般联系”。说“并没有理由认为苏联人民是一个新的人种”，“苏联人民是一个各民族的共同体”。

3月17日，《真理报》曾载文强调苏联各民族的“接近是主要的趋向”，“苏联人民正在向完全的社会同一性过渡”。指责“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把统一的苏联人民的形成过程同帝国主义世界进行的强制同化过程相提并论”。说为了“实现大小民族融合”，“必须进一步拉齐这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但是，不能把拉齐“理解为使他们的经济指标，尤其是文化发展机械地保持均匀”。

4—5月

4月4日 瑞典政府原准备在其驻莫斯科使馆授予索尔仁尼琴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由于苏联拒绝给予前来授奖者签证，授奖仪式未能如期举行。

接着，《文学报》第十五期刊登了十封由作家、工程师、教师等写的信件，谴责索尔仁尼琴的小说《1914年8月》。在此之前，《文学报》1月12日曾转载了索尔仁尼琴的家史材料，说他的祖父是个大地主，拥有二千俄亩土地，二万只羊，雇长工五十名。该报指责索尔仁尼琴把《1914年8月》送到西方出版，给“形形色色的反苏分子进行活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4月6日 《苏联贸易报》报道，1972年苏联将为外国旅行者开放一百多条旅行路线。1971年到苏联的外国旅行者超过二百万人，苏联到外国旅行的有一百八十多万人。

4月18日 《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作者、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被捕。他的罪名是："制造和散发反苏反共材料"，"诬蔑苏维埃制度和党及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

4月27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载文宣传莫斯科州农庄和农场推行管理生产和组织劳动的"新经验"。在管理方面的做法是：在农庄、农场内部建立专业化生产车间以代替"过去复杂的地区管理结构"。在全州，同一专业的农场联合成生产托拉斯，未加入专业化托拉斯的各农场联合为跨区的生产管理局。新的管理结构的基础不是地区原则，而是部门原则。主任专家领导各车间。

在劳动组织方面，种植业普遍推广机械化小组这一劳动的"新形式"。其办法是，把土地固定给小组，实行包工奖励制，1971年全州有三千个这样的小组，固定给它们的土地占全州耕地的四分之三。畜牧业的劳动条件"尽可能接近于工业企业"。

4月 《农业经济》杂志第四期刊登一篇文章：《充分利用劳动力》，说各地劳动力分配不均，一些地区劳动力过剩，一些地区则不足，"近五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和从劳动力缺乏的地区流入劳动力本来就过剩的地区这种自发过程加剧"。"农机手大批流动"，1965—1969年训练了三百多万名农机手，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九应征入伍和转业。

美国《纽约时报》2月7日引用刊登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一个社会调查称，"从农村学校毕业的每一百个毕业生中，充其量只有五人愿呆在农村里"。

2月26日，《真理报》曾刊登拉脱维亚劳动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巴卡林的一篇文章，说劳动力缺乏在拉脱维亚已成了严重问题，已影响到工厂的开工率。各工厂都竭力招收职工，造成了严重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共和国内的劳动力流动相当于每天有六千人不工作。文章提出两个办法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是加速设备更新；二是合理调配劳动力。

4月 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创办了一个以反华为主要目的的季刊《远东问题》。塔斯社报道说，该杂志的宗旨是"成为一切苏联学者和研究中国、日本、朝鲜问题的专家以及国际问题专家……等的广阔讲坛"。

5月9日 炮兵元帅雅科夫列夫死去。

5月13日 《红星报》称，维·彼得罗夫上将已被任命为远东军区司令。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10日报道，原远东军区司令托卢勃科已被任命为战略火箭部队司令。《消息报》在5月11日的一则报道中提及他的头衔是国防部副部长。

5月14日 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剧作家考涅楚克病死。

5月14—28日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连续刊登四篇题为《俄国人反对克里姆林宫》的长篇专题调查报告，谈苏联国内反抗运动的情况。

调查报告之一、之二谈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问题，说苏联共有三百多万犹太族人，愿移居的有一百万。认为苏联主要出于政治安全上的考虑近年来才放宽对犹太人去以色列的限制。

调查报告之三谈宗教活动的情况，说苏联现有东正教徒三千万，天主教徒三百五十万，浸礼教徒三百万，还有其他各

种教派的信徒，有八千多所教堂和修道院在活动。一些教徒私下出版圣经、圣歌和期刊等。

调查报告之四介绍人权运动的情况。

5月23日，意大利《前进报》谈苏联有三种持不同政见者，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牢骚最大”，“同西方记者接触最积极”，“要求民主自由”；第二种是民族主义的或宗教的，在苏联出现“俄罗斯化”以后，这种持不同政见者活跃了起来；第三种是“左派”，是工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通过“沉默的”或者“自发的”罢工，要求恢复列宁时期的各种苏维埃制度，他们“对现制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5月14日 立陶宛青年工人（按：另一说法是夜校学生、共青团员）罗曼·卡兰塔在考纳斯自焚。5月18、19两日成千名青年上街为卡兰塔举行葬礼，并高呼“给立陶宛自由”、“自由、自由”。他们用石头、棍棒同前来镇压的警察进行了搏斗。

在这前后，立陶宛还发生两起政治自焚事件，一个是青年工人斯托尼斯，一个是老工人胡卡维丘斯，都是抗议苏联当局的民族政策。

西方通讯社还报道，八名立陶宛人5月份在考纳斯市组织示威，因高呼“解放立陶宛”的口号被捕。3月份，在国际手球比赛时，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学生拒绝在演奏苏联国歌时起立，并散发传单，在大街上挂起立陶宛国旗。有一百五十名学生被捕。

5月17日 《农业经济》杂志第六期刊登一篇文章：《公有经济与私人经济相结合》，强调私人副业“在客观上是必要的”。文章说，1970年私人副业生产的土豆、蔬菜、肉、奶、蛋

和羊毛，分别占该类产品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五、三十八、三十五、三十六、五十三和十九。在农业的全部商品产值中，私人副业产品产值占百分之十二（农产品占百分之八，畜产品占百分之十四）。文章还说，1970 年私人副业占用土地六百五十五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点九四。

5 月 19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国际形势报告，卡皮托诺夫作了更换党证的报告。会上就这两个问题通过相应决议，并选举波诺马廖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6 月 8—30 日，苏联各地都召开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贯彻中央 5 月全会的决议。据报纸报道，各地主要强调以下几点：（一）“完全支持”苏联外交政策，突出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功绩”，把党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三者放在一起并提。（二）军人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有正确理解”，“并大力提高政治嗅觉和警惕性”。（三）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思想上的和平共处”。

5 月 19 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谢列斯特为部长会议副主席。5 月 25 日谢列斯特被解除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由谢尔比茨基接任。西方通讯社评论说，谢列斯特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是“明升暗降”，“谢列斯特同勃列日涅夫若干时期以来一直是不和的”，谢列斯特反对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采取的镇压行动”。

5 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刊登波德戈尔内的一篇文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苏联的五十周年》。文章称俄罗斯联邦是“团结苏维埃各民族的中心”，为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为各大小民族“开辟了一条通往新社会的

道路”。俄语“在苏联各族人民的接近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它们团结和相互联系的强有力的工具”。

文章说，苏联经济是苏联各族人民“互相有联系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各共和国都关心有科学根据的生产力布局”，苏联“给那些从苏联国民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很有必要的地方拨出大笔投资”。文章称，使苏联各民族“越来越密切接近的方针，是苏联发展民族关系的主要路线”。“党既反对推进，也反对人为地阻挠这一过程”，“党既没有忽视，也没有夸大”民族特点。“在对民族—国家建设问题的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应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有时是由对民族利益的狭隘的、有局限性的解释以及由闭关自守地狭隘地理解民族特点的意图所引起的”。声称要同“一切民族闭关自守和狭隘性的现象”作斗争，“当前仍然十分迫切的任务是：保持政治警惕性”，“对复活民族主义情绪和观点的一切敌对企图作出应有的估价并予以坚决反击”。

6 月

6月13日 苏共中央公布《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同酗酒行为作坚决斗争，要求采取措施加强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工作，“妥善安排”职工的业余休息时间。

6月15日，部长会议公布反酗酒的措施，规定缩减烈性酒的生产和销售量，缩短出售时间，因酗酒致病请假不发工资等等。

9月27日，最高法院也公布相应决议，说在酒醉状态下犯罪要加重责任。

6月15日 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后勤部部长谢·斯·马里亚欣病死。

6月19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署名为“公民委员会”的地下组织通过莫斯科的邮筒散发油印呼吁书，号召苏联公民进行罢工和示威，为改善生活而斗争。该呼吁书说，苏联“没有社会主义”，“有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偷盗和不受监督的统治是希特勒德国所出现过的情况”，“我们现有的食客和官僚为沙俄时代的二十倍”，等等。据合众社说，这个委员会包括一批工程师和熟练的技术人员，对苏联的生活水准和政治控制感到不满。

6月20日 莫斯科卫戍司令彼得·阿斯塔霍夫“猝然死去”。

6月21日 “保卫民权行动小组”的领导人亚基尔因为“系统地向西方宣传机构”提供“反苏情报”而被捕。后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亚基尔已同苏联当局合作，至少已供出二十五人。

6月21日 美国报纸报道，苏联地下刊物《时事纪事》第二十五期透露，苏联存在一个名为“爱沙尼亚民族阵线”的组织，该组织主张就爱沙尼亚自决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按：1971年12月30日，西方传苏共中央曾下令查禁地下刊物《时事纪事》）。

英国报纸7月7日报道，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理工学院学生最近举行了一次反俄示威。

6月22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提出了一项“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计划”——由两个署名文件组成：1971年给勃列日涅夫的“备忘录”和1972年的“后记”。要求“修改俄国的经济和对外政策”，“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大赦政治犯”，“结束秘密审讯”等。并传萨哈罗夫已被解除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的职务。

6月23日　苏共中央举行会议，研究更换党证问题，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出席，卡皮托诺夫作报告。

6月24日，《真理报》发表题为《更换党证》的社论，说这次更换党证“不是清党”，但在筹备和更换党证过程中要开除“那些未履行苏共纲领和章程的要求，以及不遵守党的生活准则”的人，“清除那些不合党员标准的人”。

6月25—26日　英国《东西方文摘》双周刊报道，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有一万多名乌克兰人示威。他们捣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厦，销毁了所有政治文件、护照和公民档案材料，并撕毁了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画像，打死了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另外几批示威者毁坏了州的行政、党、团和军事机构所在地的大楼。苏联当局出动了地方卫戍部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队等进行镇压。打死十人，打伤数以万计的人，许多人被捕。

该刊还报道，9月19日又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发生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数千名工人包围州委会，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给予民族自由。军队和警察曾开枪镇压。

6月26—28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苏思想工作会议，研究有关筹备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问题。苏斯洛夫致开幕词，

强调“要同敌视社会主义的侵略势力和资本主义雇佣奴役制度进行长期的顽强斗争”。说“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应是积极的、进攻性的、具体的和不妥协的”。

杰米契夫在会上作了《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是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的战斗纲领》的报告，内容未透露。

6月29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决定，指出在职业学校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疏忽现象”，“没有随时考虑工人劳动内容发生的变化”。责成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消除职业学校的缺点，提高教学质量”。

6月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第六期刊登列昂节夫的一篇文章：《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历史过程的辩证法》，说“全民国家及其固有的极其深刻的民主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党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的不断加强”，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规律”。

7—8月

7月4日 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西方的服装、音乐、语言和风度，在苏联青年中十分流行”。“西方最糟糕的问题之一——吸毒，同超短裙、喇叭裤、长头发、长排纽扣衬衣以及摇摆舞音乐等一起跃过了苏联的壁垒”。俄国人最欢迎的礼物是西方的“时装杂志”、“西方的唱片和录音磁带”，“从美国之音中录下西方音乐是苏联最广泛的癖好之一”。

7月10—12日 经互会举行第二十六次会议，研究经济

一体化综合纲要实施情况，决定由保匈德波罗苏六国共同在苏联建设一座年产五十万吨纤维素的大型联合企业。

《真理报》3月1日曾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一体化”“是两个制度竞赛中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任何民族主义必然会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

7月11日 《红星报》透露苏联抽调大批军人充实内务部。文章说，最近三年民警有很大“革新和补充”。现在“每三个新人中就有一个是从陆海军来的”。

7月27日 《真理报》摘登苏共中央《关于苏共阿尔泰边疆区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中提高专家的作用》的决议，号召各级党委“全力维护专家的威信，提高他们作为农业生产组织者和工艺师的作用”，要求“班组、生产队和畜牧场由农艺师、畜牧师和工程师来领导”。说他们对“农业生产工艺问题的指示就是法律”。

7月27日 乌克兰党中央举行全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在会上作报告。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在谈到后一个问题时，谢尔比茨基批评一些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国际主义”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缺点”，在宣传民族政策的成绩时“没有必要的深度”，在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时“缺乏进攻性”。

7月28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乌克兰党中央原政治局候补委员伊凡·格鲁谢茨基被选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6月9日，亚历山大·利亚什科被任命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

7月30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苏联高等教

育》的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加强“用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不调和地对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来教育学生”。

7月 《真理报》7月21日和《消息报》7月16日分别载文介绍兹洛宾建筑队实行“承包制”的经验。建筑队按合同工作，对工程项目承担全部责任。所得利润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上交国家，百分之四十以下用来奖励建筑队队员。奖金多少直接取决于完工的期限、质量和节约情况。这个建筑队按这种方法已工作了两年。现在全国已有八百个综合建筑队采用了“承包制”。建筑部等已下达《关于建筑部改行承包方法》的命令。《消息报》7月20日说，兹洛宾建筑队“经济核算的经验”已得到苏共中央的赞同。

《真理报》12月12日报道，一年前在卡卢加开始试验以整个建筑工段为单位的承包方案。这是“建筑队包工的继续”，工段长和工作队长一起对完成合同负全部责任。

《真理报》11月27日刊登建筑业组织和管理研究所所长科姆津教授等人写的一篇文章：《按总体工程进行结算》。文前编者按说，“已有五百五十家托拉斯和房屋建筑联合企业改行新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方法”，“它们承担着四分之一的承包工作”。文章说，“在五年计划剩下的三年中约有一千七百个托拉斯和管理局将改行新体制”，“这是重大而复杂的任务”。文章认为“必须使投产的总体工程成为向建筑业进行支付的产品”。提出“按列入这类总体工程中的已完全竣工的项目进行结算”，作为“对投产总体工程进行支付的过渡步骤”。承认“新体制的方法”对“加速设备投入运转还不能起足够有

效的作用”。

8月3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迁往国外定居的苏联公民偿付教育费》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同等学位的人移居国外，必须交付四千五百——二万二千二百卢布不等的“教育补偿费”。西方通讯社认为这主要是针对犹太族人的。

8月8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塔什干市党组织领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经济教育问题》的决议，批评塔什干市委在进行思想教育和经济教育方面不符合二十四大的要求，说“政治学习流于形式”，对“现代化管理方法掌握不够”，以至该市工业基金回收率下降，大量企业完不成计划。指责有些报告和出版物“片面阐述共和国建设成就，而不深刻揭示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评价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犯有美化过去和脱离阶级立场的错误”。指责它未从批评第比利斯市委的决议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决议要求该市委领导干部“深入掌握现代管理经济的方法”，改进“国际主义教育”，培养同“民族局限性的各种表现形式和旧时代残余进行不调和斗争的精神”，并声称要“严厉惩罚欺骗党和国家、滥用职权的干部”。

8月8日 莫斯科近郊大火，燃烧了约一个多月，着火面积达三千六百公顷。原因据说是天气干旱干草起火而引起地下泥炭燃烧。

8月16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克里米亚鞑靼族人把一份有二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交给勃列日涅夫，要求返回家园，同时将另一份有一万八千人签名的请愿书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和

政府成员，要求“结束对克里米亚鞑靼族人的政治恐怖和民族歧视行为”。

8月19日 苏共中央通过决议，规定从9月1日起增加教育和卫生部门职工的工资。医生、教师和保育员工资分别增加百分之二十三、二十一和二十九。将增加工资的职工约四百九十万人，每年增加开支十二亿卢布。

8月22日 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电影事业的措施》的决议发表。决议指责一些影片“缺乏思想性和鲜明的阶级立场”，“错误地解释历史和现实”。批评国家电影委员会对电影事业“领导不力”。

同时，任命叶尔马什为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西方通讯社认为这一任命表明对电影的控制更加严厉。原主席罗曼诺夫不久改任《苏维埃文化报》总编辑。

8月24日—9月5日 勃列日涅夫去哈萨克、阿尔泰边疆区、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城、鄂木斯克及乌兹别克等地活动。参加了当地召开的农业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强调要十分重视谷物收割和收购的组织工作。西方通讯社认为勃列日涅夫此行是由于西部产粮区严重减产而到东部去督促秋收工作的。

8月24日 部长会议设置波波夫奖章，鼓励剧作家创作“军事爱国主义”作品。

12月27日，《红星报》刊登皮缅诺夫的一篇题为《树立爱国主义》的戏剧评论，说今天具有普遍的生动性的关于描写军人的剧本不是很多的，但也不要把“军事爱国主义”剧作问题看得太悲观，最近戏剧方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兄弟共

和国的作家们站到了军事爱国主义题材的最前线”。

8月30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黑色冶金工艺流程自动化工作》的决议，批评这一部门自动化工作“严重落后”，责备有关部门没有搞好重新装备黑色冶金工业的工作。各部“行动不协调”，“互相之间没有严格要求和互不负责”。决议点了黑色冶金工业部，重型、动力和运输机器制造部，仪表制造、自动化工具和控制系统部，电机工业部，安装和专门建筑工程部等部长的名，要求他们克服缺点。

8月 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谢罗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五期发表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民族繁荣和接近的两种趋向”时，指责有人把这个问题“弄混乱了”，他们认为“各民族的繁荣和相互接近之间存在着把二者区别开来的界线”，“民族繁荣是在自主的、长期发展阶段的轨道上前进的，只有在这完成之后，民族的相互接近才是可能的”。

9 月

9月9日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苏联五百名犹太族人联名抗议对离境犹太人征收巨额“教育税”。9月19日，又有一批犹太人为抗议“教育税”示威未遂，有十三人被捕，并有人在莫斯科中央电报局绝食二十四小时。

10月24日，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已取消两百多户犹太人移居国外的离境税。说这一突然的改变表明苏联正在再次研究犹太人移居国外以及美国国会越来越把它同苏美贸易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9月15日　《真理报》就宗教问题发表社论，说现代宗教组织的活动更精巧了，蒙上了民族的色彩，“揭露宗教与民族主义残余的相互关系非常重要”。说在尼古拉耶夫州有一些党员信教。社论要求各种宣传工具动员起来与宗教作斗争。

9月1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通过《关于预防违法行为和教育公民履行法律》的决定。

据《社会主义法制》杂志第九期报道，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法院工作》的决议，要求提高司法工作在打击犯法行为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的作用。

《消息报》也曾于8月24日载文鼓吹建立“人民纠察队的统一组织”，帮助“维护”社会秩序。

9月19—20日　第八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有：(一)关于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问题。(二)关于苏维埃代表的法律地位问题。(三)选举最高法院。

会议就这几项议程通过了相应决议和法令。会议解除了戈尔金的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任命原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斯米尔诺夫为苏联最高法院院长。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格鲁谢茨基被补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谢尔比茨基取代谢列斯特升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会议还决定成立石油和瓦斯工业企业建筑部。科尔图诺夫被任命为部长。奥鲁德热夫被任命为瓦斯工业部部长。

9月29日　格鲁吉亚党中央举行全会，宣布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退休”，原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升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

6月间，格鲁吉亚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局委员兼中央书记茨哈卡雅曾因“工作中犯错误”被解职。

12月27日，《真理报》公布了对第比利斯市一些中层干部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私造别墅给予的处分。不久，格鲁吉亚邮电部部长卡夫塔拉泽因“犯错误”而被解职。

9月30日 国家计委举行扩大会议，柯西金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承认农业和工业存在困难，说“今年不良的气候条件在农业中引起困难；在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作中也有缺点，特别是建筑部门”。说“建筑方面的重要缺点是资金分散，建设项目期限长，未完工的工程越来越多(到今年年底未完工的基建项目总值达七百亿卢布)”，“新投产的生产能力掌握得迟缓”，“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国民经济未能从物资和劳动资源的利用方面收到应有效果。”还批评国家计委工作中“统计学态度占上风”，“在决定重要的国民经济问题时没有原则性，走上本位主义的邪路”。

要求1973年计划“保证最大限度地挖掘国民经济中的现有潜力，节约物资资源，更有效地使用基本投资，提高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水平，并消除现有的比例失调”。说“国家计委首先应该保障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不仅要提高最一般的比例和分布部分的计划平衡水平，而且要提高每项布局的计划平衡”，“完全平衡的1973年国民经济能够保证部和企业计划的稳定性”。

另外，柯西金在谈到提高产量质量和技术水平问题时说，“应该在国外购买许可证”，并提高在“获取和利用许可证方面的责任感”。

9月 立陶宛《共产党人》杂志第九期刊登两篇文章，攻击“民族主义理论”——“合流论”。称这种理论“流传甚广”，“在文化界、青年和部分干部中都有不小影响，在中学课本和教学中也有表现”。说“合流论”主张民族一体思想，号召“全体同胞在统一的民族基础上联合起来”，“与俄罗斯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赞扬“本民族的历史和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称赞“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是“无限热爱本民族”的“崇高的爱国主义者”。

9月 《农业经济》杂志第九期发表一篇文章：《增加谷物生产》。文章说，增加谷物生产是“整个国民经济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谷物单产受到天气条件的影响而减产的情况仍然存在”，“近年来削减谷物播种面积的趋向还在发展”，“谷物在播种面积结构中的比例从百分之六十点五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八点九”。为完成谷物增产任务，要求谷物的播种面积达到一亿二千四百万——一亿二千五百万公顷。说谷物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必须达到九百五十——一千公斤，才能完全满足国家对谷物的需要。苏联现在用于饲料的谷物约一亿零三百万吨。在谷物总产中，粮食谷物比重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七，饲料谷物占百分之三十点八。豆类谷物占百分之四点五。今后的方针是谷物经济集约化，提高单产，要求在这个五年计划中，全国谷物单产平均每公顷提高四公担，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十五。1975年，每公顷谷物单产要求达到十七点八公担。

《农业经济》杂志第十一期报道了9月间农业部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会议，农业经济计划总局局长在会上作了报告。

11月22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配合饲料工业工作》的决议，承认新建饲料厂和生产蛋白原料企业"落后于规定的时间"，原料资源分散"影响配合饲料工业的发展"。决定从1973年起实行配合饲料统一分配，由国家规定出售价格。

10　月

10月4日　国防部原总干部部长亚历山大·捷连季耶维奇·阿尔图宁上将首次以国防部副部长、全国民防司令的头衔在《红星报》上出现，未透露原民防司令瓦·伊·崔可夫调任何职。

10月6日　柯西金在物资供应委员会发表讲话，批评在物资供应方面的不协调现象和在物资平衡方面的错误。要求逐年增加通过批发贸易销售的商品品种。

10月10日　乌克兰党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农业问题和组织问题。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奥夫恰连科被解除乌克兰党中央书记的职务，而由亲俄罗斯的马兰丘克接任。

10月13—17日　苏联进行向太平洋水域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次试验的是装有多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10月18日　《社会主义工业报》载文谈瓦斯的开采和消费问题。文章说，苏联瓦斯供应系统就其能量来说占世界第二位。现在，已勘探出来的瓦斯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主要消费者却在欧洲部分，1975年其平均运输距离将达一

千三百八十公里。文章认为欧洲部分的瓦斯储藏量很大。目前的两个可能性，一是建筑远距离瓦斯管道，或者加强欧洲部分的勘探工作。说最适宜的战略是把两种方案有利地结合起来。

《统计通报》第九期曾刊登中央统计局库季诺夫等人的一篇文章，说“苏联燃料总蕴藏量虽丰富，但是在地理分布上不够好”，“主要矿物燃料产地是在西伯利亚和苏联东南地区，然而苏联欧洲部分和乌拉尔地区的燃料需要量占整个需要量的五分之四”。说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将继续为建立统一的动力系统而工作，要建造远距离强力输电线路”，“在这个五年计划中将实施建造原子能发电站的大计划”。

文章说，“国民经济对各种燃料和动力的需要超过了燃料和动力产量的增长”。另外，国家计委局长米尔林在《计划经济》杂志第十一期发表一篇文章，称已查明的各种矿产储量同今后迅速增长的开采量相比“是不够的”。在谈到燃料问题时，文章说，由于欧洲部分燃料资源不足，因此必须在这一地区加紧寻找新的燃料和各种矿藏产地。

《对外贸易》杂志 1971 年第一期曾说，“据初步统计，到 1980 年，国家欧洲部分所需燃料的不足数目将比 1970 年大约多三倍”。

10 月 18 日　《红星报》刊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里亚比科夫的一篇文章：《工业的主导作用》，宣传重工业对生产和加强国防的作用。文章称卫国战争的胜利也是“重工业的胜利”。在谈到工业转向提高人民福利时，文章强调说，这一方针的实质是在“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情况下”，更多地保

证人民的物质文化福利。文章还称，党在发展军事工业方面的路线是“清楚”而“肯定”的。

10月20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国内出现一份名叫《播种者》的地下刊物。该刊宣称其目的是“在俄国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并提出了八点纲领：(一)对社会实行科学和民主的管理，对政权机构实行科学改组。(二)坚持不渝地实行经济改革，包括谨慎地采用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的某些做法，和中央集中计划的某些做法。(三)工业企业内部实行民主。(四)缩小工人同官僚之间收入的差距。(五)取消对一切宣传手段的检查。(六)经济政策的全面人道主义化，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七)停止耗费大量资金的对外政治冒险，奉行比较合情理和比较讲原则的对外政策。(八)在“灾难”领域，主要是涉及人类福利和环境的领域里，立即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

西方通讯社认为，《播种者》的问世“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长期潜伏的种子要在苏联土地上发芽了”。

10月24日 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联名写信祝贺远东解放五十周年。叫嚷“远东自古就是俄国土地”，要远东人民“一如既往地不断巩固防御能力，警惕地捍卫祖国的边疆”。

10月24日 《社会主义工业报》刊登一篇题为《定额和刺激》的文章，宣传伏尔加汽车厂的工资制度。文章说，该厂实行的既不是计件工资制，也不是计时工资制，而是计时奖励工资制加上完成定额任务的附加报酬。

工资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按工资表计算的报酬，采用六级工资制，各级之间的工资差额为百分之十二，这是工人

在实际工作时间内的计时工资部分；第二部分是对专业技能实行特殊津贴。如工人学会高质量掌握作业小组内不少于百分之四十的各种操作，津贴费为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四，掌握百分之七十的操作，津贴费为百分之八，掌握全部操作，津贴费为工资的百分之十二，最高津贴等于基本工资等级的一个级差；第三部分是劳动条件津贴，做重体力和对身体有害的工作，工资较高；第四部分是完成定额任务的附加报酬，如作业小组百分之百地完成规定工作量，补充支付相当于计时工资的百分之三十；最后一部分工资成分是达到设计要求的劳动消耗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每月奖金。

10月30日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第三卷出版。其中收集了1970—1972年间的言论和文章。11月1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言论集的出版，是“当前政治思想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可帮助党员、干部和人民深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政策中的重要问题”。

10月 《戏剧》杂志第十期发表伊·德伏列茨基鼓吹“新经济体制”的话剧《外来的人》。

该剧从1971年以来，在莫斯科和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先后上演。《真理报》、《文学报》、《文学问题》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吹捧它是“一部生动现实的作品”，是“好久没有上演过的好戏”，说剧中的主人公切什科夫是“我们用新的方式进行工作”时，“必然要到来的”、“关键的、意义重大的人物”。

10月 《真理报》10月23日、《经济问题》杂志1971年第一期以及1970年第七期和第十二期载文谈钢铁生产和消

费的情况。这些文章说，目前只有百分之七十的金属变成轧材，回炉的废料量很大，一块钢锭有百分之十五——二十要切下来回炉。1967年钢产量为一亿零二百万吨，生产的金属成品为九千一百万吨，其中包括铸铁一千四百四十万吨，国民经济共消费金属成品八千五百万吨多一点。透露机械制造业中平均约百分之三十的金属变成废料。

《真理报》的文章说，生产高质金属的五年计划如果实现不了，“就会发生金属缺乏”，“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

11 月

11月1日 弗·列·戈沃罗夫上将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原任该职的伊凡诺夫斯基（按：11月4日提升为大将）调任驻德苏军总司令。

11月3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在五天内史无前例地给申请移居西德的日耳曼族苏籍公民签发了三百张出境签证。而通常每月仅一、二百人能离境。据西德估计，一百六十万日耳曼族苏籍公民中，约有六万人已提出离境申请。

据西德《明镜》周刊和法新社报道，1957年以来，已有二万六千人移居西德。其中1970年为三百四十人，1971年为一千一百五十一人，1972年1—11月为三千二百零三人。

11月4日 一批军事将领受提升：空军元帅帕·斯·库塔霍夫晋升为空军主帅，驻德苏军总司令叶·菲·伊凡诺夫斯基、国防部副部长亚·尼·科马罗夫斯基、谢·康·库尔科特金和阿·伊·拉齐耶夫斯基提升为大将。

11月10日 塔斯社报道，又一本勃列日涅夫言论集出版，题为《苏共为一切革命力量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而斗争》。书中收集了勃列日涅夫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文章和言论。塔斯社说，"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在该书中占"中心地位"。

《真理报》12月9日载文称该书出版是对"发展当代世界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11月11日 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政府批准一项新的条例，规定凡违反"国家和公共秩序利益"的人，不准使用电话。这项条例已自8月31日起生效，并且附加于1971年5月电话通话规则中。

西方通讯社认为，苏联显然是把这一条例作为理由来切断被当局认为是滋事生非的人的电话。

11月13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苏联警察查出莫斯科一研究所制造麻醉剂麦角酸，已逮捕了一名科学家。报道说，在苏联南部和亚洲部分，服毒品的现象"更加普遍了"。

西方通讯社还报道，俄罗斯联邦9月份颁布了一项对吸毒者进行强迫治疗的新法律。

11月14日 丹麦《时闻报》载文谈格鲁吉亚族反对苏联领导的情况。文章说，今年夏天有消息透露，在休假中心苏呼米，有一家秘密兵工厂制造了小得象原子笔那样的枪枝，提供给格鲁吉亚地下组织。有许多迹象表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分子正在使用暴力手段反抗苏联领导人，为此当局已宣布对用炸药和其他手段破坏纪念物者给予严厉惩罚。

11月15日 《文学报》刊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

部长、历史学博士亚·雅科夫列夫的一篇题为《驳反历史主义》的长篇文章，主要内容为：

（一）指责一部分人"歪曲认识"苏联的"社会实际"，不能正确看待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有的否定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把知识分子宣布为社会的领导阶级"；有的又对知识分子采取"虚无主义态度"。

（二）指责一些人披上"渊源论"的外衣，"气势汹汹地颂扬农民的旧宗法传统，来对抗城市文明"，批评许多作品"赞美教堂、十字架和圣像"。

（三）批评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和摩尔达维亚等少数民族的一些作家把过去的时代"有意加以理想化"，"复活民族主义"，用"合流论"的精神考察文化遗产，美化帝王、大公和将军（按：9 月，立陶宛《共产党人》杂志曾载文批评"合流论"）。

（四）批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1914 年 8 月》是对历史的歪曲，"美化专制俄罗斯的生活、风尚、习惯"，是"公开敌视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表现"。

（五）强调"对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表现作坚决斗争，不管是地方民族主义还是沙文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还是排犹主义，是民族自我扩张还是民族闭关自守"。谴责有人"用民族主义的狂妄自大代替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变成了沙文主义"。

西方通讯社认为这篇文章是对新的亲斯拉夫主义运动的攻击，它在几个月以前写成，经过长期争论后得到苏斯洛夫支持才发表。

雅科夫列夫于 1973 年 4 月被调任驻加拿大大使，据认为

是同这篇文章攻击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有关。

11月16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介绍苏联地下刊物《自由思想》，说该刊于1971年12月出版，自称是民主运动机关刊物。

11月16日 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杂志载文谈苏联的军费开支问题。文章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而军事努力却同美国大致相似。苏联每年公布的军事预算并不是苏联的国防开支总额。苏联的科学预算有一部分用于军事目的，边防军和国内保安部队的开支也不是通过国防预算来提供的。所以大多数西方分析家要把苏联的军事预算增高百分之二十五——三十五来计算。

11月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1973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未发表)。

全会选举弗·伊·多尔基赫为苏共中央书记，解除姆日阿瓦纳泽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11月19日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苏联1971年向不发达国家(不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和东欧国家)提供了价值十一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在1955—1971年期间，苏联总共向三十个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总额近八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1月21日 苏斯洛夫在七十岁生日时获"镰刀与锤子"金质奖章和列宁勋章，波德戈尔内在授奖仪式上说苏斯洛夫"充分表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优秀品质和特点：坚信

党的事业的正确，有惊人的进取心和坚定性、原则性，非凡的组织天才”，是一位“理论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10月21日，苏联出版《苏斯洛夫言论选集》，共收集了苏斯洛夫三十多年来的主要讲话和文章。《真理报》11月19日介绍该书时说，苏斯洛夫“对苏共的政治路线作了彻底的阐述，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和现象，以及极其重要的国际事件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11月24日 格里戈里·阿尔祖马尼扬被任命为亚美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巴·阿·穆拉江被解除这一职务。

11月25日 《文学报》开辟专栏讨论工业内部甲类和乙类问题。发表了列维科夫的文章和读者来信，抱怨消费品生产部门被看作“次要”部门，报刊宣传“消极”，基建项目不受重视，工资和奖金低，劳动和生产条件差。说甲类和乙类不平等已进入“经济范畴”，对待消费品生产“按新方针制订计划要比心理转变简单些”，心理转变则“困难百倍”。要求“注意乙类的新处境和为乙类各部门所提出的任务的全部意义”，提高乙类的“威望”和刺激措施。

1973年2月7日，该报对这次讨论进行了总结。说“大多数读者支持本报的做法，认为提交讨论的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要求计划机关、有关部和主管部门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以便该报向读者“介绍它们的正式答复”。

11月29日 文学、电影、音乐等创作团体理事会举行联席会议。

会议强调“民族团结”和“国际主义”，反对在文艺中“把民族的东西和民族友爱对立起来”，说“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是

“进一步完善各民族文化所必须的绝对因素”，声称要加强各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接近”。

11月30日 柯西金在《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七期发表长篇文章:《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谈了如下问题:

关于苏联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称全面综合发展经济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并说现阶段的发展特点是:(一)科技革命使生产出现新的规模，向生产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过渡是其中重要一环。(二)经济要在更大程度上解决同提高人民福利有关的任务，要把分配额同劳动量更紧密联系起来，加强分配对发展生产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说提高苏联人福利水平是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三)现在对计划和整个经济领导系统提出更高要求；正在考虑解决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问题，除制订生产计划外，还制订了某些城市、州和企业职工的社会发展计划。(四)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并“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

说1973年是五年计划的“决定性一年”，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加速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生产力的方针”，说那里正在解决“重大的全苏性任务”，即保证增加石油、瓦斯和煤炭的开采量，增加有色冶金、电力、木材、纸浆和造纸等工业部门的产量。要求调动各种潜力来完成五年计划。

12 月

12月5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

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关于争取1973年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开展全苏农业工作者社会主义竞赛》的决定，规定了对优胜者进行物质和精神刺激的办法，如授予红旗、奖金、奖状等。中央给共和国、州一级的最高奖金为十五万卢布。突出的个人还可发给勋章、奖章。

12月11日 《真理报》就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发表社论，说“只有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余以及地方主义的各种表现持不调和态度，才能对大小民族保持深刻的尊重”。强调各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专区都在对“煽动民族主义观点和情绪的任何敌对做法进行坚决的回击。”

12月12日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政治经济学小组召开会议，对经济学博士克隆罗德打算发表的一篇谈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问题的文章进行了讨论和批评。克隆罗德认为“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形式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然成分”，将来要“排除掉这种所有制，并尽一切努力发展全民所有制”。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意味着人们对生产资料的经济平等只是形式的，而不是实际的”。“似乎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还不具备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

以后在1973年，《经济问题》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克隆罗德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克隆罗德承认发达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建立起来了”。南通社记者认为，克隆罗德的“自我批评是相当灵活的”，“在整个论战中，对社会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抱有不同的态度”。

12月13日 民权运动发起人之一瓦列里·查利泽于11

月被当局批准去美国讲学，12 月 13 日，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向查利泽宣布取消其国籍并没收他的护照。

12 月 15 日 《苏维埃吉尔吉斯报》谴责吉尔吉斯历史学家努尔别科夫和图尔贡别科夫教授，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因为他们对目前宣传的“民族自决权”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强制改变疆界是“侵略行径”，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践踏”。

12 月 18—19 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讨论和确定1973 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 1973 年预算。

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在关于 1973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透露，1973 年的工农业指标都低于原计划数字，他说，1972 年的谷物产量“将略高于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平均产量”。“工业总产值预计增长百分之六点五，而计划原定的增长额是百分之六点九”。他说，“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略低于五年计划规定的速度，主要是由于生产设备，特别是黑色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瓦斯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设备的投产落后于计划，同时也是由于一系列农业原料不足”。

计划预定 1973 年的国民收入将增长百分之六，工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五点八，其中生产资料的产品增长百分之六点三，消费资料的产品增长百分之四点五。1973 年预算收入为一千八百一十八亿卢布，支出为一千八百一十六亿卢布，军费仍保持一百七十九亿卢布不变。

西方通讯社评论说这一经济计划透露苏联将削减原计划的消费品生产，继续强调重工业的生产。

12 月 21 日 英国《苏格兰人报》刊登威廉·约翰斯顿的

一篇文章，说苏联许多共和国首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紧张局势，而且现在比多年来都更为严重。文章援引苏联一匿名作家的话说，苏联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说，在苏联，民族的对抗已消除了。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真实的"。

英国《冲突研究》杂志1972年第三十期刊登《苏联种族压迫》专辑，介绍了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以及乌克兰共和国中反对勃列日涅夫的民族政策的一些组织、个人和活动以及当局的迫害活动，还介绍了中亚各共和国抵制俄罗斯化的情况。指出苏联国内欧亚两部分的非俄罗斯族共和国内民族情绪高涨，苏联当局近些年来加强了镇压，"1973年将继续加紧镇压"。

12月21—22日 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联合举行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本月上旬各加盟共和国已相继开过庆祝大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二十五人都出席了大会。有一百一十五个国家派代表团参加大会。波德戈尔内致开幕词，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吹嘘了苏联成立五十周年来各方面的"成就"之后说，"所有这一切根本变化，使得我党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治结论"，即在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完成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后，逐渐地变成了仍由工人阶级作为领导力量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他还着重谈了民族问题。说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但是民族关系仍然"是个现实问题"。"民族主义偏见、夸大或歪曲民族感情的现象

是极难消灭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表现往往同民族主义的同类——地方主义交错在一起"。还"存在着一些客观问题"，"如寻找发展各大小民族的最正确的途径和使各个民族的利益同整个苏联人民利益最正确地结合起来"。他说，"各大小民族的接近是一个客观过程"，"党反对人为地加速这个过程"，"也不能容忍以种种借口干扰这一过程"。他说，"对小民族的民族感情必须表现出耐心和温和"，但共产党员"要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明确的原则性立场"。

他提出要修改1936年宪法，新宪法草案预定于二十五大前提交全民讨论。

在经济方面，他宣布1973年的谷物总产量为一亿六千八百万吨，略高于第八个五年计划的平均谷物产量。说将制定1976—1990年的远景规划，"周密考虑最合理地配置国内生产力"。他说，"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党和苏维埃国家在编制我们一切计划时的主要口号"。

各主要报刊自7月份以后曾连续多次发表文章，宣传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反对民族主义，说"民族主义是国际思想斗争中最尖锐的领域"。各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也都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强调"友谊和团结"，吹捧俄罗斯民族和俄语的"贡献"和"作用"。

12月23日 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去世。

12月2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收入在七十卢布以下的人免收所得税、单身税及少子女税。收入在九十卢布以下者平均减税百分之三十五点五。此决定要按地区逐步实行。

12月26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发布法令，更改伯力和滨海边疆区一些城镇的名称。把原来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地名改为俄语名称。

12月27日 法新社报道，苏联一些地区，如雅罗斯拉夫、喀山等地已实行食物定量供应制度，主要是肉、黄油和土豆。其他食品虽没有实行配给，但除面包和面粉外，也都供不应求。

12月28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发布大赦令，对判刑五年以下，而且以前未服过劳改刑的男六十岁、女五十五岁以上的犯人实行大赦，对所谓“特别危险的国事犯”不予赦免。

12月 《经济问题》杂志第十二期刊登基斯塔诺夫的一篇文章，谈经济区划问题。说“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行政区划结构只能是按经济原则建立”。“要解决现阶段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就要求改进经济区划本身。”说“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同地区经济综合体的边界不一致，往往给解决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带来困难”。

文章说由于居民的流动和生产力布局的变化，各共和国逐渐变成“多民族化”，并列举各共和国中主要民族在全体居民中比例下降的情况，如哈萨克共和国中，俄罗斯族人数超过了哈萨克族人数，哈萨克族人还不到三分之一。说“苏联境内的民族边界越来越失去昔日的意义”。因此，“在个别情况下不仅需要建立共和国间的经济机关，而且需要通过法律手续对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作某些改动”。

12月 美国《空军杂志》第十二期说，苏联已有十一架或

十二架“逆火式”飞机。这种飞机的航程可达五千五百——六千英里，“很可能装备一种射程约四百海里的空对水面导弹”，由于“逆火式”具有远程巡航和重新加油的能力，“将它加以改装便可在反海军战争中发挥作用”。

12月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1972年苏联向国外购粮二千七、八百万吨。其中向美国购买十亿——十二亿美元的小麦、玉米和大豆。

12月 1972年苏联外贸总额是二百六十亿卢布。逆差五亿六千多万卢布，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逆差将近十亿卢布。

12月 英国《卫报》1973年1月8日报道，“1972年，克里姆林宫允许三万二千名苏联犹太人迁往以色列”。“这个数字比1971年多一倍多”。

据美联社报道，苏联内务部部长舒米林在去年年底说，“1972年提出申请的（犹太族）人当中，百分之九十五点五的人获准离境”。

1972年 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默文·马修斯著《苏俄的阶级和社会》一书。说苏联特权阶层和普通职工收入相差悬殊。如：“科学院院长月薪一千五百卢布，大学校长可高达一千二百卢布，政府高级官员为六百卢布，陆军上校为四百卢布，厂长可高达三百五十——四百卢布”，而且其中大部分人还可“获得巨额补贴”。他们是“组成高级社会中坚的数千家最显赫的家庭”，而组成“较低的社会中坚”的是数百万专家、经理、官员和艺术家等。他们的月薪最高的是三百七十卢布（总工程师），最低的不过七十五卢布（技术员）。有八百多万

各类"雇员"的月薪是在七十五卢布以下。那些"没有技术或半技术性"的职工，据 1967 年统计，平均月薪只有四十五——六十卢布。

1972 年 2 月——1973 年 2 月 《海军文集》杂志连载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的《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一文。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宣扬世界海洋已成为大国进行扩张的"直接目标"，争夺海洋的斗争"日益激烈"，说"海上进行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极大地增长了"。认为世界海洋对苏联"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苏联必须加强"海上力量"，"开向海洋"。说"苏联海军已在大洋上站稳了脚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领域的力量对比和形势"。

（二）宣扬海军在战争年代"有战略意义"，吹嘘苏联海军是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它"既能左右海战区的局势，又能左右沿海地带陆战区的局势"。海军具有"对潜在敌人施加压力的特点"，所以是"和平时期的政治工具和外交的重要支柱"。说"彼得一世时期的海军"提高了"俄国的国际威望"，今天海军的强盛是"强国的因素之一"，"所有现代强国都是海洋国家"。

（三）宣称苏联是"地中海国家"，地中海对苏联"国防有特别重要意义"。并说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和美国的一些领土如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等都是"俄国人发现的"，俄国"完全有权占领这些地方"。

（四）说"十二浬领海宽度是切合实际的"，扩展领海范围就"要造成紧张局势"，影响"公海地位和航行自由"。

1973年

这一年，苏修统治集团内部经过长期的明争暗斗之后，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加强了他个人的集权。宣传上在保持“三驾马车”情况下突出勃列日涅夫个人的作用，吹捧他“个人的巨大贡献”，5月，授予他国际和平奖金。同时，苏修上层统治集团表面“团结”、“平静”的局面已开始打破，在4月全会上撤掉了政治局内同勃列日涅夫意见不合的谢列斯特和沃罗诺夫，把主管国防、外交、公安的格列奇科、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三人提升到政治局，还降了波利扬斯基，升了罗曼诺夫。随着在最高层的人事变动，在中下层干部中也加紧进行排除异己的清洗活动。

在经济方面，这一年开始大力推行联合公司，工业改行三级、二级管理体制，并试行推广核算利润和根据纯产值指标来制订计划等一系列措施。由于1972年农业大歉收，加剧了经济的比例失调，不得不调整计划，压低指标。同时，又大量乞讨西方贷款，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走访美国、西德和法国，大搞“经济外交”，企图靠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来整饰经济。从1964年到1973年底，苏联向西方借债七十一亿美元。

勃列日涅夫5—6月访美期间，苏美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7月，欧安会第一阶段会议开始举行。10月，中东再次爆发战争，战后美苏在中东的争夺进一步加剧。此外，年初越美签订了停战协定。

1 月

1月1日 文化部机关报《苏维埃文化报》自今天起升格为苏共中央报纸并由四版增至八版。由原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罗曼诺夫任该报总编辑。

作协机关刊物《文学评论》杂志自1月份出版，该杂志是按照苏共中央1972年1月24日《关于文艺评论工作》的决议而创办的。

1月1日 据《苏联财政》杂志1974年第三期报道，轻工业所有产品和化学纤维从1973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批发价格，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七点五。

《政府决议汇集》1974年第一期透露，机器、设备和基建材料从1973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批发价格。

1月3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对劫持飞机的惩办条例》，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判处三——十五年徒刑，直至死刑。

1月4日 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报道，谢列斯特下台之后，苏联当局在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一些由谢列斯特提名的州委第一书记已被撤职，乌克兰党中央负责文化的书记奥夫恰连科以及党的组织部部长也被撤职，《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已被勃列日涅夫分子奥库连科所代替。

在知识分子中，作家伊凡·冈恰尔被开除出党，乌克兰哲学研究所的两名成员因为写信反对俄罗斯化而被捕，还有几名知识分子因抄写或拥有伊凡·久巴的书《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而被判刑。

1月5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决议，要求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全体职工在多、好、省口号下为提前完成1973年经济计划开展劳动竞赛。决议规定了对竞赛优胜集体和个人的物质奖励措施。优胜集体奖金最高额为十八万卢布，凡节约原材料增产者，奖金外加百分之二十五。优胜个人可免费在国内外旅行。全国1973年拨给生产性部门的竞赛奖金额从工资基金的百分之零点零五增至百分之零点一。

1月9日 《社会主义工业报》报道，全苏科学会议最近在莫斯科举行，"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讨论同完善改革机构、争取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有关的理论问题"。会上介绍了仪表部、莫斯科汽车运输总局"用核算利润对这些单位的工作进行刺激"的"试验结果"。其办法是把"核算利润预先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上交预算，另一部分留作自己支配（如1972年仪表部留百分之四十八点八，汽车总局留百分之三十一点四）"。如果这些单位的工作结果低于计划，那么上交预算的是全部计划数额，而留给部和总局的数额就减少了。说"这种制度在生产效率和奖励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和明确的联系"。

1月9日 《消息报》刊登司法部第一副部长苏哈列夫关于完善法制的一篇文章。文章说，"目前准备出版的一部关于苏联现行立法的有系统的汇编"，有助于"及时更新以前颁布的法令"和"改进现行法律准则的体制"。编纂集子的过程中"将取消那些由于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而实际上已失去意义的法令"。

1月9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保护环境和

改善天然资源利用状况»的决议，责成有关部门制定1973—1975年净化废水、废物和减少汽车发动机污染的措施以及1973—1974年处理垃圾的措施，并规定1974年要建造加工垃圾和烧毁垃圾的工厂，制定1973—1980年市区和郊区的绿化规划。

1月10—17日 柯西金到秋明、奥伦堡和巴什基尔等石油产地视察，检查天然气开采工程和输油管的敷设情况。随行者有部长会议副主席迪姆希茨以及动力和电力部长、瓦斯工业部长、石油工业部长等。

1月16—18日 全苏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讨论“完善高等教育问题”。会议通过了告高等学校全体工作人员书，号召“改进培养专家的质量”。会议宣布，从今年起将由科学院和共青团中央对学生的优秀著作颁发特别奖金。

1月22日 工会中央理事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1973年生产任务和开展劳动竞赛问题。谢列平在会上作报告，强调工会要“同懒汉、旷工者、酒鬼、见异思迁”等“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作斗争，要加强“同浪费和管理不善等现象”作斗争。说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存在“不少严重缺点”，如“不负责任地承担义务而没有组织措施”，并说，“不允许把竞赛变成没有群众参加的、只是各机关走过场交流经验的活动”。

他还吹捧勃列日涅夫说，“1972年最重要的对外活动是同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1月23日 《消息报》发表社论，说今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农庄要改选。“应选一些好的组织者”来代替“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的领导人”。批评有些领导人“固步自封，并且把个人

关系置于社会关系之上，违反了国家纪律”。

1月24日 《文学问题》杂志第三期报道，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召开了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文艺报刊主编会议，作协第一书记马尔科夫在会上作报告，透露过去一年的情况“令人不安”，一些刊物“回避迫切问题，很少评论现代作家”。强调“作家要参加到完成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去”，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表现出战斗性、进攻性和不调和性，在估量生活现象和文学现象时要具有党的原则”。

1月28日 《苏维埃吉尔吉斯报》载文批判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塞迪克别科夫等人，说塞迪克别科夫对吉尔吉斯语中充斥着“外来语（按：指俄语）”表示不满，提出“民族语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善”，要“为其纯洁性而斗争”，指责他“企图将本民族语言与伟大的俄语对立起来”。

8月4日，《东方曙光报》报道格鲁吉亚党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俄语学习》的决议。决议说，“不明白掌握俄语的必要性会导致民族局限性和落后性”。

1月30日 中央统计局发表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宣布国民收入比1971年增长百分之四（原计划增长百分之六点二），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六点五（原计划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其中甲类增长百分之六点八，乙类增长百分之六。农产品减产百分之四点六。

公报宣布，1972年钢产量为一亿二千六百万吨，石油产量为三亿九千四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亿六千八百万吨（比1971年减产一千三百万吨，比原计划减少二千二百万吨）。

据西方通讯社说，苏联这一年主要经济的完成情况都没

有达到计划指标，增长率是战后最低的。

1月31日 科学院和农业科学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抗旱问题。报纸在报道这次会议时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地区周期性地遭到干旱和其他不良气候条件的影响。这些地区有一亿七千七百万公顷的耕地，提供全苏百分之七十五的商品粮”。

1月 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出版的《1972—1973军事力量对比》一书中关于苏联部分中谈到：

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为五千三百六十亿美元，1972年宣布的国防预算为一百七十九亿卢布，如将先进武器的研究与发展、空间计划的军事部分、边防部队费用等包括在内，按美元购买力计算，1972年国防费用可达七百七十亿——九百一十亿美元。

武装部队总人数为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人。其中：战略火箭军三十五万人，有洲际导弹约一千五百三十枚，中远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约六百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五百六十枚（分布在六十艘潜艇上），远程轰炸机一百四十架，中程轰炸机七百架；防空军五十万人（其人员由陆军和空军提供），有三千架飞机，约一千六百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场，一万个发射器以及常规高射武器；陆军二百万人，有一百零六个摩托化步兵师，五十一个坦克师，七个空降师。其中：三十一个师驻在中欧和东欧，六十个师在苏联欧洲部分，八个师在中部，二十一个师在南部，四十四个师在中苏边境；海军四十七万五千人（包括海军航空兵七万五千人、海军陆战队一万四千人），有二百三十一艘主要水面舰只，三百艘攻击潜艇（包括三十四艘核动力

的)和巡航式导弹潜艇(包括二十六艘核动力的);空军五十五万人,有作战飞机约九千架。

此外,还有准军事部队三十万人:内卫部队十二万五千人,边防部队十七万五千人。业余军训组织"苏联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有成员约一百五十万人,并通过这个组织对十六岁以上的学生和工人进行军事训练。

1月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当局允许持不同政见的遗传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去英国讲学。8月8日,《真理报》宣布取消其国籍,罪名是"诽谤"苏联。

1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一期刊登基斯诺塔夫的一篇文章:《综合发展经济区的经济》,强调"部门计划和区域计划合理地相结合"。声称"目前当民族共和国的经济水平拉齐的任务基本解决后,应首先从整个国家利益来对待经济问题"。说"在东部地区经济结构中存在着某些严重缺点"。指责部和主管部门"对解决生产力布局问题仍未彻底消除本位主义","某些部不愿在东部建立需要大量基金的企业"。

1月 《共产党人》杂志从第二期开始开辟理论专栏:《苏共二十四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发展》。

2 月

2月2日 斯大林格勒战役三十周年。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伏尔加河畔的历史性胜利》的文章,称该战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役",取得了"有重大国际意义的胜利"。全文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只说

党是战役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2月2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解除波利扬斯基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调任农业部部长。免去马茨凯维奇的农业部部长的职务。

3月5日，波利扬斯基在集体农庄联合会会议上被指定兼任全苏集体农庄联合会主席。

1月底，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经理谢夫钦科因“破坏国家纪律”被解职，由尼古拉·鲍先科接任。

2月9日 《消息报》刊登科学院通讯院士布尼奇的一篇文章：《劳动效率和经济上的责任》，鼓吹“加强工资、奖金和生产成果之间的联系”。文章认为，现在工资方面的“剪刀差”不大，“工资等级中的差别还是很小的”。说按“谁也不得罪”的原则发奖金，只“对那些游手好闲的职工有好处”。宣传“按产值来确定工资定额”的做法。

《社会主义工业报》1月16日曾宣传一家工厂试验按产品销售额计划工资基金。

2月9日 民航部部长布加耶夫就民航节五十周年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民航在这个五年内客运量达五亿人次，货运量达一千一百万吨。国内航线总长八十万公里，国际航线总长二十二万五千公里，与六十三个国家通航。

2月15日 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杂志载文认为，在苏联报刊关于修改和保卫共和国边界的争论中，反映了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分歧，例如《经济问题》杂志1972年第十二期刊登计划工作人员基斯坦诺夫的一篇文章，强烈要求“修改”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理由是它们不适应经济单位。而《立

陶宛共产党人»杂志 1972 年第十二期则刊登国家价格委员会列别丁斯卡斯的一篇文章，认为各共和国目前的边界“不妨碍”苏联经济的发展。英刊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在政治上最高地位的人的赞助下提出的。

2 月 6 日，《真理报》曾刊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戈列格亚德的一篇文章:《苏联经济是统一的国民经济的综合体》，强调民族加盟共和国应服从全苏。

2月16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领导者的责任》的社论，批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的领导“外行”、“消极”。说“党组织的职责是，坚决根除某些领导人的骄傲、粗暴、傲慢和破坏国家纪律的行为，不管他们的职位多高，功劳多大”。

2月16日 《红星报》载文纪念 1937 年被处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称他是共产党的“忠实儿子”，是“天才的统帅”。

2月16日 乌兹别克党报《东方真理报》报道，拉苏洛夫被解除塔什干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2月17日 《消息报》报道，最高法院于年初举行会议，讨论反对浮夸虚报和加强同酿造私酒作斗争的问题。

从去年 9 月以来，报刊陆续报道了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例如:有的农庄、农场隐瞒耕地面积，以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的工厂虽然产品尚未生产出来，工厂领导人却让仓库主任“办了个手续:收到某某产品若干”。有的单位按上级的旨意弄虚作假，共同骗取奖金。

2月18日 苏共中央通过决议，规定从今年 3 月 1 日起开始更换党证。3 月 1 日，勃列日涅夫给列宁签发第一号党证。3 月 2 日，苏共中央把第二号党证发给勃列日涅夫。

3月6日，《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社论，说“更换党证不是清党”，但“将把不履行苏共纲领和章程的党员清除出党”。

2月18日 《消息报》报道，土库曼共和国最大的气田纳伊普气田的一个钻井发生火灾，火柱高达四十米，大火延续了十二天。

另据《文学报》1973年第一期报道，去年9月15日秋明地区瓦里约甘斯气田的一个钻井也发生一场大火灾，连续烧了一个月，每昼夜烧掉一千一百万立方米的瓦斯。

2月20—22日 格鲁吉亚党中央举行全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在会上作关于改进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报告，谈工农业方面严重落后的情况，指出这是“政治组织工作薄弱造成的”。指责某些领导人“划分势力范围，任人唯亲，营私舞弊”，哥里区成了“特权地区”，还有人“搞新奇别墅比赛，过花天酒地的生活”，点了五个区委书记和一些企业领导人的名，有的受撤职处分，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拘留查办。

全会解除了恰努克瓦泽的党中央书记职务。4月中旬，格鲁吉亚又陆续解除了一些市、州和区委书记的职务。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4月7日称，在格鲁吉亚进行的“反贪污腐化运动”已有六个月之久，“已清洗数十名官员和党的工作者”。

2月21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修改《民法基本原则》有关版权部分的法令，并宣布自5月27日起参加日内瓦国际版权公约。修改后的版权法规定：寄到外国的苏联公民的作品，必须是办理了“苏维埃立法机关所规定的手续”的，才

承认其版权。同时还宣布：未经作者或他的合法继承人许可，不得发表该作品及其译文。作者可保留版权至死后二十五年。

西方通讯社认为苏联此举目的是“想防止未经批准的作品外流”，杜绝西方出版索尔仁尼琴一类作者写的书。

9月20日，塔斯社报道，全苏版权协会成立，“其宗旨是在苏联参加世界版权公约的条件下保证维护苏联和外国作者的版权”。

2月27日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苏联第一艘航空母舰“基辅号”已经建成。现已开始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明斯克号”，并预计将在十年内拥有一支由十二艘航空母舰组成的力量。报道说，“基辅号”长约九百呎，四万五千吨级，其面积可同时容纳三、四十架喷气式飞机和三、四十架巨型直升飞机。该报还报道说，苏联首次把海军航空兵司令从上将提升为空军元帅。

海军第一副总司令卡萨托诺夫7月25日在《红星报》上说，核潜艇是海军的“主要打击力量”，水面舰只在完成任务中“起重要作用”，“解决极其重要任务的是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按：在这之前，苏联已有两艘直升飞机航空母舰：“莫斯科号”和“列宁格勒号”）。

2月28日 《共产党人》杂志第三期发表社论，重申苏共二十四大制定的农业路线和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方针“是正确的”。指出在改善经济体制和部门比例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对轻重工业一系列部门提出了批评，特别指责了国家计划部门和有关部委。说国家计委、各部在解决重大问题时只

顾“本位利益”,“一些部门的本位主义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强调“改善中央计划和经济部门的工作是完善经济管理的根本问题”。

《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也谈到同样问题,说“在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农业的不良条件和一系列部门没有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对 1973 年的最初计划作了某些修改”。这些修改“也反映在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上”,“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受到限制”。

2 月 《经济报》第七期发表一篇文章:《在纯产值的基础上》。文章称,从 1973 年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试验,根据纯产值指标制订计划和评价工作。说许多机器制造部门的企业参加了这种试验。纯产值“是在企业和部门范围内新创造出的价值的概括性指标”,“等于商品产值和物质消耗(包括折旧提成)之间的差额”。宣传它“比其他价值指标能更好地反映出企业和部门对创造国民收入的实际贡献”。

2 月 截至 2 月底，绝大部分加盟共和国都举行了党中央全会,贯彻苏共中央 1972 年 12 月全会精神和决定各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任务。这些全会透露了 1972 年 12 月全会的一些内容和批评各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对工业方面提出的批评最多。如：劳动生产率没有达到要求增长的指标,生产设备利用不好,消费品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不到要求,基本建设的资金和人力分散,未完成的工程项目逐年增多等等。在农业方面,一般都强调去年气候不好,经过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就”，政策是“正确的”。农业中批评较多的是畜牧业,说畜产品率低,牛奶普遍没有完成 1972 年收购任务等。

据透露，勃列日涅夫在12月全会上要求经营管理工作作出“根本转变”，“大大改进”计划工作和领导作风，并提高“群众积极性”。

3 月

3月3日 《真理报》刊登科学院通讯院士阿法纳西耶夫的一篇文章，谈经济管理问题。文章要求国家计委加强同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作斗争。批评投资有绝对平均主义的现象，有些企业为追求利润只生产对自己合算的产品。提倡建立跨部门大型联合公司，说现在全苏有九百个大型联合公司，其生产占全苏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十。责怪一些部“根本不想建立跨部门的联合公司”。文章论述了完善经济管理的途径，称社会主义生产集约化和提高效率是发展经济的“基本路线”。

8月15日 《真理报》又发表社论，批评“有许多部对建立联合公司采取了畏首畏尾的态度”，“未表现出应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点名批评了机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轻工业部，建筑、筑路和公用工程机器制造部。社论还透露，有的地方把已经成立起来的联合公司“又划分为许多小的单位”，“在专业化的借口下，这些联合公司被肢解了”。说“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倾向妨碍成立联合公司”。

《消息报》等也透露成立联合公司的做法遭到抵制。

3月6日和20日 勃列日涅夫分别电贺哈萨克农业工作者会议和乌兹别克青年玉米种植者会议，夸奖他们扩大谷物

播种面积和种植玉米等做法。

在此前后，《农村生活报》曾于2月24日和3月7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提高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播种面积是增产粮食的"主要潜力"。4月11日，《真理报》、《农村生活报》等强调"要特别重视玉米"，说它是"第二主要粮食作物"，"产量高于小麦"。

3月6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给各民族共和国颁发"人民友谊勋章"。

勃列日涅夫于7月、8月、9月分别到乌克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授勋；波德戈尔内7月到俄罗斯联邦授勋；基里连科10月到格鲁吉亚授勋；11月，柯西金到白俄罗斯，苏斯洛夫到立陶宛授勋；12月，马祖罗夫到吉尔吉斯，波利扬斯基到塔吉克，波德戈尔内到拉脱维亚，安德罗波夫到爱沙尼亚，谢列平到土库曼分别授勋。1974年1月，佩尔谢到摩尔达维亚，库拉科夫到阿塞拜疆，葛罗米柯到亚美尼亚，格列奇科到鞑靼自治共和国授勋。

3、4月间，各加盟共和国纷纷举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思想政治工作和国际主义教育问题"。其中，在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兹别克、乌克兰等的会议上，都指名批评民族利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指责一些历史学家把"过去理想化"，"背离阶级分析的立场"。

3月16日 美联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规定凡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将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5月30日，美国报纸又报道，苏联在1972年12月25日曾公布一项法律，禁止苏联公民同外国人会见和向他们传播

有关苏联的捏造的或污蔑性的消息，并规定凡进行书写和散布反对国家和共产党的言论的反苏活动是有罪的。这项法律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执行。

3月18日 合众国际社据塔斯社报道称，苏联建筑师们正在制订计划使莫斯科今后变成一个部分在地下的城市。这项计划将使餐厅、电影院、商店和展览厅转到地下。“该工程将同莫斯科市今后十五——二十年的总发展计划密切配合”，地下铁道“将从目前的九十英里扩建到一百九十八英里”。

3月20日 索罗金在《经济问题》杂志第三期发表一篇文章，强调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驳斥要求优先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所谓“新观点派”。批评他们“认为在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优先发展甲类正被更加迅速地发展乙类所代替，重工业把发展速度方面的优先地位让给轻工业，国民收入的消费部分急剧增加”。文章还说，认为苏联生产资料“过剩”是没有根据的。批评1965—1971年间“未能提高用于乙类的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说科技进步，农业和服务行业的工业化，消费品的迅速增加都要“优先发展甲类”。

文章还说，“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时期，也是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时期”。“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仍要优先发展甲类，……这是发达社会主义时期再生产的新的重要特点”。

4月间，《经济问题》杂志第四期又刊登库德洛夫和夏皮罗的一篇关于两大部类关系的文章，认为现在还要优先发展第一部类是“简单化和错误的”。该文同索罗金的文章是针锋相对的。文章认为，“从1968年开始，乙类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

甲类的发展速度”。说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生产资料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之后，已经没有必要优先发展第一部类”。文章认为，把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规律绝对化，并奉为永久性的规律“是不正确的”。说在当前的条件下，消除个人消费的落后现象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加速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重要的条件”。

3月21日 哈萨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在共和国内成立两个新州：杰兹卡兹甘州（州府为杰兹卡兹甘市）和曼格什拉克州（州府为谢甫琴柯市）。

3月21日 特务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在以色列报纸上透露，“苏联已决定非正式地停止向要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征收教育税”，他说，“将不取消这种赋税，也不对这项法律作任何修改，但是，不再征收这种赋税”。

他还说，“这个决定是美国参议院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参议院扬言要拒绝给苏联以贸易最惠国地位，除非苏联取消这种赋税”。

3月22日 亚美尼亚党中央举行全会，解除了该党中央第二书记捷尔一加扎里茨扬的职务，由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原副部长阿尼西莫夫接任。

4月23日，亚美尼亚党中央又举行全会，解除了该党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中央局候补委员斯捷潘尼扬和中央局候补委员萨基扬的职务。

第一书记科钦扬在会上作报告，指责一些身居要职的人不守纪律，列举一些人营私舞弊，侵占国家财产等，透露中央和地方撤换和处分了不少“无能的”领导人。

全会还作出了《关于非法建造私人别墅问题》的决议。

3月23日 瑞典共产党机关报《星火》第十一期刊登一篇文章:《苏联参与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文章说，苏联“向贫穷国家的出口价格往往高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价格”，而苏联“从贫穷国家进口的许多物资的价格往往低于西方国家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价格”。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发放有息贷款等各种形式的资本输出”，苏“提供印度的贷款不仅有利息，而且附有印度提供苏联所需的原料和半成品等条件”。

3月27—29日 苏军举行全军第五次党组织书记会议。苏斯洛夫、杰米契夫等出席会议。格列奇科和叶皮谢夫在会上作了报告。

格列奇科谈到要提高党和政治工作的作用，他说，这是由于“国际形势复杂、意识形态战线上斗争加剧，而对武装力量提出新的要求”。他说，党中央“在解决重大国民经济任务时总是把国防问题当作注意的重点，没有那一个问题不是由党中央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政治局直接过问的”。

他说，“帝国主义在国际事务中首先考虑的是武力”，因此在苏联政策中要把“爱好和平同给侵略者以应有打击结合起来”。他认为世界战争一旦发动起来，“将是一场最激烈的阶级冲突”，“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高度战斗准备目前具有特殊意义”。

叶皮谢夫强调这次会议是“进一步提高党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动力”。

这次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党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党

员和全体人员做思想教育工作"，"保证陆海军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地方居民中的群众性政治工作和防御工作，积极参加对青年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决议还要求党组织"经常关心加强一长制"，"增强命令的威信"，以及"加强军纪、遵守条令规定的制度，根除事故和同不道德现象作斗争"。

《红星报》4月24日发表社论，说要防止帝国主义的"思想颠覆"，打击军队中的"异己观点"。

3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的科学队伍问题》。文章说，苏联现有科学工作者一百多万人，科研机关五千三百零七个(包括八百二十四所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工作者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各科学院占百分之十点三，工业企业占百分之六。认为基础研究人员和费用应占科学工作者总数和科学总开支（1971年为一百三十亿卢布）的百分之十五——二十。说在拟定扩大科学队伍的十五——二十年计划时要注意下列问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各主要科学部门之间力量分配的比例问题；优先增加各科学部门内从事新课题研究的人数；增强科学干部的专业知识和机动性等。

3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五期刊登一篇书评，介绍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鲍久尔所著的《城乡接近的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一书。鲍久尔在书中说，在过渡时期城乡对立将消失，但"城乡之间的社会差别将继续存在，直到共产主义建成"。说要使城乡接近"必然要求农业变成一个同工业相接近的物质生产部门"。"把农业劳动变成一种工业劳动，同时扩大和全力发展农工联合企业和综合体"。书评说，苏共中央支

持摩尔达维亚关于把领导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合办联合企业的生产活动的职权交给该共和国的和区的集体农庄理事会的建议。说“这是完善农村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

3月 《经济科学》杂志第三期载文谈私人经济在农产品生产中的地位。文章谈了如下情况：(一) 1971 年，私人经济的播种面积为六百七十万公顷，占各种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百分之三点二，大部分用于种土豆、蔬菜和瓜类作物。1971 年私人经济生产的粮食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一，向日葵占百分之二，土豆占百分之十三，蔬菜占百分之三十七。(二)私人经济饲养的牲畜，牛占全国总头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其中奶牛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五)，猪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二，羊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私人经济生产的肉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五，牛奶占百分之三十五，蛋占百分之五十。(三) 私人经济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

4 月

4月2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布《关于改组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 1973—1975 年工业改行二级或三级管理体制。即部——生产联合公司或部——全苏工业联合公司——生产联合公司。取消总局。某些部门也可实行四级管理制：部——加盟共和国部——加盟共和国工业联合公司——联合企业、企业。说工业各部门在取消多级制后，大部分生产经营问题直接集中到企业和联合公司解决。

《真理报》4 月 4 日就此事发表社论，说改组的“主要目的是使行政领导机关接近生产”。“现在经济活动中的大多数问题将直接在企业、联合企业和联合公司中解决”。

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苏联工业管理改革“抄袭了美国公司的做法”。“苏联公司将具有比原先大得多的财权”，现在“可以主动地建立推广新技术和制造出口产品的基金”。“这次改组是 1965 年以利润为方向的经济改革的产物”，但仍“保持基本由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

《经济报》第十四期发表了部长会议批准的《联合公司总条例》。

4 月 4 日　《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编辑部文章，激烈批评谢列斯特在 1970 年写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文章说，谢列斯特“过多地渲染过去的乌克兰”，而对十月革命的胜利等则“轻描淡写”，把“乌克兰哥萨克理想化了”，“脱离苏联整个发展来探讨乌克兰历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文章指责谢列斯特把乌克兰的经济成就同苏联的整个发展“隔绝开来”，不提“各兄弟民族的合作和互助”而强调共和国经济自给自足。“以全人类的、抽象人道主义的立场来解释一系列文艺概念和现象”。

此外，文章还指责谢列斯特“散布自我安慰感、自矜自诩和妄自尊大感”等等。

4 月 13 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苏联两位经济学家在一份非官方的研究报告中说，“苏联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是用于防务”。据他们估算，“苏联 1969 年的国防预算是八百亿卢布（不包括国防工业的投资）”。1965 年，“有三千

万人直接或间接地为国防工作”。

4月17—18日 乌克兰党中央举行全会，谢尔比茨基在会上作关于改进干部工作的报告，指责“某些领导人对民族局限性和地方主义表现采取无原则的容忍态度，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产生不良影响”。说要“坚决制止任何企图宣扬民族主义观点的行为”。

指责许多部门的干部工作有“严重错误和缺点”，点名批评了敖德萨、赫尔松等州“严重违反党的干部工作原则”。全会撤销了管干部工作的一个副部长和一个局长的职务。

据西方报纸说，乌克兰各级组织中遭到清洗的达数百名之多。

7月26日，勃列日涅夫去基辅授予乌克兰人民友谊勋章时声称，党、政和经济领导干部经常更换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让那些工作得很糟，对自己的职务不能胜任的人过久地留在他们的岗位上，那就更坏了”，“应当让位给更有水平、更有才干、更有干劲的优秀专家和组织者”。

4月19日 《红星报》刊登扎维亚洛夫中将的一篇文章，说一旦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其特点将是：(一)按其政治内容来说是“两个对立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斗争，具有最坚定的目标”。(二) 作战的双方各自结成联盟。(三)“根据武装斗争的手段，它将是一种热核战争”。(四)“不可避免地具有洲际的规模，这就改变了我们关于前线和后方、关于主要的战略打击目标、关于后备力量等等的概念”。

《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二十期(10月)称，“来自反

社会主义、首先是反苏势力的核战争威胁本身就是反动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现在就说侵略者发动战争时不可能使用核武器,还为时尚早。”

《红星报》5月17日刊登莫斯科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教授米洛维多夫少将的一篇文章,指责一些军事著作“在关于火箭核战争的本质和后果问题上犯有错误”,“把核武器毁灭力的数学计算绝对化了”。

4月25日 塔斯社报道,尼古拉·别哥夫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按:别哥夫原为苏联驻印度大使)。

4月26—2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对外政策报告。全会就对外活动问题通过决议,吹捧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活动中的“重大个人贡献”。全会以“退休”为名解除了谢列斯特和沃罗诺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格列奇科为政治局委员,罗曼诺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列比洛夫(司法部部长)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塔斯社5月7日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谢列斯特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沃罗诺夫的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据法国《巴黎公报》1972年9月报道,自勃列日涅夫1966年任总书记起到1971年底止,“苏共中央委员会有百分之四十七的部长换了人”。“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各部领导机构,有百分之六十五换了人”,“换了百分之十的(加盟共和国)政府主席”。军队方面“一半以上的国防部副部长是新人,各军区司令都换了人”。

4月28日 西方通讯社据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报道，苏联已开始生产一种专门进行空中摄影的“安东诺夫—30”型飞机。“主要是用于科学工作”。这是一种双引擎、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飞机，头部是玻璃的。“机上有四架巨大的摄影机，由一个中央控制板制导，其中一架装在常平架上”，“这些摄影机以及一个曝光表，通过机身中心下面的五个窗口工作”。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侦察飞机”。

4月 《旗帜》杂志第一期至第四期连载《文学报》总编辑恰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围困》的第四部。这一部分着重描写1941年列宁格勒的一次突围战役。

斯大林在小说中占较重要位置。小说对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作了一些正面的叙述，但对其性格、作风、内心活动以及外表则作了许多渲染和臆测的描写。

小说第四部发表后，《共青团真理报》评论说：“恰科夫斯基的这部小说是纵览这次战役全景的头一部作品。”

4月 采购部部长齐亚·努里耶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格里戈里·佐洛图欣接任采购部部长的职务。

4月 《计划经济》杂志第四期报道，在制订1976—1990年长期计划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到部门观点和地区观点相结合”。“重新审议了国家的经济区网”，确认按七个大经济区制定长期计划“是合适的”，即：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和中央地区，苏联欧洲部分的南部地区，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地区，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和中亚。

5 月

5月1日 报纸报道勃列日涅夫获得“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在报道各地“五一”庆祝活动时，突出对勃列日涅夫个人的颂扬。

美联社注意到《真理报》一天中提到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名字就达七十二次之多，这是自从赫鲁晓夫统治以来空前未有的。

在庆祝会上，苏共领导人像片不再按字母顺序排列，而把勃列日涅夫放在第一位。

5月4日 《农村生活报》编辑扎科卢平在庆祝出版节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说“苏联出版约七千种报纸，其一次发行份数为一亿五千多万份”。“《真理报》每天发行量达一千万份。”

5月4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苏联上周发向月球的一枚火箭坠落在太平洋里”。“这次发射‘月球车’的失败是紧接着4月14日发生的一次事故之后发生的，那次事故损失了一个‘礼炮号’空间站”。这两次失败使苏联损失了七亿多美元。说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是由于“‘质子号’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没有开动起来”。

5月14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新修改的《关于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条例》，规定授予称号和奖赏的办法，并规定凡两次获得上述称号的人“在家乡建立刻有题词的青铜半身雕像”，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享有苏联法律规定的优待”。截至1971年9月1日，“获得苏联英雄

称号的有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七人，其中两次和多次获此称号者一百二十六人；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有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五人，其中两次和多次获此称号者一百零五人”。

5月下旬 科学院哲学和法学部所属社会科学部门工作者举行会议。会议提出哲学界目前存在“机械搬用资产阶级学术系统中的研究方法”和“充满西方流行的假科学术语”现象。说出版的哲学书质量“很不高”，送出版社的手稿“粗制滥造”。

5月21日 塔斯社报道，苏联元帅伊凡·科涅夫病死。

5月31日 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在迁居方面的优待办法»的决定，规定向移民提供数额不等的“现金补助”、“建筑住宅”和“购买奶牛等大牲畜”的贷款。规定移民在八年内“免交农业税”，两年内“免收房费并免费供给他们燃料和公用设备”。对移居远东、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哈萨克等地的移民“优待”最高。

美国«纽约时报»8月5日专稿说，苏联当局鼓励在靠近中国的地方移民，“这一措施同前些时候更改苏联领土上的用汉语发音的地名相关连”。文章还说，苏联当局近年来虽采取了许多物质引诱的办法，以鼓励向西伯利亚移民，但从1959—1970年期间，迁出西伯利亚的人超过了移居西伯利亚的人数。在这十一年期间去那里的每二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留了下来。

6 月

6月1日 美联社记者霍夫曼报道，美国情报人士说，一种“射程四千六百英里的 SSN_{-8} 导弹已装在苏联第一艘 D 级潜艇上，可供作战使用”。这将使 D 级潜艇“能够比俄国较老的Y级潜艇从更加广阔得多的海域把导弹发射到美国城市”。

6月3日 苏美签订价值八十亿美元的化肥贸易协议。

6月3日 苏联参加巴黎国际航空展览会的“图—144”客机在表演时坠毁，机组人员全部死亡。

在这之前，5月29日，苏联驻法国空军副武官曾在航空展览会上偷仪器当场被逮住。

6月4日 《真理报》刊登伊·索洛维约夫的一篇文章，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在学术辩论的借口下，不仅恶意抨击“苏联学者创造性的探讨”，“而且还对党的文件中的重要论点提出疑问”。作者列举《计划经济》杂志 1972 年第七、九、十期上阿·卡茨的文章，1973 年第五期上别利克和克隆罗德的文章为例，批评别利克对科学的经济预测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人为地把预测工作和计划工作对立起来”，指责克隆罗德“企图诋毁有目的的管理方法和纲领性的计划方法”。

刊登在《计划经济》杂志第五期上的上述两篇文章对科学院院士费多连科和鲁米扬采夫等人关于远景规划中“科学预测”的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别利克的文章说，对科学预测的作用估计过高“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性”，说“认为苏联计划就是计划一预测这种资产阶

级观点"在三十年代初已"被彻底揭穿"，而某些人却"把预测冒充为经济学的最新成就"。

克隆罗德的文章谈到在计划和经济领导方面的两派观点，他认为一派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另一派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宣布要建立某种新的所谓"结构政治经济学"，他指责费多连科的"目的论"是"现代美国经济计划学家从新实证论方法的原则出发制定的国家垄断经济的一种规划方法"，把这种方法应用于苏联"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7月，费多连科在《经济问题》杂志第七期发表一篇文章，说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是"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日益增长的影响"，控制论和经济数学模式正成为"当前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条件"。对经济的研究"要采取新的理论和方法学观点"，攻击计划经济的理论结构。说1976—1990年的远景计划已部分采用了"国民经济综合计划体系的原则"，这种体系"把长期预测、国家发展的目标和长期综合纲要综合成一体"。

经济学家比尔曼也曾在《各族人民友谊》杂志第三期发表一篇文章，论述经济管理科学中技术数学派和组织经济派两派的观点，并自称是属于组织经济派。

11月底，苏共中央召集经济学家开会讨论"经济学的迫切任务"，据《经济报》第四十七期报道说，会上强调指出"必须进一步探讨用经济数学方法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模制和预测的理论和方法学原理"。

6月8日 苏美签订苏联向美国出售一百亿美元天然气

的"意向协议"。

6月8日 苏联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八颗卫星："宇宙564号"—"宇宙571号"。

6月12日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苏联当局正在镇压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许多非法电台。这些电台广播西方音乐，还广播反政府的政治材料。仅在伏尔加河一带这种电台就曾有几十家之多。苏联当局认为这种电台是"一种特别严重的威胁"，因为它们的听众比散发地下出版物的持不同政见者多得多。现在，"每晚有数百辆装有无线电定位器的专车在苏联各主要城市的街道上行驶，试图找出这些播音者"。

"一些没有得到许可的电台广播者正在喀山受审。"

6月19日 共青团中央通过《关于滨海边疆区共青团委员会在改进团内工作、提高共青团员对执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要求的责任心方面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批评该区许多团组织"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工作的水平还不符合当代的要求"，"对不履行团章义务的现象不进行批评"，"低估共青团大会的作用"。决议下达后便解除了海参崴市团委第一书记楚勃和第二书记科尔斯科夫的职务。

6月27日 一条从西伯利亚到苏联欧洲部分的输油管干线竣工，这条输油管长二千二百公里。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为此致电祝贺。塔斯社4月2日报道，这是苏联国内最大输油管，自萨英特洛尔——秋明——库尔干——乌法到阿尔麦季耶夫斯克。

6月 《经济报》第二十六期刊登乌兹别克国家计委主席齐亚杜拉耶夫的一篇文章，抱怨一些全联盟部很迟才把位于

乌兹别克的全苏工业企业的发展方案下达到共和国，多次修改已确定的生产和基建计划而不通知共和国的机关。主张“一切改变都要经过加盟共和国同意”，“国家计委只有在加盟共和国代表参加下才能研究和制订各工业部门发展计划的方案”。文章还要求进一步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某些权利。

7 月

7月3日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论党的建设的迫切问题》出版。塔斯社吹捧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性和党性的典范”。

7月6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农村普通中学工作条件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谈到农村中学有二千二百万学生，占全国中学生的一半，而教学水平落后于当前的要求。为了普及中等教育，强调每个农场和大的农庄应办中学。决议还详尽规定了在农村扩建和新建学校的措施。

7月9日 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向瑞典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今日苏联是一个缺乏自由、平等、民主而统治制度官僚化的社会，是“国家完全控制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程度比西方国家高，是“一个完全受阶级支配的政权”，这个政权“只想维持现制度和体面地保存其内在的一切严重弊病”。说苏联存在“特权阶层”，“整个提升制度是同特权阶层内部的相互关系密切有关的”。

萨哈罗夫发表谈话后，塔斯社发表评论指责萨哈罗夫“污

蔑苏联及其生活方式”。

8月16日，副总检察长马利亚罗夫召见萨哈罗夫，责令他不要再会晤西方记者，不再发表谈话。

8月21日，萨哈罗夫在苏联侵捷五周年时又向十来名西方记者发表谈话，说如按照苏联条件搞“缓和”，西方就将同一个“全副武装的”、“对邻国是威胁的俄国”打交道。

7月17—19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会议议程是：(一)关于国民教育状况和进一步完善普通中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措施。(二)关于国民教育立法原则。(三)关于国家公证制法。会议就这些议题通过了相应法案。

马祖罗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国民教育的报告。

司法部部长捷列比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国家公证制法》草案的报告。

《消息报》7月20日公布《国民教育立法原则》和《国家公证制法》全文。

《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现在已实行八年义务教育制，向普及中等教育的过渡即将完成。规定国民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出“有学问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认为普及中等教育、完善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是“逐渐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本质差别的重要因素”。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要培养出“高级技术专家”。

《国家公证制法》由四章组成，规定了公证机构的任务及其活动的基本原则以及公证处的权限范围等。说要通过公证活动来“杜绝违法现象”。其中专门有一章规定对外国人和没

有公民身份的人行使公证法的问题。

7月25日 《社会主义工业报》报道，苏联发明一种喷气钻探火箭，仅用十八秒钟就钻出了一口十七米深的水井。一台这样的装置可以钻几十口井，井的成本将微乎其微。试验型火箭的功率是五万马力，长一米半，装载的燃料二百公斤左右。

7月28—30日 格鲁吉亚党中央举行全会，谢瓦尔德纳泽在总结发言中说，"共和国某一部分居民不相信纠正过去错误的方针会具有现实基础"，对"整顿共和国秩序"的各项措施有争论，但是"对战略提出异议的人是不多的，所争论的是策略，是整顿秩序的方法"。表示"如果我们允许妥协的话，我们的妥协也是暂时的，迫不得已的"。

他说，在格鲁吉亚"出现了在经济上有特权的分子和集团"，在他们手里非法集中了通过不正当途径得来的大量收入，已揭露出"一伙伙有组织的犯罪分子、阴谋家、贪污分子、诈骗犯和其他危害我们社会的人"。否认西方所传格鲁吉亚曾发生群众游行示威，但承认"出现错综复杂的过程"。

10月3日，基里连科去格鲁吉亚授"友谊勋章"时，强调苏共中央支持该共和国的"整顿措施"，要求"进一步加强纪律"。

7月31日 《红星报》报道，红旗太平洋舰队7月29日在阿穆尔湾为"庆祝苏联海军节"举行了军事检阅。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去海参崴参加了这一活动。

8 月

8月4日 塔斯社报道,苏联人口已达到二亿五千万。

8月10日 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刑满释放后获准携带家属离苏联抵法国。

8月13日 奥地利《新闻报》报道,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掌握的情报说,华沙条约国的首批战略坦克部队更换装备,改用新型的苏联T-62型坦克。被淘汰的T-54和T-55型坦克装备了在中国边境新建的苏联部队,但有几百辆存放在东德地区。

8月15日 勃列日涅夫在阿拉木图向哈萨克授“友谊勋章”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说垦荒是“苏联人民的杰出功绩”,使哈萨克草原“获得新生”。他说,哈萨克畜牧业的“意义可以大胆地和垦荒相比”,“应当象当初抓开荒那样,毫不拖延地、极其顽强地抓”养羊业。

8月21日 《消息报》刊登部长会议《关于农庄庄员做季节性临时工》的决定,指出很多地方违反规定,不凭介绍信任意招收工人,规定农庄、农场和联合组织根据现行法律与临时工签订合同时,后者须持有农庄管理委员会的证明信,所付工资必须符合农庄、农场中同工种的工资率和物质奖励制度。

《苏联政府决议汇集》第十二期刊登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农业中辅助企业和副业活动的措施》的决定,指出农业副业活动中存在“严重缺点”,许多农庄、农场的企业往往从工业或非农业企业中去招工并支付高工资,为副业生产非法提

供稀缺物资，任意抬高辅助品价格，农忙时辅助企业的工人不参加田间劳动等。决定责成有关部门消除缺点，并在农业部成立一个农村副业管理局。

8月22日 《真理报》刊登部长会议《关于改进妇女在孕期、产假和照顾病孩期间享受补助金的保障措施》，规定全体女职工、包括非工会成员和雇员，不受工龄限制，在规定的怀孕和产假期内享受相当于全部工资的补助金。

8月28日 《真理报》刊登苏共中央《关于轻工业部工作》的决议。决议指责轻工业部门工作中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如：“产品不合规格”、“品种不符合市场要求”、“许多工厂中生产纪律和工艺纪律的水平仍然很低”、“许多种产品找不到销路”等等。点名批评了轻工业部部长、化学工业部部长和轻工业、食品工业机器和日用器械制造部部长，并对农业部等有关部门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建议”。

8月28日 在《文学报》于2月14日首次公开批判萨哈罗夫之后，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等四十名院士联名发表公开信攻击萨哈罗夫，指责萨哈罗夫发表“诋毁苏联国家制度和内外政策的言论”，“粗暴歪曲苏联现实和蓄意指责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成了敌人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

8月30日，肖洛霍夫等三十一名作家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围攻萨哈罗夫。同日，《消息报》刊登读者来信要求取消萨哈罗夫的院士称号。8月底至9月初，报纸不断登载谴责萨哈罗夫的信件，说他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和平纲领”和苏联对外政策，进行“反苏活动”。9月5日，副总检察长马利亚罗

夫在记者招待会上点名指责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四期发表社论攻击萨哈罗夫，说他“已滑到同世界和平与安全不共戴天的敌人联合起来的地步”。

与此同时，西方通讯社也陆续报道苏联几名科学院院士以及保卫人权发起小组的几名成员发表谈话为萨哈罗夫辩护。

9月9日，美国科学院院长致电苏联科学院院长，警告说，苏联如拘留萨哈罗夫将会严重影响美苏科学合作。

8月28日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近几个月，从苏联各地，从亚美尼亚、塔吉克、阿塞拜疆到俄罗斯本土，都传来对经济犯判处死刑的消息，被处决的人中有农业官员和售货员、银行职员和商店经理。认为苏联当局采取这个无情的决定是由于经济罪的犯罪率太高了。

该报列举了几个被判死刑的例子，说对这些情况作出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克里姆林宫让‘罪犯们’为它的经济计划的失败付出代价”。

8月29日 美联社报道，萨哈罗夫在7、8月间曾签署了三份呼吁书。一份呼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出面维护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两名科学家——鲍里索夫和普柳什；第二份呼吁书对国际精神病学家代表大会未能反对为政治目的而滥用精神病学表示遗憾，第三份呼吁书要求所有精神病学家反对隔离数学家希哈诺维奇。

8月 苏联在陆地上空第一次试验多弹头导弹。美国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8月1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近几周，苏

联已成功地进行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实地飞行试验。

8月 《计划经济》第八期刊登计委委员加里宁的文章，指责“某些经济学家对国家集中分配生产资料的意义估计不足”，说“认为国家对物资实行集中的计划分配已经过时并应尽快代以批发贸易，那是错误的”。

9—10月

9月1日 塔斯社报道，对亚基尔和克拉辛的审判已告结束，主要“罪状”是与外国反苏组织，如西德的“人民劳动联盟”有联系，为西德报刊和电台提供反苏宣传材料。两人均被判处剥夺自由三年和流放三年。9月5日，有关当局举行记者招待会，让亚基尔和克拉辛公开认罪。

11月5日，西方通讯社传亚基尔和克拉辛已经获释，分别“流放”到莫斯科附近的梁赞和加里宁城，认为这是“官方对他们的进一步宽大”。

9月12日 勃列日涅夫1964—1972年的言论集《关于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出版。

9月15日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苏联准备修建四个大型新港口：敖德萨东面的库尔尼茨基河口一个；纳霍德卡港附近两个（弗兰格尔和沃斯托奇内）；北冰洋畔的摩尔曼斯克附近一个。

9月23日 《真理报》报道说，塔什干出现“武装匪徒”，打死了一个民警，并打伤一名内务局长和一位民警少尉。

合众国际社9月3日还报道苏联一公民在列宁墓内爆炸了一枚自制炸弹，把自己和另外两个参观者炸死。

美国《洛杉矶时报》12月9日报道说，苏联有些家庭不择手段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并援引《共青团真理报》的材料，列举有人在果园里埋地雷，有人装电网或土炮，有人在门上装自动弩弓等，以致把人炸死、电死或弄成残废。

9月27日 苏联发射"联盟—12号"载人飞船作两昼夜的实验性飞行，考察近地宇宙，塔斯社说这次飞行是改进有人驾驶飞船工作的阶段之一。

9月29日，飞船下降装置返回地面。

9月29日 《真理报》刊登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吸收退休职工参加劳动及给他们以优惠待遇》的决议。决议为参加劳动的退休职工规定了补充优待办法。

10月1日 部长会议宣布降低一些商品的零售价格。"波伦尼亚"牌尼龙外套和上衣、卡普隆男女针织上衣、人造丝女针织内衣、合成膨体纱针织外衣等分别降价百分之二十——三十。人造纤维童装降至棉布童装的价格。

苏联广播电台12月23日广播说，"个别种类的高级食品和皮货"提高了价格。

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党中央7月全会上也曾透露格鲁吉亚"有时出现提高消费品、甚至食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的现象"。

10月3日 苏联发射九颗人造卫星。其中"宇宙589号"——"宇宙595号"八颗卫星是用一枚火箭发射的。这是今年第二次一束发射八颗卫星。

西方军事专家说，这些发射显然同发展多弹头导弹有关，类似美国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10月5日 国家科委以及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批准《关于对工农业、交通邮电等企业的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实行鉴定制度》的决定，规定每隔三年对上述人员进行一次鉴定。鉴定办法是，由党、政、工、团领导给被鉴定人写评语，对他的“生产活动，业务技能，遵守国家纪律和生产纪律，以及参加社会活动等情况”提出意见。鉴定委员会根据批语采取“公开表决”的方式对被鉴定人作出“适合”或“不适合”所任职务的鉴定，并可提出“提升”、“奖励”或“调任其他工作”、“废除劳动合同”等建议。条例规定，由上级机关任免职务的企业领导人不属鉴定之列。

10月11日 苏联新成立畜牧业和饲料生产机器制造部。别利亚克被任命为该部部长。

10月12日 《消息报》报道，莫斯科五家商店试行集体计件工资制。以每一千卢布的商品额来计算工资率。

10月17日 格列奇科七十岁生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第二次“苏联英雄”称号，并在他的家乡树半身铜像。

10月18日 《红星报》报道，防空军火箭高炮兵司令邦达连科中将10月13日因客机失事“悲惨死去”。

美联社12月17日报道，十五个月来，已知坠毁的苏联民航飞机达十七架。为此，《民航》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强调“增进飞行安全”，民航部部长布加耶夫为此召开部委员会特别会议。

10月26日 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世界和平大会”上发表讲话，宣称今年取得“好收成”，“将获得二亿一千五百万吨谷物”，“收购的原棉将为七百五十多万吨”。

10月26日 苏联元帅布琼尼逝世。

10月29日 格鲁吉亚党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党组织工作和“加强党纪国法”问题。一名中央委员和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因贪污巨款(约七十万美元)和出售毕业文凭受贿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撤职逮捕。

第比利斯市11月12日也召开会议，市执委会正副主席以及内务局长等多人均被撤职。

12月21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解除和任命一批政府成员，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卫生部长、建筑部长、商业部长、地方工业部长、电影委员会主席、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经理等。

10月 作家协会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近年来的历史和革命历史小说”，动员作家利用历史题材写小说。奥斯科茨基在报告中吹捧扎格列贝尔纳依的历史小说《基辅之死》，说作者肯定了“统一大俄罗斯”的基辅大公尤里·多尔哥鲁基(约1090—1157年)的“历史正义性”，在小说中“同现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念进行了内在的论争。”他还吹捧格·阿巴希泽一部描写中世纪格鲁吉亚同蒙古鞑靼族斗争的小说《漫漫的长夜》，鼓吹所谓“黄祸论”，说小说“在客观上揭露了今天公开主张沙文主义的政治家们的称霸野心，他们正从黑暗的世纪中复活成吉思汗的可怕形象”。

11—12月

11月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民航部部长、空军上将鲍里斯·布加耶夫和防空军事学院院长、空军上将格奥尔基·齐明以空军元帅的军衔。授予北方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格奥尔基·叶戈罗夫和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尼古拉·斯米尔诺夫以海军元帅的军衔。授予火箭兵和炮兵司令、炮兵上将格奥尔基·佩列杰利斯基以炮兵元帅的军衔。授予通信兵司令、通信兵上将安德烈·别洛夫以通信兵元帅的军衔。

11月5日 作家科切托夫病死。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四十九名党政和文艺界领导人签署的讣告称科切托夫为"苏联杰出的作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1月5日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航海船队（包括运输船队和渔船队）的总吨位已达一千六百七十万吨（占世界第五位），约有七千艘船，在通往国外的五十条航线上航行。

《经济问题》杂志1972年第七期刊登一篇谈海洋经济的文章，说苏联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捕鱼船队"，从1958—1968年的十年中，在公海的捕鱼船增加了一倍。据台湾《自立晚报》1972年统计，苏联渔船总吨位已超过六百五十万吨，每年捕鱼量约五百万吨。

11月6日 基里连科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作报告，吹嘘1973年工农业取得"辉煌的劳动成果"，"谷物达到了最高的总收获量"，"棉花空前丰收"。要求"进一步争取苏联经济的高度效果，改进经营方法"。说党认为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

"具有首要的意义",三年中间有三分之一的职工"提高工资","用于消除环境污染专门措施的投资约为二十九亿卢布"。吹捧勃列日涅夫"政治经验丰富、深刻理解时代精神和具有高度党性原则"是"列宁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共运和工运杰出活动家"。

11月7日，莫斯科举行阅兵式(这是1969年以来第一次举行阅兵式)，展出了两种新式武器，一种是空降用的微型坦克,五英尺高,十英尺长,水陆两用。一种是新式导弹,西方认为这是一种洲际弹道导弹，可能是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11月6日 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就民警节发表谈话，说民警工作已根据专业化的原则进行了改组。在改变管理制度的同时，也改变了收集和整理情报的制度、计划和监督的制度,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值勤部队,建立流动民警小组。民警的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高了。

11月13日 据塔斯社报道,《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作者伊凡·久巴由于认罪和"真诚悔改",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他进行"赦免"。久巴在《乌克兰文学报》上发表声明,说他对苏联的民族政策的"理解极为错误"。

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一书的作者安德烈·阿马利里克已由三年四刑改判为国内流放三年。

11月21日 《文学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主要题材》,说在文学创作中存在着"某些极为重大的缺点"。"在杂志已发表的作品中,也会碰到一些题材狭小的、企图从现实生活的大道拐到斜道上去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有偏重于古老传统的

倾向”，“过分追求发表那些描写遥远过去的作品，因而明显地挤掉了现代题材”。

11月23日 《塔吉克共产党人报》报道，塔吉克部长会议主席卡哈罗夫已被解职，由原农业部部长纳比耶夫接任。

11月29日 萨哈罗夫宣布，他已要求当局准许他携带全家应邀访美。

西方通讯社说，基辛格签署了文件支持邀请萨哈罗夫去美国。

12月1日 部长会议决定提高残废工人和残废军人以及丧失赡养者的家庭的补助金的标准，三种补助分别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十。

12月2日 《劳动报》载文谈青年工人流动的情况，说1971年俄罗斯联邦由于青年工人流动损失了三十四亿卢布。

据1970年出版的《接班人》一书透露，工业和建筑业人员每年流动一千万人次，每次二十三天。《经济问题》杂志1972年第三期说，1970年工业部门有六百六十三万职工流动，占工业工人年平均数的百分之二十一。

12月5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决定提前偿还公债。规定1974年和1975年每年偿还十亿卢布。现居民手中共有二百五十八亿卢布的公债。

12月6—7日 苏军召开全军干部部门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军队贯彻苏共二十四大《关于做好干部工作》的决议的情况。格列奇科主持会议并作报告，说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军官、特别是卫国战争参加者“变得越来越少”，他们“是宝贵的财富”，“应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同时“必须大胆提拔

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好的年轻军官担任高级职务”。

12月7—1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作关于197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作关于1974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据1974年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农业问题言论集中公布的这篇报告的摘要，勃列日涅夫除吹嘘1973年农业成就外，着重谈农业集约化问题，表示近几年首先要克服农业的“严重落后状态”。他强调要建设大型畜牧场和联合公司，建立农庄合办、农场合办以及农庄农场合办的企业，国家要为此“开绿灯”，拨发资金来为这类企业提供技术设备。他说，合办企业和联合公司“不仅会提高农产品产量，并将提高生产公有化水平，消除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界限”，这是党的“纲领性任务之一”。

勃列日涅夫还谈到工业部门在发展农业方面的任务，透露由于仓库、包装材料、运输工具和加工设备不足而损失了不少粮食和畜产品。

勃列日涅夫还谈到提高经济领导水平和组织社会主义竞赛等问题，认为这是党在经济建设中的两个立足点。

另外，据报道，波德戈尔内12月26日在里加授勋时说，12月全会对计划中的缺点、对计划纪律受破坏、对各个经济领域的严重损失、对提高产品质量和采用新技术的缓慢状况进行了“原则性的、党的方式的尖锐批评”。全会对提高社会主义效能问题给予了“突出注意”。他说，经济发展“要求在经济领导中表现出机动灵活性，改善计划和组织结构，同本位主

义和地方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他指出在经济领导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手”等等。

12月全会后，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陆续举行全会，各系统各行业也相继召开会议，贯彻全会精神。

12月11日 谢尔宾纳被任命为石油和瓦斯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原部长科尔图诺夫已病死。

12月12—14日 第八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七次会议，通过1974年经济计划和预算。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74年工业增长百分之六点八，其中甲类增长百分之六点六，乙类增长百分之七点五；农业增长百分之六点四。

1974年国家预算收入为一千九百四十三亿卢布，支出为一千九百四十亿卢布，国防开支为一百七十六亿卢布（按：前几年一直是一百七十九亿卢布）。

12月16日 《真理报》就苏共中央12月全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发表题为《全党全民的事业》的社论。

社论说，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完成1974年计划以及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福利的根本性原则”，说全会“完完全全拥护”勃列日涅夫讲话中所阐明的原则和结论。

社论说，苏联经济已进入一个转折阶段，质量、提高效率和加速技术进步等成了第一位的问题，而解决新任务常常受到习惯势力和经济机构不灵活的阻碍。要求在经济领域中确定党的工作作风，不能以经济主义、技术至上等观点来对待经济领导工作，要同官僚主义作风、本位主义、地方主义、不负责任和形式主义等表现作不调和的斗争。

农业方面，要把农业集约化提到首位，“使农业生产转到现代工业的基础上”，“从小型畜牲场和生产队逐步过渡到采用工业化方法的大型专业化生产轨道上”。

社论还提出要改进计划工作和消灭违反计划纪律（如供应脱节等）的现象。

12月20日 《苏维埃摩尔达维亚报》报道，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尤麦利科夫被解除职务，由麦连尼谢夫接任。

12月27日 《消息报》报道，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在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进一步发展经济核算制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所有国营农场和农业部系统的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在1974—1975年全部转为经济核算制”。

12月29日 法国出版索尔仁尼琴的新著《古拉格群岛》，西方通讯社说，这本书写的是1917—1957年苏联监狱和劳改营情况，在这本书里对苏联的制度的批评比以前几本书“要直接得多”。“这本书由于逼真地重新提出了斯大林主义问题，也会重新揭开这里的老伤疤，苏联现领导近年来一直试图回避这个问题”。

据传该书下集手稿也已传到国外，主要谈1957年以后的情况。

12月30日 空军主帅康斯坦丁·维尔希宁病死。

12月 据法新社报道，1973年苏联当局批准“创纪录数量”的犹太人移居国外：有三万四千七百五十人获得出境签证。说勃列日涅夫信守了他去年6月访美时对美国国会许下的诺言。

另据合众社报道，有四千四百名日耳曼血统的苏联人被

允许移居到德国。这一年总共有四万多人移居到西方。

1973年 这一年，苏联共进行了十六次地下核试验(按：1969年进行了十二次，1970年进行了十次，1971年进行了十四次，1972年进行了十四次)，发射了八十八个空间运载工具。美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人士说，苏联发射的运载工具中，约有七十五个具有军事目的。